

恍若隔世

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邢同义著. —兰州:兰州大
学出版社, 2004. 10
ISBN 7-311-02435-8

I. 恍... II. 邢...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6416 号

恍 若 隔 世

——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 8912613 邮编: 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12.25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插页: 4 字数: 281 千字 印数: 5001~1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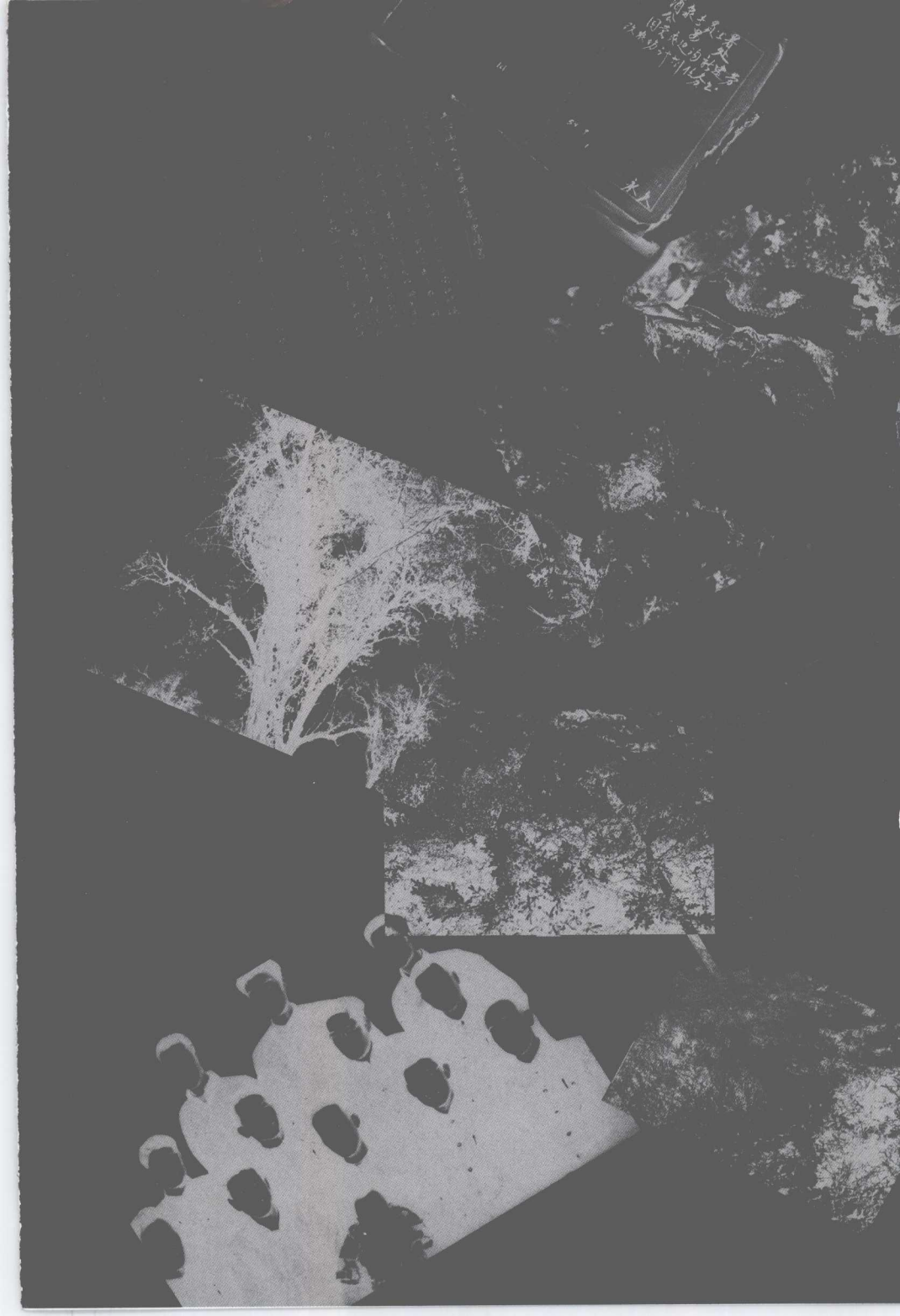
ISBN 7-311-02435-8/I·143 定价: 24.80 元

《恍若隔世一回眸
夹边沟》是作者历时数
载,走访了当时夹边沟、
明水和十工等农场劳教
右派中的健在者,查阅
了有关的历史档案,掌
握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第一
手资料,历时一年半
写成的心血之作。是目前
以夹边沟为题材的作品
中最具有史料价值的纪
实文学作品。

《恍若隔世一回眸
夹边沟》对于一切关心
那段历史的人,是不可
不读的一本书。书中各
具性格的当事人九死一
生的经历和曲折命运,
也赋予作品本身以极强
的可读性。







行止无愧天地
褒貶自有春秋

白春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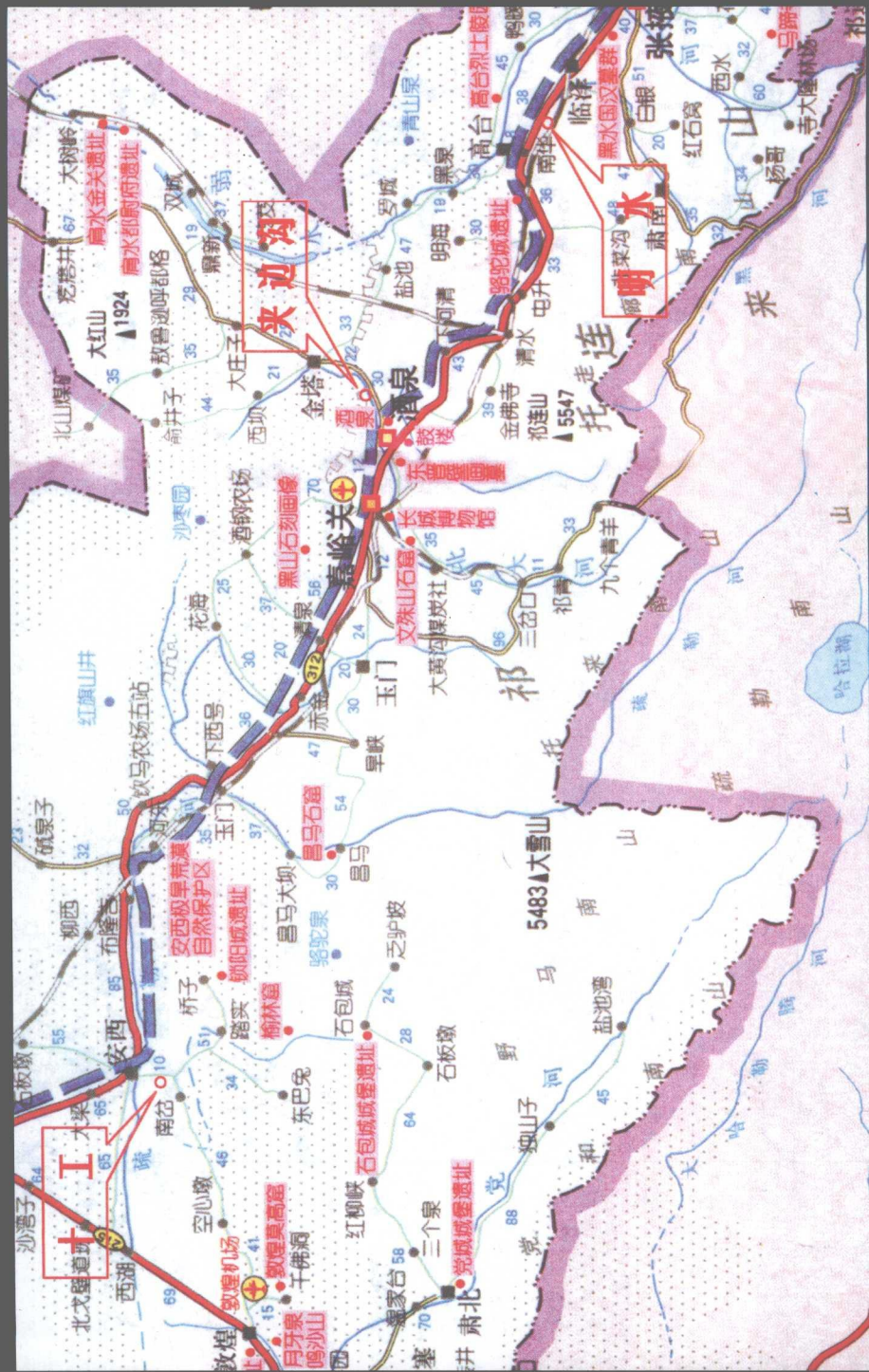


辛巳年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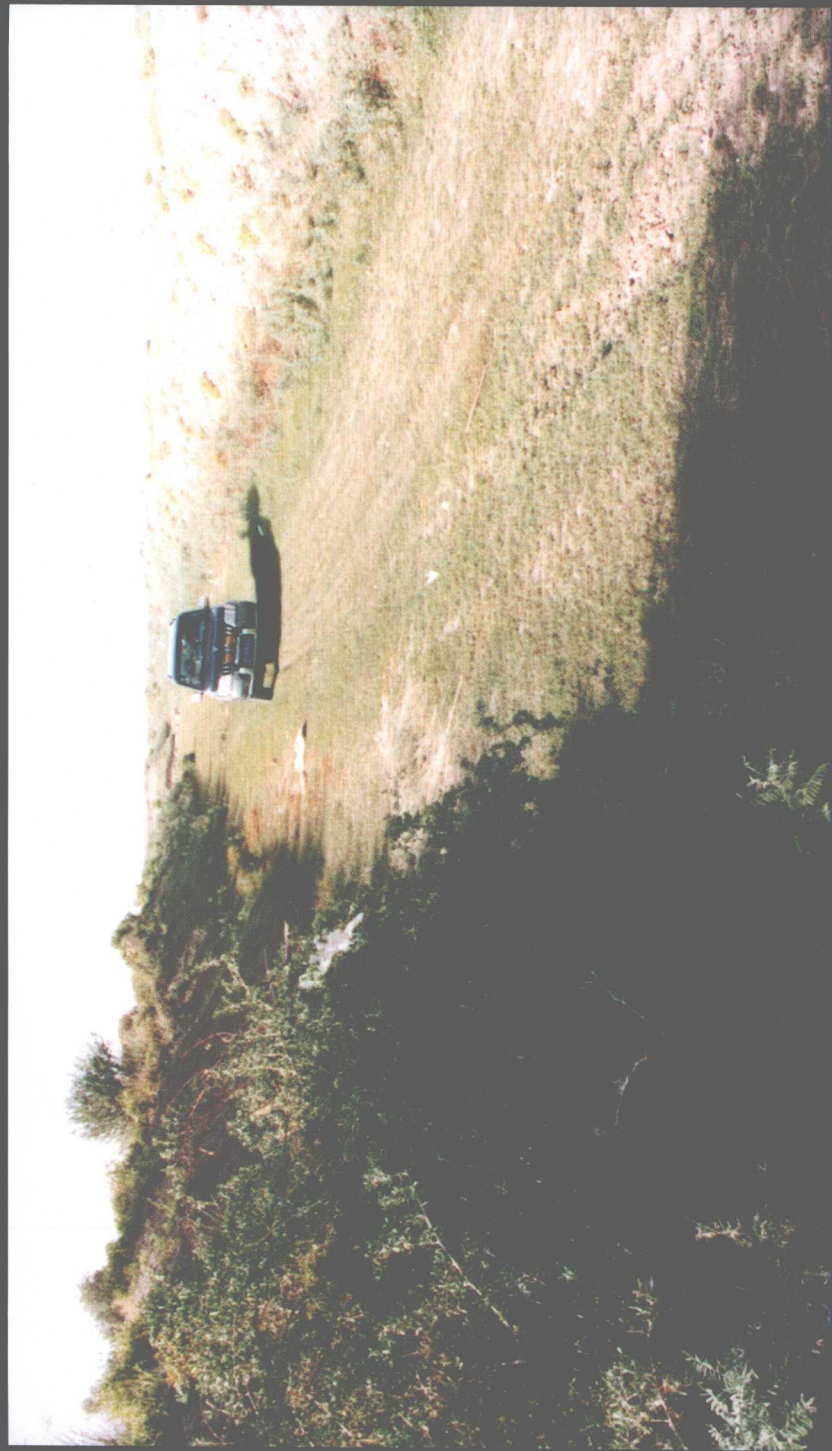


作者采访夹边沟时留影

夹边沟农场地理位置图



当年右派们开垦的土地上纵横交错的大小排碱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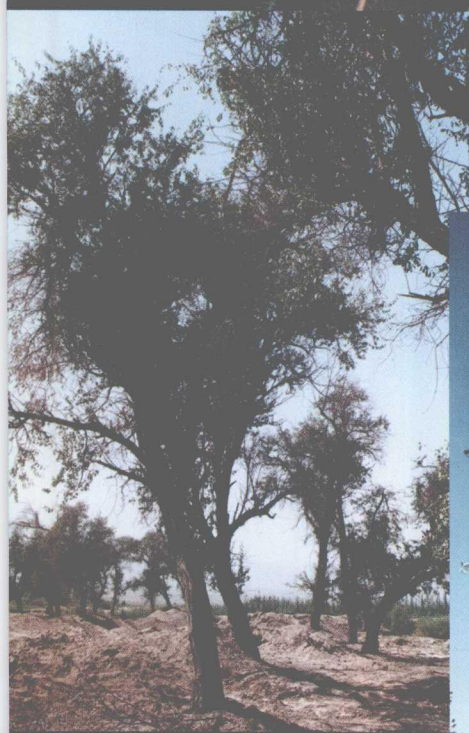
遍布盐碱滩的碱草子，又叫黄茅头。当年粮食极度短缺时，右派们就靠吃它的草籽维持生命。



当年右派们开垦的土地上现在生长着茂密的芨芨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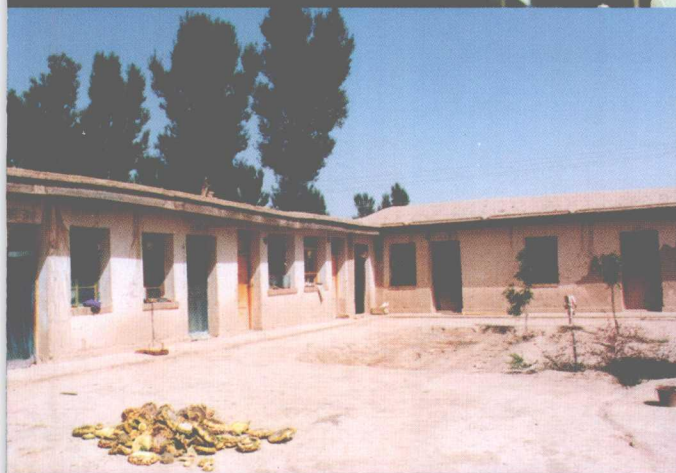
当年右派在新添墩种下的沙枣树



原明水农场的沙枣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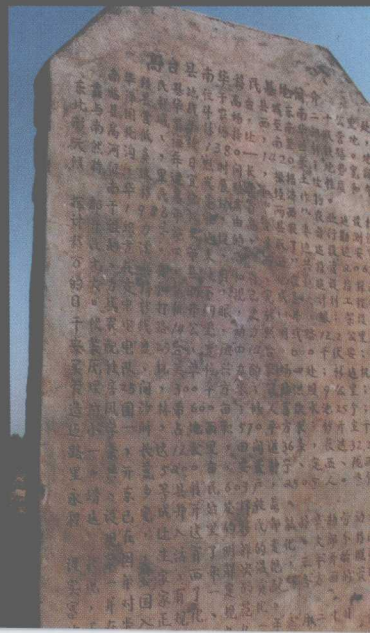


原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右派们栽
植的沙枣树，现已硕果累累。



原明水农场场部

高台县南华镇的移民纪念碑，
座落在明水村旁，即当年
明水农场的遗址上。



原夹边沟农场的旧工房



原夹边沟农场右派开挖的排碱沟，右图为小排碱沟，下图为大排碱沟。



在原明水农场旧址，一个新的移民村已经建成，这是移民村建成后高台县政府所立纪念碑。



序

李虎林

三年前，邢同义同志告诉我，在酒泉地委工作之余，他到当年甘肃省右派分子集中劳动教养的夹边沟农场去过多次，并收集了一些资料，想动手写一点东西。但他有两个担心：一是担心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没有出版社出版，毕竟大家对1957年的反右斗争，对甘肃省的反右斗争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二是怕给自己招来不测之祸，怕惹麻烦。我了解邢同义，他是个勤于思考的人，遇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是个做事严谨，勤于写作的人。如果他能够花一些时间和功夫去关注夹边沟，关注甘肃省1957年以后几年间的这段不平常的历史，并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不管是对当代或后世，自有其借鉴意义。我是相信下面的这句古话的：“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于是，我对他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希望他能把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做好。他当时说，采集并记述一些有意义有价值的奇闻轶事，是他平生最大的爱好，而且乐此不疲，他一定要多花一些功夫把这件事情做好。

两年前，邢同义同志告诉我，就在他加紧采集资料、访问当事人，并着手撰写书稿时，不少好心人劝他：“像你这样的人，都是要向前看的。你不向前看，却向后看；不跑该去的地方，却跑戈壁滩、盐碱滩、农场、乱坟岗，与时代

太不合拍了！”邢同义同志说，他感谢这些好心人的规劝。但他向这些同志表示：认准的事情，是要坚决做下去的。我又一次肯定了他的愿望和决心，并对他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即将退下来的老干部，对于你拟写的这部书，我乐见其成。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办好。你已经有了这个决心，这是一件好事。一个人做事，不应该违背自己的意志和良心，这样做人才做得踏实。

我鼓励邢同义同志去做这件事，除了他自己有这个决心，而且办事严谨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逐步恢复，历史上的错误逐步纠正，这不但无损于党的威望，反而使我们党自身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沉重的历史教训，是我们付出的高昂的学费。记下并且认清这些教训，学费就不会白付；忘记它，或者不能够正确地去认识它，就有可能重蹈历史的覆辙，这笔学费就算是白交了。中共中央于1980年6月11日发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

反右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做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今后全党对于某一时期出现的重大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一定要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冷静地、细致地加以分析，查明来龙去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什么范畴、什么领域，就应当在这个范畴和领域内解决，而不要任意扩大，更不能“一刀切”，发动带有全局性的政治运动。一定要注意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如果矛盾的性质一时未能分清，要先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决不要把犯这样那样错误的人轻易定为敌我矛盾。

把大批右派分子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农场劳动教养，经历一场大饥馑而导致大批右派分子丧生的现象，除甘

肃的夹边沟和明水之外,在全国可能也是少有的。单从这一点考虑,花上些功夫把它挖掘整理出来也是应该的。及至我拿到邢同义同志的这部书稿,并通读一遍之后,才真正看到了那场“扩大化”的斗争给我们的各项事业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损失!给数以千计的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这样的历史,我们怎能忘记?记录下这段历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也是后代人对我们的要求。

邢同义同志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的。书中涉及到的人物近百,时间的跨度有半个多世纪。空间上,以酒泉夹边沟、高台明水为主,涉及到兰州、天水、临洮、武威以至全省和省外多处地方。书中记述的每个人物和每件事,他都尽可能地找到本人、本人的家属或他们的亲戚朋友,详细询问,反复核实,力求做到尽可能的准确真实。与其说这三十万字是写出来的,毋宁说是跑出来的,是问出来的。另外,他埋头书斋,查阅了大量的当年的报刊、档案和有关书籍,掌握了大量当时的反右派背景资料。在选材上,他也尽可能地选择自己最熟悉的人物和事件,如自己的老师、同学、同事、邻居等等。他对自己搜集到的素材,不是拿来就写,而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酿造过程,不论从事实上还是从分析判断上,他捧给读者的,都是他自己最有把握的东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一篇中的主人公李景沆,是我在天水市一中教书时的老同事,也是本书作者在这个学校读书时给他授课多年的数学老师。我对李景沆是比较了解的,不光因为我们是同事,还因为我和他在“文革”期间同蹲一座“牛棚”,一起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判,一起“劳动改造”。在共同的工作、“接受批判”和“改造”中,知道了这个基督教徒的大致的历史。比如,他的信仰特别虔诚。批斗会上,红卫兵把口号喊得震天响,他照样能闭上双眼默诵《圣经》。但这只是

些表面的了解，远不像本书作者对他了解得这么详细，分析得这么深入，从对他的处理上总结出这么多的教训。通过对李景沆的记述说明，作者对书中有的人物的观察，已经几十年了；对他所记述的事物的思考，也已经几十年了。《恍若隔世》材料翔实，观察深入，剪裁得当，分析独到，这是我对书稿阅后的体会，也是我向广大读者郑重推荐的理由。

我们生活在甘肃、工作在甘肃的人，不管是从事党务、政务、科研、教学及其他任何工作的同志，多了解一些甘肃的历史，特别是有关甘肃的近代史、现代史和党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时常披览前踪，自然有利鉴往开来，有利提高认识和把握甘肃发展全局，提高领导、建设甘肃各项事业的水平。

祝愿《恍若隔世》有越来越多的读者！

2003年3月于兰州青年农场

又是夹边沟

——代自序

夹边沟对我来说，是一个梦，一种缘，近半个世纪了，挥之不去。

公元1961年初某日，一个数九寒天的日子。太阳缩到云的背后。冰天雪地，好几天也不消融。寒冷加饥饿，不光是我们那个地方。父母悄悄说，全国都一样。那是个全国人民都处在饥饿状态的不堪回首的岁月。

天水市（今秦城区——作者注）雪耻巷宪家楼三号，一个最普通的古老的平房居民院落。

一阵撕心裂肺地号啕从这里传出，传出老远老远。

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为凄惨的哭号，号啕之中夹杂着迷说，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因为郭妈妈是边哭边说，发音不真切。号啕之后是啜泣和抽咽，但眼泪却始终没有停止流淌。一段无声的饮泣，仿佛又是一种休整和能量的重新聚合。随之郭妈妈的号啕又开始了……就这样，没有任何人能够劝阻得了，断断续续，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宪家楼三号才安静下来。

郭妈妈是在哭她意外死亡的丈夫。丈夫是他们全家的顶梁柱，全家的靠山。郭妈妈的哭声使我想起了妈妈平时给我们讲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郭伯伯就是他们全

家的长城。孟姜女哭倒了长城，找到了丈夫范喜良的遗体。郭妈妈做不到，她虽然已经哭了两千多里路，从酒泉的夹边沟一直哭到天水她的家，哭了好几个昼夜，依然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此前两年多，1958年夏季的一天，我放学回家时，妈妈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说隔壁的郭伯伯叫公安局带走了，可能是到劳改队了。

后来知道，不是劳改，是劳教，地方是酒泉夹边沟。甘肃的大右派们都要到那里去。

那时，我的家就住在这个雪耻巷宪家楼三号院。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除我家外，还有郭家和唐家。

郭伯伯一家五口。郭伯伯、郭妈妈和三个孩子。大女儿凤英、二女儿凤婷年龄与我相仿，小儿子丘克还很小。凤英、凤婷的气质与她们的名字刚好相反；凤英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凤婷则风风火火，飒爽英姿，有时还叽叽喳喳，泼辣得像个男孩子；丘克两三岁，白白胖胖，很逗人喜爱。各种年龄、性格的人组成一个家庭，就是吵架也显得丰富多彩。不过他们家从不吵架，和和睦睦，其乐融融。郭伯伯非常慈祥，待人和善，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敬重他，听说他在天水市的医药行业也有很好的人缘。但对他为什么当了右派的事人们却一无所知。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开始是搞不懂，怕提起这事伤了郭妈妈的心。再后来远离天水，跟他们一家再没有什么联系，也就没有条件搞清楚了。

天水的春夏，童年的春夏，怎么那么美好。玩的丰富多彩，吃的五花八门，看的精彩纷呈。就说吃的，只一种包谷面，就能做出七八样饭食，什么发糕、群馍、烙饼、散饭、搅团、锅盔，样样可口。至于白面，那就要往十几种上说了。孩子们有个通病，总感到人家的饭好吃。郭妈、唐妈做点什么花样，我总是少不了去吃些。同样，我家有点什么

花样，丘克们也是要吃的。孩子们还有个通病，爱吃零嘴。天水的“零嘴”尤其多：刚开春，农民挑着筐子沿街叫卖的是“露头青”；等到树叶长齐时，樱桃就上市了，蚕豆那么大，圆圆的，鲜红鲜红，看一眼都叫人流涎水；再下来就是杏子；孩子们要挑甜核的买，吃了杏子还能吃杏核；杏子下来是玉黄（李子），然后就是桃子、梨子、柿子；至于柿饼、枣子、核桃、毛栗子，整个冬天，满街满街都是。孩子们之间，不管谁买了这些“零嘴”，都要分给同伴儿们一些。小小的四合院中，虽然大家都不宽余，但有的是温馨与和谐，有的是欢声和笑语。

但是，自从郭伯伯被带走，郭妈妈一家就陷入极度困顿之中。最要命的是他们立即失去了经济来源。郭妈妈一个家庭妇女，带着三个孩子，两个上小学，一个嗷嗷待哺。叫谁看，这日子也是没有办法过下去的。一家人要吃饭，孩子们要上学，怎么办呢？郭妈妈真想一死了之。自己死了，孩子们怎么办？灾荒之年，各自顾各自，想送人都找不到地方。为了孩子，为了等到恩爱丈夫回来的那一天，郭妈妈决定创造一个奇迹——让一家四口人活下来，这在当时就是奇迹。从那时起，她起早贪黑，走东家串西家，找一点缝补、浆洗的活养家糊口。郭妈妈一家老小的脸上从此失去笑容，大人小孩儿都要为自己的一张嘴而奔波。除了缝补浆洗之外，郭妈妈还在宪家楼巷口摆了个小地摊，卖一些针头线脑、头绳、鞋垫之类。就这样，她居然没有让两个女儿辍学，虽然女儿在学校也是抬不起头的学生。

两年多以后，郭妈妈出了一次远门，说是郭伯伯解除劳教，但身体有病，要家属去接，她要到遥远的夹边沟去接她的亲人。但是，过了半个多月，她一个人回来了。她是哭着回家的。回到家里，就发生了本文开头叙述的那个痛哭三天三夜的场面。那几天，凤英、凤婷们都哭红哭肿了双眼。

我们什么都明白了。小四合院比以前更加沉寂，死气沉沉。凤英、凤婷好像一下子都长大了，我们之间从此再也没有言笑。爸爸妈妈同情他们一家，常为一墙之隔的他们惋惜、叹气。

夹边沟，你为什么夺去郭伯伯的生命？好可怕的夹边沟！

后来，我小学升中学，就读于天水市一中，在我的众多的老师中，有个教代数的老师叫李景沆。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以仁慈的心，对待每一位学生。他对学生循循善诱，有问必答。枯燥的数学，他可以讲得趣味无穷。李老师非常敬业，他对努力学习的同学非常器重，非常喜欢。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们，李老师是个摘帽右派，他曾被发配到夹边沟劳动改造（劳动教养）。他在那里曾饿得皮包骨，还浮肿过。但是，他活过来了。如今，他已度过了八十寿辰。就是这么个一辈子安分守己的敬业者，桃李满天下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夹边沟也差一点儿要了他的命。

又是夹边沟，令人惊诧的夹边沟！

1968年底，我在高中毕业两年半后，被分配到窑街矿务局二矿采煤一队当采煤工。我的劳动工具是：像簸箕一样大的大铁锹、十字镐、八磅重的大铁锤。这个岗位是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特重体力劳动一级的岗位。每月的粮食定量是54斤，还有一张面额为1斤的酒票，可在国营商店购买白酒，据说是周恩来总理为井下工人特别批准的，困难时期都未取消。可见工作岗位之辛苦。在这个岗位上，只要有力气，肯干，就是好工人。但是如果没力气，想当好工人也做不到。在我的众多工人伙伴当中，有一个中等个头，脸色黝黑，略显消瘦的中年人，温文尔雅。因为体弱，经常受到工友们的奚落。说是凤凰落架不如鸡吧，实在也看不出大家有什么恶意，只是因为都是清一色的

男人，找个目标穷开心一通罢了。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工人们都称他“老右”。“老右”干起活来，半个人也顶不上。但他却能给工人们看病，尤其是内科疾病，工人们都很信服他，可他却不能光明正大地看，只能偷偷地看。每看完一个人，他都特别交待，不要往外说我给你们看病了。后来知道，“老右”叫尚世洁，是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部队起义到解放军中的上尉军医，也是后来窑街矿务局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57年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言行有四条：第一，钓鱼，经常在星期天到大通河去钓鱼。那时的生态环境比现在好得多，大通河的鱼又多又大又好钓，尚世洁一天下来能钓十几斤，他们小两口加两个孩子能吃一个星期。但钓鱼被列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时的干部队伍中是不能允许的。第二，人事科干部王XX胃疼，有天夜里犯病，尚世洁值班代替护士给他打针。尚世洁诊病内行，打针不熟练。第一针，针头打弯了；不得已，又打了一针；王XX十分不快。反右运动中，这一条算成是仇恨革命领导干部。第三条，与女同志勾搭。第四条，有一天开会发言，尚世洁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共产党允许宗教的存在。”单位领导认为，这是反对唯物主义，是极其反动的。经过一个阶段的批判斗争，1958年夏秋之交，尚世洁与同为右派分子的窑街矿务局职工业余学校的老师张德宗一起，被送往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参加劳教去了。两年多之后，张德宗老师命丧农场，尚世洁因农场安排他当了医生而幸免于难。他能活着离开夹边沟，就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倘使张德宗也能活着回来，同样把他放到井下受熬煎，他也会接受的，总比饿死在夹边沟好吧？所以，虽在矿井下面受苦受累，安全上也没有什么保证，片帮冒顶，月月都要死好几个人，但尚世洁却安之若素，也不为自己高明的医术被埋没而懊恼。从外表看，他与我们这些普通工人已没有任何差别：一样

地背着电池瓶；一样戴安全帽，安全帽上顶着一盏矿灯；一样穿终年露着一坨一坨棉絮的破棉衣，露着不该露出的身体要害部位的工作裤；用不堪入耳的肮脏语言交流思想，用恶作剧的方式打发休息时间。一切对他来讲是反常的东西都变得那么自然、协调，不思改变。这是夹边沟的劳教给尚世洁带来的灵魂深处的变化，可以叫脱胎换骨吧。尚世洁脱胎换骨了，矿井下多了一个没有力气干活、滥竽充数的工人，矿务局职工医院里却少了一名医术高明的内科专家。多少个本应得到高水平医治的内科病患者只能去将就一下了事！

又是夹边沟，能改变人的夹边沟！

8年之后，我从煤矿来到省城，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年中，编辑部和其他部门陆续接收了几名曾在夹边沟及其他农场劳教过、得到纠正的右派分子，有提钟政、邢鹤等。听一些老同事讲，这些人都是1957年之前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业务骨干。但他们二十多年不拿笔，二十多年挨批斗，没完没了的超负荷体力劳动，没完没了的低头认罪，他们的灵魂已被重新塑造，他们说话、处事、工作已经和现实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了。他们的行为叫旁人看来有时近于滑稽。有一次，他们当中一个人，被安排去采访一次全国性的体育比赛，由于他的衣着、举止太不入时，被守卫人员当成骗子驱赶出场。他狼狈而归，惹得众编辑一阵哄堂大笑。大笑之后的回味，又是苦涩和辛酸。如果没有那些牢狱或类似牢狱的生活，他们哪一个不精明？不是都可以在新闻事业上很有贡献吗？如果没有夹边沟……

又是夹边沟，能误人一生的夹边沟！

我在省广播电台工作期间，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人，即我多年的同事和朋友马孚远。通过马孚远，我对他的父

亲马廷秀有了不少的了解。

甘肃省前政协主席王秉祥1992年在评价马廷秀的时候写道：马廷秀先生是甘肃籍爱国人士，曾积极参与促进宁夏的和平解放。他是政协第一届甘肃省委员会副秘书长，政协第四、五、六届甘肃省委员会常委；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50年代初，和我相识。近十年，由于我主持第五届省政协工作和省志编修工作，更加亲密合作共事，成了十分熟悉的朋友。他和本世纪同龄，今年已九十有二。马廷秀先生前半生曾生活在一个民族危亡、国势颓败、内忧外患交织的时代。他经历了清末、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几个时期，有较为广博的见闻。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统一战线工作献计出力。这是王主席对他的评价。

但是，在1957年6月15日，甘肃省委统战部通知各民主党派开两天大会，内容是让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当时，报纸上号召党外人士大胆地给党提意见。在这种环境气氛中，马廷秀也写了一篇发言稿。内中讲到，党对法制不够重视，人民没有养成守法的习惯；有时没按法律办事，还有同罪异罚的现象。这篇发言给他引来一场大祸。后来，把他在解放初期，根据组织要求，给去台湾的同事、亲友写信动员他们回来的事相联系，说他通敌。几天之后，就通知他已被划成“极右分子”，并于1958年5月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参加劳动教养。

马廷秀老先生后来能够活着回到兰州，成为夹边沟众劳教人员当中的幸存者，全靠了家中的接济。马老先生在他的自传《百年见闻录》中写道：我在夹边沟农场的时候，每月仅有12元生活费，每天半斤原粮，维持重体力劳动是有困难的。我的老伴张淑静的支持，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了我渡过难关的勇气和决心。那时我的大的几个子女也下放劳动，二儿子远在武威黄羊农场，每

月工资56元，他除留25元生活费外，其余30元并“节余”的2斤粮票，准时寄回家中，一家四口就靠这点钱过活。而且每月无论如何也要给我寄1斤炒面。这一点炒面，在当时的份量，不是现在可能想象的，对我太重要了，是救命炒面。淑静听说河西冬天太冷，便以3元钱的价格买了一张皮子，动手给我做了一顶皮帽、一个背心。皮帽使我免受冻耳之苦，背心抵御刺骨寒风，晚上还能做皮褥用。这些，如今道来，似乎都属烦琐小事；在当时，却是性命交关的天大的事情。没有这些许炒面和衣着冷暖上的关爱，我是不能活着回到兰州的。如今，我活下来了，我的家人，特别是二儿子孚远做出的牺牲，却是无法弥补的。

与马孚远的多年交往中，他常常提到夹边沟。夹边沟改变了他们全家的生活道路。

令人恐惧的夹边沟！

1996年春，我被调到酒泉工作，换个说法，就是我被调到夹边沟所在地工作了。

夹边沟是个幽灵，它总是徘徊在我的身边，而我又一步一步走近它。从天水到兰州，从兰州又到酒泉。

我身不由己，从走近夹边沟到进入夹边沟。郭伯伯，你在哪里？李老师，你做祈祷的地方在哪里？马老先生，你劳动的地方在哪里？从此，我开始了近八年的寻觅。从夹边沟农场到新添墩作业站，到高台明水农场，到安西，到兰州，到天水，到窑街，到一个个有线索的地方……

一个个人间悲剧震撼着我的心。对死者和少数幸存者的深入了解，使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那一个个墓穴中埋葬的，不光是一具具尸体，那里还埋葬着理智、科学、忠诚、技术、执着、追求、思念、亲情、正义……人类社会追求的许多美好的东西，连同一具具尸体一起，曾经都被埋葬了！

甘肃的反右，是全国反右斗争的一部分。被送到夹边沟劳教的右派们，又是甘肃省众多右派分子中的代表人

物。右派们在夹边沟的劳动生活，是反右斗争的“聚焦点”。研究反右问题不能漏掉甘肃。了解甘肃的反右斗争，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夹边沟。

如果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一场八级大地震的话，像1975年的唐山大地震那样：二十多万人丧生，好幾万人伤残，整座城市顷刻之间变成一片瓦砾。那么，夹边沟就是这场大地震中的一座普通楼房。楼房已经倒塌，楼房中的生命已经毁伤，伤残者与肢体完整的逃生者已远离这个让他们永远胆战心惊的地方，到不知名的地方度他们的劫后余生去了。现在，让我们的目光聚集在这座楼房的废墟上，看一看它给我们的同类带来的伤害，从而扩展开来，从整体上认识和估价中国现代史上的那一场“大地震”，无疑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夹边沟之对于全国的反右运动，诚若豹之一斑。这几年，已经有了一些著述。还有更多的当年受害者、受害者的亲属和朋友、社会贤达在收集资料，准备著述。我想，毕竟各人经历不同，对同一事件的感受各异，观察事物的角度也不一样。因此，才敢自不量力，不顾愚笨，庶竭驽钝以寻觅，力戒矫饰以写真。如能让读者对夹边沟的右派劳教的真实情况有一点点了解，则劳而无怨，心满意足矣。

回顾和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创造未来。揭示夹边沟这段往事，有助于我们永远警惕和远离“左”的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去共同创建“以人为本”、民主文明的新生活！

现在，让我引用两位著名人士的话，作为此书的开篇、也即我的《自序》的结束语。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了苦头不止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下了‘左’的错误。”这段话是中国的一位巨人在1988年6月22日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的。这

位现代中国的巨人也是世界级的巨人叫邓小平。

“警惕右,但主要防止‘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在社会主义进程中,从一九五七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是‘左’。”这是一位政治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的,他的名字叫江泽民。

邢同义

2003年3月于酒泉

目次

序	001
又是夹边沟(代白序)	001
<u>档案:夹边沟农场的《计划任务书》</u>	001
<u>“黑骗骗事件”的主人公</u>	044
<u>“抗拒劳教”而被起诉和判刑的右派们</u>	058
<u>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u>	094
<u>省委机关的第一个右派</u>	216
<u>一个多才多艺的右派</u>	252
<u>撞见了不该撞见的场面获罪的右派</u>	354
后记	373

档案：夹边沟农场的《计划任务书》

这是一份牛皮纸封面的卷宗，有两个手掌叠在一起那么厚，足足一百页，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卷宗已经破损，几乎散了架，四周有老鼠咬过的痕迹，如锯齿一般。

这本现在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卷宗，便是关于建立国营夹边沟农场的《计划任务书》。《任务书》的封面上有四行横排的毛笔写的大字：

酒泉专员公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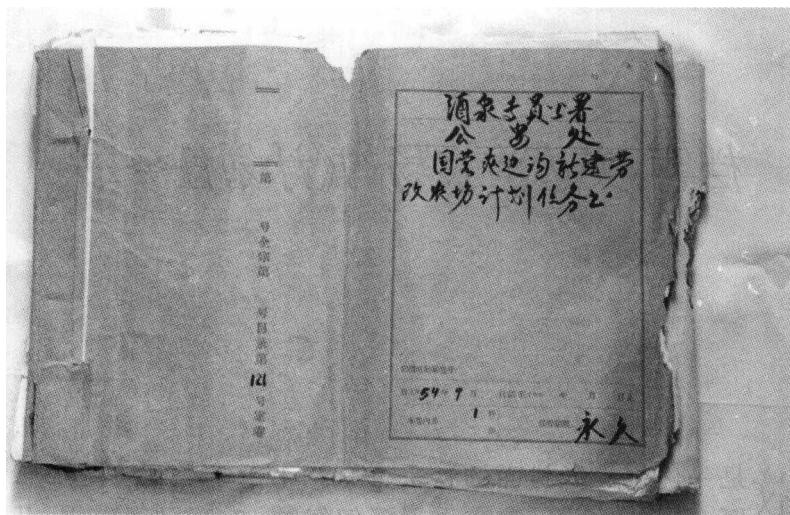
公安处

国营夹边沟新建

劳改农场计划任务书

这是靠上边四排字的内容，下边有一块较宽的空白，再往下面有几排小字，是对《任务书》保管要求之类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本档案建立的时间是1954年9月，其中各种表格和图纸上所标的，还有1954年4月28日等几个不同的时间，这至少可以说明夹边沟农场的建场时间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大致说来，夹边沟农场筹建的时间，距现在正好五十年了。

翻开封面所见的扉页，其实可能就是原先的封面。这是一张发黄的普通白纸，上面有三排蓝色的油印大字：



夹边沟农场最早的史料《计划任务书》

国营
夹边沟新建劳改农场
计划任务书

靠下方是两排小字：

酒泉专区公安处
一九五四年九月

在“公安处”和“1954年9月”的上边，加盖了“甘肃省人民政府酒泉地区专员公署公安处印”的方形印章。

《任务书》包括七十二页文字、表格和二十六张图纸。图纸一般面积较大，最大的差不多有一个桌面大小。图纸经过折叠，与文字及表格部分装订在一起，共九十八页，加上封面与封底，刚好是一百页。在二十六张残缺不全的图纸上，保留了当时与夹边沟农场有着多种关系的工作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地方及地方部门领导的名字。如第一张桌面大的《工程区域图》上，就附有如下一个小表格：

甘肃省酒泉专区新建夹边沟劳改农场					
总—0013	水利工程设计图				B—1
绘图	省公安厅	地形 及 工程布置图		处长	黄 钲
设计				专员	张子宽
校核					
审定	张守宽				
比例	万分之一	单位	公尺	日期	

接下来是一张较小的《土壤图》。《土壤图》的“校核”一栏下的名字是“余茂林”；“专员”一栏下的名字是“高鹤龄”。“日期”一栏下填写的是“1954.9.4”。就是说,大约在1954年夏天,酒泉专署的领导作了调整,专员一职由高鹤龄接替了张子宽。高鹤龄是什么时间接替张子宽的呢?另一份图上的附表提供了线索,在一张注明的制图时间是“1954年4月30日”的《进水闸平面图》的附表中,“专员”一栏空白,什么名字也没填。由此可以推断,1954年4月30日这一天,可能没有在岗的专员,张子宽与高鹤龄的交接无疑应在1954年4月30日以后几天。

在全部二十六张图纸当中,有六张标明“高台”。如在1954年6月60日制作的一份标着“高台”的《房屋工程施工图》的附表标题就是“甘肃省酒泉地区新建劳改农场”。附表中的“处长”一栏为“黄钲”,“专员”一栏为“高鹤龄”。这说明,当时的高台县属酒泉地区管辖,这个“新建劳改农场”,除夹边沟之外高台县也应有它的分场,而且分场和夹边沟农场本部的设计是同时进行的。后来的劳教人员大转移证明,标明“高台”的这一部分,正是1960年底大批劳教右派从夹边沟迁往高台的那个“明水”农场。因此,说到夹边沟,就不能不提明水,当初到夹边沟的右派,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最终是在明水饿死的。

可以认定,《任务书》是一份关于“酒泉夹边沟农场”和“高台明水农场”两个农场的规划《任务书》。

在《房屋设计图》部分,有一张专门的《浴室、理发室设计图》,上面有《正面图》、《侧面图》、《平面图》、《二层平面图》、《剖面图》、《炉池布置图》。在《剖面图》的《房顶构造》中,从下到上标有明确的“20公分大梁、16公分檩条、6公分椽子,芨芨草席一道、草泥顶面一层”的字样。这张图纸说明,建场初,主管部门对劳改人员的生活是考虑得很周到的。遗憾的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美好的设想都没有实现。

在二十多张图纸当中,有《水利工程设计图》、《水利工程设计图缩影图》、《土壤图表》、《农场设计图》、《房屋工程设计图总平面图》等等。各种总图之外,又有分项图。如水利工程中,又有《横断面图》、《纵断面图》、《预备干渠总剖面图》、《进水闸图》、《节制闸及斗门图》、《跌水图》、《大车桥图》等。在各种房屋设计图中,又有《粮食及种子库图》、《办公室图》、《干部饭厅图》、《医务所图》、《物料库农具库修理间图》、《收发室图》、《浴室理发室图》、《汽车机车库图》、《门窗大样图》、《羊舍猪舍图》等。

《任务书》的文字及表格部分,是用蜡纸在钢板上手刻之后油印出来的,字迹清秀工整,其中有很多不易辨认的繁体字,翻阅起来就好像阅读今天港、澳、台的印刷品一般吃力。

《任务书》的现今保管者是夹边沟(今长城)林场的场长邹大军和副场长满忠。他们说,《任务书》是从场档案室里一大堆废弃的材料中拣出来的。那里边有关于“批林批孔”和清理阶级队伍的讨论会记录、“一打三反”成果的总结材料等。如今,已经没有人去注意这些东西了。热情爽朗的满忠约三十多岁,中等个子,略微有点胖。他用平静的语调向我介绍了林场的现状。他对这个地方曾经发生

的灾难性的历史似乎并不怎么太在意。满忠是对的,他要操心全场四十几户农工的勤劳致富,要带领他们向前看,奔小康。肩上的担子使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怀旧。他一边介绍林场的情况,一边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了这本几乎散了架的《任务书》。

《任务书》的扉页后面便是详细的目录:

建场筹备概要及农场主要业务发展方向

甲,基本情况

- 一、农场地形地势概况,附地形图
- 二、土壤调查情况,附土壤分布图
- 三、植物调查情况,附植物分布图
- 四、气候
- 五、附近农民栽培作物情况(附作物调查表)

乙,生产计划

- 一、建场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可能发挥的作用
- 二、农业
 - 1.土地利用及区别(附区别图)
 - 2.主副业部门人畜及计划表
 - 3.过渡轮作计划表
 - 4.逐年作物种植计划及收支计划表
 - 5.农业技术实施计划
- 三、畜牧逐年发展计划

丙,基本建设计划

- 一、水利渠道、平田、修路计划
 - 1.水利渠道设计总说明(附工程总布置图)
 - 2.水利工程逐年修建与教育计划(附土方、建筑物统计表)
 - 3.水利工程技术设计(附工程概要表、设计图)
 - 4.平地说明与逐年投资计划

5.道路逐年修建计划

6.水利、平田、道路定额

二、房屋建筑计划

.....

接下来就是目录所列的每一个条目下的详细内容，有的是详细的文字说明，有的是用表格填写的详细数据，表格之下往往还有附录，补充说明表格中无法反映的内容。

在《建筑筹备概要》中有下列内容：

建筑名称：国营夹边沟新建劳改农场

位置：北纬39°40' 东经98°35'

海拔 公尺(米)

拟建场面积：10000市亩

建场设计负责单位：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安厅

酒泉专区公安处

建场设计开始：1954年7月

在《任务书》的《生产计划》的文字叙述部分，有非常客观的介绍和基本合理的计划。《计划》说：

依土壤、气候及当地群众种植作物的情况，结合国家经济需要，保证人犯生产自给，给国家积累资金的原则，确定夹边沟为水浇旱田作物型的谷物农场。农作物以春小麦为主。农场西面有天然草滩，附带发展部分畜牧业，以解决农场肥料问题。

确定目前能被利用的土地面积为9500市亩，1954年已投入人犯585名、干部30人，完成新干渠1142公尺，整修旧渠6585公尺，整修河道12200公尺，开荒4300余亩，种小麦、糜、谷、荞麦、洋芋等3 568亩。因1953年未用秋冬水泡地，今年耕种时未进行平整土地，种植亦较粗糙，部分耕地含碱较大，又加风灾，故今年收获面积占耕种面积的33.7%，其中凡是水能浇到及种植较细的地块，禾苗长得

很好。

依据水利条件及今年试种情况，拟在1955年开始建场，到1958年可产小麦1560000斤。

建场后除大量生产粮食外，逐步实行定额管理及经济核算制。初步计划，预计1957年达到全部自给，1958年可给国家上交（缴）利润8 112.36元。

夹边沟农场条件比高台较为差些，除充分发挥现有劳动力，使罪犯自食其力，在实际劳动中改造外，必须适当地配备一部分拖拉机，采用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实行经济核算，贯彻企业管理，逐年降低成本，消灭浪费，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显示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生产的优越性，并以大面积丰产向当地群众示范、宣传、启发，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

据当地百姓介绍，在1957年以前的那几年，农场确实做了不少扎扎实实的工作。“示范”作用也确实起到了一些。那时的指导思想还比较正确，作风也还比较务实，蛮干的现象极少发生。科学的态度和诚实的劳动，也曾为夹边沟农场赢得过实实在在的回报。

可以看出，这时的《计划书》中已经提到了“高台”，这跟图纸中涉及到的内容是一致的。

作者采访满忠的时候，还有几个同行者。其中有关维智、李忠。关维智是1957年反右派时省委机关“揪”出来的第一个右派分子，他当时是省委组织部巡视员。李忠算得上是个老夹边沟了。他家所在的村庄与夹边沟同属现在的酒泉市三墩镇，工作以后还在这一带当过民办教师和乡干部。2001年，李忠已是酒泉市（即现在的肃州区）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除满忠、李忠、关维智外，陪我采访的还有夹边沟村的三位老人：七十三岁的唐正兴，七十一岁的张银，六十岁的赵洪发。这些热心的陪同者们为了尽可能让我准确地了解当年的实际情况，你一言我一语，相互启

发，相互补充，极力从记忆的长河中打捞有关当年的情景。



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见证人
(左一赵洪发、左二为作者、左三唐正兴、左四张银)

李忠说，这些年，我到乡（镇）上特别是市上工作以后，到外边开会的机会多了，接触外边的人也多了，有中央的、省上的，还有外地的。提起夹边沟，很多人都会这么问：1960年，那儿是不是饿死了很多右派？当时的确饿死了很多人。

今天的人或许会这样问：右派们为什么不逃命？这本《任务书》可以部分回答这个问题。

《任务书》在《农场地形地势概况》介绍中说：

本场在酒泉城东北30公里的夹边沟，场区北接金塔境的山岗（距鸳鸯池水库30里），南靠临水区的双墩子山区，再南是古长城与清水河，东边紧连着夹边沟村的村庄与农田，西边是河北区的一片戈壁滩，整个地形是一带形

低地，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本场位于带形的东部，场内岗丘起伏，并有零星沙堆。东部低于西部17公尺，约合千分之五的坡度。可垦荒地9 859市亩，河滩占9亩，干渠30亩，支渠70亩，道路占地102亩，林带占地148亩，实有农作物面积9 500亩。西部尚有二万市亩列为预备场区，以备将(以)后扩展。

上面这一段《农场地形地势概况》正好说明，夹边沟就是这样一个易守难逃的地方。周围戈壁连着荒丘，荒丘连着水库，水库连着河滩。只有它的东面有一个小小的夹边沟村，农场也因这个村而取名“夹边沟农场”。夹边沟村现属酒泉市肃州区三墩镇管辖，位于三墩镇东北十公里处，与巴丹吉林沙漠相连。该村现有五个村民小组，一百六十四户四百九十八人，耕地面积一千九百七十八亩。“夹边沟”作为村名的来源是：村子的一边是古长城，当地百姓叫“边墙”；另一边是排洪沟，因此叫成“夹边沟”。今天的夹边沟村，已经形成了五个集中的居民点，家家户户都通了闭路电视，村里道路宽敞。全村有一百六十四台四轮拖拉机、八辆农用三轮车、七十六辆摩托车。现在全村造林面积已达到五千亩，农田里林网纵横，绿树成荫。过去那种一见风就飞沙走石的现象已有所缓解。

随着历史的变迁，夹边沟农场的任务也在不断地调整。在新中国成立初的十年之内，它先从劳改农场变成就业农场，然后又从就业农场变为劳教农场。当夹边沟农场成为以接纳戴帽右派为主的劳教农场时，农场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时期便从此开始了。一些曾试图从这里逃跑的人，除少数幸运者外，大多数人都没有逃过死亡的厄运。

戈壁滩一望无际，凶残暴烈。炎热的酷夏中，地表在强烈的日照下，温度可达摄氏五六十度，它能把人烤得浑身大汗淋漓。严冬，朔风劲吹，无遮无拦，可冷到摄氏零下

二十几度,甚至零下三十度,就是钢筋铁骨也招架不住。到了晚上,如果不懂得星相,就根本不知道往什么方向走,也许会越走越远离有人烟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自己走向死亡。

《任务书》在介绍了农场的地形地势概况以后,紧接着介绍了《土壤调查情况》:

因接近风沙地区,场内以沙土为多。下挖20公分~150公分不等即属沙壤、沙壤土,一支渠尾部及四支渠部分地区为沙壤土。土内含有碱的成分。地下水位在110公分~280公分[之间](就有)60%的水内含碱。表土碱质成白色粉末,见水即溶。个别低洼地区如五支渠尾部附近,由于排水不良,地下水位高,表土见水即变为暗褐色。为了进一步详细说明土壤(成分),在本场分七个部分探采土样二十六次、地下水十份,作为室内分析之用。俟得出结论后再行补报(附土壤分布图及土壤情况表各一份)。

以上土壤调查说明,这里是严重盐碱化的沙土地。要



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当年劳教右派分子开挖的排碱沟依稀可见

想耕作成功,必须进行“排碱”,就是在地里挖出纵横交织的网沟,让溶有碱成分的水渗入沟里,以自流方式排到更低的荒滩。由于地下水位较高,沟渠一边挖一边往下渗碱水,而人要站在沟里挖掘和往两边撂泥土,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因为碱水有极强的腐蚀性,对人体伤害也大,属于有害的重体力劳动。对那些拿惯了笔杆子和教鞭的书生来说,挖排碱沟,无疑是一道鬼门关。

《任务书》接着介绍了这里的植物调查情况:

场内野生植物主要为芦草,高约50公分~100公分,分布在场的北部与东部。还有一种300公分~500公分长,顺地蔓延,分布在西部。矮芦草高5公分~10公分,多分布在南部。其次为肥蒿,这是一种豆科野生植物,群众取作肥料,此草分布于农场各处。另外还有芨芨、竹芦草、骆驼刺等数种,分散裸生,远较上两种为少。蒲公英、马莲、苣荬菜,偶然能见到一些。

从这些介绍看,这一带生长着的都是些耐碱性的植物,芦草居多。可以想象,遇到灾荒年月,可供救急救命的野菜是很少的,因为像“苣荬菜”(即“苦苦菜”)这样能食用的野菜只是“偶然能见”。这种野生植物的分布状况,注定在以后的日子里,右派们在这里要渡过荒年,是很难找到替代食品的。接下来,《任务书》介绍的是拟建农场的气候情况和附近农民栽培作物的情况,并附了一个数据表:

这里的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有时一年都不降雨。即便降雨,也多在八九月间,但降雨量也最多不过200公厘(毫米)。但蒸发量却大约在1 200公厘(毫米)以上。这里不但昼夜温差悬殊,而且一天之内气温的变化也很大。如今年三月上旬,昼夜温差即在 9°C ~ 20°C 之间。四月底,早晨是 13°C ,中午就是 26°C 。风在这个地区比较多,夏季多西北风,最大的达到八级,有时风沙夹着寒流危害田禾。这里春天多西风,初秋多东风及东南风,强度最大

的有四五级。

附近农民栽培作物情况：附近农作物以小麦为主(春麦)，秋作物以谷子、糜子、洋芋最多。如果种麦，每两到三年倒一次茬(换秋作一次)。每亩施圈肥十车，或灰土肥料十五车(每车约500市斤)。翻土两次(12公分深)，耙耱各一次。一般浇水三次，每次10公分上下。播种前浇的是10公分深，最要紧的是出苗后的二水。当地农民不习惯冬浇。麦子的下种量是每亩20市斤以上，兹将作物收播时间及用水情况列表如下：

作物名称	播种季节	开始用水	用水次数	每次深度	收割季节	备考
小麦	4月1日 ~ 4月底	4月底 ~ 5月初	播前一次 出苗后二 ~三次	1次10公分 1次7公分 2次10公分	八月上旬	春小麦
谷子	4月20日 左右	5月中旬	同上	1次10公分 3次8公分	八月上半月	
糜子	5月中旬	6月中旬	三次	10公分	九月底	
胡麻	4月底	5月半	一次	10公分	八月半 ~月底	
红花	4月底		播前一次	20公分	九月初	耐旱作物
菜类	不定期	随时		5公分		

(此表中数字有阿拉伯数字和汉语数字两种，为原档案中所用——作者注)

初到这个地方，就是不干任何事，也未必能适应这里的气候，这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个关口。

从上面数据表上可以看出，播种在四五月，收获在八九月，它的无霜期呢，从四月中旬到八月底，只有一百三四十天。

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干燥的夹边沟，野生植物品种单调的夹边沟，大批右派涌进来之后，能种下希望收获温饱吗？显然非常困难。

大批右派的到来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的作者和凤鸣认为：

选择这种普通人难以生存的地方，以对甘肃全省的极右分子予以处罚，让两千多无辜者在苦役及无效劳动中消耗体力，消磨生命，这正是甘肃省当时一些领导人所要的效果。

关维智对当时情况的回忆是——

1958年春，经过半年多的批斗，该戴帽的人就都定下来了。然后就是下农场。当时，这些农场都在河西，计有武威黄羊河农场、张掖老寺庙农场、酒泉夹边沟农场、敦煌棉花农场、安西十工农场、安西四工农场、玉门黄花农场、玉门饮马农场等。全省各地对当时的极右分子或问题严重者，宣布了一条有选择的政策：一个是回原籍，彻底解甲归田，与“公家”一刀两断，当农民，或留城自谋生路，也是与“公家”一刀两断；再一个就是到夹边沟农场，属劳动教养，保留干部身份，以后还可以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人选择了后者，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对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来说便意味着选择了死亡。至于其他右派的劳动改造，则可到上述除夹边沟外的其它农场。

1960年，甘肃的大饥荒到来时，河西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河西的普通老百姓尚不能逃脱，何况是身陷囹圄的右派们！

1960年在夹边沟二队担任队长的张银告诉作者，当时劳教的右派中，老实些的，还有年龄大的、跑不出来的，大部分都饿死了；奸（方言，精明、狡猾的意思）些的，也经常跑出来，拿东西找农民换吃的，大部分都活下来了。那年头其实也换不上啥好吃的，无非是些榆树皮面干粮和

糖萝卜、红萝卜(胡萝卜)之类的。就这,也是能救命的。经常跑着换东西的,活下来了;没有跑的,多半都饿死了。李忠插话说,不跑的都是最听话的、正统些的、职务较高的、学历较高的。因为,劳教干部也不断地给他们“做工作”,训话,讲政策,他们是一批比较自尊的人。

2002年九月4日和9月15日,作者两次到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原址寻访,两次都碰到了在这里放羊的明沙窝四队农民王世礼。明沙窝四队离新添墩作业站原址有一公里,是距新添墩最近的村子。如今的新添墩作业站原址上,早已是荒草萋萋。经王世礼指点,才能看出一排排略微高出地面的房基。因为当年建的就是土坯房,因此没有一个砖片瓦片,土地碱性非常大,鼓起了一个个坟头一样的小土包及清一色的耐碱性植物:矮芦草、肥蒿、竹芦草、碱蓬草、骆驼刺。王世礼现在六十岁,1960年时二十二岁,是了解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及周边农村情况最理想的人选。王世礼说,1958年,一下子来了一千多人,天天都挖排碱沟。他指着现在还依稀可见的那些纵横交错的沟渠说,这些沟都是右派们挖的。活重,又吃不饱肚子,多数人饿死了。他们有时候也拿东西到我们村上换吃的。农民都吃不饱,拿什么给他们换?

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自尊”是一种叫人加速死亡的催化剂。《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的作者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也是饿死在劳教农场的。王景超先是在夹边沟,后被转到高台县明水农场。和凤鸣则是在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安西县十工农场。十工农场教育科李科长告诫和凤鸣,不要偷吃农场的东西,不要违犯场规,要有高度的自尊心。和凤鸣在她的书中回忆道:

我竟糊里糊涂地把关于“高度自尊心”的话,在写给景超的信中也说了一遍,说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半年后,我才省悟到自己的这段话铸成了大错!错在我当时

还未意识到我们已面临生存危机，景超同我们离别后一直挨饿，他早就该为生存而斗争！倔强的他两年来信守的就是所谓的“自尊心”，我还以对他的爱心要求他要有“高度的自尊心”，这真是雪上加霜，我追悔不已，追悔不已啊！天赋人权，当大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那个奢谈“高度自尊心”的李科长的话竟然打动了，而我又愚蠢地把他的鬼话写给景超，使景超把他的鬼话当成了我的意思，这是我一生中铸成的最大的过错！

1960前后在夹边沟三队当木匠的唐正兴回忆说，饿得太厉害了，那些劳教人员就背着衣服、棉絮、被面跟农民换吃的。有人用一块罗马表换十个红萝卜（胡萝卜）。有个叫马良的大干部，四十多岁，拿了件英国呢子制服跟我爹换了四两粮食。我爹把那件呢子褂给我穿，爹岁数大了，他不穿，我穿上就是个大干部的样子。衣服很结实，我穿了多年以后，又给我兄弟穿了。

李忠说，当时张掖专区财政局的局长刘协被划成右派以后，也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了。他的女儿刘文环当时只有三岁。刘文环的哥哥背着刘文环，长途奔波来看爸爸。两年没见儿子和女儿了，骨肉相见自然高兴。作为爸爸，两年多都没有尽到当爸爸的责任，此时的刘协是高兴、内疚而又无奈。自己都快要饿死的刘协能拿出什么东西来给自己的儿女呢？他到地里掰了几棵包谷秆子给孩子嚼，看着孩子嚼得津津有味样子，刘协的眼泪只能往自己的肚里流。几个月以后，刘协就饿死在农场了。几年后，刘协的亲人曾到夹边沟来找过他的尸骨，但是没有找到。

李忠和关维智说，1960年，越到年底粮食越紧张。又赶上一个少见的严冬，劳教人员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为了度过荒年，当时上级有“瓜菜代”的号召和要求。茫茫戈壁，有什么瓜？什么菜？被逼无奈时，还得想办法，那就是

沙枣树叶、榆树叶、玉米棒的芯子,最后还有麦草即麦秸。

《任务书》在介绍这一带的野生植物时,并没有提到以上的几种植物,那是从建场后到1958年的两三年时间内,劳改犯、就业人员和劳教人员逐年栽植的绿化树。直到今天,夹边沟林场还生长着当年他们栽下的这些沙枣树。这些沙枣树是当年夹边沟历史的见证树,也是劳教人员的救命树。只是它们当时还很小,还没有长大,可提供的沙枣叶极为有限。



夹边沟劳教农场时期的旧房子,
已在2002年夏天拆除。

《任务书》在《植物调查情况》中,介绍了一种叫肥蒿的植物,说是一种豆科野生植物,分布在农场各处,群众取作肥料。李忠和关维智又谈到一种叫“黄茅头”的草,也是结籽的。还有一种叫碱草的,也能结籽。后来,经过我和关维智现场查看,并请教了当地百姓,搞清了黄茅头和碱草原本是一种植物,要紧关头它的籽是可以采集来充饥的。劳教人员把这种采集来的草籽和榆树皮一起加工成面,做熟以后用来充饥。吃了草籽,多数人都发生便秘,而且相当严重。大便长时间排不出去的滋味是相当难受的,每当这时,就得用小棍儿往外掏。相互掏或自己掏肛门,成为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们每天必做的“功课”,成为那时夹边沟农场的一大“景观”。如此集中的掏肛门现象,人类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不吃要饿死,吃了也可能会憋死。但饿急了还得吃,憋急了还得掏。在饥饿与“掏挖”之中,人就被折腾得越来越不像样子。好多人开始浮肿,从腿脚部先开始,脚肿得连鞋子都没法穿,只好拖着走。

李忠的老家就在夹边沟的邻村,他在这一带长期当

民办教师,后来又在这个乡上当干部。当年的这一幕幕,他是亲眼所见。他和关维智、满忠,还有夹边沟村的三位老人唐正兴、张银和赵洪发,争先恐后地抢着给我介绍1960年下半年饿死人的情况。

一些人头天晚上还在一起喧荒(方言,聊天),第二天早晨就醒不来了。当时农场还出现了两种“药”：“模糊汤”和“康复丸”。模糊汤就是面打成的糊糊,看着有的人不行了,就给灌上些,轻些的就救过来了,重些的还是饿死了。“康复丸”的主要成分是豆面和红糖,也是只能给危重病人服用。其实,用不了这药那药,明摆着的道理,只要有了口粮,什么药不用,啥病也就没有了。但当时情况下,多些模糊汤、康复丸,也能救几条命。可惜,当时就连这些所谓的“药”也并不多,人照样死。为了给家属有个交待,对外有个说法,每一个死的人还得有个像样的“病名”。于是,在当时夹边沟农场,一个古老的疾病名称——“急寒病”,被频繁地使用起来。

开始,死人还是个别现象时,就由劳教人员们自己抬出去埋葬了,到后来,劳教人员们自己也没有力气了,所有的人几乎都要扶着墙才能走,只好雇周围的农民抬出去埋。

作者在夹边沟访问的三位老人中,最年轻的赵洪发当时只有十几岁,是夹边沟三队的记工员。雇农民抬埋“右派分子”,就涉及到一个记工的问题,他对这件事显然比别人更清楚一些。赵洪发回忆说,当时队里调劳力埋人,埋一个人记五分工,然后场里给队里再付两元钱,我们队光埋人就挣了二三百元钱。另外,埋人还能得一点小东西和衣物什么的。胆子小的人害怕,不愿意干,队里就派胆子大些的去干。我们队派的是王多俊和盛举,他俩胆子大,埋起来也快。不过那时候埋人也简单,也就是挖个小沟沟,半米深吧,瓜趟子(种瓜时挖的沟)一样,一个挨

着一个。那时埋人不用棺木，没有棺木，也来不及做。人死的时候穿的是啥衣服，就是啥衣服，也不用整理；连被褥都是原来现成的。每人都有一条现成的绳子，那是他们来参加劳教时捆行李用的，现在却用来给他们裹尸，这是来这里的右派们当初谁也不会想到的。发现谁死了以后，就用被褥把死者一裹，再用他们自己带来的绳子一缠，这时候的人很轻，这样就好抬了。有的也还加一个用芨芨草编的席子衬在身子下边，也就算是“棺材”了。这些人来这里的时候，人人扛着行李，提着一个大箱子，有的还是皮箱，我们这里见都没见过的，多威风呀！到最后，饿死了，搁在那儿都成了别人的。人埋了以后，张三还是李四，总得有个标记吧？不然，家人来了，怎么交待？唐正兴回忆说，开始是钉个木头牌牌儿，把名字写在木牌上。再往后就是立块砖，把名字写到砖头上。李忠回忆说，我小时看到过一排排的砖，上边写着名字，整齐得很。后来听放羊的娃子们说，常看见有一些写有人名字的石头，三个字和两个字的都有，他们还扔着耍呢。可能是到后来砖头不好找了，就拿石头将就。在戈壁滩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大小石头。原甘肃省广播电视厅副厅长、电视台台长王燕天回忆说，1963年，他曾受命到夹边沟农场作过调查。当时，农场的同志反映，1960年12月，西北局兰州会议提出抢救人命之后，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后任青海省委书记）专门到夹边沟来了解过劳教工作。当时，有不少被饿死的右派分子的坟头没有名字，为了应付王昭的视察，补了很多名字，张冠李戴胡乱摆放了一番。所以，人名牌子与死者并不相符。

从《任务书》所介绍的考察情况和立项本意看，当时的各种工作和对困难前景的预测，都是比较客观的，应该说还是讲究科学的。事实上，直到大批劳教右派进场之前，建场和开荒工作都还做得有条不紊。那时的场部就设

在现在的夹边沟村委会所在地。就是说，“首脑”机关驻地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生产上、开发上。夹边沟的庙和学校里边都驻过场部领导。1956年，就是刚建成还叫做劳改农场那阵儿，犯人也多，规模挺大，而且规划科学，管理严格，渠、路、林配套，很有一些气派。农场已有专门的农业技术人员，科学指导农业生产。当时在广大农村还没有见过的农业机械如拖拉机、播种机等，首先开进了夹边沟农场。机械作业，着实叫周围的农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1958年，大批右派开始进入夹边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人员成分变了，管理方式也得变。过去对犯人是武装押解，强迫劳动。犯人们多是些年轻人，不乏身强力壮者。那时政策也比较好，就是改造你的灵魂，并不去克扣口粮；表现好的减刑，立功者受奖。这种做法，在犯人中，树起了正气，生产也受益，虽然条件差，生产还是年年有发展。“劳改”改“劳教”，原先的犯人转往别处，新到的右派老者多，弱者多，戴眼镜的书生多，根本就承担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大量涌入的这些劳教人员们，还是竭尽全力卖命劳动，他们都想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早日回到人民的行列。无奈当地的土地、气候、灌溉条件太差。在“大跃进”时期，农业生产一路下滑，农场已经没有办法取得劳教人员自己养活自己的收成。据说，到1959年，全年的收获只够全场人员吃一个季度左右，这在劳改、劳教系统的其他农场都是罕见的。作为劳教农场，其收成无法自给，还要上级拨给粮食养活劳教分子，这使省劳改当局非常恼火，又毫无救人措施，只是眼睁睁看着这些劳教人员一批又一批地被饿死。

饿死人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中央开始采取措施。1960年12月，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纠正这几年左倾蛮干的歪风，抢救人命。贯彻落实

这次会议精神的下派干部最常说的话是：“不管怎么说，先把人救活”。这次会议深得人心，深得所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甘肃百姓的心，他们往往把汪锋看成救命恩人，尽管当时起关键作用的中心人物是西北局书记刘澜涛。

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夹边沟劳教农场里幸存的劳教人员，就被转移到了高台明水农场。此后的夹边沟农场，就只有那些右派们当时用生命作代价开垦出来如今又废弃了的土地，还有那些谁也说不清准确数字的坟墓——由于埋得很浅，一场狂风就能吹走沙土，把尸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新添墩作业站水井遗址

1969年，夹边沟农场被部队征用。进驻的部队是坦克团，对部分坟场进行了整理，一部分留在原地，一部分迁到了别的地方。原先埋葬死者所立的木片、砖头、石头等“墓碑”已不见踪影，那些所谓的“坟”成了无主坟。唐正兴回忆说，迁坟就是在山那边挖个大坑，把迁过去的骨殖一起埋到大坑里。

20世纪70年代初，部队又从夹边沟移驻到别的地方，农场遂交给地区管理。当时的地区领导人马汝贵对这个地方比较重视，投资搞了些农业机械，还采取了一些绿化措施，又将农场更名为“酒泉地区机械化林场”。

又过了几年，林场被移交到酒泉市（即今天的肃州区），再次更名为“长城林场”，科级建制。这个场区的南部边缘，确有一段东西走向的长城遗址。从20世纪80年代初更名为“长城林场”后，一直到2003年，才改为“夹边沟林

场”。满忠说，这些年来，一直断断续续有人来找亲人遗骨，尤其是清明前后。原先，劳教农场可能跟人家的家属说过，每个坟上都有碑，能找到自己亲人的坟墓，但现在哪里找得到？

唐正兴说，有一个洛阳来的老太婆，是带着自己的儿子来的，找孩子他爸的尸骨。她找了一天也没有找到。她找人问：不是说立下碑了吗？我们也不好回答她这个问题。老太太说她的老汉是长征干部，打过天下的，边说边哭，我也陪着她母子哭了一阵。没有办法，谁也帮不了她。老人哭完就领着儿子遗憾地回去了。

满忠说，去年兰州大学政治系的一个教授来过。教授说，他小时候，母亲曾经带他到夹边沟来找过自己的父亲。他们母子来以后才发现父亲已经很虚弱。如果没有母亲的照顾，父亲可能就活不了多久。为了照顾父亲，他们留了下了。三个月后，母亲饿死在夹边沟，父亲带着他回到了兰州。

满忠还回忆说，2000年8月，在成都市公安部门工作的徐翔来到夹边沟，说他的父亲张棣就长眠在夹边沟。徐翔说，父亲在清华大学教过书，后来到了甘肃。1959年6月，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年底去世，母亲带着徐翔改嫁到了四川。劳教农场当时告诉母亲，父亲是死于肝硬化，这也是记录在档案上的，但真实情况搞不清楚。徐翔说，他希望联系一些死者家属，有能力的，每人出些钱，在夹边沟搞些绿化，再建一座纪念碑。他自己愿出资十万元，但不知政府是不是允许。他表达了这个意思以后，就回去了。

唐正兴老汉说，也有找到亲人遗骨的。他说，六几年（口语，意思是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年），张掖有一个老婆子来找过她的老伴，那时坟还没有迁，老婆子非要找到一个腰上有绿丝带的尸体不可。他们两口子当年商量过一

个办法，饿得快不行时，老婆子给老汉寄来一条绿丝带，让他把绿丝带缠到腰上，死也不要解掉。老汉听了老婆子的话，直到饿死，也没有解开丝带。最后，他腰上就缠着绿丝带下葬了。老婆子到夹边沟当年埋葬右派的坟场，专捡墓坑的中间部位往下刨，看腰上有没有她从家里寄出来的绿丝带。她挖了半天，看了好几个坑，最后终于找到了她丈夫的尸骨。老婆子说，老汉死时是五十一岁，她自己四十七岁。

2001年7月，作者同关维智、李忠等又一次来到夹边沟当年劳教右派开挖的排碱沟边，沟里的水还在静静地流淌。我们又来到当年劳教右派住过的地窝子跟前，地窝子已不复存在，只能依稀辨认出大致的轮廓。我们来到农场场部，那是砖土结构的平房，砖和土坯砌的墙，“人”字型泥顶。这里雨水太少，快半个世纪了，房子虽已千疮百孔，居然尚未倒塌。贴着屋檐，是一条30厘米宽的木板，蓝色的油漆尚未完全脱落。窗子又窄又长。门窗已用土坯和黄泥堵死。据说劳教人员撤走以后，这些房子曾一度被改为仓库，所以只要安全就行，不考虑采光通风。有的改成了牛羊圈，周围杂乱无章地堆放些柴草。

我们来到埋有死在夹边沟的右派们的戈壁滩。太阳直射戈壁，火辣辣的，有些灼人。其实到生活最困难的时期，连稍有力气、能埋葬死者的人都很难找到了，很多死者就都被草草地掩埋在现成的“瓜趟子”里边，及至后来，在夹边沟，“瓜趟子”就成了右派坟墓的代名词。我们蹲下身子，仔细查看，果然看到了“瓜趟子”的轮廓，散布在小山包下或干滩沟边，有的绕着山包走，有的沿着沟边走，数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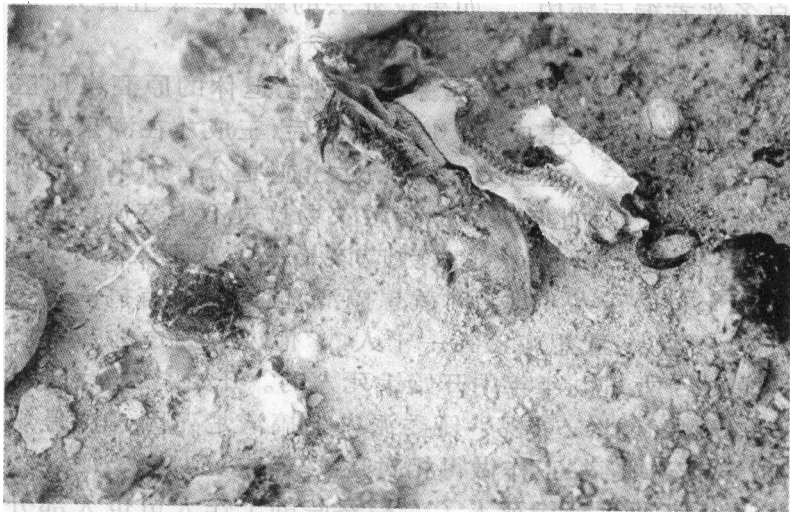
在一个墓穴里，有一点棉布露头，还没有完全腐朽，使劲一掀，是一只棉布袜子。关维智说，那个年代，人们只穿这种袜子。今天通常穿着的混纺线袜，当时还没有出世

呢。布袜所用的棉布是比较粗的，但做活的针线相当精细，贴着脚边，并排纫了两条线，针脚只有一粒小米那么宽。可见布袜的缝制者是个手巧的女人，虽无好料，却有细工。是死者的什么亲人呢，她是贤妻？还是良母？

另一个墓穴中有一绺头发露出了地面，半截在土里，半截在外边，露出地面的部分就有近20厘米长，一阵轻风吹过，褐色的头发还在随风飘动。阳光下，那头发一动一闪，仿佛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一团火焰。一位倔强的女性，你要向世人诉说什么呢？

又一个墓穴，有金属的光亮。用脚一踢，是一把钥匙，很精致的小钥匙。常言说，人配衣裳，马配鞍鞴。如此精致的小钥匙，也只能配精致的手提箱、小提包、文件柜、办公桌，那里边装着他割舍不下的东西。

还有一处墓穴露出一件棉布背心。可以想象，穿上它，既保暖，又能甩开膀子干活“改造”。看到它，不由使人想到那一首古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夹边沟死亡右派分子的墓葬场

有两座相邻的墓穴，各自有一段绳子露出地面，但质地各异，一根是棉线绳，一根是棕绳。分明来自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来自北方，一个来自南国。两条命运的轨迹在这里相会，也在这里结束，在这里被埋葬。

我们在这里还见到了铜制拉链、驼毛裤子、钢丝表链、花布衬衫、赛璐珞钮扣、火柴盒和纸烟渣……读者可能要问，夹边沟这个地方，当年到底来了多少右派分子？饿死了多少？

唐正兴等三位夹边沟老人和李忠一起的共同回忆是：总共来了一千多人，饿死的有七八百吧。

《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的作者和凤鸣采访过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前编导王志，王志是夹边沟劳教人员中的幸存者。王志告诉他，在夹边沟劳教的各类人员共有两千多人。

作家杨显惠在他的《夹边沟记事》一书中，写到饿死人时采用了一个医生的回忆：“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一千五百名死者编写病历。”如果仅死去的就有一千五百人，那么加上活下来的共有多少呢？

2002年3月27日，作者采访了现已退休的原酒泉地区检察分院检察长王成才。1959年前后，王成才在酒泉县当过代理检察长。在当代理检察长之前，是分管刑事和监所的检察人员，因此与夹边沟劳教农场打过不少交道。他回忆说：“夹边沟的劳教总人数应该是一千八百人以上吧。上没上过两千人？我当时就想搞清，但始终没有搞清。至于饿死的人，我想应该在一千人。”他说：“夹边沟劳教农场是从一九五九年年中开始饿死人的。开始，县检察院对这一现象还比较重视，还委派人去搞清楚死因，这是规定，要记录在案，工作做得相对还比较细。到后来，酒泉县农村也开始大量饿死人了，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也大部分

已经饿得走不动路,农场的问题也就顾不上了,了解得也少了。这是没把数字搞清楚的主要原因。”

《任务书》的《生产计划》部分有这样一段叙述:“依据水利及今年(指1954年)试种情况,拟在一九五五年度开始建场,到一九五八年可产小麦1560000斤,每人每年按720斤计算,可供2167人食用(一年)”。客观地说,1954年的各项计划,多数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起码也是比较接近实际的,如果不要违背客观规律,一步步去实施,大体上是能够办得到的。那么,这里说的到1958年,所产小麦“可供2167人食用”的话,当是领导者往夹边沟安置劳教人员的依据。据此推断,包括新添墩在内的整个夹边沟农场,安排两千多名劳教人员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夹边沟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幸存者高吉义,是《夹边沟记事》中《逃亡》一章的主人公。他告诉作者,他听当年炊事班长刘杰说,全场右派分子为两千九百六十三人。高吉义还说刘杰最后当上了总务科长。就在本书初稿完成后,关维智给我送来一本名为《延安生活片断》的书,作者燕斌,是拨乱反正时期甘肃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主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燕斌在他的这本书中写道:“对在夹边沟劳动教养的两千三百六十九人,撤销原劳动教养决定,为他们恢复名誉,死亡人员家属子女给予妥善安置。”这个关于在夹边沟参加劳教的右派分子的数字,应是最权威的了。《甘肃省志·大事记》中说:“据1959年7月统计,全省共定右派分子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就是说,甘肃全部右派中的百分之21.28%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

罗增福是当年夹边沟劳教农场的生产股长,是作者找到的目前在世的惟一一位劳教农场管理干部。他是二十年前从酒泉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主任岗位上退休下来的,几年前中风以后半身不遂,现已不能起床,思维尚且清楚,语言表达已很吃力。2002年8月23日,

作者来到罗增福病榻前，与他长谈了两个多钟头。他身体虚弱，只能谈谈停停。由于他已经吐字不清，只好反复询问、核实。这位前劳教农场生产股长说：夹边沟农场分农场本部和新增墩作业站两处，由一个场管理。本部的劳教人员有一千六百名左右，新增墩作业站有一千二百人左右，两处加在一起，劳教人员的总数应在两千八百人上下。作者认为，罗增福讲的这个数字，是全部劳教人员总数，即全部右派分子加上坏分子及其他什么分子。罗增福是1958年年中被调到夹边沟劳教农场的，一直到1959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都在生产股长这个岗位上工作。这个数字相对其他几个数字更为可靠一些。1959年下半年，管教人员的口粮也减到每天只有半斤原粮，饥饿难耐之时，管教人员也开始吃杨树叶和沙枣树叶。罗增福的胃本来就不太好，一吃树叶，诱发了严重胃病，随即在酒泉劳改医院住了院，并做了胃切除手术。手术之后，罗增福有一段时间在家病休。说起吃树叶加重胃病以至于不得不做手术的往事，罗增福至今仍是伤感万分，他躺在床上，抽泣了足有两分钟时间，泪水把枕巾都弄湿了一片。罗增福还回忆说，劳教农场当时的党委书记是张鸿，场长姓刘，这两个人是否在世，他已说不清。至于其他的管教人员，罗增福已多年没有和任何人有过联系，他认为这些人多数是不在世了。罗增福还回忆说，夹边沟农场从劳改农场到就业农场，又从就业农场到劳教农场，是个连年亏损的场子，但在1958年底，最后决算的账面为盈利人民币三元。就是说，在罗增福，主要是张鸿书记和刘场长当政期间的1958年，夹边沟终于做到了扭亏增盈，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当然是个了不起的成绩。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人们对自己做过的好事总是能够很容易回忆起来，而且回忆得十分清楚。但是，1958年是个全国劲吹“浮夸风”的年头，夹边沟劳教农场有没有这类问题？目睹罗增福一个

病残之身，十分认真而又痛苦地在记忆的长河中寻觅我向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不能不提醒自己，这是一个不宜在他这里刨根问底的问题。一般说来，对管理人员讲，盈利当然是成绩，但只盈利三元，说明他们的心并不是很重。但对劳教人员讲，他们每天是要吃饭的，吃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蔬菜和副食，低产报高产、亏损报盈利，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农场当时上报的数字，包括粮食产量和其他生产成果，是不是给后来的大饥荒埋下了伏笔？还需要后人和研究者们自己去进一步考证。

罗增福所提供的夹边沟劳教农场总共有两千八百名左右的劳教人员的数字，相对其他几个数字更为可信，只是比较而言，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人的记忆有时是会出现偏差的，何况还是个风烛残年的偏瘫病人。后来作者找到了劳教农场主管部门的一位领导L同志。因为我与他有过交往，印象中他相当客气，再凭我的地方领导的身分，相信L同志会给一个面子，允许我看看那些历史档案。我打电话直言告诉他，我想看一看这个部门管理的这部分历史档案。L同志说：“已经是历史了，都快过了半个世纪了，为什么还要翻腾呢？”我说：“不是翻腾历史旧账，是为了弄清当时的一些情况。”L说：“有一本书，叫《夹边沟记事》，那上边都说清楚了，你去看那本书就行了。”我说：“当然，我已经看过了。还有一本书，叫《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我也看了。除了这两本书上谈过的情况之外，我还想进一步地做一些深入了解。历史上它是你们管理的劳改劳教农场，但在我们的地盘上，如今是我们地方上的一个林场，承担着防护农田和育苗的任务。在地方史当中，夹边沟是一个方面和一个特定的环节，地方上的同志有责任把它搞清楚。搞清楚的目的是教育后人，警示来者，并不是折腾历史旧账，‘欠账’者多数已不在人世，找

不到讨债对象……”没等作者把话说完，L同志早就没有耐心听下去了：“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对这个问题如此感兴趣，这值得吗？如果你们执意要看，那你就让你们地委写个介绍信，说明由谁来查阅，什么目的，我们研究以后再说。”接下来的话已不是说明和解释，而是教训，就像家长教训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一般：“查阅档案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谁想看就看！那不是你们自己家的家谱，想咋看就咋看。得有一定的批准程序，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等作者继续请求，L同志就断然挂了电话。至此，这段努力以失败告终。要了解更加详尽的情况，只得待后人再去努力。

从大量的文字材料和个别采访所了解的情况看，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到达夹边沟农场的的时间大约都在1958年5月到10月之间。

右派分子们一批一批地被送到夹边沟农场，是谁决定的？都办理过什么手续呢？这自然是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从一名普通劳教人员甄文涛身上大致可以看到一些来龙去脉。

甄文涛是甘肃省医药公司财会科的一名职工。医药公司当时属省卫生厅管辖。1957年11月11日，省卫生厅以“省卫生厅整风领导小组”的名义上报了一份《右派分子甄文涛的单行材料》。全文如下：

一、概述

甄文涛，别名明月，男，现年20岁，汉族，天津市人，家庭成份（分）城市贫民，个人出身学生，初中文化程度。曾参加过一贯道，系一般道徒。一九五五年被天津市九中开除后，参加了流氓集团，并当了“霸王”，以“震金刚十八字太保”身份（分），经常侮辱妇女，扰乱社会治安，并冒充我公安人员进行流氓活动。一九五六年六月，被我公安机关拘留教育两次。同年十月被吸收来兰参加工作，现在在甘

肃省医药公司会计科。

本人简历：该员于一九五〇年在天津广继小学上四年级，一九五三年在天津宝光小学毕业。一九五四年在天津三十九中及九中读初中。一九五六年十月被吸收来兰工作。

二、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甲，仇视与反对党的领导。

1. 辱骂人民领袖，幻想国民党复辟。反动透顶的右派分子甄文涛对党的领导是恨入骨髓的，对社会现实极端仇视。他“不愿再在新社会生存下去”，时刻幻想国民党反动派复辟。他在学习小组会上在纸条上写下：“介石回北平”，想叫蒋介石回北京来当总统，重新奴役人民。

2. 企图制造匈牙利事件，寻找反革命组织，制造暴乱，与国民党里应外合。在六月十八日的鸣放会上，甄借他在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运动中（被）列入重点的话题，叫嚣“要是我国有匈牙利事件，我一定参加，我一定干”。露出了他丑恶狰狞的面目。

这个右派分子好像快被淹死的人拼命抓住一根稻草一样，他为他这种反动狂妄然而必定破灭的幻想制造了一个“理论根据”。他认为，“共产党将来也要失败的。根据历史的发展看，过去的历史是一朝兴起，一朝衰败，由分裂到统一，再由统一到分裂，它是来回变化着的。如果得到人民的拥护，满足人民的需要就可以胜利；满足不了人民生活需要，就受不到人民的拥护，就会失败”。他还诬蔑：“共产党领导的（得）不好，政策全是整人，人民是敢怒而不敢言，人民并不是真心拥护”。

3. 否认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说：“革命不要共产党领导也能胜利”。歪曲党的性质。说“共产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工人、农民两家的党”。他在一次学习会上说：“在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很多人不是共产党

员,而是人民,为什么说胜利属于党的领导呢?党将革命的胜利归功于自己,人民白为革命出了很大的力量,白白地牺牲了很多烈士”。他还无耻地说:“要是革命失败了,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呢?到那时就该说不是你们共产党领导的了吧?又该有很多理由推到一些人身上了吧?”“共产党里大部分是农民,现在叫工人阶级的党,没有农民的份!”

4.公开附和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叫嚣取消党对工会的领导。右派分子甄文涛在整风学习会上对储安平“党天下、青一色”的谬论表示拥护。他说:“报纸上提出来的‘党天下、青一色’甘肃就有。”“你们共产党的天下,人民是没什么地位的,人民敢不听你们的话吗?”“你们党员犯了错误可以互相包庇,你们就是官官相护。”

在鸣放会上,当右派分子黄深泉射出“工会领导不要党员”的毒箭之后,甄文涛异常兴奋,并在六月十八日的会上公开响应和支持,说:“请党支部与行政负责人不要担任工会的领导职务,选择品德较好的人来担任。”他还张贴大字报攻击工会主席李映高(党员)说:“叫李映高下台,叫他一败到底不能抬起头来”。

5.攻击党的政治工作部门。他诬蔑政办公室是“挑拨离间”,政治工作是“搞人解闷”,“党员是官老爷”。“公司里边的各种制度比劳改所还严”。“党员比我们高一头,说话比我们顶用,党员们就是官,我们是小卒”。“现在的政治工作就是搞人,没事找一个人来谈思想,批你一通给他解闷”。“政办公室工作就是传人、开会、布置会议,管来往的人员登记,别的工作就没有了,还很保密,我对政办公室意见大了”。

乙,仇恨社会现实,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1.反动透顶的右派分子甄文涛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怀着强烈的仇恨,公开地和暗地里发出过很多恶毒

的反党谬论。他说：“共产党的政策阴险得很，将人的思想和走路的自由都给限制住了。”“过去反动统治时期还没统治住人民思想，而现在共产党的政策连人的思想都给统治住了。因为党内有很多的奸细（指积极分子），他们听你说什么话就马上给你汇报上去。”“不论什么政策都是人民倒霉，人民都是口服心不服，敢怒不敢言。”“人民要说‘这是不对的’，或替谁辩护一下，那党就说他是温情，是给反革命分子作辩护，人民是不敢说话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是由于党领导不好造成的。共产党领导的要是真好，就没有人来反对了。就是由于领导的不好，所以才有人来反对。”

2.恶毒诽谤精减（简）机构。这个右派分子对目前精减（简）机构措施深为不满。他颠倒黑白的（地）说：“现在的精减（简）机构和过去国民党时期资本家叫工人回家看孩子是一样的，只是名词上变了一下，是换汤不换药的。”还扬言如果叫他回家，他仍旧去当流氓，并煽动其他职工对抗精减（简）机构。他煽动投考卫校的刘敬芳说：“我们来西北是为工作而来的，不是为求学的。反正组织上叫去，不去也不行，要有不打算考上的思想准备。你就把字写好一点，这样看起来挺认真，但是不要往正确内容上写，自然就不会录取。”

……

当十月十日宣布了他的右派材料后，他竟敢明目张胆地抗拒和破坏反右，表现非常猖狂和嚣张，说：“你们共产党的阴险我是知道了，我算知道你们的真理了，说话就有杀头的罪。你们是逼我当反革命。”咒骂关于他的材料是“大编特编的，编材料的不是人，是没吃五谷杂粮的东西”。

三、分析处理意见

右派分子甄文涛所以成为这样的反动货色，不是偶

然的，这是有其阶级与历史根源的。他虽然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又是学生出身，但他自小就在他所处的旧社会罪恶环境中沾染了许多资产阶级腐朽、污秽的思想。综合以上问题简述，我们认为甄文涛不但是反动透顶的右派，而且是十足的流氓分子。他的流氓行为虽经政府和组织多次教育和挽救，但屡教不改，反而恩将仇报，更发展到寻找反革命组织、妄图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和发展流氓集团等反动活动。尤其宣布他为右派分子以后，竟敢明目张胆地对抗和破坏反右斗争，并破口大骂党。因此，本着党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该员系反动透顶、目无法纪、罪恶滔天的分子，应依法逮捕，以纯洁革命阵营。

卫生系统整风领导小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受理这份《右派分子甄文涛的单行材料》的机关，应该是比卫生厅高的部门。顺着这条思路，作者查阅到1958年5月11日《中共甘肃省委五人小组》的一件批复。全文如下：

报来甄文涛一案，经省委五人小组研究，应定为坏分子，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已报省委于五月十一日批准，希执行。

省委五人小组(章)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一日

五人小组的这份批复的总号为“58—省甄字第016号”，主送单位为“省卫生厅党组”，抄送单位为“省监察厅党组、省劳教委员会、省劳教局”，存档一份。

在“省委五人小组”批复后的第十二天，即1958年5月23日，省民政厅向省卫生厅发出一项通知，为“民社(58)字第081号”，全文如下：

你处在此次肃反运动中决定开除处理的甄文涛，为免于流浪社会，不事生产，影响治安，应予劳动教养，由国

家统一安排就业。除通知公安厅劳政局外，请你处于五月×日将甄文涛送劳政局。

为荷！

民政厅(章)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在省民政厅向省卫生厅发出这份通知的五十一天之后，即1958年7月12日，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就以“夹农育字第120号”函的形式，向酒泉县人民检察院写出申请，以“继续进行反党活动”为由，要求“依法逮捕右派分子甄文涛”。

这就是说，甄文涛在1957年年中被“省卫生厅整风领导小组”划定为右派分子之后，到1958年5月11日，又被省委五人小组定为坏分子，并报经省委批准，同年5月23日，又被民政厅通知参加劳动教养。一个多月后，他参加劳教的夹边沟农场则告他“继续进行反党活动”。

对甄文涛的处理过程比较有代表性，能反映出一部分送到夹边沟农场参加劳教的右派分子的遭遇：这部分右派的帽子系单位划定；送往夹边沟农场的的时间大都在1958年夏；批准机关为省委五人小组；执行机关为本单位、本系统或民政厅、劳教局；参加劳教者除一般的右派分子之外，还有如甄文涛这样的既是右派分子又是坏分子的“双料货”；个别参加劳教者不守规矩或另有滋事者，又被检察机关起诉，则可能被判刑。

如此大批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兼坏分子、右派分子兼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之外的其他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各类“分子”，在几个月之内被集中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它的政策依据和法律法规依据是什么？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法规，没有一份专门的文件通知，全省一下子集中往夹边沟送右派分子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原来,1957年,国务院出台了一项《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经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同年8月3日由国务院公布的。《决定》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条的规定,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劳动教养问题,作如下决定:

一、对于下列几种人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

而以上这项《决定》的依据又是《宪法》第一百条。作者查阅了1954年9月20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部《宪法》。其第一百条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夹边沟农场的近三千名右派分子和其他各类分子就是依据《宪法》第一百条,以及根据这条法律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被送来劳教的。

那么多人一下子成为右派分子，是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几千人一下子被送到夹边沟劳教，显然是适用法律法规失当。当时甘肃的做法比外省更“左”一些，损失也就更大一些。

西北局兰州会议在1961年初提出“抢救人命”，纠正这种极左做法之后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各地也都采取了相应补救措施。

1961年3月17日，第十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作出《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第一条就是关于劳动教养的：

几年来，劳动教养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被劳动教养的分子，一般有了不同程度的改造。但是，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有的地方对劳动教养是为了改造人的目的不够明确，收容范围有些过宽，错误地收容了一些不应该收容的人；管理上同劳动改造罪犯没有明确区别开来；对县以下不准办劳动教养的规定，有些地方没有坚决执行。为了正确地执行党的劳动教养政策，补充规定如下：

第一，必须严格控制劳动教养的对象。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当前应当收容劳动教养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厂矿、企业、机关、学校中清理出来的三种人：(1)有轻微罪行，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和有流氓、盗窃、诈骗等行为，屡教不改而又不给予刑事处分的坏分子；(2)少数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政治上有危险而又不给予刑事处分的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3)某些受旧社会遗毒太深，好逸恶劳，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不断无理取闹，妨碍公共秩序，屡教不改的分子。

收容被劳动教养的分子，应当经过专署(市)公安处、局长批准。

第二，劳动教养的主要任务是改造人。一切劳动教养，必须坚持“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坚持“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原则，除了强制被劳动教养的分子劳动生产外，还必须安排一定时间，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对不同的劳动教养对象，应当有不同的教育内容，采取不同的改造方法。劳动教养单位的生产任务，应当根据劳动能力来适当制订，一时不能自给的，可以给予适当补贴。

第三，对于劳动教养分子，应当设立专场管理，务必要不要同劳改场所放在一起。在暂不能建立专场的地方，也应当分别编队，分别劳动和生活。劳教场、队中的三种分子，也应当分别编队，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被劳动教养的分子，应当自食其力，并发给合理的工资，对那些好逸恶劳的分子还应实行计件工资制度，在劳动教养期间，准许他们依照规定有一定的行动自由，给予适当的假期。

第四，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从二年到三年，这是内部规定，只在收容的时候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不对外公布。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好的，可以提前解除劳动教养；表现不好的，可以延长教养期限（也必须正式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有破坏行为的，应当依法判刑。被劳动教养的分子在解除劳动教养以后，由公安机关负责介绍回原单位工作，或经过劳动部门介绍到农场、工厂就业，但绝对不要送回首脑要害部门和军事要地。无家可归，无业可就，本人自愿的，可以留在劳动教养单位就业。

第五，从一九六一年夏季开始，各地应该根据上述条例，有准备、有步骤地对现在被劳动教养的分子，进行一次清查整顿。对于继续留队劳动教养的分子，经过评审后，应当确定劳动教养期限，向本人宣布。以上清查整顿工作，应当经过摸底排队和评审，由劳动教养单位提出意见征求原单位同意，经专署（市）以上公安机关批准。

第六,专署、市举办劳动教养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委批准。县一级今后不准再办劳动教养。现有的应当迅速清理结束,最迟在今年九月底以前清理完毕。

这项《规定》虽然仍把右派分子列入收养劳教对象之列,但它明确提出了只限于“少数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政治上有危险而又不给予刑事处分的”,经过这样严格限制,范围大大缩小了。

这是一个迟到的《规定》,对已经饿死在夹边沟农场和后来的明水农场的右派分子来讲,它来得太迟了。

近半个世纪之前造成的那场灾难,给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是永远抹不掉的。2002年8月,《夹边沟记事》中《逃亡》一章中的主人公高吉义(逃离夹边沟劳教农场的幸存者)带领五名在夹边沟饿死的右派分子的子女,从兰州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原址祭奠他们的难友或亲人。

8月的戈壁滩,赤日炎炎,地面温度接近摄氏50度,但他们已感觉不到自己汗流浹背。高吉义声泪俱下,面对茫茫戈壁,宣读他的祭文:

难友、亲人们的冤魂:

在我们坐离死别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才有机会,带着极为哀痛的心情,远道来此沙漠荒滩——你们冤死暴尸的地方,寻找你们的冤魂,表达积压多年的对你们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怀念之情!

一九五七年,在那风雨如晦的特殊日子里,一些有良知的志士仁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出于民族责任感,从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出发,说了几句真话,反映了一些实情,竟然大祸临头,灾难降身,被错定为“右派”,全国几十万人,瞬间落入万丈陷阱,人格受到严重凌辱,精神受到无限折磨,肉体受到极大摧残,有多少人还被无辜夺去了生命,悲哉!痛哉!历史怎能忘记一九五七年!人民怎能忘记一九五七年!

戴着重如大山的“右派”帽子的三千人，被强迫送到酒泉的荒无人烟的夹边沟劳教营羁押，开始了屈辱的、饥寒交迫的、劳苦的非人生活！冬天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夏天顶着零上近四十度的酷暑，住的是地窝子、土窑洞，一天喝上半斤糊糊汤，饿得实在忍受不了，去找草叶、草籽填肚充饥，还被强迫超强度地劳动，眼看着难友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眼看着难友们一个接一个含冤惨死，抛尸荒野沙滩，狼啃鸟啄！几年死了一半多！

夹边沟，夹边沟，白骨累累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日日夜夜声啾啾！

千古奇冤无处诉，凄惨情景难忍睹！

难友无法相救，亲人难以相见！

悲哉！惨哉！

幸存的难友怎能忘记夹边沟！

死难者的亲友家人怎能忘记夹边沟！

历史怎能忘记夹边沟！

人民怎能忘记夹边沟！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拨乱反正，扫除迷雾，作出英明果断的决策，为全国被冤的几十万右派改正、昭雪。随着形势一天天好转，现在尘封四十多年的夹边沟的罪恶历史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让世人关注！这是幸存者和死难者家人的福音，也给黄泉下的冤魂以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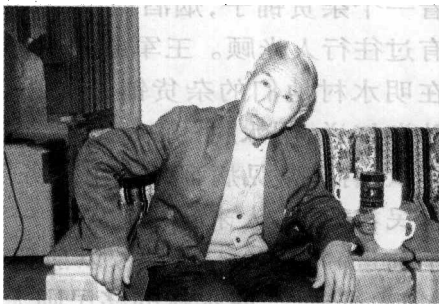
亲人啊；如果你们有灵性，就形成一股强劲的旋风，来到我们身边，我们就知道你们听到了我们的声音，知道我们来找你们来了。最好能把我们带到你们的遗骨边，我们就可以收回抛在远离家乡的荒野沙滩的遗骨，了却我们后人的心愿！

夹边沟幸存者高吉义率难友亲属奠

二〇〇二年八月

茫茫戈壁以无言的沉寂回答了高吉义们的祭奠。

昔日的夹边沟农场即今天的长城林场的主业已成为营林。林场现有林地两万八千亩,总面积十一万亩左右。根据2000年的评估,林木总资产是八百三十九万元,主要是各种杨树,另有沙枣、红柳和一些果木。此外,



夹边沟农场劳教右派中的幸存者高吉义

还有两千四百亩耕地,四十二户农工,总共一百四十二口人,大部分是来自定西和民勤的移民。现在的这两千多亩耕地,均为当年右派所开垦,集中在原规划农场的东头。西部的几千亩地,在种过几年以后,随着农场体制的改变,再加上上游鸣沙窝用水量的增加,地处下游的这近万亩耕地水源已近于枯竭,已弃耕多年。

弃耕的这些土地,上游虽不来水,但有丰富的地下水。邹大军和满忠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正在筹集资金,准备带领他的十一名在职职工和四十多户农工,沿农场北部边缘造一条三十米宽的林带,以护卫他们的林场和农田,发挥他们的优势,大力发展绿化苗木,造福当地,又贡献社会。这是他们新的“计划任务书”。

预祝邹大军和满忠的“计划任务书”早日实现!

与夹边沟农场同时设计、承担同样任务的高台明水农场今天又是什么样子呢?

2002年金秋时节,作者到高台县南华镇寻访,找到了如今称为“明水村”的地方。作者采访了一位叫孙淑红的中年妇女。孙淑红说,我家是1988年从静宁县迁来的移

民。我今年三十四岁，丈夫王军四十岁。我们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他俩都在上学。孙淑红夫妇除种田外，还经营着一个杂货铺子，烟酒糖茶，日用百货，三间屋的门面，常有过往行人光顾。王军原先在静宁就干过赤脚医生，如今在明水村他们的杂货铺子旁边依然开办了一个医务所。孙淑红说，明水村的一千多人，还有西边永进村的一部分群众，有些常见病都到这个医务所来看。永进村也是一个移民村，很多人来自永靖县。一则不忘家乡，二则寄希望于前进和发展，不想再像以前那样祖祖辈辈受穷，因此起名“永进村”。明水村的移民则大部分来自静宁，还有陇西等县。设村之后，村委会就设在当年明水农场的场部，因此村名也就叫“明水”了。孙淑红说，听说以前这里办过劳改农场，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移民到明水，已经是第三拨了。前两拨主要是井打得浅，开始有水，还能生活，后来没水了，只好走。我们这一拨来明水，国家帮助我们打了深井，通了电，浇地、吃水都没啥问题，我们就住下了，再不想回去了。静宁地方穷，又是山，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不方便。你看这里多平，一眼望不到边，生活比静宁好，来的人都不愿意回去。孙淑红说，我们现在种的地都是我们自己开出来的荒地，也有以前开过，撂荒以后我们又种起来的。我家的那块苜蓿地不平，用推土机推地时，推出来好几个人头、还有大腿，眼睛是两个深洞洞，怪吓人的。其他人家整地时，也都推出过死人尸骨，有的多，有的少，现在都不见了。

在孙淑红的带领下，作者找到了明水农场原场部办公的院子。院子的犬门向南开，院墙也还在。东、西、北三面平房也是当年所建，虽已破烂不堪，但显然还在使用。进到屋里，发现木椽和房泥中间没有使用民间盖房时通常用的芨芨笆子，而是码了一层红柳代替。同行的关维智指着这一层红柳说，这是“大跃进”的产物，急于要建房，

来不及编茭茭草笆子,就砍些红柳代替。有一间房子的木梁已经因腐朽而断落,房顶开了“天窗”。还有一间的房梁快要断了,临时打了一根支柱顶着。这个院子的主人如今是来自静宁的移民张妈妈。院子里放着拉水车,地上晒着刚收获的向日葵,她养的几只老母鸡在院子里悠闲地“散步”。张妈妈的两个儿子都外出打工了,不在家,她一家六亩地由她一人操持。六十开外的人了,身体仍十分硬朗。小院子虽然破旧,却不乏生机,恰似一幅农家秋韵图。

在第三拨移民组成的明水村和永进村两个村中间的路边上,立了一块两米高的石碑。石碑的正面是竖写的碑名和立碑日期:

国务院三西农业建设目标志

公元一九九一年五月廿一日立

高台县南华移民基地

背面的碑文是:

南华移民基地位于高台县城东南二十公里处,东靠临泽县新华农场,西至南华部队营地,北与国营碱泉子农场接壤,南至兰新铁路。农场地形南高北低,海拔1380米~1420米。地势宽阔,天然河沟多,年日照时间长。根据土壤性质和气候特征,这里适宜发展粮食和经济作物。

南华移民基地是甘肃省“两西”农业建设指挥部于1986年批准,由高台县农委自行勘测设计并组织力量施工建设的,采取了边建设边安置移民的做法。四年来,省“两西”指挥部共投资206.2万元。在县委、县政府和省、地农业建设指挥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现已完成各类计划工程项目。其中,打机井19眼,更新旧井6眼;架设十千伏农电线路14公里,动力照明线路12.2公里,安装配电箱25盘、变压器14台600千伏安;购买原社队及机关单位新办的农场4处;新建机井管理房25间200平方米;筑防洪坝9公里;营造防风固沙林带600亩;修人畜饮水池25个;兴

建占地面积570平方米的小学1所；新开长达12公里的主渠道1条；兴修田间道路36条，总长达32.2公里；共开荒5200亩。南华移民基地已安置静宁、定西、陇西、永靖、东乡等县移民603户2 505人。整个工程建设已完成并开始发挥效益。

现在，迁入这里的移民都能够辛勤劳动，建设新家园，生活有了明显的变化。大部分移民实现一年安家、两年解决温饱、三年开始脱贫致富，并对国家有了一定的贡献。多方面的管理工作正在步入正规化、规范化。

一九九一年五月廿一日立

经过以后这些年的努力，像高台县和河西走廊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日子相对河东的农民要富裕多了。当然，他们并不满足于目前的状况，他们还要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孙淑红的脑海中有更加美好的未来生活的蓝图。她已经送两个孩子分别在中学和小学读书，她要让孩子们好好学习，以便将来有更广阔的施展本领的天地。她和丈夫王军除了自己的责任田之外，还有一个小卖部的生意及医务所的医疗工作。她一年四季都在忙活，但她忙得舒心、忙得有成果、忙得心甘情愿，完全不同于四十多年前在这块土地上被管制劳教的右派分子那样忙得凄惨而徒劳，最后带上恐惧和不堪回首的心境离开明水，或在极度的饥饿与疲惫中葬身在明水的黄土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淑红们的劳动和生活，也是在继续和实践着当时的《任务书》中设想的农场的发展，尽管今天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的成员已由劳改和劳教人员变成了移民，但当年的右派们毕竟在这里开出过一片片耕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遍布移民区的星星点点的沙枣树，已有水桶粗细，那是当年劳教右派留下来的惟一能够看得见的劳动成果。红色的、黄色的、青色的沙枣挂满枝头，硕果累累。萧瑟秋风中，发出“沙沙”的微弱声响，

不知道是千百个冤魂在述说着各自的冤情，还是冤魂们在祝福着这块土地，祈愿明水有个丰收年，这里的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孙淑红们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历史包袱，她们对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灾难没有去了解的责任。对平田整地中平出来的骷髅和干尸，把它们扔掉就是了。孙淑红们只考虑种好田，做好生意，过好日子。

“黑骡骡事件”的主人公

众所周知，骡子本身并没有生殖功能。它是驴和马交配所生的杂种，个头比它们的父母都要高大，体力也大，寿命又长，是最适宜役使的力畜。它们似乎生来就是为了被人类役使的。为了使它更好地向便于役使的方向发育，酒泉一带盛行一种骗骡子的做法，即割掉它们的睾丸或卵巢。于是，当地就有了这样一个习惯，把骡子称为“骗骡”。

黑骗骡已经奄奄一息了。十一岁的黑骗骡本来比较强壮，是国营夹边沟农场农业队饲养组饲养的几十头牲畜中最棒的一头。它力气大，干活“老实”，是队里的“强劳力”。不幸的事情发生在1959年8月29日下午收工以后。牲畜们在抢食饲料时发生了“殴斗”，平日里“老实”的黑骗骡被它的“伙伴”踢伤了左前肢。也难怪，那个年头的牲畜跟当时的人面临同样的问题：饥饿。由于伤势太重，营养也无法保证，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也不见什么明显疗效。黑骗骡的生命保不住了，它就像饲养它的主人一样因极端饥饿而整天没精打采，在治愈无望的情况下，1959年10月25日，黑骗骡被作了屠宰处理。

事后，农场兽医室的兽医陈锐经过解剖分析和详细调查，为“黑骗骡”之死写出了最权威的“证明材料”。在那

个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环境条件下，“证明材料”同时也意味着肯定和赞扬，抑或揭发和批判。当时，任何纯技术性的材料，都要带上政治色彩，这是那个时期中国的时代特色。

也许是农场当局和司法部门对这份至关重要的旁证材料有专门的要求，陈锐在这份盖着他自己名章的材料中，作了详细的陈述。也可能是几易其稿吧，陈锐交出这份材料的时间是黑骡骡被屠宰后的两个月又十天，即1960年3月2日。

陈锐的这份材料共分三部分，内容如下：

证明材料

一、发病原因：

场部马圈有黑骡骡一头，十一岁，健康状况良好。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九日，由于饲养组组长马述麒工作不负责任，没有按照先草后料的饲养操作规程饲喂骡子，以致引起该畜与别的骡子抢吃饲料，被踢伤左前肢。因致伤严重，肱骨骨折，喙肱肌、深持屈肌有重伤，正中神经和尺静脉有撕裂。

二、治疗经过：

伤畜被踢的当天下午，立即给伤处压迫止血，创口用五分之一的高锰酸钾冲洗后，撒上磺胺碘仿撒粉，并用纱布棉垫包扎，随即肌肉注射油剂青霉素九十万单位，以预防炎症及并发症。次日起由场部兽医刘成文、陈锐二人会诊，劳教人员曹炎林协助进行治疗。共治疗五十六天。伤肢开始局部有炎症，每天用消肿药洗涤，以后每隔一天洗涤一次。全身方面，内胀先后消散，用镇疼补血药物。最后，伤肢的炎症消退，但已变短残废。由于长期躺卧于阴凉处，并发风湿病，伤畜极度衰弱，消瘦。认为无治愈希望，按当时情况发展下去，只有死亡。因而具情报告场领导，请示处理。

三、死后解剖情况：

在没有办法治愈的情况下，我们提出处理意见，经场部领导批准，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作了屠宰处理。屠宰后解剖所见：伤肢肱骨半部已断，跗跖骨骨折。由于发炎引起骨质增生，关节越来越大。关节附着各肌腱重生欠佳。喙肱肌、深持屈肌已化脓坏死。结缔组织增生，结果形成包囊。尺神经、正中神经、尺静脉有伤痕和愈合现象。

该畜从受伤到治疗的过程中，场队党政领导对病畜都非常关心。刘场长、罗股长、梁队长都亲自到马圈看过多次，并督促兽医人员抓紧治疗。在人事方面，可以说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这份“证明材料”的意义并不只限于它本身，不限于它本身的详尽与否，准确与否，科学与否。骡子平白无故死掉，农场失去一个好“劳力”，得有一个交待，也是情理中的事。问题是，在同一个时期，饲养黑骟骡的马述麒们死后，就找不到这么个像样的“死亡报告”。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中的《医生的回忆》篇中记载了一个医生的话：“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胃肠不适，中毒性痢疾”。牲畜的死因要搞清楚，说明白，人的死因却要瞎编，这就是公元1960年前后的国营夹边沟农场的现实。医生还说：“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黑骟骡永远闭上了它的眼睛。但在它身后，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开始了。就在陈锐写出关于“黑骟骡事件”证明材料的前十天，即1960年2月21日，夹边沟农场就以“夹农育字第〇〇三八号”公函的形式向酒泉县人民检察院

提出了“关于提请逮捕破坏生产犯马述麒”的请求。这份公函很简单,全文如下:

酒泉县人民检察院:

我场劳教分子马述麒,在饲养牲口的过程中,偷盗牲口饲料,严重地影响了牲口健康,破坏了生产,已构成犯罪,特报请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追究刑事责任,判处徒刑。

马述麒何许人也?他与夹边沟农场两千多名劳教人员一样,都是右派分子。在伙伴们中间,他的年龄是稍大一点儿的,时年四十三岁,比他的年轻伙伴老成些。进场初期,因为抱着“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早改造好早回家”的愿望,有过很长一个阶段的“伪装积极”,被委以马号负责的工作,即饲养组组长。马述麒原籍甘肃民勤县。解放前在酒泉中学读过书,1942年,在甘肃省银行训练班接受过四个月的训练,结业后先后在酒泉、敦煌、安西的银行里当过出纳员、会计员和助理员。1949年安西解放后,马述麒被继续留在银行工作,以后又调往酒泉银行办事处、酒泉中心支行、张掖中心支行,担任过文书组长、督导员。1957年定为右派,同年12月送夹边沟农场劳教,被分配到饲养组。



50年代的马述麒

为了证明马述麒确实是破坏生产的罪犯,农场方面除向检察院写了提请逮捕的申请以外,还收集了十份共计十八页近万字的旁证材料。

有一份由夹边沟农场农业队出具的旁证材料中,列举了马述麒三大罪状。

其一,对领导不满,不安心改造,煽动群众,破坏生

产。说马述麒自1959年以来,就不安心改造,他经常对别人说:“难道我们一起来的四十九个人,没有一个好的吗?”又说:“叫我们来劳教时,党还没有宣布对右派的处理决定,如今把我们弄到这里,根据是哪一条?”上级布置写“交心书”,他不管,也不往下布置,反而说:“黄干事说了,春节过后重新布置,现在还没有什么安排,借这个机会,我们先休息。”这样,造成马号冬训学习搞不起来。他对领导的指示拒不执行,并阳奉阴违,采取两面派的手法,欺上瞒下,要把马号变成自己的天下。1959年10月,场里召开畜牧工作会议,要求饲养人员整顿思想,研究工作。但马述麒拒不执行。后来罗股长向他询问落实会议精神的工作安排时,他说:“已经开了三四次会了。”其实连一次会都没有开。领导安排喂牲畜时,一般草和碱性草要搭配,并按规定的比例搭配,但他根本不执行。在这次畜牧工作会上,针对病弱牲畜大量出现的问题,为了减少死亡,强调病弱老牲畜要分群分圈饲养,但他都不执行。1959年8月29日,马述麒值班饲喂牲口,他不按先草后料的操作规程饲喂,造成牲口之间相互踢咬,以致黑骟骡被踢伤,他又不精心调治喂养,造成黑骟骡体质急剧恶化,不得不屠宰,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其二,盗窃。在同一份旁证材料中,这方面的问题一共给他列了七项:一、偷吃大豆约二十斤。1959年1月,杨发智就发现马述麒的床上有大豆。二、偷吃甜菜二十多斤,胡萝卜十多斤,白萝卜和蔓菁五斤。三、和刘玉林一起偷吃洋芋约三十斤。10月到12月三个月当中,两人还偷吃葵花籽四五斤。四、将场内一只猫捉住打死,并主谋策动杨发智剥皮,然后煮熟吃肉,影响灭鼠。五、1959年七月,在新添墩参加农场畜牧会,会后在新添墩吃了饭。回到夹边沟以后,说他还没有吃饭,又打饭一次,应视为盗窃。六、黑骟骡8月29日受伤后,为使伤畜尽快康复,领导上批

准给黑骡喂小米五六斤,但他只喂了两次,还剩下两三斤小米没有给伤畜喂,放到自己包内,以后不知去向。七、马述麒自己身为饲养组组长,不仅自己偷吃饲料,还偷饲料送给别人吃。曾送给康得生吃大豆一次。其他饲养员偷吃,他也从不制止。

其三,包庇拉拢坏人,搞小集团。旁证材料就这方面的问题一共给他列了六项:一、1959年7月的一天,饲养员刘玉林值夜班,刘不按饲养程序饲喂,吃碱性草比例过大,食后饮水安排也不合理,致使三四头牲口肚子疼,影响出工。做为饲养组组长,马述麒没有向领导汇报,有意包庇。二、饲养员程炯民批准怀孕的老白马出圈,供役使单位去役使,致使老白马流产,破坏畜牧业发展。事故发生后,马述麒向领导汇报说不是程炯民批的,是别人批准的,有意包庇程炯民。三、木工组的劳教人员发现刘玉林偷吃萝卜,给马述麒反映,马说:“刘玉林总没有那事吧!”不做任何处理。还有一次刘玉林在地里拔萝卜吃,被四队劳教人员当场抓住,报告了马述麒,马说:“小事”。劳教人员反映,有一段时间,程炯民经常在四号圈里烤火,还烧煮东西吃,马述麒不但不制止,还参与分东西吃。程炯民利用工作之便偷吃饲料及秋菜,把自己正常的口粮节约下来,攒下十来个馒头,有不轨图谋。领导上知道以后问马述麒知道不知道这件事,马述麒撒谎说,程炯民是为了向国庆节献礼。四、1959年11月,场里收获秋菜,别人都很忙,马述麒却睡大觉。马对饲养员张志焕说:“你给杨发智说,叫他给我弄些胡萝卜来。”后来因为看管很紧,马述麒的阴谋没有得逞。五、1958年刘玉林受奖,是马述麒私自上报的,没有经过组里全体劳教人员讨论。畜牧会上奖励的好人好事,也没有经过群众评定,都是马述麒一个人自己决定就上报了,其他人有意见。六、马述麒不发扬民主,拉拢一批打击一批。经常是他给程炯民写成绩,程炯民给

他写功劳,造假成绩,造成饲养组不团结。

这三大罪状是由夹边沟劳教农场农业队出具的旁证材料中所列举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劳教人员梁进孝、潘生武分别交待的老白马流产过程的证明材料,都证明马述麒包庇刘玉林,工作不负责任,造成骡马流产。

案子到了检察院,检察院决定立案侦察。检察官张生瑞在1960年3月1日提审了被告马述麒。马述麒的交待事实部分与“旁证材料”所列大体一致,只是对问题性质的认定有一定差距。他说:“我1957年12月来农场,是因为划了右派。划右派的原因是我给单位领导提了意见,就说了个‘人事制度不合理’,‘党群关系有沟有墙’。我认为错误并不严重,领导一不高兴,就给我把帽子戴上了。我想我在这里好好劳动,表现好一些,让领导满意些,早一天出去,我还有公职,还能到银行去上班。再说了,老婆孩子生活无着落,他们也都盼着我早一天出去。因此,在1959年的6月份以前,我工作很卖力气,没有违犯过场里的任何纪律、制度。6月以前,场队领导对我的工作是相当满意的。6月份,场领导提出我们要以场为家,我心想,看样子是出不去了,劳动好也白搭,以后开始工作不负责任。我在马号当组长,工作赶不上去,老是受批评。1959年9月的一天,在吃饭的时候,我给王队长说:‘现在大家都垮了,工作赶不上去,是否调换一下我的工作?’王队长把我批评了一顿,叫我继续安心工作,我也就没再说啥。身体不行了,工作达不到领导满意,我也实在没有办法,我是力不从心。”

关于小集团问题,马述麒交待:“因为感觉到程炯民工作积极,有毛病随时批评一下他也能改正,就对他比较信任。别人反映我和程炯民、刘玉林、杨发智是个小集团,我考虑了好多天,实在没有啊。”

提审马述麒的次日,检察官张生瑞又分别询问了程

炯民和杨发智。他们的旁证,无非是些偷吃萝卜、蔓菁、白骡马流产、黑骡骡被踢之类的事情。

找到马述麒的遗属,还经历了一番曲折。根据原先作者掌握的线索,马述麒当时的家属居住安西县五爱公社十工大队。“十工大队”当是今天的“十工村”无疑。“五爱公社”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区划单位,现在已有新的区划和新的名称。但从“十工村”分析,应为现在的安西县南岔乡。因为路程遥远,几次意欲前往均未成行,只得央求文友王安平代为打听。王安平又委托他的同事王生军前往十工村了解马述麒一家现在的情况。几经周折,王生军才找到了马述麒的妻子李春兰所生次子马安生,而马安生竟然是与作者同事八年的老相识!马安生如今是安西县政协副主席。他曾经在兰州、酒泉的公安和劳改部门多方打听其父的下落,一直没有找到线索。他对父亲在夹边沟的饲养组长工作和所谓“抗拒劳教”的问题一无所知。当知道作者对马述麒这一段情况有所了解时,马安生与作者有过几次促膝长谈。

马安生给作者提供了一份中共酒泉地委的文件,是以“摘帽办”名义下发给酒泉地区人民银行的。文号为“地委摘办一九七九·七号”。文题是:“关于对马述麒同志原定右派问题改正意见的批复”。全文如下:

酒泉地区中心支行:

你行报来《关于改正马述麒右派问题的报告》,经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六日地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领导小组讨论:“同意你们对马述麒同志原定右派问题的改正意见,恢复政治名誉,按国家有关规定发给其埋葬、抚恤费。对于表、衣物作价一百五十元。发给其子女生活困难补助费四百元。同意将其小女儿马梅英招工。

此复

中共酒泉地委摘帽领导小组

一九七九年十月七日

“地委摘办”的这份文件，还同时抄送给了地委组织部及行署公安处、民政处，还抄送给了安西县的公安局、民政局和知青办。

王生军通过十工村的几位年长的村民李福民、陈桂花、杨生泉、阎国清、李富存等人，又找到李春兰老人，了解到他们一家自马述麒到夹边沟农场参加劳教以后的一些变故。马述麒的妻子李春兰与马述麒是同乡，也生于甘肃民勤县。李春兰幼年随父母从民勤迁到安西县十工村，如今已过古稀之年。李春兰与马述麒于1948年成婚，生育三男三女六个孩子。马述麒自幼父母双亡，由其三妈抚养成



马述麒的妻子李春兰与儿子马安生、女儿马菊梅合影留念，摄于1954年春。

人，他有一个亲生哥哥，曾在酒泉邮局工作，已故。解放前夕，马述麒在安西县银行工作，解放后被留用。1951年被调入酒泉市中心支行督导处。1953年以后，李春兰随丈夫和孩子们一起在酒泉生活。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李春兰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眼界也比以前开阔了许多，特别是在扫除文盲的运动中，李春兰经过刻苦学习，达到脱盲标准，能够读书看报和撰写简单的文字材料。1957年到1958年，当时甘肃省的河西三地区（武威、张掖、酒泉）合并为一个张掖专区，银行机构跟着调整，马述麒被调入张掖银行督导处，李春兰和孩子们也随丈夫到张掖生活。1957年12月，马述麒以右派分子的身份被送到国营夹边沟农

场劳动教养以后，李春兰和孩子们也被遣送回安西县五爱公社十工大队(今安西县南岔乡十工村二组)。张掖之别，即是他们夫妻、父子、父女的永别。马述麒去夹边沟农场是怎么改造的？其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后来为什么又从夹边沟转到了别的什么农场的？李春兰一无所知。1962年，李春兰半年多没有接到丈夫马述麒的书信，就向夹边沟农场去信询问丈夫的近况。农场随即寄来公函说，马述麒已于半年前因心脏病发作治疗无效而死亡。

1958年冬季，在凛冽的寒风和周围人们的冷眼中，怀着身孕的李春兰独自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回到了安西县五爱公社十工村艰难度日，备尝辛酸。在饥寒交迫中期盼丈夫能结束劳动教养，回家过乡村生活。李春兰想，农村生活虽苦，但能免去各种政治运动中的担惊受怕，她宁可选择苦日子、安稳日子。但是，万事不随人愿，1962年，噩耗迟了半年之后才传来，而且是在家属询问之后。如果家属不询问呢？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告诉李春兰和她的家人一声：你们的亲人已经死去！一条人命与草芥一般，李春兰伤心至极，也悲痛至极、胆寒至极。丈夫随随便便就被人剥夺了生命！年幼的孩子怎么呵护？凭李春兰一个人的力量，能呵护好自己的孩子，能抚养孩子长大成人吗？

后来，在亲友们的劝合下，李春兰与同村农民马贵富结婚，并生有二子。马贵富为人忠厚、勤劳，在村子里很受人尊重。马贵富对李春兰与先夫所生的三子三女，与自己亲生的一样看待，这是李春兰和她的孩子们不幸中之万幸。如果马述麒在天有灵，他也会感谢马贵富，并由此感到欣慰。马贵富的行为也赢得了子女们的爱戴，子女们个个知冷知热，孝敬二老。马贵富当过几十年的生产队长和小组组长。原南岔乡党委书记、现甘肃省水利厅厅长盛维德与马贵富交往颇深，当时是马贵富家中的常客。1992年春节期间，盛维德曾陪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到马贵富

我还给他缝了新被子。被面用的布是红底黄花，还有一条在家里舍不得用的毛毯，被面子上的花儿颜色和图样我记得很清楚……说到这里，李春兰停了两分钟，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已经泣不成声。孙子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默默地围在她的身边，抓住奶奶的手，望着奶奶的脸发呆。过了一会儿，李春兰老人继续说：“马述麒走后，就叫我和孩子们离开张掖回老家。回什么老家呢？马述麒从小就没有爹娘，他是他三妈养大的，他的老家民勤已经没有亲人了。当时，我的母亲还在世，就在安西县十工村，我们只好奔我妈来。那时，已经到了1958年的年底，天气特别冷，一辆马车，安西叫皮车，把我们一家人连家当一起从火车站拉回了十工村。坐在皮车上，孩子们的脸冻得胡萝卜一般。到了十工，啥也没有，人家是冰锅冷灶，我们是没锅没灶。当时，只能靠我妈。这么多人，靠到她一个人身上也不是办法。唉，那几年也不知道是咋过来的。苦也受尽了，累也受尽了，气也受尽了，一做个啥，就说你是右派分子家属，做啥也不能做。真是不想活，看着几个可怜的孩子，还得活，还不能死。”

毕竟是十工村嫁出去的姑娘，在李春兰一家陷入上天无路、人地无门的绝境时，十工村接纳了他们。李春兰可以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挣工分养家，孩子们在家中自己去玩耍，也就算是安了家了。就在这个时期，十工村不但接收了嫁出去的姑娘李春兰，还接收了一批全省各地参加劳教的右派分子，听说还有北京来的，都是知识分子，还有军官、老师，啥人都有，就是没有普通老百姓。其中，包括《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的作者、前甘肃日报社记者和凤鸣，也包括本书另篇介绍的《省委机关的第一个右派》的主人公关维智。有一个时期，劳教人员和十工村的社员们是在同一个“共产主义大食堂”就餐。李春兰说，开饭时，我领上几个孩子去打饭，参加劳教的右派分

子们总是直瞪瞪地盯着我的几个孩子，说这几个娃娃不像农村娃，说我也不像农村妇女，还问孩子的爸爸在哪里。我能给他们说孩子爸爸的事情吗？我总是领着孩子躲着他们，但是躲也躲不开，他们总爱捏捏孩子的手，亲亲孩子的脸，特别心疼这几个孩子。后来我想，那些右派也都是有家室老小的人，而且跟我们一样，原本都住在城里，都是城里人，看见我的孩子，就想起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不管我怎么躲，那些右派后来还是知道了孩子他爸也是右派，也是好人，也在另外的地方劳教。这样他们就更喜欢我的孩子了。见不到自己的孩子，见了人家右派的孩子也心疼！

李春兰说，马述麒远在夹边沟，他不能回来，我们也没有条件去看望他，他思念孩子的心情跟十工的右派们是一样的！他从张掖到夹边沟农场去改造，除了行李卷，就带了十元钱上路了。过了一年多，我也听说他们那里吃不饱肚子，天天挨饿。我没有力量去关照他，他却一直牵挂着我和孩子们。到农场去时，他只带了十元钱，就这十元钱他也没有舍得花完，剩下五元，他装到信封里，又写了一封信，把这五元钱和一封信寄到了十工。信当时是要经过检查才能寄出来的，现金装信封也是不允许的，说明这五元钱不是从夹边沟直接寄出来，而是想了个什么办法，从别处寄回来的。可惜这封信我没有保留下来，也搞不清楚是从哪里寄出的了。但是信的内容我还记得，说是你一个人带几个孩子，真不容易，你一定要把孩子带好，这五元钱寄回，你给孩子们买一点吃的东西。在家的時候，马述麒很喜欢孩子。回家别的事情不多做，就是喜欢孩子，特别是老二马安生，胖乎乎，两个眼睛大大的，最招人喜欢，他回来就抱上不放手。老二当时五六岁，他特别叮咛要看护好，到上学的时候就给报名，让上学去。五元钱今天看起来不算啥，但当时还是能顶大用的。如果这五

元钱不要寄回来,留下他自己用,兴许……李春兰又是几分钟的泣不成声。

四十多年来,李春兰最不愿意说起的,就是她的小元元。马述麒1958年底去夹边沟农场劳教时,李春兰已经怀上她的小元元好几个月了。从张掖被遣送回安西时,李春兰是一个孕妇。小元元是个男孩,跟他的哥哥姐姐们一样,浓眉大眼,五官端正,白白的皮肤,可爱极了。小元元在李春兰最困苦的时候出生,没有过一天温饱的日子,也从未见过爸爸是什么模样。孩子三岁多时,李春兰到生产队的地里去薅草,孩子们自己在家中玩耍。小元元可能是想找妈妈,就独自一个人走出家,走出村子,不幸掉进路边的水渠里。水流很急,孩子没有能力爬上岸,不到四岁,就结束了他年幼的生命!

李春兰老人对马述麒在夹边沟农场饲养组的经历一无所知。作者向她讲述了这一时期马述麒的工作和生活即劳教情况,黑骡骡之死的经过,骡马流产始末,马述麒因包庇饲养人员偷吃饲料而被批判等等,李春兰老人安静地听着,不时插上一两句话:“他是个好人,冤啊!”



马述麒遗孀李春兰和儿孙们

“抗拒劳教”而被起诉和判刑的右派们

就像对马述麒的处理办法一样，从1958年10月16日到1962年1月6日的三年零三个月时间内，酒泉县检察院一共办理由夹边沟农场提请办理的此类案件四十件，涉及嫌疑人共四十六人。这些右派分子或坏分子来自于全国十四个省、市，男女都有。其中，年龄最大的四十几岁，最小的十九岁。经过法院审理，一般的判刑三五年，最长的十年，也有免于刑事处分的。

这是一个更为不幸的群体，是以前诸多关于右派分子生活情况的纪实文学作品中很少涉及的领域。全国五十多万右派分子，投入劳教的是不幸中的不幸者，但毕竟占的比例不是很大。投入劳教之后又因“抗拒劳教”而被起诉者，又是这不幸者中的最大不幸者。

为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情况，现将发生在夹边沟农场的四十件案件中所涉及到的四十六个人的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文化程度	原工作单位
1	陈作周	男	30	甘肃通渭	初中	兰州木材公司
2	陈培生	男	37	浙江绍兴		酒泉机械厂
3	王晋	男	28	陕西长安	大学	甘农大
4	王先直	男	34	河南济源	初中	兰州市民政局
5	王改会	男	31	河北		地质部兰州采矿机械厂
6	张汝楫	男	35	天津		玉门铁路车辆检修厂
7	张云生	男	19	河南南阳	初中	甘肃省公路局第四工程处
8	李忠智	男	20	吉林伊通		兰州林校学生
9	李飞云	男	35	安徽潜山		上海市畜产品公司
10	梁正林	男	27	甘肃通渭		临夏回族自治州水利局
11	孙治田	男	26	安徽	高中	兰州火车站
12	邢政	男	26	甘肃兰州	高小	兰州市城关区政府
13	柳国田	男	19	四川江油	高小	部队
14	唐德如	男	29	江苏泰州		兰州铁路局客运段
15	林春生	男	34	四川		兰州公安局人事股长
16	姚自修	男	33	甘肃天水	高小	天水市批发商店
17	秦筱月	男	29	河北魏县		
18	缙振奎	男	37	陕西富平	高小	兰州纺织品批发站
19	甄文涛	男	21	河北武清	初中	甘肃医药公司财会科
20	温清海	男	24	广东梅县	大学	兰州建设银行
21	刘永钧	男	27	河南巩县	初中	兰州油脂公司
22	单兴怀	男	33	甘肃高台	初中	兰州市统计局
23	李保光	男	22	辽宁锦西	大学	兰州工业学校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文化程度	原工作单位
24	王明德	男	30	甘肃兰州	高中	部队
25	郭九春	男	26			白银公司
26	万志彪	男	39	甘肃高台		甘肃地质局水文二队
27	王立德	男	26	甘肃天水	初中	天水县人民委员会
28	王留贵	男	23	陕西南郑		部队
29	张克远	男				不详
30	张良	男				不详
31	张浩然	男	43	辽宁辽阳	高中	武威县木材公司
32	马述麒	男	43	甘肃民勤	高中	银行张掖中心支行
33	刘德明	男	46	山东巨野	高中	不详
34	郭玉山	男				不详
35	范长英	男	30	山东乐陵		兰州科学院
36	郑寿昌	男	34	江苏盐城		上海市市政工程局
37	郑孝祖	男		上海		定西县商业局
38	黄建民	男	35	甘肃山丹	高中	山丹银行
39	吴殿君	男	32	吉林德惠	初中	兰州铁路局高崖车站
40	张文智	男	22	陕西卢县	小学	部队
41	赵彦武	男	23	陕西长安		甘肃省商业厅
42	赵振中	男	23	甘肃武威	初中	武威市百货公司
43	由天	女	38	吉林扶余	大学	兰州医学院
44	周扶基	男	27	浙江绍兴	高中	兰州化工厂
45	张志富	男		上海		成都将军街15号
46	汝明 (又名霍乃美)	男	35	江苏苏州		江苏南京市

当时在酒泉县检察院工作的接触过夹边沟农场提请办理此类案件的材料的人,包括检察长崔元举、副检察长张万元,负责监所工作、后来当了一年代检察长的检察官王成才,还有几位具体的办案人员:许进才、岳忠、万生祥、张生瑞、王守科、孔繁敏、李怀明。

与黑骡因伤致死的责任人马述麒一样,以上四十个案件所涉及到的四十六名被告,都有一个统一的罪名:抗拒劳教。

2002年3月27日和29日,作者两次走访王成才,请他提供当年夹边沟农场提请法办的这四十多人的情况。我向他特别请教:“抗拒劳教”是个什么罪?王成才苦笑一声回答说:“就是调皮些,有的是身体太差。这些都成为罪名无非是政策左呗。”

一个“左”字,就是王成才对当时审理此类案件的历史总结。王成才的办案经验十分丰富。在检察工作岗位上工作到退休。他是从酒泉地区检察分院检察长岗位上退休的。他说:“回头看,很多人是不该判的。”“他们都是些文化人,讲道理,本身就不应该划右派,更不应被劳教。”

右派们当时“抗拒劳教”的具体表现之一是“破坏生产”。

除马述麒因工作原因造成黑骡死亡被视为破坏生产之外,还有十几名被告都有关于破坏生产的记载——

王晋原为甘农大的助教,大学文化程度。1960年5月3日午夜,饥饿难耐的王助教悄悄溜出宿舍,进入农场第一生产队的猪圈。农业大学的助教,对牲畜的脾性并不陌生。黑暗中,他用给猪搔痒痒的手段,把一头六十多斤的猪抱到了一个远离猪圈和宿舍的菜窖边,然后用随身所带的镰刀把猪杀死。王晋将猪杀死之后,这才想到:“没有煮肉的家具,怎么吃到嘴里?”于是,他回身到灶房又偷了一只铁水桶,重新回到他宰猪的菜窖旁,却又遇到了两个

问题：一是桶小猪大，把肉卸开，一次也放不下。二是窖旁水渠中这时候刚好没有水，煮不成，搞水又得跑老远的路。同时，天已快亮了，时间显然已来不及了。精疲力尽的王晋想了想，决定先把猪肉掩埋起来，第二天晚上再想办法吃。挨到第二天晚上，大锅和水的问题还是不好解决，于是王晋又想到用火烤。就在他刚生起一堆火，还没有来得及把猪肉放到火上，就被两名工作人员曹国泰和姚克勤逮了个正着。活该王晋倒霉，他偷宰的这头猪，还是一头怀孕的母猪。看是一条猪命，实际上十几条猪命也能给他算得上。一个星期之后的5月10日，夹边沟农场的一纸诉状，就以破坏生产罪把他告到了酒泉县检察院。农场出具的这份“提请逮捕”的公函编号为“夹农育字第零陆捌号”。该函称：“偷宰怀孕母猪，严重地破坏了畜牧生产。他一贯抗拒劳动，经常偷盗，是一个屡教不改的反动分子，特提请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严厉打击破坏生产的刑事犯罪分子了，以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的顺利发展。”

郑孝祖的“破坏”是因为他偷吃了白菜种苗。夹边沟农场为酒泉县检察院出具的证明材料称：“1960年2月3日晚上，郑孝祖用作案工具把菜窖的门扭开，偷出留做种苗的大白菜十七棵。领导发现后，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向他指明这是留下的白菜种株。郑孝祖仍不听劝告，一个多星期后，即2月26日晚间，他又扭坏菜窖门，偷走一百四十二棵，故意将大白菜根子全部切掉，让你想种也不能种，偷到的这些种株，他不但自己煮着吃，还送给其他劳教分子吃。郑孝祖前后三次一共偷窃白菜种株一百六十四棵。预计这些种苗可产大白菜籽二十斤半，可种菜地一百零二亩，即来年就有一百零二亩菜地不能下种，致使该站无法完成1960年的蔬菜种植计划，严重地破坏了蔬菜生产。”郑孝祖后来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还有一些人出现过一些偏激的行为，也把他们列到

了“破坏”之中。劳教人员秦筱月于1958年4月1日潜逃回原籍河北省魏县,5月10日就又被公安部门押解回到了夹边沟,关进了禁闭室。在禁闭室里,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大喊大叫:“他妈的,我们单位给我乱七八糟编了一大套,什么右派,我想不通,我就要跑。”“他妈的还要我上工,这不人道!”边喊边对门窗拳打脚踢。后来,农场给他整理的单行材料上,认定这就是砸门窗,破坏监舍。另外还有“锄草时乱挖麦苗,损坏麦苗很多,破坏农业生产”。

被告们“抗拒劳教”的表现之二是“散布反动言论”。

“右派分子”陈作周的反动言论是:“共产主义五十年也建不成。”他这话是在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高潮时期,而且又是在夹边沟劳动教养时说出来的,罪行就显得尤为严重。当然,陈作周的话并没有错。我们简单算一算:1958年说的这句话,五十年以后,差不多也就是现在。不要说共产主义了,连社会主义也只能算初级阶段。再过半个世纪才能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还是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远大理想,还很远。如果今天有人说“我看共产主义再过五十年也实现不了”,那别人一定会认为他是在说废话,因为这是尽人皆知、明摆着的道理。但是,在全国上下人人发热的1958年,那可是反革命言论。陈作周有点像哥白尼了。哥白尼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比起地心说,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科学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戳穿了宗教神学伪造的谎言,对社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教会势力不能容忍这种科学上的进步,哥白尼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说一句正确的话,因不合“时宜”或不对领导的口味,说话者就需付出沉重的代价,有时是政治生命,有时是青春年华,有时是幸福晚年,这是中国现代历次政治运动的普遍特色,也是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一提政治运动就心有余悸的主要原因。

1958年10月16日，酒泉县人民法院以“酒刑乙字第二一八号”文件作出判决。判决称：“被告在兰州木材公司工作期间，就说过‘领导是军阀’。整风运动中说‘肃反你整我，整风我整你’。还说‘党天下’说得对。党和群众之间有墙有沟，墙高而厚，沟深而宽。”“在劳教期间，不但没有悔罪表现，反而更加仇视我党，恶毒攻击说‘共产党管得太宽’。‘把我们骗到夹边沟，把人往死里饿，吃不好，脸色都变了。’“公开抗拒劳动。领导批评他，他公开叫嚣‘走不动’，‘你把我怎样？把头割了也是碗大的疤。吃多少饭，干多少活’。‘什么社会主义，人民生活有什么提高，我看共产主义五十年也建不成’！”“根据上列事实，本院认为，被告曾因反党谬论被劳教，现在劳教期间仍继续散布反动言论，诬蔑我党，并抗拒劳动，其情节确属恶劣，故依法判处被告陈作周有期徒刑五年。”

“右派分子”张汝楫的反动言论是：“每天在吃饭的时候拿着碗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讽刺社会主义不好。”张汝楫唱“社会主义好”的时间是在1960年元月，全国大饥馑，中央领导都降低了自己伙食标准的时候。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的粮食定量已降到每月不足二十斤，人人都饿得皮包骨，浮肿的人很多，死人的事几乎天天发生。人们已经没有心思干活，队长、组长们自己喊人的底气都不足了，所有的人都蓬头垢面，几天不洗一次脸，洗澡更谈不上，衣服也没有力气去洗了。虱子太多，就把衬衣脱下来抖一抖再穿上。为了减少体力消耗，尽量躺在床上不动。每天保留下来的例行活动就是打饭、吃饭和上厕所。就在大家静静地走向死亡的集体行动中，每到吃饭的时候，张汝楫就拿着他的饭盒，用自己的筷子有节奏地使劲敲，并且边敲边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坐得牢。反动派，被打倒，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胜利，共产主义社会一定来到，一

定来到！”有谁如果对他的这种歇斯底里稍稍表现出不满意，不以为然，他就要把“一定来到”唱到谁的脸上，把饭盒敲得山响，而且就贴着你的耳朵敲。如果当下还挨不到他打饭，还要等一等才能排到跟前，他就要把“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词重复几遍。尤其到了管教干部跟前，他专捡这其中的一句，提高了嗓门反复唱。张汝楫“何其毒也”！酒泉县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列举了张汝楫的一系列反动言论：“这次整风，我的嘴巴不好使，讲错了几句话，因此就拿我当右派了。在会上斗争，逼得我没办法，才满口胡说地承认了。过去我太幼稚，什么是实事求是？我才不信呢，只要你说共产党好就是实事求是，你提个意见就不是实事求是。我现在在农场劳动一个月只拿两块五毛钱，这里的劳动力可真太便宜了，世界上再没有咱们这样便宜的劳动力了。唉，发啥钱呢，把小命保住就算好了。将来能不能出去也不知道。我们表面上是劳教，实际上是劳改，不过名词安得好听罢了。”

被告人邢政的反动言论主要源自他的一封家信。他在给自己胞弟的一封信中，介绍了夹边沟的劳教生活：“早晨一个馍，半碗苣菜，中午一个馍，吃上三小铁勺稀糊糊糝子饭。哥哥一天要劳动十七个钟头，怎能挨住？好多人都饿得走不动了。我有时挖些苦苣菜用水煮一下吃，还不能叫别人看见，赶快咽下去。我还偷吃过场里喂兔子的菜。有一回，不小心把有毒的草吃下去，中了毒，还受了批评。哥哥伤心透了，为什么没有人搭救我呢？因为吃不饱，有的人上了吊，偷跑的人也很多，哥哥实在活不下去了！”就在这封家信被查获的同时，场方还收集了一些邢政在这一时期的一些言论：“我跟我弟弟要了几斤点心、两斤蒜，结果还叫别人偷吃了，组织上把人都教育成贼了！把我在夹边沟继续教育下去，我看也得抢着吃！什么叫按劳付酬？就是每天把你累死，给一点点粮。跃进呢，馒头没有

我的孢子(指睾丸)大,跃进个球!”邢政为他的家信和平日言论付出的代价是: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被告人林春生的反动言论是打自己孩子时说了不恰当的话。林春生被送劳教以后,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顿之中。他从小当兵,四川老家没有什么依靠。劳教之前,他在兰州当公安预审员;划了右派之后,同事们立即跟他们这个家庭划清了界限。在无助中,他的妻子只好忍疼把孩子撂给林春生。当时,场里是不同意接收这个孩子的,怎么说也不行。万般无奈之中,林春生和他的妻子想了一招:假离婚。两人向场方陈述:妻子没有工作,也就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林春生是有公职的人,目前只是劳动教养,将来还是要回到公安局工作的,根据法律规定,他有责任养活孩子。场方无奈,只好让林春生把孩子留下来。为了活命,想什么招都不能算荒唐。林春生自身保命都很困难,再拉上个孩子,真够他受的。于是,他经常故意打孩子,而且专门在人多处打,当然是装样子给别人看的。关键是打的时候口中还念念有辞:“爸爸不老实来劳教,你还不老实!”于是农场为他写的上报材料中认定:这是“瓦解军心,煽动群众对党和国家不满”。

“右派分子”甄文涛的反动言论是“猖狂”和“嚣张”地否定自己为右派分子。他经常散布:“我的材料是捏造的,大编特编的。这编材料的不是人,没吃五谷杂粮的畜牲。说真心话,你们就给扣上温情主义、同情右派分子的帽子。我算知道你们的道理了,说话就有杀头的罪。你们愿意怎么往反党上拉就拉,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这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得不低头,我也不低头。你就是开大会斗我,我嘴上承认,心里也不承认,心里承认我就不姓甄了!你们跟我谈也是白谈。你们想要我说你们想听的话,那是叫我昧良心,我不会说,到人殓也不会说,跟你们谈不到一块,因为我没有那一种思想,都是你们捏造

的！你们可以堵住我的嘴，但堵不住我的心！要我到监狱去也是这样子，我就要抵触一辈子。你们还有什么巧妙的办法尽管给我往上用，我就是不承认反党！”甄文涛的这些言论说得越多，场方对他的批判斗争就越严厉，他的“反动言论”内容就越“充实”。他也就不参加劳动。发展到最后，他干脆说：“把铁锨和刀子架到我的脖子上，我还是不劳动。以前我不反动，现在我要反动了，这是你们逼的。别人不敢反抗，我要反抗到底。我没有掌握武器以前，以言论跟你们斗。我要是有了武器，就拿武器跟你们斗，反正人生总是一死，迟死不如早死！”法院认为，甄文涛是反动透顶了，因此，对他的处理是：“依法判处被告甄文涛有期徒刑十年。”在全部四十六名被告中，他和柳国田是处刑最重的两个人。他们之下，最高刑期是七年，然后是五年或更少。

温清海的反动言论是白纸黑字。他将牢骚写到纸上，放到厕所。凡上厕所的人，均能看到。在粮食定量一减再减的情况下，他写道：

领导实在太关心，可怜小麦重变轻。

三顿他竟变两顿，稀汤喝得清又清。

整天喝稀汤，饿得心发慌。

混（浑）身没力气，担心倒路旁。

人形像鬼瘦，脸上死尸黄。

说了受批判，劳教实难当。

严队长，我们要求喝饱！

1959年12月29日，夹边沟农场给酒泉县检察院的一份报捕材料最后提出的请求是：“对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以反动传单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右派分子温清海，报请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给予刑事处分”。

范长英的反动言论，实际上是一派胡言乱语，如痴人说梦。夹边沟农场1959年5月8日为检察院出具的《现行反

革命分子范长英的单行材料》中称：范长英在工地上对白清瑞等人说：“毛泽东不想当主席，将来我去北京当主席，但我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我要当中华民国的主席，我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有深刻的认识。《材料》称：1959年4月11日，范长英刚从兰州到夹边沟，就对张岐山说：“我是黄巢县人，当年黄巢杀人八百万，是被逼的。我将来也要大批杀人，也是被逼的，要将陕西人统统杀光，没有枪就用刀子杀，陕西人欺负了我，我一定要报仇。”他还对人说：“我从小参加革命，什么问题也没有。兰州的反革命说我是反革命，把我送到了夹边沟。我哥哥范长江从莫斯科回来，被毛泽东压了一下，现在他也不得意，我就不去找他了。如果有事，给他说说，给北京打个电报就行了。这次宋庆龄要当主席了，我去给她当秘书长。她一当主席马上就会给我来电报，我的秘书长办公桌都给我准备好了。”“将来有一天我要带兵去打西安，先杀猪，然后把陕西的男人全部杀死，光留女人。”“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出了八个女帅，穆桂英、刘金定……孔夫子周游七十二国，都是用理说服别人的。”“兰州的反革命不讲理，我的一张大字报，就说了群众应该跟党走，但党也应该跟群众走，这就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将来也得杀他们。”范长英的案子到了检察院以后，负责办案的是张生瑞。从案卷的各种取证和讯问笔录看，张生瑞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他没有人云亦云，是一个在狂热年代中还有胆量说些真话的人。当然，他的意见也是被院领导认可以后方能产生法律效力。1959年9月5日，范长英的案子也有了结果。由代理检察长王成才签发的《关于不追究范长英刑事责任的决定》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决定》全文是：“你场报送范长英抗拒劳教一案的材料收悉。经审查原材料及调查了解后认为，该犯所犯罪行是由于其患有神经病所致，故决定不逮捕法办，你场可作其他处理。特

此函复。”

我们无法知道，范长英是否健在。不知道他最后是否回到了他工作过的单位——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范长英在夹边沟农场劳教时，他的父母双亲都还健在，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自己的爹娘。就在他“犯案”之时，还写过一封家书。与他平时的“反动言论”比，思维显得正常多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杜甫老先生那个年代不搞什么运动，只害怕战争，其实，不光在战争中家书才显得珍贵，对于因在“运动”中获罪而导致骨肉离散者，何尝不是“家书抵万金”？范长英的这封家书保存在《酒泉市人民检察院侦查卷宗·一九五九年度检字第第七号》里边。信封用白色厚纸做成，很有一些当年的“时代”特色。右上角和左下角各有一组色彩艳丽的图案。右上角是蓝天与彩霞的背景中，有四只和平鸽在展翅翱翔。白色鸽子的嘴和爪子是鲜艳的红色，是夸张的“和平”。范长英的字写得很好，柳体，工整极了。如果这位老先生有幸活到今天，如果他是在什么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话，那他一定是一位很不错的书法家，是完全可以出书法作品集的那一类。谁让你范长英没有当领导呢？谁让你范长英乱说呢？你再有学问也白搭，资格再老也无用，字写得再好也只能写检查、写交待，最多再写个信。范长英在这封家书的信封背面写道：

范长英参加中国革命整整十八年，曾为国家民族流过血和汗，（在）部队当过翻译官、回民教导员，望求我的官兵，请将此信传。以前经过八年苦战，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优良党员。

此致

军礼

打开信封，里面装有五件东西：

一、一张十人合影照片，八男两女，女的蹲在前排，男

的分两排站在后面。看上去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个个喜笑颜开。有的戴着眼镜，典型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戴着草帽，像是匆匆从农田赶来的农民。他们都很高兴，尤其是前面蹲着的两位女子，眉清目秀，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如同镶在照片上的两朵花。照片背面写了个早年日期：“59.6.30”，这正是检察院收审他的时间，因为在他的案卷封面上，清楚地写着“收案日期：1959年5月10日”。“结案日期：1959年9月5日”。两相对照，显然是范长英情绪好时的照片，是珍藏在身边的。到了1959年的6月30日，再审视这张令人心酸的照片，想想眼下接受审判的现状，浮想联翩，不堪回首，随手写下了这个对范长英来讲是个历史性的时间。照片背后还有几个不太清晰的字，一行是“加秀存”三个字，另两行是两个名字：“萧凤英、王云仙”。

二、两张饭票。饭票上印的字是：“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食堂 饭票 壹角 内部使用 不准外借”。两张饭票上都加盖着一样的红色印章，印章上的字是“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总务科”。两角钱的饭票，范长英一直放在自己身上，可能的原因是：他坚信，自己总有一天要回到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回去工作，因为自己没有错。

三、从一本书上扯下一张纸，在这张书纸上写了一段话。书上印的是斯大林《在苏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当然，这与范长英在这张纸上所书写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反映了一点儿时代背景。范长英是用铅笔书写的，字比较大，可以看出他书写时的思维是混乱的：

毛泽东、宋庆龄主席授令范长英为政治部副主任兼参谋长，打骂范长英行为实为目无法纪，破坏国法，侵犯人权，应对案犯xx等人逮捕法办，剥夺公民权十年，终身劳教，限十日上诉酒泉政府，如不上诉，即为死期。

四、巴掌大小的一份剪报，一面是新华社记者孟庆彪拍摄的刘少奇同志视察石家庄钢铁厂的照片。另一面也是一幅照片，似乎是两位表演文艺节目的姑娘，半蹲式，拿着手鼓，体态婀娜。可能是这一张照片引发了范长英的什么联想，抑或是什么冲动，他在照片下方写下了几个字：“谁家姑娘两姐妹？”

五、一封折叠成纸鹤的家书。铅笔描绘过的纸鹤有栩栩如生的尖尖嘴巴、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翅膀和鹤身上写了很多装饰字，内容为“双喜”、“凤英”、“山东”、“济南”“乐陵”、“安惠”。纸鹤昂首展翅，有点像如今法国的“协和”式大型豪华客机。范长英用自己的巧手表达的美好愿望是，他心中的鹤一定会飞越万水千山到达济南府他的老家，飞到他朝思暮想的亲人手中。信的内容是用钢笔写的，年久褪色，已无法辨认。

“仙鹤”升不了天，“协和”至今仍被存放在酒泉市检察院的档案室里。

右派分子“抗拒劳教”的表现形式之三是对自己不顺眼的劳教伙伴、管教干部大打出手，甚至用脚踢，用嘴咬。这乍听起来有点像发生在那头黑骡骡和它的畜牲伙伴们之间的事情。的确，本来应该讲文明的人们，一旦人性被扭曲，完全不要尊严的时候，那就完全变成了弱肉强食的一群。

劳教人员陈培生有点“困兽犹斗”的架式。他躺下不起床，坐下不干活，谁说也不听，谁叫他他就打谁。有一天，他坐在地头不动身，劳教人员彭希年去拉他干活，他顺势就咬破了彭希年的手。小组长刘良善和他的组员袁俊卿上前劝告，他一拳打在刘良善的脸上，并骂彭希年：“你积极啥哩，你再积极也是个右派。老子就是不劳动，看你把我能咋的。”劳教人员李世英揭发说：“他有两天不起床，不穿衣服，不出工。小组长史复生催他出工，他拿起铁

锨就打，把史复生的鼻子打得流血，并把一起劝他的锥元明一脚踢倒在地，把同房住的重病号刘士珍、侯谨祥打得无处可逃。本组人没办法，队长让其他组的人来拉，他连打带踢，一脚把我踢了个老远。”劳教人员朱金庆揭发：“11月22日，陈培生随大队到工地参加小组劳动。为了慢慢引导他，组里没有让他干抡洋镐等重活，只是叫他把刘良善刨下来的半块砖大的土块从沟里扔出去。他根本不用力气，慢慢腾腾，既干又不干，土块扔不到要求的地方。刘良善告诉他，为了以后出土方便，要把土块扔远些。陈培生听后，瞪了刘良善一眼，就干脆坐下来不动了。刘良善上前一拉他，他开口就骂：“妈的×，你要干啥？你要干啥？”说着，随手就插了刘良善两拳。

“右派分子”李飞云在1960年5月19日写过一份《检查报告》，其中说到：“在劳教期间，先后被我打过的人有：张志毅、朱云龙、许其瑞、宋舜卿、张良等十多个人。”李飞云打宋舜卿的原因是：李偷宋的毯子，被宋发觉，宋表示不满，李就大打出手，把宋舜卿打得头破血流，当场不省人事，经过急救好几次，才保住性命。但过了不久，宋就死了。宋临死前有一份亲笔写于“夹边沟二病室”的《检举材料》，按有他本人的手印。《检举材料》中说：“1960年5月12日，趁我睡觉之机，李飞云偷我的羊毛毯（红色）时，我被惊醒，制止他，他偷不成就抢。我俩争夺起来，他力气大，我争不过他。他把东西抢走不算，又打我，先在我腰部打了几十拳。我大喊救命，被值班医生陆道义听见了。陆开门进来，看到李飞云很凶，同时一看见他李就开始威胁，陆医生只好退出去。这时，李飞云更加疯狂，他用棉絮把我的嘴塞上，用木棒猛击我的头，并用双脚踏住我的胸口，我被打得满脸青紫，头破血流，遍体是伤，不像人样，昏死过去。直到今天（指5月17日，即挨打五天之后），我腰部的伤疼还不见好。后来，周捷看到情况危险，向领导作

了报告。领导及时给我安排救治，郭站长亲自来了三趟。郭站长、陆医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李飞云杀害人命，他要置我于死地，我要求领导给他以法律惩处。”到五月十九日，李飞云写《检查报告》的这一天为止，被他打的人中，活着的只有张良一人了。我们不能断言这些人的死就是李飞云打死的，但也不能说这些人的死——或者说过早的死——与李飞云打人没有关系。死亡，主要还是饥饿造成的，但当时是不能这样说的。一个被饿得苟延残喘的人，临死再挨上自己同伴的一顿毒打，那是多么悲惨啊！1961年5月31日，劳教人员耿华录写了一份《见证行凶分子李飞云犯罪事实》，其中写道：“1960年11月间，李飞云夜间偷盗地里的萝卜，偷回来把萝卜藏到宿舍。第二天夜里，又去偷了一些，也藏在宿舍里。上午下工回来，说在宿舍因病休息的张志毅偷了他的萝卜，就把张志毅一阵拳打脚踢。张志毅呼叫救命，李飞云就把门反扣上继续毒打，打得张志毅遍体鳞伤，第二天不能起床，也不能吃东西。就在张志毅动弹不得的时候，张的许多衣服及日用品被李飞云偷窃一空，把这些衣物拿到老乡那里换东西吃。张志毅全身青紫，第四天死亡。”

劳教人员孙菊臣作证说：到夹边沟劳教之前，李飞云在另一农场——边湾农场劳教。就在夹边沟西边几十公里处。那时候，李就动不动打人，是老毛病了，受他害的人实在太多了。1959年5月的一天，我们到怀茂去种向日葵，中午留在工地吃午饭，先发馒头，后发开水。李飞云把他自己的一份吃、喝掉之后，又要吃别人的。劳教人员葛永彦说了一句公道话，他就拿起一只开水缸，攒到葛永彦脸上，攒开一条血口子，鲜血立即流了出来。还有一次大厨房的师傅何四俊曾检举李飞云到大厨房偷过菜，李飞云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打人。有一天开饭时，李飞云就问何四俊：“这馒头为什么有大有小？为什么专挑小的给老

子吃？”其实馒头大小都是差不多的，李飞云是故意找茬子。何四俊根本就没敢还口，但还是挨了一顿。李飞云照何四俊的脸出手就是五六拳，造成何四俊鼻孔血流不止。转到夹边沟农场之后，李飞云旧病不改，经常拿他偷抢到的东西到老乡那里去换吃的，回来到我们休养组（是一群饿得走不动的体弱者）换钱。有一次到第四休养组卖萝卜，这个组的组长吴光启说：“你不要来卖了，你要的价格太高。”李飞云就与吴光启争吵起来，争了两三句，李飞云冲上去就对吴光启几个耳光。吴光启是个没有一点点力气的病人，根本就没防到他这一手，打完半天，吴光启都没有回过神儿来。

柳国田，四川江油人，1958年十九岁，是所有被起诉的四十六个人中比较年轻的一位，有点血气方刚。1958年9月23日，他的组长白征、李和清叫他出工，被他拒绝。白、李二人晓之以理，柳国田起身便打，先把李和清打翻在地，又趴到李和清的身上，抓住李和清脚，一口下去，李和清脚后跟的一块肉就被他咬掉了。同组的李维先、周兰亭、刘治业上前劝阻时，柳国田起身又朝周兰亭的肚子上踢了一脚，脊背上捣了一拳。接着把刘治业踢了两脚，又把李维先的左手抠破三处，还在腿上踢了一脚。把柳国田关到禁闭室以后，他还大喊大叫：“狗官”，“吃人的野兽”，“奴隶社会”，“整个社会都是黑暗的”。

刘德明打人之前，总是先声明自己是“神经病犯了”。1959年元月的一天，劳动组长分配刘德明和李生才抬开水。两个人走着走着，刘嫌水重，不愿抬，把水放下，说自己的神经病犯了。李生才说：“什么神经病，你是装的吧？”刘德明便破口大骂：“你这个王八蛋，有什么根据说我的病是装的？”李生才对骂：“你是王八蛋！”刘德明立即怒气冲天，说：“老子打你这个王八蛋！”一面说，一面操起扁担，照李生才腰上就是一家伙，打得李生才叫苦连天。还

有一次，刘德明跳窗子爬进刘敏文他们的宿舍说：“我神经病犯了！”抓起刘敏文存放的吃食就往嘴里填。刘敏文几乎是气哭了，那是家属从牙缝里抠出来，一点一点节约着攒起来送给自己救命的东西呀。旁边的姚锡光看不过眼，说了刘德明几句，刘德明抓起铁锨，把姚锡光的帆布箱子就砍了个稀巴烂，接着又把同一房间的刘钟敏的箱子也砍了个稀巴烂，吓得一房子人眼巴巴看着，谁也不敢说话了。刘德明好像气还没有出完，气势汹汹地拿着铁锨不松手，眼睛骨碌碌左右转着瞪人，看着大家没再说啥，也都不敢动一动，他才气呼呼地从门口走出去。

劳教人员中，再凶的人打人也只打劳教人员中的同类。但范长英是例外，他打伤了管教干部梁进孝。此时的范长英，是一个精神失常者，可是场方并不认定这一点，上级部门也不认可，因此，甘肃省公安厅劳改局酒泉分局在“1959公劳酒管字第一千一百四十一号”公函中，对酒泉县人民检察院提出：“范长英数次侵犯人权，不服劳教，无理取闹，经我们研究，同意夹边沟农场意见，请贵院研究处理。”这是笔者在四十份材料中惟一看到的一处少有的“侵犯人权”的记述。范长英打人是侵犯人权，不应该，那么范长英们的人权呢？被打之后的梁进孝在1959年8月12日写了一份控拆，他写道：“1959年8月6日下午三时左右，在场长室前的花园旁边，有个人在那里装疯卖傻，谩骂场部领导人员。当时我路过花园，不知道骂人的这个范长英是劳教人员。为了弄清是非，我问他是从哪里来的？范长英即破口大骂说：‘你妈的x，我是场长调来的！是来买葫芦、南瓜的，我是军官，叫你们把我关到这里，真他妈没有人性，你们会这样对待你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吗？简直没有人道，都他妈不是好人，没有好人！’当时我说：‘你胡说什么？’范长英即动手向我的右眼猛打了一拳，我的眼睛被打破，顿时就流了血。这个情况被四分队劳教人员杨

通达和猪圈饲养员杜克发现了，我让他俩帮我把范长英捆起来。范长英顽固反抗，跟我们对打。把手抓住，又对我们用脚踢，用头顶。最后终于把他制服，捆起来以后方告罢休”。

右派分子“抗拒劳教”的表现之四是偷窃。当时的夹边沟是最没东西可偷的地方，但却是盗窃案件发生得最频繁的地方，做贼的人多，被偷窃的人更多。

王先直本来很斯文。反右前是兰州市民政局的干部，还担任过市公安局七分局治安股代理股长。在反右中，他因说了“党团员可以越级提级别，而非党人士几年不提级”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激烈的群众批判会上，王先直刚开始还能挺得住。兰州市民政局的上报材料上说他“假装镇静”，“对其反动谬论避而不谈，几次会上都臭表他的进步思想”，“把反党说成只是对个别人有意见”。换个角度看，这时的王先直申辩时还是不失矜持、不乱方寸的。但送到夹边沟农场，饿了一年多以后，王先直就破罐子破摔了。有个叫刘维的劳教人员在1959年6月2日写的一份检举中说：“王先直今晨四时左右到厨房偷馍，被人发现并追赶上之后，一面扯一面吃，边跑边吃。还说饿了就要吃，愿怎么办就怎么办”。夹边沟农场为检察院出具的材料中说：“王先直在1958年就偷过伙房六七次。秋上，他偷过姬绍模的炒面四斤，另外还偷过地里的大豆，偷过白映延的馍馍。还有一次将老乡的西瓜低价买来高价卖给其他劳教人员赚钱二角六分。”《材料》接着写道：“由于在他身上发生了一系列偷盗行为，场里曾经对他进行了多次多方教育，王先直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由小偷发展到大盗。1959年6月4日晚十一时，他把供销社的库房门捅开，潜入房内，偷盗白糖十五斤、冰糖六斤半、白鸽牌香烟两包、光明牌香烟四条、代乳粉四筒、水果糖半斤、新华酒五瓶（半斤装）、烟嘴子一个、手电筒一把、粮票十一

斤半、人民币八元六角五分、面袋一个。”《材料》说：“似此反革命管制分子、右派分子，在管制劳教期间不但不老实守法，反而大胆盗窃国家财产，总计达六十四元之多，已构成严重的经济盗窃刑事犯罪。”《材料》最后提出建议：“现报请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判他有期徒刑十年以上，以维护国法。”为了证明王先直可恶至极，农场方面配合检察院让十一位当事人写了旁证材料，统统都盖有各自的名章和手印。这些人是：农场供销合作社张存武，第一生产队梁进孝，劳教人员王进福、谭小楚、姬绍模、王永图、姚中平、王继黎、刘维、白映延、张祖尹。这些揭发检举材料各有特色，各有侧重。其中，张祖尹的材料中，除揭发王先直的盗窃问题之外，还揭发了另外两件事：“每次开饭，王先直都表现得特别紧张，他要尽量捞稠的，尽量给自己多舀，还对别人说，打饭要有技术，勺子要端平，饭碗要靠近饭桶，速度还要快。起鼓动破坏作用。听他爱人说，王先直经常写信要炒面，还向他不太熟悉的亲戚和本族远房的叔父要东西吃，别人给了他还嫌少，不满意。他老婆每月只有十五元工资，养活三口人，无力购寄食品，王先直不但不体贴安慰，反而写信说老婆无情，进行谩骂，所以老婆说他不是人，是畜牲。”原本斯文的王股长，如今成为“畜牲”了，连自己的妻子都这样认为，这是夹边沟农场对右派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的“成果”。

李忠智，吉林伊通人，他是四十多名因“抗拒劳教”而被起诉的人中最年轻的人员之一。1959年3月，夹边沟农场把一份《偷盗分子李忠智单行材料》送到酒泉县检察院时，他才刚满二十周岁。《材料》一共三页半，但光脏物清单就占了足足两页：

现已查明和本人供认不讳，对证确凿的脏物计有：

1.半新马裤呢制服一件，价值25元。

- 2.新短袖棉毛衫三件,价值11元。
- 3.全新红色花棉袜一双,价值1元。
- 4.新毛线红围巾一条,价值3元。
- 5.旧棉毛衣一件,价值2.5元。
- 6.全新黑皮手套一双,价值7元。
- 7.高筒黑皮鞋一双,价值15元。
- 8.全新条绒单鞋一件,价值4元。
- 9.全新条绒长裤一件,价值10元。
- 10.全新府绸衬衣一件,价值6元。
- 11.全新花袜子一双,价值1元。
- 12.全新白线衣一件,价值7元。
- 13.全新黄花袜子一双,价值1.5元。
- 14.圆领新棉毛衫一件,价值5元。
- 15.蓝咔叽布一尺八寸,价值1.3元。
- 16.青咔叽布一尺八寸,价值1.3元。
- 17.围巾一条,价值1元。
- 18.暖水袋一个,价值5元。
- 19.线裤一条,价值2元。
- 20.新劳动布裤子一条(原资料未列价值——作者注)。
- 21.鸡毛掸子一把,价值1元。
- 22.背包一个(包括内装物品:香辣粉一盒、手套一双、健儿粉半瓶、辣酱瓶一个),价值7元。
- 23.背包一个(包括内装物品:肥皂盒一个、胶水一瓶、皮带一条、钢笔两支、手帕两个、小刀一把、筷子一双、酒瓶两个),价值7元。
- 24.半新线单子一条,价值8元。
- 25.名花牌香烟八盒,价值1.2元。
- 26.旧金星钢笔一支,价值2.5元。
- 27.大头水笔一支,价值4元。

28. 旧活页日记本一本（原资料未列价值——作者注）。

29. 小剪刀一把，价值0.5元。

30. 旧双人床单一条，价值4元。

31. 半新蓝呢子上衣一条，价值25元。

32. 旧白毛线裤一条，价值5元。

33. 新红毛衣一件，价值8元。

34. 咖啡色线背心一件，价值2元。

以上赃物合计价值壹百捌拾捌元捌角。

列完罪行清单，夹边沟农场的《材料》最后说：“根据以上事实，该李确系一贯盗窃、屡教不改的分子，已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教养前和教养期间先后盗窃财物达二百余元，是一名罪大恶极的惯窃，而且百般抵赖，对此类坚决不悔改的死硬分子，现报请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给予刑事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李飞云，解放前在上海一家畜产品公司当过差。从能够查阅到的材料看，他能言善辩，头脑灵活。逮住机会，能偷则偷，不能偷则骗。夹边沟农场为他出具的《李飞云犯罪事实单行材料》中，列出了两份清单，一份是偷“公家”的，一份是盗窃或骗取个人的：

盗窃国家财产事实：

1. 在昌马水利工程队伙房时（李飞云是从安徽白茅岭农场转到甘肃玉门昌马水利工程队，再由工程队转到酒泉边湾农场，最后由边湾农场转到夹边沟农场的），经常把馍馍偷出来，让吴克洪等人代卖。仅据自己承认，就达八十多斤，得款5元。

2. 在边湾农场时，偷伙房两次，共偷馒头六十斤，价值25元。

3. 在边湾农场化肥厂偷萝卜三百斤，价值30元。

4. 在夹边沟农场麦场上，盗窃麦子三次，共偷得二十

斤，偷高粱两次共八斤，萝卜两次共五十斤，总价值8元。

5.到磨房盗窃三次，共偷去小米、面粉等共十四斤，价值2元。偷马料四次，共偷去豌豆、大豆、高粱共十五斤，价值1.8元。

6.十一月中旬与闵惠忠、谭国良、张良等七人合伙，偷农场生产的兔子十一只，价值16.5元。

7.还是在十一月份，又和闵惠忠合谋偷农场的小猪一头，重二十斤，价值15元。然后又和张良合伙偷猪娃一头，重四十多斤，价值36元。

8.通过劳教分子高志冲盗卖公家棉被八床，价值80元，棉衣一件，价值28元。

9.通过金伯乐盗卖公家棉被一床，价值20元。

10.通过劳教分子张海皋盗卖公家棉被两床，价值40元，床单两条，价值18元。

11.偷附近公社兔子两只，鸡一只，价值6元。

盗窃、诈骗私人财物的事实：

1. 一九六〇年九月在边湾农场偷盗劳教分子谭学贤的现金10元、粮票15斤，偷李明云的箱子一个、现金20元。

2.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偷宋国安的毯子一条，价值12元。偷陈翔小组里一个病号的短大衣一件，价值28元。

3.(此处内容被涂掉)

4.(此处内容被涂掉)

5.(此处内容被涂掉)

6. 一九六一年一月，偷吴根信的脸盆一个，价值4元。又偷病号的花格被一床，价值25元。

7. 骗何尚琦的挂表一只，价值30元。

8. 骗洪中林的手表一只，价值60元。

9. 骗田世杰的棉大衣一件、毛衣两件、衬衣一件，价值72元。

10. 骗邢安的女式手表一只，价值60元。

11.以少量食物欺骗倒换劳教人员高志冲的咔叽布衣服一套、羊毛衫一件、布裤子一条、被面子一条、棉衣两件,价值共达68元。

12.骗卖卞生恒的衣服一套、夹克衫一件,价值28元。

13.骗田世杰的衬衣一件、华达呢裤子一条、咔叽布单衣等共九件,价值50元。

14.骗换刘玉清的咔叽布裤子两条,价值16元。

15.骗换项玉金的咔叽布衣服一套,价值16元。

16.骗曹阿贵的棉絮两床、单子一条,价值40元。

17.骗换何尚琦的雨衣一件、衣服一套,价值24元。

18.骗换陆道义的毛毯一条,价值50元。

19.骗换谢兆龙的大衣一件,价值30元。

20.骗刘子达的卫生裤一条,价值5元。

21.骗周道义的被子一床,价值25元。

22.骗陈世刚的咔叽布裤子一条,价值8元。

23.骗换张海皋的面盆一个、被子一床,价值25元。

24.倒换谭国良的被子一条,价值20元。

25.倒换金伯乐被子一床,价值20元。

26.倒骗杨作屏的单被子一条、棉被子一条,价值34元。

27.倒骗杨乃馨的单裤一条、呢子裤一条,价值45元。

28.倒骗辛建福的羊毛褥子一条,价值30元。

29.倒骗卞化民的单衣一套,价值16元。

30.骗取吉格平的毛衣一件,价值20元。

31.骗取唐学贤的衣服一套,价值16元。

《材料》中出现了很多“骗”、“骗卖”、“骗去”、“骗取”、“倒换”、“倒骗”等字眼,显然是有“骗”,也有“交易”。而交易在那个年代是被严格限制的,只能在计划体制下公公或公对私进行,超出规定范围,那就是投机倒把,就是非法,就要严厉打击。

在李飞云的案卷中，保留了大量的检举人的旁证材料。这些检举人也多为劳教人员，他们是：杨旺兴、金伯乐、沙振权、王敏芬、陆道义、耿永录、吴辛季、吴星、陈湘元、程伦、杨作屏、李明荣、高志冲、王江阁、杨乃馨、唐学贤、宋舜卿、程俭、封树立、孙菊臣、刘旭初、程斌文、林之明、高骊山等。

南方小伙唐德如是江苏泰州人，二十多岁，他在偷了挨批，批了检查，检查完再偷的多次“循环”之后对一起的劳教人员说：“我的人生观就是偷。”1958年5月23号，唐德如在被批判之后向场里交了一份《检查》。其中写道：

我成天叫喊饭不够吃，说自己肚子大，吃得多，其实我们的粮食是够吃的，这是制造紧张空气的反动言论，是为了采取新的偷窃行动。我利用工具房的钥匙把回民灶房门捅开，第一次偷了三个大饼自己吃了。事后过了一个星期，又用同样的办法将门打开，又偷了六个馒头，自己吃了两个，剩余四个被领导检查出来了。由此看来，品质是恶劣的，也是犯法的，是法律不容的，我深深地认识到这是犯罪行为，是最可耻的，是无脸见人的坏家伙，实在是坏透顶了，不如半马有自觉性，简直是冷血动物，毫无人性。四月二十四号下午，从地里劳动回来，一见宿舍炕上挂包里有两个馒头，趁大家开饭的时候又偷了一个馒头，刚好有人看见，就偷偷将馒头丢到烧开水的灶坑里，目的是叫领导检查不出来。其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眼睛是照妖镜，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因此我觉悟到自己一切完蛋，只有死路一条。但是党和组织再三宽大我，是我辜负了党的关怀。我现在保证如下：一、遵守各项生活制度；二、爱场如家，服从指挥，执行劳动纪律；三、杜绝偷窃行为，如有偷窃，愿受法律处理；四、说到做到，如有做不到的，当场逮捕判罪。

可是到1958年11月30日，也就在他写过“检查”半年

之后,农场基建五分队代工组长谢磊给场里呈交的《申诉严惩坏分子——唐德如》的材料中又说:“该坏分子屡教不改,盗窃行为从食品到物件,由场内到场外,由私人到公共,还有信件、邮票和布证,严重地破坏了国家邮政事业,破坏宪法,要求领导严惩这坏分子。”谢磊还在材料之后列出了一份唐德如这一个时期的《盗窃物品清单》:

毛衣一件、绒衣一件、灰布裤子一条、绿哗叽裤子一条、卫生衣一件、枕头套一个、蓝中山衣一件、金星笔一支、棉花绒裤子一条、棉絮一个、肥皂两条半、棉裤一条(已卖给老乡)、袜子两双、绿绒背心一件、手帕一块、贴邮票信封一个、新民(牌)水笔一支(已丢失)、衬裤两条、毛巾十多条、面袋子五条、猪棕刷子一个、羊毛四十斤四两、茶缸子两个、盒子一个、小银勺一个、甘油一瓶、保险刀一架、钥匙两把、刀片两个、香皂一块、肥皂盒一个,从别人的信中偷取公债30元。

在其他入出具的《材料》中,揭发的大都是类似以上的东西,更细心些的,还有诸如“白线一缕”、“蓝线一缕”、“丸茶两粒”、“萝卜一个”等等。

前面已经说过,军人出身的林春生,部队转业之后当过公安预审员、人事股长等。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初期,林春生是很规矩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诚实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怀抱”,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林春生一直把自己当成革命军人、公安战士来要求。但是,随着农场口粮的一减再减,当他和他的未成年的孩子的生命发生危机的时候,体面和尊严也就连一个胡萝卜不如了。不管怎么说,他不能先于孩子饿死。他开始偷窃,起点很低(也不可能高)，“偷吃醋糟、抢食猪食两次,有一天晚上,将场内正在孵蛋的母鸡偷出来,企图拧死吃肉,破坏场里的畜牧生产,被劳教干部当场抓获。”从这个时候开始,“捡到篮子里就是菜”,他抓住一切机会把能够填到嘴里的东西往

嘴里填。在夹边沟农场给酒泉县检察院报送的《提请法办林春生》的材料上,列举了大量这方面的事实:

在放夜班水的时候,偷甜瓜四个;另一次放夜班水时,偷分队菜地南瓜一个。在五支渠曾剥吃过生大豆一两。偷吃向日葵十次约一斤。在试验田工作时偷吃花生一把约十五粒。在五支渠一毛渠偷吃甜瓜十个(未成熟小瓜)。在新添墩偷吃甜萝卜多次,有一次曾连续吃了两个钟头。在醋房偷醋糟一次。在新添墩偷吃过伙房的切好的碎萝卜一把。烧吃蔓菁根两次……

夹边沟劳教人员万志彪因饥饿而盗窃,因盗窃而被整,因被整而逃跑,逃跑后因身无分文继续“作案”。夹边沟农场向检察院报送的关于万志彪的《材料》中说:

该万于六月十一日由我场潜逃后,六月三十日,潜伏到酒泉水文队,在这个队的厨房内,盗窃清油七斤、馒头二十六个、玉米糝子三十斤、油桶一个、菜刀一把、铁勺一把、面袋子七个、麻袋一个、线袋一个、脸盆一个、盐一包、香辣粉一包、碗一只,以上东西藏匿于酒泉南文殊沟龙王庙。将东西吃完以后,又窜到酒泉火车站偷了一旅客的人民币九元、粮票二十八斤,然后乘车逃往张掖。七月,在张掖王府街食堂又偷了一个顾客的人民币十四元,粮票三斤。在张掖住了四天以后,万志彪又逃往武威,在武威上火车时,从一名乘客身上掏得黑钱夹一个,内装钥匙两把、人民币二十三元、储蓄券二十元、粮票二十斤、布证三丈。用这些钱和粮票,在武威、古浪、兰州三地流窜半个月以后,于八月一日乘火车到天水,又从天水到郑州,从郑州到山西晋城。在晋城,偷得一名群众的人民币十七元、粮票二十斤。在晋城访亲未遇,不能长久藏身,即又返回郑州,又从郑州乘车返西安,在车上从一名旅客的上衣口袋里掏得人民币九十六元,粮票约二十斤,于八月二十八日到达西安。在西安,先后到解放市场企图作案;三次未

送,被一群众李英杰发现,报告碑林公安分局,于八月三十日被扣留。”

就像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一样,万志彪一路闯关,居然也去了这么三省十几州。如果不是眼睛雪亮的群众李英杰,谁知道这个万志彪还要流窜多少地方呢?反正除了流窜,就是束手就擒。为了不被擒获,只有玩命地流窜行窃。

因为盗窃案件发生得太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已无法维持。万般无奈之下,农场想了个当时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搞运动。运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非常时髦,有全国性的运动,有全省性的运动,也有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系统、单位的运动。只要领导者心血来潮,随便想个什么名字,就是一个运动。有一天,召开全场劳教人员大会,场长作报告,在全场要开展一个“反盗窃、反逃跑、反违法乱纪的三反运动”。场长滔滔不绝地讲了这个“三反运动”的伟大意义,还要大家深刻认识,认真讨论,贯彻落实。因为历史上有一个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为了加以区别,农场管教人员和劳教人员都把场内的这次“三反”运动称为“小三反”运动。但是,不管怎么“运动”,饥饿这时已成为有着巨大马力的发动机,它驱使着还没有完全饿倒的人们不顾一切地去行窃,根本不管你的“运动”和禁闭。严管队的绑绳天天捆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丢的夹边沟农场还是天天失窃。除上述那些盗窃案之外,据记载还有很多:原天水县人民委员会干部王立德半年之内就盗窃三十七次。部队转业人员王留贵的盗窃清单密密麻麻写了四五页,其中有“凡士林一小盒”、“清凉油一盒”、“仁丹一包”、“旧手绢一个”、“口罩一个(毛巾质的)”。原籍为江苏盐城的郑寿昌,五个月就盗窃一百多次。

右派分子“抗拒劳教”的表现之五是逃跑。

原地质部兰州探矿机械厂职员王改会，是一个成功的逃亡者。王改会从投入劳教的那一天起，就不认为自己是右派，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他反抗的办法是：不承认，逃跑，申诉。1959年5月2日凌晨，他携带衣物第一次潜逃。场方发现后，立即派人追捕。经过近一个月的查找，于5月31日在酒泉被抓获。又经过一个月的“严管”之后，王改会回到了他原先的生产劳动单位。管教干部看他情绪比较稳定以后，就放松了监管。但刚一放松，8月2日，他又乘机脱逃。这一次一口气逃到了北京。此后的一个月当中，王改会不是到国务院，就是到地质部，再不然就是公安部，到这些地方的信访部门喊冤叫屈，申诉问题。问题得不到解决，他还找到过地质部一个副部长的家，在这位副部长家中申诉。副部长给甘肃打招呼后，场方才知他在北京，并于9月3日派人去北京把他抓了回来。回来之初，王改会放话说：“还要到国务院去告，”“还要到地质部反映。”为了防止他再次逃跑，农场派出专人盯着，给这个人不安排任何工作，其任务就是盯紧王改会不让他逃跑。已有两次逃跑经验的王改会又一次钻了空子。10月14日中午，乘盯梢人不备，又一次逃脱，而且直达北京，又遍访了有关部委。但是，他的真实身份也很快暴露了。1960年元月14日，王改会第三次被押回夹边沟农场。不管场方的警惕性如何高，措施如何得力，一个决意要跑出去的人的毅力和饥饿状态下的耐久力都是超乎寻常的。1960年2月26日，瘦得皮包骨、连路都走不动的王改会，悄悄备了干粮之后，第四次成功逃跑，而且从此杳无音讯。成功逃亡能够成就王改会什么呢？他的问题能够被甄别吗？他能够在全国性的大饥饿中活下来吗？对王改会来说，恐怕凶多吉少。

河西走廊土生土长的原武威百货公司干部赵振忠，就没有王改会那样的手段和运气。他是休病假时，趁别人

下地劳动的机会逃跑的。但他只跑到高台,就被当地“革命群众”抓获,扭送到当地公安局。经公安局讯问,弄清身份以后,很快就被押回农场了。转业军人、原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干部梁正林跟赵振忠差不多。梁正林是凌晨悄悄起床,人不知鬼不觉地跑出农场的。但他身无分文,又饿又困,又无法乘车,就在离农场不远的临水公社开始找“外快”了。但他刚刚偷到一件羊皮筒子,还没有来得及“变现”,就被老乡发现了,随即将他扭送回了夹边沟农场。这样,梁正林从逃跑到被押回,时间不到一天,路程不到二十公里。这是农场在“小三反”运动中取得的一次速决战的胜利。郑寿昌活该倒霉,他跑了一个没有人烟也没有水喝的方向,及至找到人烟,他已经动弹不得,只有束手就擒,然后被民兵押回农场。跟梁正林、郑寿昌们差不多的,还有浙江人周扶基、陕西户县人张文智、河南南阳人张云生等。

还有想跑而干脆没有跑成就被拿获问罪的。李保光、王明德、郭九春、温青海、万志彪五人就曾有过一次“组织暴动逃跑”未遂的经历。1960年2月21日,夹边沟农场在给酒泉县检察院上报的《关于报请捕办组织暴动逃跑的李保光五人单行材料》中说:

以上五犯企图外逃,经管押教育,不但不低头认罪,在劳动中进行认真思想改造,反而坚持反动立场,提出无理要求,预谋罢工,攻击喊叫吃不饱,并宣扬他们外逃的原因是粮食不够吃,企图制造混乱,拒不出工,在劳教人员中造成极坏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以李保光和王明德为首,五个人分别准备粪杈一把、木棍一根、铁锤一把等撬门、挖洞工具,计划到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外逃,被我发觉,及时制止,阴谋未逞。

根据上述事实,此五犯屡教不改,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在劳教人员中产生了连锁反应。为了安定劳教人员思

想，保证农场春播任务的顺利进行，我场意见是逮捕严惩。

右派分子“抗拒劳教”的表现之六是闹。所谓闹就是“胡闹”。翻遍四十多份各种资料，在当时的高压气候下，有胡闹胆量的人并不多。但有两种行为，管教部门是把他们列为“胡闹”之列的：一是反复违规违纪，今天检讨明天重犯；二是已有明显的精神分裂症状，但场方并不认为他们有病。

原山丹县人民银行职员黄建民的材料近百页，其中夹边沟农场的上报材料和酒泉市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文件各占一页，剩下九十多页全是黄建民本人的《检查》、《保证》和劳教人员的揭发旁证。1958年6月10日，黄建民在他写的第一份检查中说：

我虽是贫民出身，但是受旧社会封建主义影响较深，趁党整风之际向党猖狂进攻，犯了严重的错误。党为了挽救我，把我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给了我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我辜负了组织的期望，昨天拴草绳，我虚报了七十公尺，是伪装积极，是不正确的思想行为，是欺骗领导的恶劣作风。

从《保证》中看，黄建民痛改前非的决心溢于言表，后边洋洋洒洒地有错误根源的分析，有今后行动保障措施。但是不久之后，在农场晒粮时，又虚报成绩，受到领导的训斥。接着又多次偷窃，经过批判帮助，1958年7月10日，也就是在他写了保证书的一个月之后，他又以血书形式写下一份检查和保证：

由于我脑海中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党费尽千辛万苦、苦口婆心，我还是忘恩负义，放毒、编瞎话、偷盗，执迷不悟，我对不起党。

接着，又是一通根源分析，最后写道：

我的血书保证：一、今后决不拿别人和公家一针一

线。二、在劳教期间，自己再不离开小组，克服自由行动。三、保证积极劳动，有一分力出一分力，把全部精力用到生产和思想改造上，克服胡思乱想、三心二意的恶劣作风。四、靠拢组织，经常汇报自己的思想、劳动情况，和坏人坏思想作无情的斗争。

从内容和血书形式看，黄建民的检查和保证是十分有诚意的，是令人信服的。但从1957年被划了右派，经历了急风骤雨式的群众批判会，他认识到任何解释和申诉都是徒劳的过程以后，黄建民就已经调整了自己的“战略”：躲过初一，且不管十五。写检查不顶饿。饥饿难耐，写完再偷。在1958年7月10日以后的二十多天中，他偷盗的东西计有：

黄豆一捧约三合、地里长的洋芋约四斤、葵花籽约一合、干菜一把、韭菜约一斤、磨膛里的小豆青料一包包、灶房里的洋葱五个，冒充打饭一次……

事情败露之后，1958年8月4日，他又写了一份长篇检查和保证：

今后的保证：一、保证不拿别人的一针一线，坚决不离开工地，所有大小便时必须向组长同志请假。二、保证从八月五日开始重新做人，脱胎换骨，在同志和组织监督下劳动改造，严肃地同我的坏思想作斗争，争取十天内改变我的坏名誉。三、组织分配给我的工作，尽所有能力来完成。四、保证严格遵守场内的各项制度，遵守小组的各项制度和纪律。

这当然还是他的“战略”。此后，他还是不断“作案”，一个萝卜、一把干菜，有“大”的机会当然更不放过。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不断地被检举，被发现，被抓，被捆，被“严管”，写检查，写保证。直到起诉他的时候，黄建民光血书就已写过三次。最终农场的上报材料上认定的，还是欺骗奸诈，无理取闹。

由天,女,吉林扶余县田家窝堡人,先后在兰州大学和兰州医学院任马列主义教员,是所有夹边沟被起诉的“抗拒劳教”人员中惟一的女性。以前出版的有关夹边沟的著作中也有把她写成“由田”的。也许“由田”的写法是有根据的,但是我所接触的其它资料中所载,一律为“由天”。因此本书暂以“由天”二字记述。1958年,她三十八岁,和她同在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女右派们反映,她有间歇性精神分裂症,犯病时语无伦次,东拉西扯;清醒时安静温和,说话很有理智。理智的话不违规,不犯法,不走火,资料中没有记载。资料中所记,都是她精神不正常的言行。但场方认为,这是无理取闹。1959年1月18日,夹边沟农场在他们上报的《无理取闹的坏分子由天的单行材料》中说:

该由天一贯不满给自己划右派。她经常叫嚷:“我没有一点错误,就是学校要把我提为副教授,给我加工资,我不要这些钱,他们就说我闹不团结,给我扣了帽子,送我来劳教。”以此诬蔑反右斗争,散布不满情绪。由于她坚持反动立场,不服处分,装疯卖傻闹回家,批评教育对她已完全无效,一天三四次故意捣乱。她劳动时间不劳动,跑到办公室乱闹,碰见哪个干部就向哪个干部闹。曾找白连奎队长闹过十几次,找教育股闹过七八次,找刘场长和张场长各三四次。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竟公开离场,逃到长城边后被追捕回场。捕回后禁闭五天,经谈话教育,还调整她做轻体力劳动,但由仍不悔改,反而闹得更凶。不但在场里闹,而且还不停地向兰大校长、省委张书记、中央杨秀峰部长、国务院周总理、全国人大刘委员长写信,企图达到释放她的目的。

由天还以消极怠工的方式抗拒劳教。在劳动时间,以上厕所为名溜到宿舍休息。别人质问她: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回工地劳动?她反而无耻地说:“我解手以后就得到

宿舍洗屁股，这是我的生活习惯，从小养成的，啥时候也改不了”。磨房分配她踏罗，她说：“我胸疼，不干。”叫她收磨，她说：“手腕酸，不收。”叫她喊驴，她说：“我一喊嗓子就哑，影响说话，不喊。”叫她打扫磨道驴粪，她嫌脏，不干，说：“驴粪太臭，呛得我上不来气，直流眼泪。”调她到淘麦组洗粮食，她经常迟到早退，不按时出工，干活也是磨洋工。调她到大田劳动，她一天挖不下十分之一立方土。往地里送粪，她只背两锹，不到十斤的粪，还喊重，稍稍再上一点，她背到半路就倒了，还对其他劳教人员说：“我过去吃饭都是人给我端到嘴边，家务活也不干，现在说我是右派，硬把我送到这个鬼地方，折磨不死也急死了。”

由天还经常污蔑领导同志。

……

由天还恬不知耻的(地)吹嘘：“过去我的工作搞得很好，成绩很大，省上党政军领导和各大专院校的负责人都很重视我，如果张仲良书记在兰州的话，我就不会来劳教；毛主席、周总理也不会同意。”以此散布本单位对她的右派问题处理错了。她还更加卑鄙透顶地说：“我离开兰州到夹边沟劳教，整个兰州市为我降半旗。要是我死在这里，全国人民都得向我致哀，降全旗。全世界降半旗。”“把我放在夹边沟劳动，对国家民族的损失太大了。”“如果把我留在兰州，我一定能给国家作出很多贡献。”“甘肃省的党政军领导都很关心我。在兰州时，我一出门，后面就有许多小汽车、飞机，陆海空军跟着保护着我。”

经常打击劳动教养积极分子，也是由天的拿手戏。她自己干活从来都是磨洋工，杜克、李怀殊、那秀云、豆维柯督促她好好干，老老实实改造，她就说：“等我翻身的那一天吧，我非好好收拾你们不可！”“毛主席、周总理、张书记都很关心我，我得好的那一天快了，信不信你们等着！”抱

有非常反动的复仇心理，对积极分子赵经中、杜克等非常不满。她曾经借故打过赵经中两拳，杜克一拳，骂组长和积极分子是“一个老驴带着一帮小驴”。

据说，由天是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学生。她曾在北平、重庆流亡，在流亡中上完大学。她的爱人姓宋，也是东北流亡学生，成都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做了大学教授。大陆解放，中美断交，由天自己带着三个孩子与她的丈夫天各一方，无缘相会。1957年由天被定为右派，她把孩子托付给邻居，自己来劳教。连续不断的精神打击，家庭生活的内外交困、骨肉分离，她的精神支柱被完全摧垮了。她变成一个痴人以后，精神负担反而没有了。于是，奇迹在由天身上出现了。在众多的劳教右派一个个饿死的情况下，她因痴而被免于起诉，因痴而稀里糊涂地活了下来。杨显惠先生在他的《夹边沟纪事》中说，由天回到兰州以后神志完全不清醒了。她在马路上捡树枝，人家问她捡树枝干什么，她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把她送到清水精神病院去治疗，住了两年院，出来以后就病休了。她后来住在兰州八里窑附近的一个老年公寓。1959年秋，由天的丈夫从美国回来，到夹边沟看望过由天。后来，宋先生被安排到宁夏大学当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了。

1958年10月到1960年5月，在夹边沟农场劳教的陈作周等四十六名“抗拒劳教”的犯罪嫌疑人经过酒泉市检察院审理以后，多数被起诉，对有些人则决定免于起诉。又经过法院审理，有据可查的是有十八个人被判处有期徒刑，最重的十年，是十九岁的柳国田，还有二十一岁的原甘肃省医药公司的甄文涛。下来是七年的原兰州市民政局社会科的王先直。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的有六个人，他们是：原兰州木材公司第二木材厂的陈作周，原临夏回族自治州水利局的梁正林，原兰州火车站的孙治田，原兰州铁路局客运段的唐德如，原甘肃省地质局水文二队的万志

彪，原兰州化工厂的周扶基。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的人最多，一共七个：原玉门铁路车辆检修厂的张汝楫，原省公路局第四工程处的张云生，原兰州市城关区政府的邢政，原兰州纺织品批发站的缙振奎，原兰州铁路局高崖车站的吴殿君，陕西户县人张文智，原武威市百货公司的赵振中。定西县商业局的郑孝祖被“管制两年”。

所有被起诉并判刑的“抗拒劳教”人员中，周扶基又有些情况特殊。其他被判者表示服判，没有上诉，但是这个浙江绍兴人周扶基不服气。1958年10月17日，他接到酒泉市人民法院的判决：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劳动教养政策，彻底贯彻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处被告周扶基有期徒刑五年。如不服判决，可于接到本判决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附本，上诉于张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周扶基按法定时间提出了上诉。不巧的是，张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还没有审结这桩案子时，河西走廊的行政区划发生变化，张掖地区一分为三，恢复了原先的武威地区和酒泉地区。周的案子又转到酒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直到1962年元月6日，中级法院做出了二审判决：

“申诉人周扶基实属屡教不改，原判五年徒刑正确。”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当事人不能上诉。”

被夹边沟农场告上法庭的总共这四十六名劳教人员当中，能够找到他们本人或他们的遗属的，目前只有马述麒。

一个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1958年5月的一天,已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天水一中数学教师李景沆,接到学校通知,说领导要召见他。如惊弓之鸟的李景沆急匆匆地赶到了学校,战战兢兢走进学校领导办公室。学校领导告诉他:根据上级指示,学校里对问题较轻的几名右派有一个处理方案,你李景沆是较轻的一个,这个方案适合你。李景沆心里七上八下,他不知道这个“方案”对他来说是凶是吉。但是,既然领导上说自己被列为“较轻”的右派之列,恐怕比其他十几个右派的前途会好一些。这位领导接着说:给你们两条路,一条是到国营夹边沟农场去参加劳动教养,一条是离开学校自谋生路。该领导还特别强调:到国营农场去的劳教人员不开除公职,表现好的两年之后回到学校继续执教,而自谋生路就等于与学校完全割断关系了。言下之意,第二条路就是开除公职。李景沆问,现在就要决定吗?学校领导回答说,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考虑,是去农场还是自谋生路,这是一生中的大事,需要考虑成熟再作决定,应该给你一个比较充裕的时间。一个月之后,你再答复。

听完这个决定,李景沆的脑袋嗡嗡地响了一阵,脑子里一时间成了一片空白。这一阵,他的血液只往下去,不往上行,脚重得抬不起来,头轻得好像在飘,几乎跌倒在

地。学校领导见他如此,也停止了自己的说明。李景沆稍稍有些缓过神的时候,这位领导继续说:你先回家吧,自己考虑考虑,跟家里人也商量商量,两条道路,你自己选择。

从天水一中到东关建设路古风巷李景沆的家,约一公里左右。平时走这段路,他要不了一刻钟,可是这一天却好像用了一个小时也没有走回家。从学校往回走的路是个慢下坡,应该是很轻松的。李景沆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深一脚浅一脚,明明是走在平坦的马路上,却好像走在了乱石滩上,虽没有跌跌撞撞,却也是磕磕绊绊。

回到家中,边喊爸爸边跑上前抱住李景沆双腿的是四岁的小儿子颂林,接着跑出来迎接他的是七岁的大儿子颂高、八岁的二女儿绿竹、十岁的大女儿宜萱。看看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李景沆的心都要碎了。他想,我去了,把孩子都撂给妻子立珍和年过花甲的父母,他们今后的生活怎么办?立珍还是有个身孕的人,这个难关怎么过?

李景沆决定请上帝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难题。

李景沆想,如果我问上帝:“主啊,仁慈的主,请告诉我,我到劳教农场去不去呢?”上帝是不会回答我的。上帝不是凡人,他怎么能说话呢?他非常清楚:上帝的旨意都是通过耶稣传播到人世间的。耶稣就是大约两千年前,圣母玛利亚在伯利恒一家旅店的一个马棚里产下的那个男婴,玛利亚的丈夫约瑟给这个小男孩起名耶稣。约瑟并不是耶稣的父亲,是圣神使玛利亚怀孕的,她怀的是上帝的儿子。

虔诚的基督徒李景沆,没有从上帝那里找到他究竟去不去或者该不该去劳教的答案。

于是,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的李景沆,依照数学方式设定了一个推导“公式”。他设想,从今天开始到学校要我答复究竟去不去还有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里,如果我生了一次病,哪怕是一次小病,或者受了点伤,哪

怕是一个小伤,那就是主的启示,启示我不要去。相反,这一个月里,如果我十分平安,没病没灾,那也是主的启示,启示我:去吧,我的孩子,去苦上两年,再回到天水过你的团圆日子,教你的学生吧!

这样一个推导方式设定之后,李景沆心中又出奇地平静下来了。他想,上帝是不会欺骗他的,他要服从上帝的旨意,上帝怎么启示,他就怎么做,义无反顾。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李景沆希望自己有一次感冒或者跌上一跤,但是没有。眼看作出决定的时间就要到了,平静的心情又渐渐变得焦躁起来。快一个月了,他的身体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过。李景沆太爱他的父母和妻子儿女了,实在不愿意、不忍心抛家弃舍远走他乡,去到那可怕又遥远的戈壁滩。他有时候想,不妨用小刀或用一根针把自己的手戳一点儿小伤,哪怕只动一点儿皮,不也是受伤吗?不是可以不去那个遥远的地方了吗?但转念一想,不成!那不是上帝的旨意,那是对上帝旨意的亵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怎么能这样胡思乱想呢?这不是跟犹太差不多了吗?犹太接受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了自己的导师耶稣,我这不是贪家恋家而出卖自己的允诺和灵魂吗?主啊,饶恕我的不忠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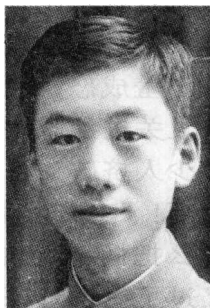
李景沆又恢复了平静的心态,平静地等待上帝的最后决定。

一直等到最后一天,1958年6月的一天,李景沆都平安无事。他向学校领导报告了“自己”的决定,说自己决心去接受劳动教养,也决心有个好的表现,两年之后再回到教师队伍,请党和政府考验自己。

根据学校和政府的安排,第二天李景沆出发了。这将是他的第二次离家远行。第一次是1945年,他被西北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到兰州去读书。这一次是“反右”当中犯了错误,到那个遥远的地处酒泉的农场去劳教。

入夜,李景沆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往事,如烟的往事像一幕幕的电影画面,一幕接一幕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李景沆父母婚后一连生了几个女儿,李景沆的母亲为此而忧郁成疾,时间长了就变得经常神经兮兮的。他们家有个亲戚,是清末基督教传到天水以后较早的教徒,也是一个最虔诚的信徒。她的三儿媳跟李景沆的母亲是亲姊妹,按辈分李景沆和他的姐妹们都叫她张婆。李景沆的母亲很喜欢到张婆家串门,每次去都会见到一个基督徒在讲《圣经》。受张婆的影响,李景沆的母亲



小学毕业时的李景沆,时年15岁。

也渐渐地迷上了天主教,张婆就正式给她传福音。李景沆的母亲没有文化,也不知道什么是上帝,但她渴望上帝给她赐个儿子。或许是有了精神寄托,入教以后李景沆母亲的病竟慢慢地好了,而且在一年多以后,如愿以偿地生下了李景沆。从此,李景沆的母亲逢人便说,李景沆是上帝赐给她的儿子。因为母亲的原因,李景沆在襁褓中就开始出没在教堂里,他的幼年和童年便是在家庭和教堂之间度过的,一直到上学以后,他还经常陪母亲上教堂。

中学时期的李景沆,很爱学习,也很爱国。有一天晚上,李景沆放学回家后,他的父亲李文甫对他说,自己的上司罗为要向自己借钱,实际上就是要钱,要粮库的钱,说穿了就是讹钱,是勒索,自己很为难。他的父亲说:“罗为也不是只向我一个人要,他向大家都要了,而且别人也都给了,我不给,这个饭碗还端不端了?这个饭碗不端,吃啥去?”李景沆对父亲的懦弱不以为然,说:“我们家现在有一院房子,三十亩地,挨不了饿,不管他!看他咋办。你不要考虑我的将来,不要考虑给我置办产业。我将来有本

事就吃饭,没有本事就挨饿。当年的天水县长黄欣,就因为受贿一碗大烟,被省长谷正伦枪毙了。爸爸,今天是国难当头,全国奋起抗战之时,这些贪官污吏无耻之极,暴敛到这种程度,我是个爱国学生,我不能同意你向他屈服。”在李景沆的再三劝告下,他的父亲终于愤然离职。罗为恼羞成怒,找了一个借口就把李景沆的父亲抓了起来,并且关进了监狱。罗为散布说:“管粮食的师爷是个肥缺,多少人挤破头想干都干不了。李文甫犯了事想溜掉,想得轻巧!”李文甫身陷囹圄一个多月,罗为通过清仓,抓不到什么把柄,觉得也达到了侮辱的目的,就把李文甫放了。又过了一个月,田赋上的另一个师爷又不辞而别,逃离天水。于是有人向罗为诬告说,这个逃跑的师爷与李文甫有勾结。于是,李文甫第二次被抓进监狱。

这样一来,李景沆考大学的打算只好搁浅。他义愤填膺,改造社会的决心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可怜。有好心人劝告:家财是死的,人是活的,救人最要紧。要那么多土地干啥,不如卖掉,给监狱看守多上些贡,早一天把人放出来,比守着那些地好!听了这些劝告,李景沆跟母亲商量好以后,就决定卖地救人。于是,他们请了经纪人,托这个经纪人帮他们把地卖掉,好营救父亲。但是,这个经纪人把地卖掉以后没有马上把钱交给李景沆的母亲,而是拿上这些钱进了赌场,一夜之间,便输了个精光,于是逃之夭夭。

两年之后,李景沆的父亲刑满出狱,家中已是空空如也。父亲说,我一生辛劳,才挣得这份家业,就是想叫你们过个舒服的日子。可是,这么大的家业,说没就没了,才是一转眼的功夫呀。看来,家业再大也靠不住,家业再大不如本事大。家业大别人能骗去,能抢去,本事别人骗不去也抢不去。学好本事一辈子吃不完喝不完。还是《三字经》里说得好:“人遗子,有千金,我遗子,唯一经”。孩子,上学

去,还是上学好。于是父亲母亲经过商议后决定:变卖家中所剩无几的家产,父亲再去下苦挣一点钱贴补家用,以便供李景沆上大学。从此以后,全家定时做祷告,祈求上帝保佑。全家人围在一起,轻轻唱起了赞美诗:

安稳隐藏在主的翅膀下,
谁能使人离开主的爱?
人世间时常有患难,
主的翅膀下有平安。

1945年秋,李景沆考取了西北师范学院数学系。在远离家乡和父母的日子里,一本《圣经》始终伴随着李景沆。虔诚的基督徒赵立珍也在这一时期走进了李景沆的生活。

李景沆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非常喜欢钻研问题。同学们不理解,他们问:“李景沆,学得再深,毕业后还是中学老师,够用就行了,你比我们大家都学得好,还钻什么?”他们哪里知道,李景沆的目的不是普通中学教师,是学者,是教授!李景沆坚信,我用我的学识能改良社会,能抵制贪官污吏的腐败,能为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效力。李景沆在他们那个年级,甚至在全校,都成了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他相信,凭他的学识水平,百分之百地能把他留在西北师范学院,做助教,然后的路子就是讲师、副教授、教授。等到成为教授的那一天,说话有了分量时,他就要批判社会,批判社会上的贪官污吏。那些无中生有陷害百姓的污吏,那些寡廉鲜耻横征暴敛的贪官,还有他们的喽罗。

血气方刚的年轻李景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一个嫉恶如仇的热血青年,并决心一生都不向邪恶势力低头。

但是,美好的宏愿未必就能实现,未必就能得到善报,就像那位据传一生救苦救难的耶稣,却遭到了官吏和

祭司们的嫉恨，受尽了打骂和侮辱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慢慢受苦而死。这个世界是多么不公平！李景沆是在他多次“碰壁”，被碰得头破血流，有时是几乎命悬一线的情况下，才认识到这一点的。

大学毕业后，李景沆却由于一些意外的原因没能留校，也没有进入另外的大学，而是回到了天水一中，当了一个中学数学教员。这使李景沆陷入了苦闷之中。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了挽救危局，在全国各地极力扩大它的组织和外围组织，就在在校大学生中大力发展成员。李景沆所在的班有很多同学都参加了，李景沆却执意不参加。他不参加的原因是怕耽误学习。李景沆的想法是，参加国民党跟将来当教授、当数学家有什么关系？李景沆还因此被怀疑过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险些受到迫害。

痛苦之中的李景沆，又想到上帝。

刚刚解放的天水，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李景沆家中一贫如洗，政治清白，连三青团都没有参加过，又是刚刚大学毕业，正是新政权需要的合格人才。他比其他知识分子更受党和政府的欢迎。但也不能，因为他是主的孩子，今天轰轰烈烈，身后是上不了天堂的。斟酌再三，只能按上帝指引的路继续走下去，不能追求今天的地位和富有。李景沆牢牢记下了从《圣经》中学到的道理：永恒是存在的，永恒只存在于天国，人间的事情都是暂时的。因此，人间的受苦受难是短暂的，哪怕是八十年，我活到八十岁，受上八十年的苦和罪，比起永恒的天堂，那也是暂时的。我对今天的受苦受难心甘情愿。

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管碰到什么挫折和艰难，心中都要有上帝。哪怕今生坐监牢，死后也要升天堂。八年之后，李景沆果然进了比监牢还要可怕的夹边沟农场，但他坚信，那是上帝的安排，也是通向天堂的一个路段，他必须走过去。这也可能就是别人挺不过去，而他却能挺过去的

动力之一。李景沆寻思,在无神论者执政的国家里,一个基督徒在中学讲坛上能站得下去吗?共产主义最终是要消灭宗教的,这个“最终”是多长时间呢?几年还是几十年?李景沆感到自己又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前方是一左一右两条道儿。一条是放弃基督信仰,当教书先生,吃安稳饭;另一条是坚持信仰,但这有可能被逐出学校,或者被逐出学校还要判几年徒刑,但枪毙不了,因为我是良民,不犯法,只是信仰问题,最多也就是判十年吧。前一条路不能走,那是死后要进地狱的事。后一条可能不得不走,当然要尽量走好,走得平安,办法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取得校领导的信任。实在不得已,不离开学校不行,那就要再学一门谋生的手段。于是,工作之余,他开始在家中学习木工,以便将来被逐出学校后好自己谋生。

因为公开亮出了对上帝的信仰,因此,从1950年开始的每次政治运动,李景沆理所当然地都成为重点。从这个时候开始到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的七年时间里,李景沆的生活和工作中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不断地挨批,作检讨;第二、信仰活动转入地下,因为那时运动多,集体生活多,在集体生活中,他常常在夜里睡觉时,用被子把头蒙起来做祈祷;第三,只要走上讲坛,尽力把课讲好。

李景沆有讲好课的充分条件。首先,他爱学生。他相信学生当中有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他总是循循善诱地讲解,认真解答学生们的每一个问题,批改作业也是一丝不苟。他极力掌握班上每个学生的性格特点,因人施教,以达最佳教育效果。其次,他有极为扎实的数学功底。数学上的公理、公式、定理已经烂熟于胸,他已经运用自如。前边说到,他甚至用数学推导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且不说这样的推导是荒唐还是可信,只说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都以数学原则来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话,起码不是数

学的悲哀,对学生学好数学肯定会有很大的好处。几十年后的一天上午,李景沆在水街街头碰到了一位他多年不见的学生。寒暄之后,他知道这个当年数学成绩优异的学生如今已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时候,便惋惜地问:“数学放弃了?你不把数学作为一种业余爱好了?”他的潜台词是:搞什么文字呢?数学才是学问嘛。李景沆一直生活在数学王国里,而且他希望他的优秀学生都这样,虽然他这一生也没能成为大学的数学教授。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是李景沆最大的痛苦。痛苦的时间长了,麻木了,也就适应了。适应了的东西反而不痛苦了。每天静静地、悄悄地、只在自己心里对上帝祈祷,是他最好的心里平衡方式。

教好每一个学生,让他们学好数学,是李景沆最大的满足。工作和批斗之余学一学木工、瓦工、漆工,使他的生活变得十分充实,有了这些手艺就有了比较保险的饭碗。不管有什么磨难,就是刀山火海,他也能走过去,走进天国,走向天堂。

李景沆声言:基督徒就是要当好人,当好儿子、丈夫和父亲,当好女儿、妻子和母亲。有了这种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在1957年以前那段政治上相对平静的两年多时间里,李景沆的日子和他的家庭生活还是平安的。但他对他的同事有过害怕共产党的流露,共产主义最终要消灭宗教,当然也包括基督教。这是虔诚的李景沆所不能同意的,他有些怕。

光阴荏苒,转眼到了1957年,整风运动的战鼓在全国播得震天价响。

天水也行动起来了。有一天,地委组织部的领导找到李景沆、车汉英、杨成天等人,叫他们帮助党整风。杨成天是武山中学校长,北大毕业。李景沆按上帝关于“要服从在上掌权的人”的旨意,发言歌颂了共产党。但组织部的

人不满意,说让你们提意见,为什么不提?帮助党整风,为什么不帮助?如此好几次,李景沆仍然是歌功颂德。运动进一步深入,天水一中也行动起来了。学校领导经常组织大家开会,启发他们发言,给党提意见,尤其对李景沆等这些旧社会过来的人,一次次动员,一遍遍启发。李景沆不改初衷,还是一如既往地歌功颂德。学校领导却因此产生了疑问:“李景沆说的这些话,是他的真心话吗?李景沆这个基督徒,能拥护共产党吗?唯物主义者和有神论者是誓不两立、水火不能相容的呀。”“反右”运动进一步深入,上级对每个单位“揪出”右派的数量渐渐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天水一中必须有右派,张三还是李四,要落实到人头。

李景沆终于被圈在“资产阶级右派”这个范围之内。领导解释说,李景沆的右派言论不是在运动之中,而是在运动之前。运动前,他曾对别人说过:“我害怕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要消灭宗教。”“肃反运动把我吓得跟猫娃一样。”这是他根深蒂固的思想基础,跟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运动中也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就等于坚持反动立场,坚持反动立场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比那些公开跳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还要严重。李景沆辩解说,鸣放中我没有给共产党提过任何一条意见。你们让我帮助党整风,我也没有帮助。学校领导认为:你不提意见不等于没有意见,你不说,却比说还要反动。李景沆无言以对,只有束手就擒。

李景沆有错误。他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别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他认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共产主义社会要消灭宗教,共产党与宗教当然是水火不容。可是,李景沆的直接领导们也同样犯有错误,是他们首先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别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共产党要消灭宗教,共产党与宗教水火不容。

实际上,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写入宪法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是:宗教有其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力量去发展宗教。宗教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宗教的自由。舆论部门要宣传无神论,但不能简单地把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别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共产党提倡坚持政治上的团结合作、信仰上的互相尊重。国家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保护正常的宗教界的合法利益。国家制止和打击的只是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

可惜,在当时,这些正确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在信教群众中,给党的形象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用极端的方式和手段处理宗教问题,更是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文革”结束后,用了很大的气力来拨乱反正,才使得正确政策得以执行。

到“反右”结束时,天水一中高中部四十二名教职员中,就有二十二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包括校长任纪文在内。其中,到夹边沟农场参加劳教的有数学教师李景沆、校长任纪文、语文教师王锦、李绍桐、卢剑英,还有历史教师李振篱一共六人。任纪文参加革命较早,是中共陇南地下党组织的老党员,老地下工作者。四位语文教师和历史教师都是天水地区有名的才子。这六个人中,五个人饿死在夹边沟或明水农场。奄奄一息回到天水的只有李景沆一人,这是后话。

告别默默无言的父亲、啜泣的母亲和已经哭得眼睛红肿的妻子,李景沆便背上行李上路了。学校的领导、同事以及送行的地方干部们,对李景沆们都很客气。李景沆

想,对右派分子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当然应该客气。劳动教养,就应该是劳动加教养。去了以后,住的可能是集体宿舍,一个房间五六个人。每天早上起床后是早饭,早饭之后是学习、念文件,念有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做笔记,讨论心得体会和收获。思想改造嘛,少不了这一套。劳动教养,劳动教养,不劳动,怎么达到教养的效果?不劳动光教养也不可能嘛。他将未来的劳教生活几乎设想为一首优美的田园诗。李景沆暗下决心,好好劳动,好好学习,好好念经文做祷告。最好不要等到两年,争取尽早回到家乡。

刚一上火车,李景沆便马上发现气氛发生了变化。送行的地方干部原来是两个公安人员和一名机关干部。“站起来!”公安人员用枪指着他们几个即将踏上“教养”之路的右派高声喊叫着。要他们把行李放到一起,人也坐在一起,便于路上看管。上车之前还是温文尔雅,春风拂面,顷刻之间就成了倾盆大雨,劈头盖脸地浇下来了。上车前根本没有发现他们有枪,怎么一上车就被枪指到额头上了?原来,上车之前,他们的枪都藏在各自的背包里,没有往外亮。

李景沆们仿佛已经走进了牢狱,因为只有牢狱里的犯人才有持枪人员看押。同行的右派们面面相觑,谁也不说一句话,惊惧而无可奈何。可能有人后悔,不是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吗?自谋职业、自谋生路也是允许的嘛,为什么非要到夹边沟农场呢?李景沆不后悔,因为是上帝为他作出的选择。李景沆也有疑问:劳动教养难道成为劳改了?成为服刑了?为什么连上厕所都有人拿枪跟在后面呢?路上两天,一点吃的东西都不给。李景沆从家里出发时,妻子给他塞了两个锅盔,他也就啃了一路这个东西。有人没有带多少吃食,饿了一路也没有人管。火车到兰州时,有人提出下车到月台上走一走,公安人员没有同意,

李景沅们只好窝在那里等开车。经过两天的行程，酒泉车站到了。押送李景沅们的两名公安和一名干部把右派们喊下车，又引到车站广场一处人少的地方，押送干部与接车干部在这里耳语了几句，交换完手续，就算是把他们交到酒泉方面的公安人员手中了。停在旁边的一辆卡车放下一侧的车厢板，“欢迎”他们这些疲惫不堪的远客。李景沅们先把各自的行李撂上去，然后一个一个爬上车，木然地坐在各自的行李上。

一声吼叫，汽车驶离了火车站。

汽车扬起的烟尘遮天盖地。向前看，碧野蓝天；向后看，一片黄沙死死挡住了视线。李景沅的心里猛然跳出四个字：不堪回首！当然，基督徒的希望在未来。虽然他就要来到地狱般的夹边沟农场了，但此时的他却还在憧憬两年后的家庭团圆，甚至是永恒的天国的幸福。

汽车是天黑之前到达农场的。两个用砖头砌起来的砖柱，分别竖在路的两边，是个象征性的大门，又颠簸了一阵，汽车停在了一座大房子门口的场子上。

一下车，就听到管教干部喊：“一个一个地站开，都打开你们的行李！”右派们以相互间一米左右的距离整齐地站成了一排，他们开始打开自己的行李，平铺在地上，等待着管教人员的下一道指令，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管教人员要自己打开行李干什么。

这时候，管教人员开始检查每一个人的行李，他们看得很认真，看不到的地方，就摸得很细。

李景沅还愣在那里发呆，他没有及时把自己的行李打开，是想蒙混一下，看不打开行不行，想碰碰运气。但他一看管教人员是要检查每个人的行李，顿时感觉心跳加快，两腿发软，两手发抖，还有点憋不住小便的急迫感。他想，虽然已经划成右派分子了，投入劳动教养，但人身自由还是有的，自身的行李是不会被搜查的。基于这种估

计,在准备行李之前,经与妻子商议,他决定带上一本《圣经》伴他远行,平时可以诵读,遇到危难之事,也可以求得主的启示。李景沆夫妇坚定地认为,《圣经》能给人启示,它的教义是神圣的,它的准则是可靠的。别的东西可以不带,《圣经》却不可须臾离开身边。《圣经》是个精装袖珍本,携带方便,也好隐蔽,以免碰到不必要的麻烦。妻子是把《圣经》装到一个布袋中,然后拆开棉被,剥开棉絮,再把这个布袋夹到棉絮当中,把棉花铺垫均匀,重新缝好,又摸摸,直到自己都感觉到轻易不会被发现,才放心地替他打上行李。可是现在……

“李景沆!愣着干什么?快打开你的行李!”管教人员这么一喊,李景沆反而不抖了。听天由命吧,听凭上帝的安排吧。事到如今,行李不打开是不行的,公开对抗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李景沆显得从容不迫地打开行李,站在旁边,神情自若,心中却在默默地祷告:上帝保佑!

但是,管教人员只是认真地查了两三个人,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及至查到后边,也就马马虎虎了。李景沆顺利过关!可李景沆并不认为这是管教干部马虎,使他侥幸躲过了这一关。他坚定地认为:上帝总是在他危难时候保佑他。

正当李景沆们重新收拾各自行李的时候,远处来了一群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他们衣着整齐,青一色的白衬衣,洗得还算干净。他们大模大样来到收拾行李的右派们中间,悄声问:“有吃的东西吗?”李景沆纳闷了:这些衣冠整齐的人,知识分子模样,怎么如此不讲尊严?如此把脸撇下不要?难道他们在这里挨饿了吗?李景沆还在琢磨,一个长者已经来到他身边,伸出手说:“给一点,给一点吧!”李景沆从天水出发时所带的锅盔在火车上已经吃光,一点剩下的也没有。老者翻了他一眼,到别的右派那里讨要去了。李景沆心里又是一惊:劳教人员难道要饿肚

子？

收拾停当，要开饭了。这是来到夹边沟农场的第一顿饭，是开始劳动教养生活的第一顿饭，是离开素有“小江南”之称的故乡天水，来到河西走廊的第一顿晚餐。有人用木桶给他们把晚饭提过来了，黑黑的，满满一桶，说是尽饱吃。搞不清是荞面的、高粱面的还是黑豆面的。大家狼吞虎咽，来不及品什么味道，稀里糊涂装满了肚子。李景沆满满吃了两大碗，饥饿难耐的感觉顿时消失。

“呃，听着！”管教人员声音很高，调子也拖得很长。因为他面对的是一大群右派分子，他要用这种方式引起右派们的注意，然后再发布他的命令。李景沆很不习惯这种说话方式，好像是把右派当成了牲口在驱赶。但是，无可奈何，自从在天水火车站登上西去的火车，公安人员用枪指向自己以后，他已经成为一只羔羊了，任人摆布吧！

“呃，你们就住在这个大厅里。”原来是在给他们安排住处。这大厅就在入场检查和吃第一顿晚饭的场子旁边。

大房里什么东西都没有，空空荡荡的。土坯墙，泥顶，粗糙的木纹已经开裂的杨木门窗，李景沆定下神来瞅了瞅，已经精于各种木工活的他一眼就看出来是用的什么原料了。他想，这样的泥顶泥墙，放在天水，一场不大的雨就能把它泡塌。还有，杨木怎么能做门窗呢？易遭虫蛀又不结实。一座糊弄人的房子！

管教人员继续扯着嗓门喊：“你们就住在这个房子里，场子那边有麦草，你们自己去抱！”李景沆清楚了，并非他想象的三五人或五六人一间房，而是几十个人一间大房子！二百人恐怕也能住下的大房子！李景沆的家乡是个习惯睡炕的地方，再穷的人家，都要有个炕睡，只要人不懒，随便捡点柴草、牛粪、马粪、锯末之类，烧一烧，冬天也能热热火火，夏天也能赶赶湿气潮气。这里不但没有炕，连个木头床也没有，地就是炕，地就是床，人又回到原

始社会了？真是不可思议。

右派们出门抱了些麦草铺在地上，就打开行李躺下了。大家都不说话，各有各的心事。李景沆的行李没有打开，他坐在麦草上，斜靠着自己的行李卷，想一想天水建设路古风巷的热乎乎的炕头，温情脉脉的妻子，慈祥而年迈的父母，憨态可掬的儿女，伤心的泪水就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了。泪水流到脸颊上，顺着嘴角流到嘴里，咸咸的，涩涩的。流到脖子里，透心地凉。这一夜，李景沆一直没有睡意，他也没有打开自己的行李，是这天晚上惟一一个一夜都没有打开自己行李的右派。半夜里，他想到了缝在被子中的那本《圣经》，想看一下主对自己有什么启示，但他不能，这么多人，又没有灯，没法聆听主的教诲。

天亮之后，依旧是管教人员用高嗓门像吆喝一群羊一样吆喝他们起床，吆喝他们吃早饭，吆喝他们每人拿了一把锄头去劳动。原来，从这一天起，劳动就是教养，并不安排什么学文件、读报纸、讨论、记笔记、写心得。

右派们被吆喝到一片麦地边上。他们被告知，今天的任务是除杂草，每人五行，杂草必须除净，麦子不能锄倒，一棵也不准碰倒，否则是破坏农业生产。如果有漏掉的杂草，就说明你没有好好工作，就不是真心实意参加劳动教养。今天第一天，就是对你们的考验。

右派们坚信不疑的是：只要劳动表现好，就能早日回到工作岗位，当然也就回到了温馨的家。尽管经过了几天的旅途，但多数是些三四十岁的壮年人，还没有经过太大的体力消耗，谁不想好好表现以求早些回家呢。管教人员把任务布置明白以后，右派们个个奋勇当先。李景沆平时在家虽然也干些木工活、瓦工活，但那是业余时间偶然干一干，纯粹的农活还从来也没有干过。几分钟之后，这位习惯站讲台的李老师就有些招架不住了。他腰疼、腿疼，两眼有些发花。李景沆抬起头来环顾左右，心里又有些着

急了,本来大家是在一条线上,就像田径场中起跑线上的运动员,在发令枪响之前的阵势。可转眼之间,直线变成了曲线和折线,前的前,后的后。而最后一个就是李景沆,其余人员全部都在他的前边。他们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埋头赶快往前赶。如果人家说你最落后,最不要求进步,劳动态度最不好,对参加劳教不满意……想到这里,李景沆不禁有些后怕,便只有往前赶了。

赶呀赶呀,前边的人也不时往后瞅,他们也生怕被后边的人赶到前面。如果后边的人赶到前面去,不又显得他们的劳动劲头不足了吗?前边后边的右派们想法不同,拼命地干活的态度却都是一样的。等到李景沆锄到地头的时候,他前边的右派们也是刚刚锄到地头。李景沆喘着粗气,像一滩泥一样坐下了。他看看他的伙伴们,几乎都成了一滩泥,而且脸色煞白,好像是医院急诊室门口排队等待急诊的病号,歪七扭八坐着的、躺着的、半坐半躺的。

缓上片刻,还得继续锄,还是劳动竞赛一般地“奋勇当先”。李景沆第一次尝到长时间超强度体力劳动的滋味。还要上什么天堂?劳动中如果能够坐一坐,哪怕是把活停下来站一站,就是天堂!李景沆看看地头上那个来回走动的干部,那个干部只是悠闲地看一看右派们干活的质量,看谁的活不行,就扯开嗓子喊两声,多自在!这个干部已经生活在天堂之中了。但是,李景沆手中的活是不能停的,停下来就是抵制劳动教养,抵制了劳动教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一连三天,李景沆是咬着牙挺过来的。最难熬的是第二天。这天早上,他睡得太死了,是别人喊了几次才把他喊醒的。几天的旅途劳顿,加上第一天的超强度体力劳动,他的骨头好像已经散了架,手脚也不听使唤。他已记不清自己头天晚上是怎么爬到地铺上的。整整一夜,什么梦都没有做,他已经没有气力去做梦了。临睡之前例行的

祷告也没有来得及做，什么都乱套了。

被别人喊醒的李景沆本能地、习惯性地想抬手揉一揉一时睁不开的双眼，但刚一动，就觉得手臂上、胳膊上的肌肉钻心地疼，根本抬不起来。他想翻一翻身，调整一下姿势再往起坐，但稍一使劲，后背、臀部、后腰、双腿就钻心地疼。管教干部又在喊叫了，再躺下去，管教干部可能要跑到地铺跟前拽被子了。李景沆咬紧牙关，运运气，忽地站了起来。

依然是除草劳动。两三斤重的铁锄，在李景沆手中已变得像有千斤重，每举一次，浑身都疼得冒汗。两条腿像灌上了铅，每挪一点都要下很大的决心。野草好像都是牛筋做成的，锄上几次，草根都锄不断，蹲下身子去拔，腰里又好像穿了一根棍子，僵直、疼痛，没有办法弯下腰身，只得再锄。本来一下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时必须几次三番，非整出几身汗不成。

第四天早饭之后，劳教管理人员又开始高声喊叫了。这次不是让大家去除草，而是要大家批斗反革命分子。

哪里来的反革命分子呢？不都是右派分子吗？大家站好队，“反革命分子”被押上来了。李景沆定睛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他天水一中的同事张君奇。张君奇今天的“罪行”是逃跑未遂。

张君奇不是右派，他是“坏分子”。为什么把张君奇定为坏分子呢？是因为年轻的张老师爱上了他的一个学生，前因是这个学生首先爱上了英俊潇洒、知识渊博的张老师。师生相爱结婚之后就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接着是离婚，张君奇便以“坏分子”的身份先于李景沆们到夹边沟改造了。

院子里黑压压站满了人，是几百人还是几千人，李景沆也说不清。喊出来的口号声惊天动地。“打倒张君奇！”“打倒反革命分了张君奇！”“张君奇必须老实交待！”“不

交待死路一条！”被反绑的张君奇站在前面，低着头，并不言语。当时的做法，对参加劳教的不管什么人，只要有逃跑等不轨行为的，都可以称为“反革命”。每个发言的人都是慷慨激昂，似乎张君奇已经十恶不赦，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每一次发言批判之后，又是同样一阵震耳欲聋的口号。光听听口号声，胆小些的人就能吓破胆，谁还敢有一丁点儿逃跑的念头。那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吗。如果再看一看张君奇的狼狈相，那就更不敢有逃跑的念头了。成百上千只拳头举到空中喊打，多么大的震慑力啊！李景沆有些颤抖，他为他的同事张老师捏着一把汗，他害怕张老师承受不了这种强大的压力，再出其他问题，默默地在内心为自己的伙伴祈求上帝保佑。

但是，李景沆是杞人忧天，他想得不对。张君奇就是张君奇，不是李景沆。张君奇有自己的主意，而且也敢于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敢爱敢恨。他不喜欢事事顾及别人的态度，哪怕是他的领导或什么“广大群众”。就在这次批斗他几天之后，张君奇又逃了一次，被捉回以后是更加严厉的批斗。但是，不管你火力多猛，他还是要逃。在经历了四五次失败之后，张君奇终于获得成功。逃脱之后的张君奇在“文革”前又在水一中拿起了教鞭，任教多年。

第五天，李景沆接到通知，他被调往新添墩作业站。新添墩在夹边沟农场本部以西十几华里的地方。李景沆两年半的劳教生活是在三个地方度过的。最早的五天是在夹边沟农场本部，最后的三个半月是在高台的明水，中间的两年多都是在新添墩作业站，大致就是个分场吧。新添墩的房子比夹边沟小多了。房子里有个大通铺，每人能占的宽度最多是五十厘米，睡下有些挤，翻身时“左邻右舍”都受干扰。

来到新添墩，也是多日不谈学习，不念文件，不发笔记本，不组织讨论，只是组织劳动，组织形式是“大队——

队——小队”大队长由管教干部担任。队长在劳教的右派分子中选出，小队长当然也是由右派分子担任。队有农业队、基建队、副业队。

李景沆被分配到农业队，参加大田劳动。第一天的劳动是整地，挖排碱沟。排碱沟是包括新添墩在内的夹边沟农场开荒造田的基础性工作。这里地处讨赖河下游，地下水位高，土地的盐碱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土地开挖出纵横交错的网状沟渠，地里灌上水，让碱性物质溶化于水中，从开挖的沟渠中排出，以去掉土壤的碱性，造出良田。李景沆们挖的排碱沟，口宽五米，深四米，底宽一两米。沟的横截面是个倒梯形。挖沟不比大田除草，一人五行往前锄，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一目了然。挖沟不好计量，就在每天下工以后评工分，干得最多最好的是十分，一般人都是六七分，七八分，惟独李景沆一连几天都评为四分，每天都要受批评。因此，他的思想压力很大。每天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已经把他搞得精疲力尽，但他还要努力争取更高的得分。他知道，长期得四分，受批评，他的两年后回家、回讲台之梦将有破灭的危险。

如果说最初的五天，在夹边沟农场本部还算是能把肚子填饱的话，到了新添墩的这几天，一样的糊糊饭已经严格地限量供应了，每顿饭只能算是个半饱。按李景沆当时的饭量，有三碗半就差不多了，但能分给他的不到两碗，而且没有任何油水。从这个时候开始，饥饿笼罩了劳教农场，时间是公元1958年7月。这个时间比夹边沟周围农村饥荒到来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一年。

挖排碱沟时由于体力不行，李景沆没有分配到沟底的开挖工作。因为沟底的人要掘土，还要把每锹十多斤重的泥土往上擗，他鼓足劲只能擗到半坡，泥土又全部滚到沟底了。小队长看着生气，只好把他打发到地面去运土。李景沆的工作是把开挖出来的泥土装筐，然后抬到地里

边整平。有一天，在沟边装土的时候，李景沆失足掉到沟里去了，因为是斜坡，也没有伤着什么地方。但他笨拙地往上爬时，却怎么也爬不上去。只听“岸”上有人高呼：“把那个老汉拽上来！把老汉拽上来！”于是有人在上边伸给李景沆一个铁锨把，李景沆借助铁锨把的拉力爬到了地面。到了地面上后，李景沆却不由自主地想：我一个三十八岁的人，怎么就成了“老汉”了呢？我离家才半个多月，就老得这么快吗？这半个多月，李景沆在巨大的思想压力下受熬煎，在超强体力劳动中挨日月，饥肠辘辘，愁肠百转。历史上曾有伍子胥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的传说，难道我李景沆头发已白？自己确实已变成了一个老汉了？来到夹边沟农场的这半个多月，李景沆还没有照过镜子。他没有带那东西，别的劳教人员也没有。劳动教养期间照镜子，那是一种奢侈。李景沆不知道自己目前究竟是个什么模样，但被人突然唤作“老汉”，对他是个很大的刺激，刺痛了他的心，也刺伤了剩下不多的自尊。

爬到“岸”上的李景沆狼狈不堪，他没有力气马上装筐抬土。刚愣了一会儿神，他的上海籍的小队长就高声喊叫开了：“李景沆！为什么不劳动了？”“李景沆！站着干什么？”小队长是喊给李景沆听，也是喊给大家伙儿听的，主要的还是喊给队长和大队长听的。小队长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工作积极的，自己的劳动教养是认真和卖力的。比起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右派立场的劳教分子，我小队长是进步的。好像航船在海上遇险，乘客纷纷落水，如果我蹬着你的肩膀能爬上救生船的话，那就要毫不犹豫地、坚定不移地蹬上你的肩膀往上爬，来不及顾及你的死活。李景沆有一种自己的肩膀被别人踩蹬的感觉。他百思不得其解：人性哪里去了？劳动教养难道就是要教养得人们没有人性吗？

排碱沟越挖越深，地下水已经渗出来，人要站在碱性

很大的水里边作业了。开始时,还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几天之后,一些人的脚开始溃烂了,这是碱性物质刺激皮肤引起的。小队长、队长的喊叫声比开始挖沟时大了,但是效果却越来越差。有那么一个人,把铁锹拄在身前,双手抱着锹把,站在水里边纹丝不动,像个雕塑。任凭小队长怎么喊叫,这个人都“我自岿然不动”。“雕塑”是自己的同类,“雕塑”分明还活着,他的眼睛还在眨巴,眼睛里散发着悲凉的光。看样子,他的体能只够支撑他站着,而且还离不开铁锹把的扶助。除站立之外,“雕塑”什么力气也没有了,再强的外界刺激对他也不起什么作用。几天之后,这个面黄肌瘦的大个子“雕塑”在一天夜里突然死去,他是新添墩作业站第一个死去的劳教分子。

这是李景沆到新添墩作业站一个月左右,即1958年7月初发生的事情。站到沟底挖泥土,因为有渗水,无法穿鞋,只能光着脚。大部分人的脚上都有化学性物质刺激引发的溃疡,疼痛难耐。由于体能不支,大家都已开始磨洋工,但磨洋工也只能站在水里边磨,谁也不敢到沟上边去坐一坐。

当时劳教的右派们,只有个别人戴着手表,大部分人没有表,不知道离下工还有多少时间。快到下工时,总是有人问那些有手表的人:“收工还有多少时间?”于是就不停地有人大声说:“还有四十分钟!”“还有半个小时!”“还有十分钟!”这些大声说着收工时间的人其实是说给自己的,也是说给别人听的。说的人一个劲儿地说,问的人还是一个劲儿地问,就像报时钟一个劲儿地在报时,每分钟都在报一样。

开始开挖排碱沟,每天收工的方式是先集合,大队长讲话,总结半天或一天的工作,边总结边批评,每天都是老一套,这一套老话说完以后,说声:“收工!”右派们就可以往回走了。等过了一个月以后,“程序”逐步简化,只剩

下“收工”二字，再不喊“集合”。大队长的一声令下之后，有力量的人快步往回跑，没有力量的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回挪。李景沆属于走不动的那一类，他要走一走，歇一歇。这时候，不光是李景沆要歇一歇，还有不少人也是这样。有些人走上几步走不动了，就一条腿跪在地上，一条腿蹲着，双手抱着铁锹拄在地上呻吟。想坐却不敢坐，坐下再起身太吃力。想睡不能睡，肚子还饿着。想走又没有走路的力气，只有走走停停。也有人放展躺到路上歇的，但躺一阵还得爬起来再走。

宿舍门前的场地，是劳教人员们的“饭场”。饭场中立了一只缸。每次开饭时，缸里都装着糊糊饭。一个小队一只缸，供二十多人食用。糊糊饭里面间或有筷子粗细的面条。饭是提前做好装到缸里的，不是很烫，有时候还有些凉。大家排上队，由大师傅打饭，一勺刚好是一碗。每到开饭的时候，这些右派们早已饥肠辘辘，打上饭的人边吃边排队打第二碗。等不到排到跟前，第一碗饭早已吞完，有的人还用舌头把碗舔得精光。这样，每天吃饭时，等着打饭的、打上饭吃饭的、吃完以后舔碗的、舔完又排队的就围着饭缸形成一个圆圈。李景沆们的每顿饭，都是在这个“圆圈”中狼吞虎咽“解决”的。李景沆触景生情，他看到的这个圆圈跟他在课堂上给同学们上平面几何课画的那个圆差不多。但那是画给同学们看的，是给他们传授科学知识的。真没有想到，画了多少年，竟把自己牢牢地画到了这个“圆”上！两碗稀糊糊下肚，他远没有吃饱，大家都都一样，他们的共同心愿是再有两碗该有多好！他们明知缸已成为一个空缸，大家还是要再上前瞅上两眼，仿佛那是会长出饭的宝贝缸。瞅上一阵，才失望地回到房里去。

堡子，《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是：方言，指翻耕出来或掘出来的土块，也叫堡头。夹边沟一带的农村方言中，就有这种挖“堡头”的农活和叫法。一般是在地下水位较

高的盐碱地中长满芦苇等碱性杂草的地方，划出二十厘米见方的正方形，切割挖掘，叫做挖草堡子，是除了挖排碱沟之外又一种最主要的劳动。这种草堡子的用处很大，可以垒到一起，中间留出空隙，焚烧以后做有机肥施到农田，是当地最常用的传统农家肥。堡子中间是盘根错节的芦草根，挖出来干透以后，可以点燃，用于冬季取暖、烧炕，就跟定西一带铲草皮作燃料的做法差不多。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保护植被的意识，眼前都顾不过来，谁还能管那么多？

草堡子用途广，是个好东西，但是，樱桃好吃树难栽。芦草根在挖掘机面前是豆腐渣，但在一个个饥肠辘辘、面黄肌瘦的右派们的前面却变得钢筋般坚硬，橡胶般柔韧。挖草堡子的第一道工序是切割，工具是铁锨，锨刃先对准正方形的一个边，然后用脚猛踩锨肩，活像是用刀背去割老牛肉，一点也蹬不进去。李景沆想到了一个物理学上的定律，叫动量守恒定律。动量等于速度乘以质量，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速度越快，动量越大。如果把铁锨提到空中，锨刃对准正方形的一个边，然后使劲往下猛砸，动量大，铁锨铲下去的力量大，效果可能会好一些。他鼓足了劲，把铁锨高高提起，然后猛然砸了一下，虽然震得虎口发麻，铁锨却还是没有铲下去。李景沆失望极了，学了那么多的公理、原理、定律，夹边沟一个也用不上！干这个活，李景沆比挖排碱沟还要不中用，还要沮丧。挖草堡子是有定额的，完不成就要挨批。队长们的喊声不绝于耳，再难也得干。好不容易把正方形的四个边切割完成以后，力气大些的人是用铁锨铲进堡子底部撬出堡子的，而李景沆做不到，他要铲一铲，搬一搬，反复多次才能把一块堡子搬出来。每当这时，浑身上下也就糊满了泥浆。

有一次，李景沆正使出吃奶的力气挖他的草堡子的时候，听到旁边有人喊：“喂！来，那个老汉，来帮个忙！”李

景沆一看，是在喊自己。原来，有几个测量人员在测量土地，是为开荒、修渠、平整土地做准备工作。测量人员人手不够，是叫李景沆为他们拉一下测绳。李景沆接过绳子，往地上一坐，浑身那种从强体力劳动中突然放松的滋味真是妙不可言。他暗想：天哪，让我坐上五分钟吧，坐上五分钟我就满足到顶了，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坐上五分钟更好呢？那是人生的满足！高兴喜乐的五分钟！当然，天堂一般的五分钟不可能长久。几分钟以后，他还得去挖堡子。

还有一次，是往工地上送开水。距离大约是二里路，运送开水的桶子用的是杀猪褪毛的大木桶，抬水也有大致的定额。比如，让你一个人挑水，是一人两桶，可用普通的桶。两人抬，就要抬够普通四桶的水量，这样，折合下来，也是一人两桶。一大桶水，加上大木桶自身的重量，压得李景沆站也站不起来。抬不动，那是你自己说抬不动，抬不动也得抬，李景沆不敢稍稍有反抗的表示。每次勉强站起来之后，双腿根本就不听使唤，挪不上几步，眼前一片黑暗，不由自主地大声呻唤、大口喘气，天旋地转，马上就得放下水桶，否则肯定要跌倒。可是，抬水是两个人的任务，你放下了，你的搭档的任务也无法完成了。“咋搞的？放下干啥？抬！”这是客气的训斥。客气几次就没有耐心了：“这个狗屁！这个软蛋鬼！”比这还要不堪入耳的肮脏语言劈头盖脸就来了。

自从被划为右派以后，李景沆对自己曾经享受过的师道尊严再不敢有什么奢望了，那已经成为历史，永远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一点，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一天到晚要受到别人的侮辱和咒骂，在辱骂声中做苦役，李景沆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不是说“士可杀不可辱”吗？可人家偏要“辱”，你有什么办法？李景沆苦闷极了，他只有暗自感叹劳教人员中人性的式微。又让他想到遇险航船的落

水者，你推我搡，你拉我拽争相登上救生船的可怕场面，没有患难与共，只有同类相残。李景沆抬头看看蓝天，他在心里发问：天啊，人情呢？人性呢？怎么只剩下兽性了？

不论是挖排碱沟还是挖草堡子，中午是不回宿舍的，都是在工地上吃送饭，然后稍事休息，再接着干活。戈壁滩夏日的太阳是火，它可以把沙滩晒到摄氏六七十度。有人做过试验，最热的时候，把鸡蛋埋进沙子，过一会儿挖出来，生蛋就能焖熟。李景沆们劳动的这些地方，都是些无遮无掩的空旷地带，他们成了扔在戈壁滩上的肉，经受着灼热阳光的蒸烤。草帽和汗衫抵挡不住强烈的阳光，这种强烈的光线像刀子，直射的地方当时就隐隐作痛，只得不停地调整姿态，以免一个部位因被晒得时间过长而灼伤。

一个月下来，李景沆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他慢慢垮下来了。最让他恐惧的是晚上遗精，每天早上，他都会发现下身湿漉漉的一片，第二天头昏脑涨，疲乏得爬不起来。李景沆清楚，这是无梦而遗，因精关不固，为滑精，是身体渐垮的明显迹象。因为没有镜子照，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模样。但他设想，大概距离“骷髅”不远了？李景沆渐渐有些神魂颠倒，连路也已经走不稳了。

晚上躺到铺上，李景沆暗自祷告：主啊，你是万能的，你是宇宙的主宰。我今天已无力劳动，明天我可能就躺到工地上爬不起来了。同类们肯定要踩我、踢我，他们还要骂我：“李死狗，为什么躺着不起来？”我一定被折腾得满头满脸满身的泥巴，毫无尊严地永远躺下去，永远，不再起来。主啊，我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饶恕我的罪过吧！

对于劳动的苦和累，李景沆并没有怨言，他认为他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他的责任就是尽力去做。如果到实在做不动的时候，下一步会是如何，那上帝自有安排，这

叫听天由命。祷告毕，他就安心入睡了。

早餐是发到每个人手中的两块饼，一块二两，一共四两。李景沆回忆说，这时候劳教人员的粮食定量是每月二十八斤，进入新添墩，就没有吃饱过。刚刚拿到饼子往嘴里填，就听队长喊：“李景沆，出来！”李景沆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他出来以后，队长告诉他，要他到木工组去。队长的声音比较高，二三百人都能听得到队长的话。这一下，二三百人的眼睛同时投向了李景沆。木工活相对于大田劳动，相对于挖排碱沟和挖草袋子来说，那是天堂！

李景沆学木工，已经有些年头了。他学木工犹如他学数学，非常投入。他知道，因为信仰的关系，自己站讲台这碗饭怕是吃不长久的，总有一天，学校会把他打发掉的。进劳教农场之前，李景沆的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到木工上了。他曾经做过一个十分精致的折叠椅，拿到学校去坐过，被语文教师李绍桐看见了，拿去试坐两天，赞不绝口。恰好，李绍桐也被划为右派，也送到了夹边沟，而且这个李老师一再给农业队举荐：李景沆是个木工高手，他做出的折叠椅，小巧玲珑，非常漂亮，建议队上把李景沆分到木工组去发挥他的专长。当时，场方查阅了李景沆的档案。从档案上看，他只会数学，哪里有什么木工记载，因此未能同意他到木工组去。随着农场劳教人员的不断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木工组的工作量日渐增大，原有的三个人已经不能保证生产、生活对木工组的需要。这时候，场方又想起了李绍桐的举荐，不妨弄去试试看吧。这一试，改变了李景沆的命运，正好与李景沆头天晚上的祷告巧合上了。

世界上巧合的事情很多，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事情一过也就忘记了。可李景沆不，他认为这是他祈祷的结果，他在蒙恩。

从这一天开始,李景沆拿起了斧、锯、刨、凿,开始了他力所能及的木工劳动。但他最大的感受是吃的比以前好多了。东西还是一样的东西,但能多吃半份。为什么能多吃半份呢?因为伙房里的饭并不是根据劳教人员的人数一分不差地做的。师傅们总是要多加两瓢水,有他们多吃的,也有些许剩余。这些许剩余,要给伙房用得着的人吃点偏食。这用得着的人,就包括木工组的几位。原因是:伙房蒸馍要用蒸笼,修蒸笼是木工组的工作。木工组师傅给他们修得认真些、严实些,蒸起馍来就省劲些。木工组如果把蒸笼修不好,或者有意留下点隐患,那就把伙房的师傅整住了,任凭你怎么费神,用一个跑气的蒸笼蒸馍,那是没有办法蒸好的。孰轻孰重,伙房师傅心里很明白。为了给自己买方便,伙房师傅必须得讨好木工师傅。这种无形中的“制约机制”救了李景沆的命,使他没有成为第二个“雕塑”。李景沆的第二点感受是避免了强烈阳光的炙烤。那是从火焰山一下子来到清凉世界的差别,是天壤之别,是地狱与天堂的区别。他的第三点感受是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已经降到他能够承受的程度了。体力逐步有所恢复,遗精现象消失。第四点感受是,我李景沆现在又像个人了,比起以前,侮辱和咒骂少得多了,又多少恢复了一点点人的尊严。

“感谢上帝!”这几天,他常常默默地感恩和祈祷。一个多月来,那个缝在棉被中的袖珍《圣经》还没有拿出来诵读过,一则住的是集体宿舍,又是集体劳动,人多眼杂,没有自己单独活动的时间;二则是挖排碱沟、草堡子的劳动强度太大了,还没有躺下,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什么精力也没有。现在好了,三四个人的木工组,他已经有了单独活动的时间,加上饮食状况的改善,他的身体已有明显的恢复,精力好多了。有一天,李景沆把他的袖珍《圣经》揣在怀里带到了木工组,跟往常一样,拿起斧、锯、刨、凿

干了起来。不一会儿,另外几个人出去办其他事情了。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李景沅从自己怀里掏出了他的袖珍《圣经》。李景沅首先闭上双眼祈祷:“主啊,我活过来了,感谢你的保佑!请你给我一则启示,作为我一生的座右铭。”同时,这位李老师又按数学方式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推导方式。他设想,他要随意翻开《圣经》,这一页上记载的主的教训,就是今天上帝对他的启示。想好之后,李景沅随意翻开了《圣经》,这一页记载了主对妇女的教诲:不要以金耳环、金项链为美,要以温柔、谦卑为装饰,学会忍耐,不以牙还牙。李景沅认为,上帝要求妇女做到的,他李景沅一样也应该做到。既然在翻开《圣经》以前就已经许下今天主的启示就是今生今世的座右铭,那就要说话算数,说到做到。他暗自祷告:“主啊,今生今世,我一定温和、谦卑地待人,不管别人对我如何。别人对我再不好,我也不会以牙还牙,阿门!”他同时在其袖珍《圣经》的这一页上工工整整写下了主对他启示的这个日子:1958年7月15日。

这时的木工组,一共有四个人,组长叫寇国英,进场前是兰州一家工厂木工车间的班组长之类的负责人。副组长是天水一家工厂的技术员,叫李生才。寇、李两人都非常和善,待人诚恳,交待什么任务时均以商量的口气,从不盛气凌人。看到李景沅身子单薄,总在可能的条件下尽力关照他。还有一个行伍出身的湖南人,叫王子善,黑黑的脸,中等个儿,是最野蛮的一个。“黑人”很凶悍,他见李景沅是一介懦弱书生,就有意与他过不去。有一天,木工组的任务是砍木橛子,是测量人员在测地时准备楔到地里做标记用的。李景沅并不偷懒,一个班下来打了四十个,而“黑人”却打够了五十个。于是“黑人”质问李景沅:“我能打五十个,你为什么只打四十个呢?”李景沅牢记主的教训——温柔、谦卑,于是好言相答:“那好,我就加班

打够五十个”。第二天,李景沆照样打够了五十个,而“黑人”这一天却又打了六十个。“黑人”又质问李景沆:“为什么我能打六十个,你只打了五十个呢?”李景沆答:“好好,我再加班打够六十个。”就这样,“黑人”完成的数量每天都在增长,李景沆也只好被迫增加自己的工作量。但是,增长是有极限的,当“黑人”打到一百个的时候,李景沆只完成了七十四个,他再也打不动了。王子善不“善”了,他拉下脸子,把李景沆一顿辱骂,语言之粗鲁,不亚于那天同李景沆一起抬过开水的那个伙伴。李景沆一言不发,他甚至一点愤怒的表情也不能流露,他必须“温和、谦卑”。

拉大锯是木工组常有的活。“黑人”王子善与李景沆是拉大锯的两搭档。把一抱粗的圆木画上线,立起来固定到一个木桩子上,两边斜搭两块木板,两人对立于木板上,你拉我送,你送我拉。如果配合默契,并不十分费劲。但是,李景沆跟王子善一起拉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王不停地训斥李景沆:“你怎么不使劲儿拉?”“你怎么不使劲儿送?”“你怎么不快一点儿?”“你死了?”“瞎屁!你看跑锯了不是!”

晚上睡觉,床铺已经比农场的农业队宽敞多了。李景沆的原则是:尽量贴着边睡,给别人多留下些地方。“黑人”并不领情,他睡觉也有些霸气:翻身时总是把李景沆踢上一腿,侧睡时就把膝盖顶到李景沆的腰上。仿佛只有这样,王子善才能舒服。李景沆这么想:王子善和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他为什么要欺负我呢?人欺人总要有个原因吧?没有原因就欺,这不合人之常情。自从我来到人世,撒旦就一直有停止对我的欺侮和陷害,父亲的牢狱之苦,自己大学教授梦的破灭,家道中落,都是魔鬼撒旦在作祟,一定是撒旦附上王子善的肉身跟我过不去。李景沆把王子善看成两个人:替撒旦行凶的王子善和作为一个人的王子善。

“撒旦”王子善对基督徒李景沆的欺侮不断升级。有一次，王子善居然骑在李景沆的身上欺人取乐。李景沆气极了，但他转念又想到主的教诲：“要爱敌人。恨你们的，你们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你们要为他祝福。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送给他。”遵从主的教诲，李景沆没有发作，后来，他始终善待作为一个人的王子善。有一次，李景沆还把天水家中寄来的点心分了一块给王子善吃。点心是从一家老小的牙缝中抠出来的，家人们也在挨饿，“黑人”知道这一点。半年多以后，王子善终于良心发现。有天晚上，他悄悄对李景沆说，老李呀，我饿得不行了，虽然木工组比其他地方好一些，但终究是要饿垮的。我受不了，今晚，我就要逃走了。我的家乡湖南是个鱼米之乡，兴许比这戈壁滩鬼地方要好混一些，能养人。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回去。我一个右派分子也不知回去能不能呆得下去。留下是死路一条，逃走也是生死不明。就是死了，我也得回去看一眼我的老人和妻子儿女。老李！你是个好人，过去对不起你，我很后悔，将来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到天水去看你！李景沆被感动了，他认为，这是上帝以自己的教诲又挽救了一个人的灵魂，王子善终于善起来了。之后，他常常为王子善祈祷：望上帝保佑王子善平安回家，夫妻团聚，阖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

有一天，一位妇女带领两个孩子来到木工组，问她的丈夫埋在什么地方了？李景沆一听就明白了，这是“雕塑”的家属奔丧来了。李景沆反问她：“你怎么不去找干部呢？”意思是让她去寻找管教干部。妇女说，她找了，干部们说让她自己去，去找“雕塑”所在的那个农业队。她找到了农业队所在地，但人们都出工了，有的去挖排碱沟，有的去挖草堡子，人走光了。只有木工组有人，她才找到这里。李景沆从这件事上搞清了：人死了以后，由死者所在的小队或队里处理尸体，场方不管。这个妇女四十岁上

下,两个孩子一大一小,大的八九岁,小的七八岁。三个人哭成了一团;十分凄惨。李景沆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太可怜了。他很想帮这母子三人找到“雕塑”的葬身之地。但是,看看他们母子三人无依无靠的可怜样,找到了“雕塑”又能怎么样呢?李景沆也陪上哭,还劝他们回家去算了。这个妇女坚决不回,一定要找到自己丈夫的葬身处。李景沆无奈,只好根据自己的记忆给这位妇女指了个方向,让她顺着自己指引的方向去寻找。因为当时“雕塑”是夹边沟农场第一个也是当时惟一死去的右派,李景沆便对她说,那里有个坟头,找见了,那必定就是。顺着李景沆指示的方向,妇女拉着她的一双儿女,哭泣着离开了木工房。他们没有再回头,李景沆也没有再见到他们。看着他们母子三人的背影,李景沆自问:下一个悲剧不知落到谁家?果然,以后每隔半个月,就有死人的事情发生。这个时期的死者,还能享受到一口杨木棺材“厚葬”的待遇。棺材用的是两厘米厚的板皮,用铁钉一钉,做起来很快。大约到了1959年初,死的人开始多起来以后,薄板棺材就没有了,改成茭草编成的草篮子,两米多长,一米多宽,把尸体放到篮子上就抬埋了。

饥饿笼罩着整个农场,死亡威胁着每一个劳教人员。自从来到夹边沟农场,每天只是劳动、劳动,干活、干活。李景沆还在想象,劳动教养,应该有学习提高,改造思想,集中起来念个报纸也算数。开始不组织,劳动一段以后应该组织,但是却没有组织。学习没有,娱乐却有。对一群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类似囚犯的劳教人员来说,组织文娱活动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一场恶作剧。每一个人都是在苟延残喘,勉强拖延一口快断了的气,谁有精神去娱乐?但场方还是要定时安排,场方对劳教人员的要求是:不能说生活不好,要说生活好,能吃饱。文娱活动每一个人都必须参加,不得缺场。李景沆们被告知,这样做的理

由是活跃劳教生活。有一天,作业站安排看电影。电影开映之后,有些人就悄悄溜走了,他们熬不住,太疲乏,回房间睡觉去了。他们敢于钻这个空子,是因为管教干部也疲乏了,这时候往往看管较松,溜也就溜了。李景沆不敢,他一贯是各种场规的模范执行者。抱李景沆这种态度的人是多数,多数人是守规矩的,不敢开溜。电影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劳教人员的极度疲乏,再精彩也无济于事。开映几分钟,就听见有人打鼾。不一会儿,全场观众就都东倒西歪,就地卧倒,鼾声与电影伴音混到一起,根本听不清说些什么。这是戈壁滩农场中一道特有的风景:你放你的电影,我睡我的觉。电影不放是不对的,因为要活跃劳教人员的文化生活,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电影是个很重要的手段,怎能不放?劳教人员不去看也是不允许的。试想,如果上级刚好派人来检查,看劳教人员的文化生活是否丰富多彩,电影场没有人,怎么交待?至于开演之后阻止劳教人员们睡觉,那就很难办了,你把他喊醒,他又接着睡,那么多人同时睡,你喊谁?拽谁?场方无奈,只好任他们去睡,由他们鼾声如雷。

一阵凉风吹过,李景沆打了个寒颤,惊醒了。戈壁滩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再热,晚上也是凉飕飕的,他往银幕上扫了一眼,银幕上的画面牢牢吸引住了他的目光。原来,这天晚上的电影是国产故事片《祝福》,鲁四老爷家正在过大年,放鞭炮,点焰火,祥林嫂正兴冲冲地端着一盘肥肉去为鲁家先人供奉。李景沆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他想到在家过年时的丰盛的年夜饭,特别是那红中透黑的油亮亮的大块红烧肉,心里就像猫儿抓挠一般。李景沆在心里暗自念叨:今生今世,这样香喷喷的肉食怕是再也见不到了。想着想着,李景沆又睡着了,直到电影结束,才东摇西摆回到宿舍。

还有一次娱乐活动是晚间跳交谊舞,当然是露天舞

会。交谊舞应该是男女搭配,但新添墩作业站上千号劳教人员,几乎都是男性,只好是男男搭配。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搭配,大家也不懂什么男女舞步的章法,只是一个拽上一个胡乱地走。交谊舞应有适当照明,夹边沟的舞会却是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夹边沟的气候十分干燥,常年降水量的平均值也就是一百多毫米,赶不上陇南、陇东一场雨,而蒸发量却大得可怕,超过两千毫米。场地是干焦的黄土,不要说几百人蹦跳,就是有一个人走过去,都要随脚带起一股灰尘。走上几步,你自己带起的尘土就能沾满自己的裤角。几百人在一个黄土场子上蹦跳的结果是,大片烟尘腾空而起,遮天盖地,超过了今天北方人们在春季看到的沙尘暴,呛得人出不来气。李景沆没有什么音乐天赋,除了曾在教堂与教友们唱过赞美诗外,他对音乐一窍不通,因此对大喇叭里播放出的欢快的音乐,他从心里共鸣不起来。站在飞扬的尘土中,李景沆啼笑皆非。作为夹边沟农场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方法和成绩,在报给上级部门的材料上就会堂而皇之地写上右派分子劳动之余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的内容:他们曾经跳起欢快的交谊舞。而实际情况是:他们在经过整整一天的劳动,已精疲力尽,十分渴望躺下休息的时候,却被迫经历了一场自己制造的连气都出不来的“沙尘暴”的袭击。他们虽然极不愿意,然而却身不由己。

这年秋天的另外一场“音乐”晚会,却在李景沆的脑海里也留下了永久的记忆。秋天的酒泉,到处瓜果飘香。入夜,月亮高高地挂在半空,没有云,没有风,是个月明星稀的好天气。坐在农场上等待“音乐”会开始的空隙时间,李景沆不由想到了他从小就熟读的李白的那首《静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以前虽然读过多次,但读了就完了,从来也没有今天的感受,真叫人体味不尽。莫非李白老先生知道一千多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夹边沟农场?夹边沟农场会有两三千名背井离乡的劳教右派分子?劳教分子每天都受着骨肉分离的煎熬。出了家就会想家,出了家遇到不幸更想家,这是人生中一个永恒的话题,真是割不断,理还乱。李景沆太思念他的骨肉了。

二胡拉响了,曲调哀怨,慢慢地,有一种刺破苍穹和割裂地壳的力量,还能穿透人的心,又仿佛在诉说他难过的往事。乐曲中每一个音节都是对李景沆思乡情怀的推波助澜。李景沆从来没有“进入”过音乐,他想不到今晚的这首曲子对他会有这么强烈的感染。他是在多年以后才晓得,这首二胡独奏曲叫《二泉映月》。受到《静夜思》和《二泉映月》的双重感染,李景沆的思绪跃过千山万壑回到了天水东关的古风巷。年迈的爹娘不知道如今是否还好?妻子已到产期,不知这个苦命的孩子是男是女?孩子当中,他最疼爱的是他的小女儿绿竹,那个天真烂漫的小绿竹!这个时期的家中来信不多。即使写信,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家人跟他一样清楚,因为这个时期劳教人员的所有来往信件内容都要经过场方的检查。闹不好,搞个什么反动言论,给你罪加一等,是很可能的。报喜没有喜,有忧不能报,写几句不着边际的空话,对家中发生的事情是了解不到的。实际上,在这一时期,他的妻子赵立珍生下了他们的三儿子晓平,因为无力抚养已经送人了。晓平的生命保住了,没有被饿死,这是晓平不幸中的大幸。但晓平从此割断了与生身父母的联系。晓平还能原谅他的生身父母吗?活下来的李景沆认为自己对不起儿子,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一直到八十多岁时他还是这么想。可李景沆怎么尽这个责任呢?等他回去以后再尽,孩子早就没命了!这一切,家里一直瞒着李景沆。不告诉李景沆,是赵立

珍为李景沆着想，她不想为李景沆的劳教生活雪上加霜，她宁可一人承担本应由夫妇共同承担的良心上的重压！中国的贤妻良母，为了丈夫，献出了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惜，何况一个良心上的重压！与此同时，他们的小女儿绿竹正在病中，而且日渐消瘦，加上困苦的生活，无钱治病，小绿竹即将走到她生命的尽头。这一切，李景沆是一无所知的。明亮的月光和悦耳的二胡演奏声非常有利于他的遐想，是全家平安的遐想。这是李景沆到达夹边沟农场以后一次真正的文娱生活。事后，他也有想不通的地方：那个二胡演奏者也是一名劳教的右派，为什么给他提供一个表演的机会？那天晚上，全场看不见一个睡觉的人，大家都折服了，这不是让大家都去佩服一名右派吗？想来想去，他也坚信，什么东西，好就是好。你说它不好，最终也不影响它好，硬要诋毁它；它反而会更显得光彩夺目。是金子总要发光的。

秋去冬来，农场的环境犹如戈壁滩的天气，越来越恶劣。

按劳教农场规定，冬天到来之前，应该给劳教人员发一套棉衣、棉帽。新添墩的劳教人员却被告知：要棉衣、棉帽的，就发给你们；有些人已经预备下了这些御寒冬衣，再发一套也没有什么必要，就折算成钱发给你们。李景沆们斟酌，寒衣我们已经有了，发上几个钱，买个信封、信纸，吸烟者买个香烟等更合算些。再者说，大家都几乎要饿疯了，对他们来说，吃和穿虽然都必不可少，两相比较，穿还能凑和一下，毕竟从家里带了些御寒的东西。吃就不行了，这是一天一顿都不能凑和的事情。每当走过小卖部，谁都要把那些被称为“点心”的黑疙瘩瞅上几眼，淌几滴涎水。黑疙瘩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果果腹还是可以的。李景沆们希望能用御寒衣服折算的钱换取一点食物以度过灾难。他们纷纷向场方表示：不要棉衣，要钱。

过了一个月，劳教人员们去要钱，却遭到一顿训斥：“你们急什么？”又过了一个月，严寒的冬日快要过去了，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的劳教人员们再一次提出讨要他们应该得到的这一份御寒棉衣钱时，受到的训斥更加严厉。看看管教人员那怒目圆睁的严厉表情，李景沆最先死了心。他想，这个钱是注定要不上的，命里注定就该用这些钱去“补贴”那些管教人员，不会有人来检查这笔棉衣款的着落。即使有人来查，那也无人敢说。谁让你们自己表示不要棉衣呢？就跟河里的鱼上了渔人的钩，只为嘴馋，悔之晚矣。每遇不顺心的事，总是最先自认倒霉，也是最先取得心理平衡，这成了李景沆的“优势”，这种思维方式帮了李景沆的大忙，任何艰难险阻面前，他总能调整成一个平心静气的心态。同那些命丧夹边沟的性情刚烈者相比，李景沆作这样的自我调整是值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他自己救了自己的命，但他不这么认为。直到晚年，李景沆更加相信，是上帝保佑了他。

粮票在那个年代跟钱一样宝贵，有时比钱显得更重要。上街买食品，要同时支付钱和粮票。粮票分两种，全国通用和全省或直辖市通用，但粮票不能流通，不准交换，属无价证券，管理非常严格。粮票是国家配发给有城市户口的公民的，叫吃商品粮者，农民没有这个待遇。在享受商品粮的公民群体中，又有详细的类别和不同的标准。在甘肃，分特重体力劳动、重体力劳动、轻体力劳动、脑力劳动、无职业城市居民、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少年、儿童等十个大项，每个大项又分几等。如特重体力劳动者中，又分为“特一”、“特二”、“特三”，即特重体力劳动一级、特重体力劳动二级和特重体力劳动三级。“特一”为每月定量五十四斤，“特二”为五十二斤，“特三”为五十斤。往下算，逐级减少，无业城市居民为二十七斤，少年和儿童要更少一些。这就是计划，制定计划的人肯定自认为他们自

已是聪明绝顶的,是最讲科学的,最实事求是的。“计划”不考虑、不愿意承认人和人的区别。粮食越来越紧缺,不准流通的粮票在黑市上大量流通。这种现象在夹边沟劳教人员当中也开始出现。新添墩周围农民拿上他们生产的鸡蛋、土豆等农副产品悄悄来到农场小卖部,与有粮票的劳教人员展开讨价还价的交换。劳教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粮票夹边沟都有,农民最喜欢的是全国通用粮票,因为通用粮票全国各地都可以用。这个时期,夹边沟周围农村的农民也大批逃荒到新疆,有的举家西迁,有的一家走几口,走的人到新疆求生,省下一口好让家中老小度饥荒。如能换得几斤全国通用粮票,寄往新疆,也能解一解逃难者的燃眉之急。没有全国通用的,接下来比较“吃香”的就是甘肃的,依次是新疆的、陕西的、内蒙古的、河南的,最不值钱的是沿海的。虽然粮票的交易是违反国家规定的,那是无价证券,不能用作交换,但为了活命,这种“地下”交易屡禁不止。

大量粮票黑市交换的动向引起了农场领导的注意,农场决定对劳教人员采取措施,解决这个“严重的违法问题”。开始是动员,动员大家把来时从家里带的粮票交出来。但是没有效果,劳教人员已经在与农民的交流中吃到了鸡蛋和土豆,那是救命的土豆、救命的鸡蛋,不能轻易往外交。再说了,粮票票面的面积很小,纸又薄,极易保存,随便放个地方,旁人很难发现。基于这两个原因,任凭你怎么动员,劳教人员们就是不交。

等到又发现了两起粮票换鸡蛋的事件之后,队上进行了一次紧急集合,场领导向大家宣布:由于一些劳教人员不听劝阻,坚持拿粮票换鸡蛋,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粮食政策,也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不利于劳教人员的改造。为了维护国家粮食政策的严肃性,制止破坏国家粮食政策行为的继续发生,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的

发展,要对全体劳教人员进行搜查。每一个人的所有口袋都要搜查一遍。然后是衣箱和提包。搜查工作进行得非常仔细,搜查人员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有人放到衬衣口袋里的纸片被捏了半天,勒令取出后,原来珍藏的是亲人的照片。有人穿的鞋有些异样,也被喝令脱下来进行检查。李景沆很坦然,也很庆幸。原因有两条:一是他从天水带来的五斤甘肃省地方粮票早已换成鸡蛋吃掉了;二是他的袖珍《圣经》既没有揣在身上,也没有放进皮箱和提包,而是放到铺下的草垫子中间了,是个万无一失的地方。那些被搜出粮票的劳教人员,不但粮票被没收,而且还遭到严厉的训斥,有的还遭到恐吓:这种行为足以导致劳教期限再延长两年!

管束越来越严,体能消耗大而营养补充少的不平衡使得人们的饥饿感日益加重,千方百计做一点可怜补充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但人非草木,人是有思维的高级动物,为了活下去,他们发挥出了超乎寻常的想像力。

1959年春节期间,新添墩作业站曾经杀过一头猪。人多肉少,分到每个人身上,吃不了两口。骨头被扔进了垃圾堆,有人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春节过后,他们从垃圾堆里捡回这些骨头,然后三块砖头支起一个盆子,点了火熬汤喝。他们就是想活着,不要饿死,活着回家。为了与亲人团聚,为老人颐养天年,为把孩子抚养成人,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巨大力量支撑着每一个人,使他们在没有继续活下去的饮食条件下千方百计地活下去。垃圾堆里捡骨头是很多措施中的一个小事例。

这个时期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吃馍时,有两种极端的吃法。一种是狼吞虎咽,又猛又急,可称为短跑式。打上饭,几步之内就解决问题了。这些人显得迫不急待,每口咬得太多,只在口腔内翻几下就下咽。下咽一次就使劲伸长一次脖颈。人一瘦,就显得脖子长,再使劲一伸,活像

一只呆头鹅。这些人的理论是：就那么一点东西，反正是个吃不饱，咽下去慢慢消化吧。还有一种吃法是细嚼慢咽，也可称为马拉松式。他们拿到馍后并不急于吃，而是把馍拿回房，坐在自己的床铺上，把馍放在眼前，看一看，然后再拿起来上下左右端详一番，像一位收藏家在鉴定一件古玩，又像一位文物工作者研究一件新发现的文物。欣赏完之后再拿出小刀，小心翼翼地切成小薄片，慢慢地一片一片往嘴里送，从两唇开始，让口腔中的硬腭、软腭、两侧、下膛、舌尖、舌面、舌根都能充分感受到馍馍的滋味。这时候，唾腺的作用发挥很充分，唾液分泌旺盛，加上咀嚼的时间又长，口腔就把胃的一部分功能代替了。在唾液中的酶的作用下，部分淀粉分解为糖，能感受到淡淡的甜味。这部分人说，这才叫吃，才能将有限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前一部分人是两分钟解决问题，后一部分人往往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能结束他们的马拉松吃法。李景沆的吃饭方式不同于以上两种中的任何一种。他的吃饭方式是中间状态派，不紧也不慢，尽力体现出一种温文尔雅，与平日里待人接物的温柔和谦卑相协调。

夏天，西瓜上市了。上次搜身、搜包只没收粮票，并未没收钱，劳教人员们各自都有多少不等的零用钱可以买瓜吃。但他们的钱都不宽裕，可用作买瓜的更是微乎其微。现在的人吃西瓜是消暑解渴，当年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吃西瓜是为了补充营养。他们有他们的吃法，完全不同于平常人。首先一个原则，不能切成块。原因是，只要切，刀上就要沾上西瓜水，这些西瓜水无法吃到嘴里，是一种浪费。切的时候，瓜瓤与刀刃接触的地方，刀刃过处，又有一点西瓜水要随着刀的走动流到外边，这些流出的瓜水也无法吃到嘴里，又是一种浪费。右派们的吃法是，先在西瓜表面随便选一个位置，用小刀子旋开一个鸡蛋大小的圆锥形小洞，取出这个连在一起的圆锥体。先把小

刀子上的西瓜水吮吸干净,然后解决这个圆锥体,最后才进入正式的吃瓜程序。吃的时候是用一把小勺,挖一勺吃一口,慢慢咀嚼和下咽。遇有瓜子的时候,要把瓜子全部噓完,才再吃下一勺。这是一滴瓜水和一个瓜子都不浪费的吃法,在夹边沟农场极为流行。李景沆在夹边沟两年多时间,经历了1958年、1959年和1960年三个年度的夏秋,他没有见到过第二种吃西瓜的方式。当然,他自己也是这么吃的。跟别人一样,他把红瓜瓤和花瓜皮中间的那一部分发硬的非皮非瓤的东西,也要刮得一千二净填到肚子里,剩下的只是一个薄薄的壳子。到了1960年,连瓜皮也不剩了,都要吃下肚。但是到了1960年的时候,要找到一个西瓜已十分不易了。

在新添墩作业站劳教期间,李景沆的接触面不是很宽,加上时代久远,距离当年已快半个世纪了,他又是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他能回忆起的具体人的事情也不多了。除了前面说过的“雕塑”、“黑人”之外,他还对傅作恭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傅作恭与他不在同一个生产单位,但他们有过多次接触。大约是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的那个寒冷的冬季,李景沆和他的木工组的成员沿河渠到地里去修农具,这是木工组人员提出的“服务到工地”的口号的具体实施。傅作恭所在的小队这天的劳动是搬冰。三九天,河沟里结了很厚的冰。劳教人员下到沟里,把冰打烂,砸成一块一块不规则形冰块,然后把这些冰块抬到地里,等待天气暖和些,冰化成水,起一个浇地的作用。据说,这种劳民伤财、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办法并非夹边沟的创造。早些时候,兰州白塔山上造林时,也采用过这种办法。那个年代,黄河兰州段每年冬天都结厚厚的冰。对干涸的土地来讲,这种搬冰工作是杯水车薪,不会起太大的作用,不可能换取来年的五谷丰登。但不起作用也不能叫你闲着。这是愚公移山精神,这种挖山不止的精神会最终

感动上帝，任何过去认为办不成的事情都能办成。可谓“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可是，想到的人并不在三九严寒中亲自去做，而亲自去做的人又是明知不可为但又必须得为之。这是一种典型的播撒辛酸、收获辛苦的劳动。这种劳动在大跃进的中国到处都有，据说甘肃是为害最烈的省份之一。傅作恭身材魁梧，李景沆老远就发现他了。只见傅作恭呆呆地站在冰上，一动不动。别的人有的在河上砸，有的往地里搬，也有两个人往地里抬的。傅作恭却长久地站着不动。趁着修农具的工夫，李景沆问了问他的伙伴，傅作恭为什么站着不动。伙伴告诉李景沆，傅作恭不干活已经有些日子了。你批评他，他站着；你不批评他，他也站着。你骂他，他挨着。你打他，他也挨着。他不还手，但也不干活，他就说自己干不动。李景沆走近看了看，傅作恭拄着一根棍子，微闭双眼，脸色已经很差，看样子是有了病，或者是过于饥饿。实际上，那时候的很多劳教人员是病饿交加，病与饿互为因果，恶性循环。李景沆在心里念叨：难道又是一个“雕塑”？果然，不久以后，傅作恭在一次背草袋子的劳动中去世了。前面已说过，草袋子是长满草根的泥土块，很重。傅作恭使用的工具是芨芨草编成的背篓，把草袋子装进背篓搬到烧草肥的地方，为来年春耕备底肥。傅作恭说他腿软没劲，寸步难行，依旧是站着不动。管教干部赵来苟就叫别的劳教人员用芨芨草绳拴到傅作恭的脖子上，前后各让一个人拽着，让傅作恭继续背上草袋子走。傅作恭不走，就让前边的人往前拽；傅作恭跪下了，就让后边的人把傅作恭提起来继续走。三天之后，傅作恭就永远躺倒在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了。傅作恭是在国外定居多年的水利专家。解放初期，邓宝珊出任甘肃省主席以后，立志大修水利工程，给他的老朋友、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写信求援，傅作义又写信反复动员已在国外定居的弟弟

傅作恭回国效力，支援甘肃。不想一场反右斗争将傅作恭划为极右分子，在饱尝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以后，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与傅作恭不同，文大兴是在他劳动特别卖劲，表现相当突出的时候去世的。文大兴是李景沆的学弟，也是西北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学的是生物专业，教的却是俄语，比李景沆小五六岁，毕业后在秦安中学任教。文大兴到夹边沟时，三十刚出头，身强力壮，血气方刚。文大兴干活不惜力气，挖排碱沟时，他跳到碱水中，不停地一锹一锹往上撂泥。他撂得比别人快，每一锹铲的泥也比别人多。挖草堡子，他不是挖得最快的，但能看出来，他是最卖力的。因为是同学关系，李景沆又长他几岁，文大兴对这位学长非常尊重，心里话也愿意对李景沆唠一唠。文大兴出身贫寒，父母亲为供他上学，吃尽了苦头。工作不久，父母亲又为他操办着成了家，文大兴也很快有了孩子。如果没有“反右”斗争，文大兴一家三代，生活虽不能算宽裕，但也衣食无忧，媳妇孝敬公婆、尊老爱幼，一家人热热闹闹，小日子也还红火。但是，自从文大兴被送到夹边沟，父母亲已经急出了病，一家负担都落在妻子一人身上。文大兴相信场方的宣传：劳动表现好的，可能不需要两年时间，有一年多就可以回去了。文大兴是豁出性命向领导表现的，他自认为年轻身体好，多出点力气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早一天回去就行。作为生物系毕业生的文大兴恰恰忽略或者说他不愿正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便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能量都是有极限的。超过了极限，构成一个生物的各个系统就要出问题的。比如一辆设计载重为五吨的汽车，你硬要给它装上十吨货物在公路上急驶，不是压断承重钢板，就是扭断传动轴，或压爆轮胎。有一个阶段，文大兴经常在夜里睡觉时猛然惊醒，十分痛苦地呻吟好长时间，久久不能入睡。这是身体严重受损的征兆。文

大兴依然不正视这个危险的信号，他还是拼命地干活，拼命地表现，幻想着用他的良好表现换取一个早日回到秦安家乡的机会。嗷嗷待哺的孩子等着他，病中的爹娘等着他，贤惠的妻子盼着他。不管每天夜间浑身怎么疼痛难忍，文大兴始终不改初衷。有一天晚上，像一辆超载行驶的卡车戛然扭断了传动轴，文大兴的心脏骤然停止了跳动。早上起床时，看到他纹丝不动，同伴们喊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反映，拉开被子一看，文大兴早已停止呼吸。李景沆认为，小伙子是被活活累死的。李景沆想到了传说中的“汗血宝马”。据说这种马奔跑起来如同离弦之箭，既快又有耐力，只要作战不停，它就奔跑不止。跑累了，浑身出汗，汗呈鲜红色，因此称为“汗血宝马”，出了血汗还要继续狂奔，直到累死才躺下。文大兴，一匹烈性的汗血宝马！李景沆很后怕，如果自己不到木工组去，首先累死的不应该是这匹汗血宝马，而毫无疑问应该是他李景沆。

文大兴死后，以兰州大学一帮教师为首的劳教人员进行过一次集体请愿。他们抗议，劳教农场每天安排的劳动时间太长，每天从早到晚长达十一个小时，中午也不准休息。有时候晚上还安排深翻土地，劳动强度太大，即使以前从事体力劳动的身强力壮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过去很少参加劳动的知识分子。长此以往，文大兴的结局就是他们的结局。他们了解到，同一时期的其他劳改农场的劳改犯人也并没有像夹边沟的劳教人员这样大的劳动强度和每天这么长的劳动时间，生活上也按国家规定安排，不像夹边沟的管教人员这样随意，想增加多少劳动时间就增加多少，想搜身就搜身，想查包就查包，没有什么章法，不如到劳改队去。他们强烈要求，不住夹边沟，要进劳改队。新添墩作业站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全站劳教人员大会，会上管教人员把他们训斥了一个多钟头。听起来是在训斥请愿者，实际上也是说给大家伙儿听。管教干部说：

想到劳改队,想不想到省城?到北京?由你们说了算吗?你们是干啥的?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你们趁我们党整风之机,对党发起恶毒的进攻,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你们犯下了滔天罪行,就得好好在这里改造!闹什么,还想上天呀!想造反?老实告诉你们,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认识你们,解放军的枪不认识你们,解放军的武器大炮是吃素的?美帝国主义都不在话下,还怕你们几个右派?我们要看谁是带头人,究竟想干什么?这件事不能算完,等着,等查出来以后……

这次大会以后,请愿事件彻底平息,甚至敢于再提一提这件事的人也没有。有一天,作业站领导通知李景沆,要他到夹边沟农场的场部木工组,去协助完成一项紧急任务。紧急任务,说走就走。李景沆被安排在一辆拉货的卡车上,上车后管教干部让他爬到货顶上,黄昏时开到了夹边沟。李景沆一下车就听到有几个人在喊“李老师,李老师”。这几个人一面喊,一面走近李景沆。这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看不清是什么人。等到这几个人走到他跟前以后,才看清了面孔,原来是天水市的几位小学教师,都是划为右派以后被送到夹边沟劳教的。天水老乡,当右派之前大家也都接触过,小学教师们也都很佩服李景沆的学问,大家对他都十分尊重。长久不见了,免不了寒暄一番,然后是问长问短。谁知刚说几句话,哨声响了。原来是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晚间集合的时间到了,小学教师们只得离他而去。临走,一个教师给李景沆手中塞了一个圆蛋蛋,李景沆还没有回过神来,那个教师就已经走了。借着昏暗的星光和手掌的触觉,李景沆知道他手中的这个圆蛋蛋原来是酒泉当地产的一种叫酸梨的土梨,酸梨由于酸而小,口感不好,产量又低,当地种的也不是很多,后来都被淘汰了,被名扬全国的锦丰梨、早酥梨所代替。但在饥荒时期,只要稍能占据一点胃里长期空着的空间,再酸

涩苦辣都变得香甜万分。李景沅捏着这个酸蛋蛋想：这都是救命的东西呀，是不该送人的，小伙子怎么给了我？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塞到了我的手上了？我把人家是张三李四都没有认下来！真是罪过。李景沅吃下了这颗梨，也同时就收下了这颗心，一颗年轻的、对师长充满崇敬之情的、火一般温暖的心。一股暖流顿时涌向全身，这是李景沅到夹边沟劳教农场一年多所感受到的最强烈的一次人间温情。这天晚上虽然加班干了不少活，但李景沅的心中却一直感到很温暖。

回到新添墩以后，李景沅回忆起来了，那一帮小学教师有七八个人，他们是刚毕业不久的高中学生，李景沅曾给他们代过数学课。为了发展基础教育，当时天水地方政府决定选一批优秀高中毕业生充实到各个小学校当老师，于是，有不少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放弃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报名参加了小教工作。参加工作不久，“反右”开始了，这一帮血气方刚的初生牛犊，以不怕虎的精神又一次响应了党的号召，真地扎扎实实帮助党整了一次风。他们不光给党提意见和建议，而且还相互商量，讨论提意见的内容和方式。于是，别的右派都是单个儿右派，他们这一伙儿被集体打成了“黄风集团”，成为有组织反党的集体右派被送到了夹边沟。为什么叫“黄风集团”？李景沅已经记不大清了。因为是与“胡风集团”只有一字之差，李景沅用联想记忆法记死了这个“黄风集团”。如果叫个别的什么集团，李景沅可能永远也回忆不起来了。现在又一次回忆这件事，李景沅还在为当天晚上的那颗酸梨感叹：那是个救命的东西，年轻人舍不得吃给了我，而他们自己显然比我更需要。

那七八个年轻人，后来统统都饿死在夹边沟和后来的高台明水农场了，一个也没有回到天水。尤其是一个名字叫王士其的后生死得更早更惨。他是在一次事故中丧

命的。有一天，他们那个小组去炸石头，结果碰到一个“哑炮”，导火索点着半天没有爆炸，大家都有些着急。王士其自告奋勇，说我去看一看，是不是导火索出了毛病。王士其顺着导火索一直查看到装炸药的炮眼位置，刚弯下腰想看个究竟时，炸药却突然爆炸了。王士其被抛到五六米之外，当下就咽了气。

另外一次外出执行任务，是到新添墩作业站西南不太远的一个农村去伐树。新添墩往西南，也就是往祁连山方向，那个村子的名称，李景沆已经回忆不起来了。领导上拿了一些钱和粮票向李景沆交待：这是六个人三天的伙食费和粮票，你把它千万拿好，不要给别人。李景沆答应：好。领导上又一次交待：这是六个人三天的伙食费和粮票，你把它千万拿好，不要给别人，你听清楚了吗？李景沆纳闷儿，一句同样意思的话，为什么要反复说？如果在课堂上用这个办法给学生讲课，那就要被学生轰下讲台了，真是罗唆。不想这时候领导上又对他做了第三遍交待。噢，李景沆明白了，这件事非同小可，是一个重大的、艰巨的任务。钱和粮票不能交给别人，是怕其他人不可靠，拿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或者拿上这些东西跑掉。

贪吃和逃跑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了，场方已是防不胜防。李景沆们那个木工组，原先是四个人，组长寇国英、副组长李生才、“黑人”王子善和李景沆本人。但到了派他伐树的时候，“黑人”已经失踪了。当然，如果“黑人”有幸逃出去，逃到他们那个山青水秀的鱼米之乡湖南，也许还能保存一条生命，这也是李景沆的愿望。李景沆常常为王子善祈求平安，虽然王子善并没有善待过李景沆。留下来的，受到死亡威胁越来越大。

那么，这次外派，领导上为什么相信我李景沆呢？经过分析比较，李景沆认为，从本人来讲，我是基督徒，不能说假话，行为不能骗人，要心地纯洁，是我永不改变的信

条。圣训说,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这样做将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将见到上帝。自从到夹边沟和新添墩作业站的那个时候起,我就是这么做的。领导上不知道我是遵从主的教训,我也不能告诉他们。他们怎么看我呢?他们可能是通过我的行为判定:我是最能画地为牢的愚笨懦弱之辈,不敢有非分之想,能靠得住。感谢上帝,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承认了我的纯洁。我肯定不越雷池一步,你让我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的。

带上其余五个人南行,好像是长久关押的犯人被放了风,李景沆心中一阵轻松。来到了一处有水面的地方,几只绵羊悠闲地在水边啃草,一只苍鹭在天空盘旋。李景沆从北向南望:天上是雪白的云朵,祁连山顶的皑皑白雪仿佛一道玉砌的长堤,下面是黛青色的山坡,再往下是东西望不到边,如一幅丹青长卷一般徐徐展开的酒泉绿洲,啃草的绵羊和盘旋的苍鹭倒映在水面。太美了,跟他以前看过的瑞士风光照片像极了,这是日内瓦?是苏黎世?天国大概就是这么美吧?李景沆真想把他此刻的感受告诉他同行的五个人,但他忍住了。他没有说,不能说。右派们之间,谁也不问别人的事,谁也不能告诉别人自己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因为当时时兴“给党交心”,你心里想啥,你听到别人说啥,给组织说出来,可以取得帮助和将功折罪或立功赎罪,这样做,或许意味着立大功受奖。可悲的是,一些人却往往因“交心”把自己交成了右派分子。能忍住气,什么话都不说的人,什么问题也没有。到夹边沟农场参加劳教的人员都从自身的教训中深谙此道,除了无关痛痒的话,涉及现实内容的话是万万说不得的。很多当下听起来什么问题都没有的话,经过有心人分析、解剖、断章取义、上纲上线以后,那就一定能成为“恶毒攻击”、“伺机反扑”、“不满现实”、“不甘心失败”等等十恶不赦的右派言论,甚至极右言论。

到了村上,找到了管教干部安排交待好的接头人,就开始伐树了。虽然是第一次伐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出发之前,寇国英组长已经向李景沆作了详细的交待,怎么下锯,怎么错茬,怎么选择放倒大树的方向,怎么预防突然崩开等等,一切按寇组长交待的规程走,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但到了伐树的村庄,看到当地农民的居室院落以后,李景沆走在路上时的那种心旷神怡的心境完全没有了。土墙院落,土墙泥顶房,睡的是土炕,里里外外一片灰黄。灰黄的颜色也覆盖在男女老少的脸上、手上和他们露在外面的脚踝骨上。不知是缺水还是人们没有洗洗涮涮的习惯,似乎个个都是蓬头垢面。家家土炕上只是一张破席,一堆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破毡片。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李景沆对天水农村比较熟悉,那里的色彩要比眼前的这个酒泉农村丰富得多,而这里却几乎全是一个颜色:灰黄。一片瓦都不见,一块砖也没有,他没有见过比这里更贫穷的村庄了。多么凄凉!他的心情又回到了在新添墩时的状态。

天黑了,几个人各自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李景沆独自一人蹲在一家农民的灶火门口,灶中灰烬还散发着微弱的热量,凑在那里,身上舒服些。突然,一个妇女神色慌张地破门而入,李景沆不知所措地稍稍离灶火门远了一些。只见这个妇女找了一根烧火棍,迅速扒开灶膛里的灰烬,拨出几颗烧熟的土豆。李景沆这才明白了这个妇女看见他伏在灶门口时那种惊诧的神色。土豆皮已经被火灰煨成了金黄色,熟土豆散发出的香味顷刻弥漫了整个屋子,土豆表面被烧得鼓起皮的地方就像充了气的气球。李景沆想,这些鼓起来的小包,触摸起来一定有一种又软又滑的感觉。就在这一刻,李景沆的涎水已经不能自控地流到了嘴角。李景沆咽下了这口唾沫。在饥饿的驱使下,第一次放弃尊严,放下了自己知识分子的架子,伸出了他那拿

惯三角尺和粉笔的手，用祈求的眼光望着这位妇女说：“大姐，给我一个吧！”农村妇女把李景沅看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无声地把盛土豆的衣襟伸到李景沅面前。李景沅毫不犹豫地捡了一个最大的土豆，用双手抱在怀中。在整个过程中，两个人都没有说一句话。

李景沅等到那位妇女走后，才开始慢慢地消受这颗珍贵的土豆。他先是迅速地钻进了被窝里，用被子把头蒙起来后才开始一点一点地“品尝”。这天晚上，李景沅是一个人睡了一个屋，他像真正的贼一样，把自己完全蜷缩在被子里边，采用“蚕食”而不是“鲸吞”的吃法，来对付这颗极不平凡的土豆。他要把享受土豆对口腔、食道、胃壁抚慰的时间尽量拉长。这正是：

饱腹休言饭不香，甘食从来在饥肠。

问余春光几时好，最教饿囚闻饭香。

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与李景沅有相似经历的人，叫张韬。张韬是个受康生、曹轶欧迫害的老干部。他被关押了七年零九个月，每天食不果腹。一天，偶然吃了一顿像样的饭后，写下了这首感触极深的诗句。如今回忆起这件事，李景沅仍然感动不已。那位素不相识的酒泉农村妇女，能在自己的家人们也快要饿倒的情况下，匀出一个土豆给自己吃，这不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简直是天使！耶稣说：“仁慈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获得仁慈。”这个天使给我以仁慈，是在替天行道。感谢仁慈的上帝！李景沅希望他有生之年能再回一次酒泉，再回一次夹边沟和新添墩，再去看望一次那位令他整个后半生都在感动的农村“天使”。

在夹边沟农场和新添墩作业站，劳教人员们都是凭票吃饭。饭票由大队直接发给劳教人员本人，有非常严格的登记签字手续。有一天，领上饭票之后，李景沅跟别的劳教人员一样，把自己那一份数了又数，本意都是看给自

已发够数没有。可是,李景沆发现,自己的这一份多出了二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在当时的环境,只会出现短缺而不可能多余。话说回来,手工活,又不是计算机,哪能那么准确?就是给谁多出那么几两,那个年头,只有傻瓜才会声张出来。拿上这多出的二两饭票,李景沆心中很不平静:按《圣经》所讲,这二两饭票是非分的东西,我要遵从上帝的教导,是不能拿的,是应该还给人家的。但是,既然已经发到了我的手中,会不会是上帝看到我快要饿得不行了,多出了这二两来挽救我的生命呢?犹豫之中,李景沆突然觉得心里很不安。李景沆又想,把这多余的二两吃掉,能补充多少营养呢?靠这二两饭票,能挽救我的生命吗?如果我把这二两饭票交出来,管教干部一看,呃,木工组的那个李景沆诚实、劳教态度端正、遵纪守法,有了这样良好的印象,给他“减刑”的可能不是没有。这样比起来,还是交出为好。于是,李景沆把这多余出来的二两饭票退还给了管教干部。

收到李景沆经历了复杂的思想斗争之后退回去的二两饭票,那个管饭票的管教人员却毫无表情,既没有不耐烦,也没有流露出丝毫赞许神色。李景沆沮丧地想,自己这次经过反复思想斗争以后才决定采取的重大“举措”,领导们并没有多大兴趣。他设想的交上去就如何如何的各种结局,只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二两饭票,在他李景沆手中重过千钧,但在管理饭票的管教干部手上,就是一张小纸片,轻于鸿毛。你不交,我还少麻烦。李景沆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

经过大约一年的劳动教养,到了1959年下半年,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中,再没有人像文大兴那样违心地去表现了。大家不是没有这个欲望,而是经过一年多的饥饿的煎熬,已经没有去表现的气力了。劳教人员们也对方说的表现好的可以提前解除劳教的许诺渐渐产生了

怀疑，过去那些确实表现好的，有的像文大兴那样累死了，有的累垮了身体，挣扎在死亡线上，已经朝不保夕。管教干部们也开始不再那么喊叫。到了干活的工地，你干多少算多少，评分已经完全停止。干部们也饿得不行了。吃饭时排成的“圆”也已不复存在，因为排队也得费力气，而力气几乎已经消耗殆尽。糊糊饭越来越稀，谁都知道排前排后打的饭都是一样多，大家也就不争了。挺着胸脯走路的人没有了，一下子增加了好多弯腰驼背者。人人都像掉了魂一般，低头不语，目的是尽量减少体力消耗。无论是新添墩，还是夹边沟，都进入了一个死气沉沉的时期。

有一次，队里给木工组交待了一项任务：到作业站灌溉系统的干渠和支渠上去检查维修水闸。李景沅们没精打采地出发了。他们沿着渠边走，走到了有水闸的地方就下去应付一下差事。大点儿的水闸都有人看守，看守人也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能不能完成开关水闸的任务，已经显得没有以前重要了，干部们也不再来验收。

又来到一处有水闸的地方。护堤上不见人。他们走到水闸跟前，才发现护坡上躺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的头枕着另外一个人的腰，李景沅们一边说一边走近他们二人，但这两个人连一点点动静也没有，让人搞不清这两具躯体还有没有生命。一个伙伴对李景沅说，是死人吧？李景沅有些害怕，停住了脚步。议论中，两个躺着的躯体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一个胆子大些的伙伴说，可能已经死了，但人死了应该有人埋嘛，咋能放到这里不管呢？说着，这个伙伴捡起一个小石子儿打向躺着的人身上。小石子儿刚好落到其中一个人的头上，这个人微微动了一下，抬起脖子把李景沅们看了一眼，他们这才看出是两个活人。但这两个活人对他们的无礼行为，一点表示都没有，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又原样躺下了，躺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始终都没有动一下。按理说，木工组的人应该关照一下这两个

人,询问一下还有没有回到宿舍去的力气,如果回不去,采取个什么方式帮他们一把。但木工组的李景沆们也处在自身难保之中,他们力不从心,只能多看几眼之后,再顺着渠边走向下一个水闸,去应付他们自己的事情。

再往后几个月,到1959年秋收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人干活了。长时间极端饥饿的情况下,人人都放弃了做人的任何尊严,什么事情都只剩下应付,包括穿衣,不冻就行,整洁不整洁根本没人再去管。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吃、吃、吃……

深秋了,渠里淌着秋灌的水。看闸人都是饿得走不动的瘦躯壳。修闸人举不动斧头、打不动凿子。就是修也是胡乱应付一下了事。水闸出事现象比以前频繁了。有一天,大队通知木工组说,有一处干渠的水闸挡板脱板,漏水严重,马上去抢修。这时的木工组只剩下寇国英、李生才、李景沆三个人了。李生才另有任务,剩下寇国英率领李景沆前往出事的水闸。来到现场一看,是个大水闸,宽三米,高两米。水闸进水一方的渠水最少有一米五深。水闸的挡水板是用三十厘米宽的木板一片紧挨一片地钉到升降柱上的。此刻钉在最下方的那片木板,在强大的水压下,一边已经脱落,另一边还连在升降柱上,张开一个大口子。进水方的渠水居高临下,通过这最底部的三十厘米缺口奔涌而出,卷出一米多高的浪花,还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有效的抢修办法应该是:人要下到出水一方沟底,把脱落的木板顶回去,再用钉子钉牢。已临近冬天,天气很冷,寇国英和李景沆是穿着棉衣过来的。李景沆寻思,就这样两副终日辘辘饥肠的皮包骨头的身躯,跳进接近零度的冷水,不但推不动挡板,反而会瞬间就被冻死或被水冲倒淹死。寇国英也显得无可奈何,两个人都对着眼前的情景愣住了。

水继续从那个漏开的挡板中往外猛冲,直接威胁着

开口对着的一侧护坡，这一侧护坡已经被明显地冲出一个坑，再过一阵，这侧护坡可能就会被冲开，大渠开口，那将是一起很严重的事故。

不修也不行啊，愣了一阵，寇国英说话了：“老李，脱衣服下呀，不下怎么办呢？”李景沆想，明摆着的事情，下去必死。但寇组长的话就是命令。命令已下，不下去看样子是拖不过去了。李景沆的心里难过极了，站着没有动。如果真的一跳，那就意味着这很有可能将是告别人生的一跳。他有可能从此就进了天国，但到底还有太多的割舍不下的感情，他的年迈的父母亲，温顺的贤妻，他的还没有见过面的小儿子，天真烂漫的小女儿小绿竹。基督徒李景沆无法战胜肉身的李景沆对亲人、对人生的深深牵挂，他仍然在站着发愣。

寇国英没有催促李景沆脱衣服，而是自己脱下了自己的棉衣，什么话也不说就“扑通”一声跳入水中。

水清澈极了，冰冷极了。护堤上的李景沆这才发现，寇国英往下跳的时候，是左手拿着几只铁钉，右手掂着一把斧头下去的。这是一个壮举，是一个英雄视死如归的、动人心魄的义举，过去只在电影中的战斗场面里才能看到的镜头。可惜，今天的观众只有李景沆一个人。李景沆已经“傻”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寇国英似乎不需要这个帮手，他前边的话，大概只是试探一下的意思，他断定，这个弱不禁风的书生没有这个胆量。好心肠的寇国英也晓得，不能让李景沆往下跳，水会把他冲倒，冰凉的水会把他冻死在渠里。

透过清澈的渠水和飞溅的水花，李景沆看到的是一个他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英雄壮举：寇国英先是抓住一边脱开的挡水板，使劲往升降柱上推，然后就抡起斧头往上钉钉子。水花溅到他的身上，脸上，溅得他无法睁开双眼，他是用手摸着，凭着经验和感觉在抡起斧头往下砸，一

枚，两枚……

钉完冲开的一边，寇国英又在没有冲开但有些松动的一边补了两个铁钉，然后直起身子，站在水中把右手中的斧头伸向护坡上的李景沆。刚刚回过神儿的李景沆通过斧头给寇国英助了一把力。寇国英上来了，他的腿在颤，手在颤，嘴唇变成了铁青色。这一刻，寇国英的手脚已经统统不听他的大脑指挥了。他的上下牙齿“嗒嗒嗒嗒”响个不停，想说也说不成了。李景沆噙着眼泪为全身发抖的寇组长措下了身子，穿上衣服。寇国英半天没有缓过劲儿，上下牙齿仍旧在“嗒嗒嗒嗒”响个不停。李景沆又脱掉自己的棉衣加到寇国英身上。寇国英想示意不要加，但他动弹不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寇国英的上下牙齿渐渐停止了打架，能说话了，他颤抖着说了一句：“唉，算是活过来了！”已经被冻得浑身发抖的李景沆听了寇组长这句话，顿时泪如雨下。李景沆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还在颤抖的寇组长还给他的棉衣，笨手笨脚地穿到自己身上。从这个时候起，寇国英在李景沆心中变得更加完美了：诚实、无私、勇敢、慈爱。往回走的路上，寇国英给李景沆说了许许多多的话。他们在一个木工组一年多了，寇国英从来没有像今天的话这么多。寇国英告诉李景沆：我是东北人，家住北大荒。北大荒知道吗？那里人烟稀少，一户人家到另一户人家往往有几十里地。旧社会时，火种很宝贵，特别是冬天，那时没有火柴，家里的火种常年不能让它灭掉的。有一次，家里的火灭了，爸爸让我到另一户人家去取火种。当时我十几岁了，是个很棒很棒的小伙儿。取上火种，天色已晚，“邻居”让我在他家过夜，一则夜路不好走，二则怕碰上狼虫什么的也不安全。但是，我想，家里人还等着用火，我身强力壮，什么也不怕，还是回去吧！我喂饱了马，驾起雪爬犁上了路，整整一夜，我是在雪爬犁上过的，天亮时才回到家中。父母又高兴又后怕，埋怨我不该

连夜回来。我自己倒是有什么也不在乎，反复安慰我的父母，没什么，放心，我怕什么？我身体好！

从身体说到家，从家想到大豆。呃老李，那首歌你知道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谁不知道这首歌？李景沆曾在这首歌的激励下，热血沸腾，立志抗日，报效祖国呢。但当时他年纪尚小，没有成行。李景沆随口回道：日本鬼子坏！寇国英说，是坏。但是，老李，我是给你说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一点儿不假。我去取火种那时，我家几间房子周围都是大豆，地上、院子里也都能捡上丢掉的大豆。地上豆子多了，不小心能把人滑一跤，我小时候走路不小心，经常被滑倒。可是现在，连一粒豆子也找不到啊。如果现在有上几捧大豆该多好，我们可以炒上吃，也可以煮上吃，直接在火上烧着吃也行呢。你把大豆擗到火上，只要听到“啪”的一声响，豆皮烧裂，立马就熟，最快不过。寇国英脸上掠过一丝苦笑，叹了口气后又接着说：唉，不要说几捧了，一捧，几粒，那怕是一粒也行。不要想了，想不来的！不过老李，今天的抢修，你看清了，真是不易，是拿着性命拼出来的。我不能叫你去，你下去就没你了，冲不走也得冻死到沟渠里。我比你身体好，雪地里能过夜的人，得我去。我也几乎送了命了。我自己不好说，你去了给大队长说一说，叫他今天给咱们增加一个馍吧，实在饿得受不了啊。

按理，李景沆回去说明情况，加一个馍馍是应该的。北方规矩，冷天下水是要吃肉喝酒的。吃饱了，再喝点酒，有些地方还用酒把身子擦一擦，热乎乎地下去，才能受得了。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也就不说了。跑水的事，紧急，来不及提要求，事后做一点弥补，都在情理之中。李景沆认为，这个要求多少还有点把握。

进到管教干部的办公室，寇国英两腿一软就跪倒在

管教干部面前了。李景沆详细说明了抢修的过程，最后提出了晚饭给他们增加一个馍的要求。管教干部很不耐烦地说，哪里有多余的馍？不给！李景沆淌着眼泪哀求：可以不给我，但是要给寇组长。这么冷的天，他跳到冰水里去钉挡板，你们去试试，啥滋味，他一个钟头都没有缓过来，都快回不来了。

一个五尺男儿，流着泪哀求，不是给自己，而是给别人。管教干部的心也软下来了。他们多给了一个馍，说清了是给下了水的寇国英的。拿上馍，寇国英对李景沆说：咱俩吃。李景沆说：你吃，你吃，你下水了，冻坏了，快吃吧。寇国英变了脸说：你也吃，你非吃不成！说着，掰下一半硬塞给了李景沆。面对刚强而又善良的这个东北汉子，李景沆眼含热泪吃下了这块馍。一年多来，寇国英处处照顾李景沆。寇国英是从李景沆处处原谅王子善，对王子善以德报怨的行为上认识李景沆的人格，他经常对李景沆表示：老李你身体不好，你是好人，只要我在木工组当组长，只要咱们能在一起，我一定会把你照顾好。我们如果能活着出去的话，我还要到天水去看你。

1960年年初的一天，农场说第二天有一个全体劳教人员大会，说是要宣布一项国家有关大赦的决定。劳教人员当中立刻传开一股风：要大赦了！大战犯要大赦，小战犯也大赦，一般的劳改、劳教人员中表现好的，这次也要放出去一批。似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劳教人员都异常兴奋和激动。有人给李景沆说：老李，这次大赦本来没有你，后来听说又把你加上了。李景沆自己想，也许是个机会，但我不抱太大的希望。我的一生已经交给主了，主让我出去我就出去，主不让我出去我就不出去，我靠主不靠人，我以平静的心态看大赦。第二天就要开大会了，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有些人通宵没有睡，乱喊乱叫，跳舞，狂欢。有的人说，明天就要赦了！也有人说，不管我赦不赦，

曙光看到了,有奔头,有等头,有盼头了,有希望了。整整一夜,还是一个寒冬的夜,欢乐的气氛笼罩了新添墩,笼罩了夹边沟。

第二天,早饭之后就集合往会场走。在往常,开大会往会场走,是要排队的,而这一天却没有要求排队。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好像是去赴宴,去参加一次婚宴,大家的心中充满了希望。李景沆独自一人走向会场,受大家情绪感染的感染,他的心情也不错,这是他到夹边沟一年半时间以来少有的一次。他设想,今天的会场一定布置得很庄重,主席台上有毛主席像,主席台两侧红旗飘扬,台下用白石灰画了方格线,各大队按要求站到自己的方格里边去。但是,进入会场之后,却感到气氛不对。台子上只挂了两面旗,没有一点庆祝的气氛。台子上只放一个破烂的单桌,连桌布也没有铺。劳教人员们席地坐在台下,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开会。场长走上讲台,只宣布了中央对溥仪等几个大战犯实行大赦的决定,根本就没有提及夹边沟的事情。劳教人员们傻眼了,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我。一夜兴奋,临到开会前还在激动,这一阵儿却一下泄了气,软塌塌地坐在地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李景沆因为事先已经想好,一切交由上帝安排,所以他并没有什么泄气的感觉。很长时间不开会了,今天是个机会,他的天水一中的那几个同事不知今天能否见到?李景沆左顾右盼,在距离他两三米的地方看到了语文教师卢剑英。原先胖乎乎的卢剑英如今已是骨瘦如柴。这就是那在讲台上神采飞扬的卢剑英吗?卢剑英的语文课讲得很精彩,全天水地区都有名,教过的学生都很崇拜他。在他离开天水来到夹边沟之前,有一节“最后的语文课”。他告诉同学们,一个右派分子,已经没有资格继续站在这个讲台上了,但他舍不得这个讲台,舍不得同学们,因此他要以极其认真的精神讲完这最后一课。他要把他几十年

的知识财富一股脑儿留给同学们的那种深情，让这课堂上所有的学生都终生难忘，一些同学含着眼泪听完了他这“最后一课”。有个同学把惋惜、留恋和思念深深地埋到心底三十多年，一直等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在《天水日报》上发表文章，赞扬卢老师当年的“最后一课”。

李景沆很想与卢剑英打个招呼，但是正在开会，众目睽睽，没有办法私下里说话。况且，卢老师正低头干着他自己的事情。卢老师是利用开大会的机会，脱光了上衣在抓虱子。据说皇上身上也有三个御虱。但在夹边沟，虱子多得就邪乎了。夹边沟农场是个虱子富集区，数量多，色彩也多，李景沆曾经亲眼看到过有人一把就抓下二十多只虱子的奇观。当时的人们都知道，虱子共有三种颜色，寄生在身上的幼虱是灰白色的；长上几个月，变老的虱子就成了浅黄色；而寄生在头发和阴毛里边的则呈黑色。这种有短毛、头小，没有翅膀，腹部很大的寄生虫最是可恶，专找最穷、最饿、最瘦的人欺侮，吸食血液，繁衍后代。在贴身衬衣的针角缝上，母虱子能一串串一片片地产卵，通常被称为虱子的虱卵牢牢地粘在衬衣上，抠也抠不掉。摄氏三十六度半的体温，正符合孵化小虱子的温度要求。于是，虱子一代又一代，以几何级数繁殖泛滥，不分白天黑夜叮咬，给人带来极大的痛苦。消灭虱子，并非难事，常洗澡洗衣服，搞好个人卫生，虱子自然就没有了孳生的条件，但是，夹边沟的现状是，不光缺粮，什么都缺，没有洗衣的肥皂，更没有这个粉那个剂。没有洗澡的设施，到夹边沟两年多，谁也没有洗过澡，洗澡可能太奢侈了吧，没有人提起过这码子事，管教干部也没有。当然，管教干部们可以到酒泉城里去洗一下，那也只能偶尔去一下，还要趁工作之便。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劳教的人几乎连洗脸的力气都丧失了，更不要说洗澡。消灭虱子只能靠手工，捏、抓、挤、抠，提起衣服抖，但这只能解决部分问题，无法彻

底、干净地解决这些害人虫。只要太阳好，人们就在背风向阳处一溜排开，全部脱下衣服，一边晒太阳一边捉虱子、除虻子，这成了夹边沟农场的另一大景观。像今天这样利用开大会的机会捉一捉，大家也是见怪不怪。卢剑英还在低着头对付他的虱子，那一股全神贯注的认真劲儿，就跟当年在课堂上讲语文课时的投入差不多。李景沆看见，卢老师的脖子已经很细，脖子上的皮松软地往下耷拉着，这使他远远地看上去像一只火鸡；两边肩胛骨高高耸起，好像在两肩分别插了个三角尺；锁骨下是凹下去的深窝，骨头就像从身体外边安上去的一样。当年那个气宇轩昂、神采奕奕的卢老师完全不见了。李景沆心里一阵伤感，同时也很庆幸自己进了木工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免遭虱咬之苦。原因是，木工组有大量刨花、木屑，生火不愁。他们可以一边干活一边生上火，把衬衣放到开水中去煮沸，这样，不管是灰白虱、浅黄虱、黑虱、虻子，统统都被煮死煮熟。一旦发现有这种可恶的小动物，只要有一件能替换的衬衣、内裤，就每天都有条件烧煮，以解心头之恨。

直到大会开完，管教干部把话训完，他们各自返回自己的住处，李景沆也没有机会同卢剑英搭上话。没有想到，这一次错过竟使他从此永远失去了同卢剑英说话的机会。这是他见到卢剑英的最后一面！

大会结束，大家还是不用排队往回走。就在这次大会结束之前，场长还发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号召：劳教人员要以场为家。来时说说笑笑的气氛完全没有了，一个个垂头丧气，没精打采，一句话不说地往回走。从外表看，这些人已经完全成了一帮乞丐。他们大概有一两个月没有洗过脸了，厚厚的污垢已覆盖每一张脸，无法辨清他们每人原来是什么肤色。那个年代的衣服就是两个颜色：蓝色和黑色，可是穿在劳教分子们身上的衣服，蓝色已发黑，黑色已变灰，底色已经看不清，快成一样的灰色了。经历了

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挂破的、磨烂的衣裤变成了披在身上的破絮絮。死亡已近在眼前，直接威胁着每一个人，他们没有心思再顾什么尊严和脸面。李景沆一直在琢磨“以场为家”这四个字的含义。不光是李景沆，大家一声不吭，谁不思摸这“以场为家”的分量？什么是家？就是吃住一辈子的地方，是不离开的地方，是把自己的精力、年华统统都贡献出来消耗掉的地方！我出不去，我的妻子能来吗？我的父母能来吗？孩子们能来吗？我的一生在戈壁滩度过，我的家人也要在戈壁滩度过吗？妻子很爱我，她能来，但她来了孩子怎么办？老人怎么办？“以场为家”伤透了每一个劳教人员的心。李景沆已经得出结论，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到那个风景如画、物产丰富的北方小江南天水了！开会之前艳阳高照，暖融融的，还能晒太阳捉虱子，现在天空昏暗，阴风也吹起来了，太阳被乌云遮住了光芒。李景沆越想越泄气，两条腿有千斤重，使劲抬也抬不动。他前后左右一看，别人跟他也差不多。开会之前是走，而回去的路上则只能算是挪，他们用比平日两倍多的时间挪回到新添墩他们的住处。

1960年年初的这次大会是整个夹边沟农场的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劳教人员相信两年之后是可以回家的。如果表现得好，还可以缩短劳教时间。因此，来场初期，还出现过类似劳动竞赛那样的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因粮食不能保障，体力消耗过大，像文大兴那样拼命干的人已经“壮烈”掉了，“壮烈”掉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大家就疲塌下来了。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他们掐着指头算时间，从1958年6月份算起，到1960年5月，是两年时间。如果政府说话算数，再有四个月，他们就可以回家了。但是，关于劳教到期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人提，不但没有人提，现在又摆出一个“以场为家”，还有什么希望呢？他们全部死了心，彻底蔫了。

从1960年初开始,管教干部不喊了,也不叫了。一则是劳教人员明摆着干不动什么活儿了,他们奄奄一息,能保下命就不错了。二则是管教干部本身也在挨饿,他们自己也没有喊叫的力量了。进入1960年以后,死人的现象渐渐增多,李景沅所在木工组钉棺材的任务已取消。原因是死人太多,没有那么多的木头供做棺木用。再说,木工组四个人跑掉一个,剩下三个,他们有气无力,也干不动了。硬要叫他们干,那就拿馍来!没有馍,他们就没有力气,干不动。

在等待死亡的日子里,夹边沟农场及其所属新添墩作业站中发生的最多的事情是偷,不管是公家的还是劳教人员个人的,“该出手时就出手”,大到撬门扭锁,小到顺手牵羊拿一个胡萝卜,无论白天晚上,时时处处都在发案。有的是“不宜出手也出手”,那便是弱肉强食的抢劫。还有脸对脸的强夺,那是完全撕破脸皮以后的举动,而且此风愈演愈烈,越接近年底越频繁。这个时候,距离“人相食”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几乎与暗偷明抢同时风起的另外一股狂潮便是逃跑。谁都知道,“逃”是一步险棋,也有性命之忧,凶多吉少。一个右派身份,又是劳教分子,即使能逃出去,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安身立命呢?但是谁都明白,天天都在往外抬尸体,连棺材都来不及做,谁死掉都只能用茭草编成的笆子一裹就草草埋了。今天抬着埋别人,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与其在戈壁滩被埋掉,不如铤而走险,豁出去试试。铤而走险,险中还有一丝逃生的希望,而老老实实地守着,则只能是坐以待毙。

1960年9月中旬,李景沅们接到上级通知:包括新添墩在内的夹边沟农场的的所有劳教人员和管教干部,要在冬天到来之前全部迁到高台县明水河一带,为高台新场明年的农业生产做准备。和凤鸣了解到的情况要详细一些,她在《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一书中的记述是:酒

泉夹边沟一带的土地不仅十分贫瘠,而且盐碱太重,虽有排碱措施,却过于费力费时,成效太慢。1958年开始,随着国内政治形势不断向“左”的方向发展,劳教分子大量涌入,农场负担骤增。虽然劳教人员个个都非常卖力地劳动,都想争取一个早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早日回到人民行列的前景,终因土地条件太差,农场无法获得劳教人员自己养活自己的收成,全场收获只够全场人员吃三个月,这种困难处境在劳改系统都是绝无仅有的。作为劳教农场,其收成无法自给,还要上级调拨粮食以养活劳教人员,这使农场领导和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农场决定迁场到高台县,另外开辟一个天地,然后驱赶劳教人员拼命劳动,争取有个好收成,以便在粮食问题上取得自给。高台县新场址的土地都是黄土地,没有盐碱,于是领导们就主观地认为,前途一片光明。其实所谓明水河,只是一条宽十多米的沟,平时并无流水。有时上边下雨,也可能流下些水,那是一年一遇或几年一遇的事情。此前,国家曾从河南组织移民到这里开荒和安家落户。不知什么原因,这些移民后来全走光了,留下的还是一片荒野。

通知下来以后,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新添墩的劳教右派们更加恐慌。不管怎么说,新添墩、夹边沟总还有房子住。人都饿得走不动了,到高台的那个什么明水河,那里连房子都没有,我们这些人哪有力量去修房子?没有力量修房子怎么住?怎么熬过寒冷漫长的冬天?戈壁滩,寒风凛冽的严冬!一想到这里,李景沆就浑身打颤。

这个时期的木工组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组长寇国英已调往夹边沟农场木工组,说那里任务多,叫他过去充实那里的力量。新添墩只剩下李生才、李景沆二人。二人本不能成为“组”,但还叫组,而且撤掉李生才,任命李景沆为组长。这样,李景沆反过来又成为李生才的“领导”了。

李景沆和李生才接到了迁场前的第一个任务，是给管教干部做装东西的木箱。

刚开始做，李景沆非常尊重他的老领导李生才，两个人总是商量着干。有一天，管教干部催他们加紧干，越快越好。两人商量如何落实管教干部布置的这个任务时，李景沆提出，不管他，还是只在白天悠着干，量力而行，不要累垮了，夜晚不能加班。李生才不同意，说晚上还是要加班的，可在白天多磨一磨洋工，晚上加个班，这样才能领一个加班的馍。为了这个馍，晚上还是干。李景沆说，为仅仅多领一个馍加一个晚上的班得不偿失，多消耗的体力不是一个馍能补得上的。李生才说，不行，非加不可，就是要这个馍，就是要加班。于是，李景沆组长“温柔、谦卑”地顺从了他的前组长，整整加了一个晚上的班为干部做木箱。没有电灯，李生才拉锯，李景沆掌灯。掌灯也不轻松，因为灯要跟上锯口走，跟上刨刃走。李景沆快要饿昏了，随时有被魔鬼抓住后吞噬的幻觉。李生才几次想丢开手不干，拉一拉锯，停一停，推推刨子，缓缓气。但是为了领到那个加班馍，他还是坚持下来了，直到后半夜，他们才做成这只木箱。收拾完东西，关门时，东方已经发亮。两人抬上木箱来到管教干部宿舍。李景沆谦卑地弯腰向干部报告：干部，箱子做成了，完全按你们的要求做的，我俩整整加了一夜的班，给我们加一个馍吧！出乎他们俩意料的是管教干部却连头都没有抬就生硬地说：“什么馍？走！把馍给你们，我们吃啥去？把别人的馍给你们，把别人饿死，光叫你们俩活着？走走走，少罗唆”。

李生才伤心地哭了起来，站着没有动。干部们又把他俩训了一顿。李景沆眼看没有希望了，就拉着李生才往外走，边走边埋怨李生才，不该为了这个馍，一晚上折腾，体力也消耗了，馍也拿不上，冤枉透了，认倒霉吧，谁让我们命苦，谁让我们是右派分子，谁让我们自己愿意到这个鬼

地方来劳教呢？这一夜之后，李生才的身体大不如前，连走路都要大口喘气，后来干脆走不动了。可怜的李生才，最终也没有能够熬过随即到来的那个漫长的冬天，他永远地躺下了。

天气渐冷，严寒的冬天转眼就来，气温骤然下降。夜里一场小雪过后，枯黄的树枝变成了粗粗的白色的银条。电线也被裹上了厚厚的一层雪，成了弯弯的“抛物线”。枯草也是一片洁白。人们相互开口说话，嘴里吐出的是白色的雾气。冷气袭人。劳教人员在早饭之后又纷纷钻进各自的被窝，躺在被窝里等待午饭时间的到来，用这种方式，把体力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那个特定的时期和场合中劳教人员普遍采用的养身之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哨子响了，要紧急集合。劳教人员被集中到场院中，瑟瑟发抖着坐在冰冷的地上神情木然地听一位穿着厚军大衣的管教干部宣布“上级”的决定，管教干部说：“我们接到上级通知，为了进一步搞好春耕备耕工作，现在就要迁到高台县。我现在开始念名字，凡念到名字的，都是马上要去的，最后没有念到名字的病号先留下来。我叫到谁，谁就出来站到南边去。”李景沆心里直发毛，他生怕念到自己，好像念到自己，就要被立即执行枪决一样。他暗自在心里祈祷：主啊，千万不要让他把我叫上！但最后还是叫到他了，因为所有的劳教人员统统都念到了，李景沆当然不能例外。

汽车开进了新添墩后，劳教人员才被告知，行李要尽量精简，木箱不能带。上车时只拿随身穿的衣服。铺盖打成行李放下，有专人押送。李景沆接到通知，木工留下，押送行李，把自己的木工工具也要带上。迁场大约用了三四天时间，就连那些半死不活的病号都全部拉光了，剩下一个炊事员、两个管教干部和一个木工李景沆。什么时候

押送行李呢？李景沅不知道，他要等待通知。

无聊中，李景沅想，来到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已经两年多时间了，除刚来的一个月在地里挖过排碱沟和草堡子之外，就是木工房。出去修水闸和农具，总共也只有两次。新添墩是个什么样子？将来有朝一日如果我能够活着回去的话，家人问我，景沅，新添墩是个什么样子？我怎么告诉他们呢？趁着这个时间，我不妨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出了木工房，不远处就是一排排宿舍，那是住过劳教人员的。现在人去房空，一点响动也没有。李景沅走过去看了看，里边一片狼藉，烂草、烂衣服、烂鞋、烂袜子丢得满地都是，虽然门窗都打开着，但还是弥漫着一股扑鼻的霉味和臭气。这是人住的地方吗？这跟猪圈、牛棚、羊圈有多大区别？地狱可能就是这样的吧？一阵风吹来，窗子“哐啷”一声被风给关上了。窗户纸已被扯破，破纸在风中“哗啦啦”响，好像鬼在说：“老李，来，你来！”李景沅吓得拔腿就跑。跑了几步，他又停下了，明明是风吹动破窗户纸的声音，哪来的什么鬼，他笑自己太胆小。李景沅回头再看看这个地方，这是个什么地方？低矮，潮湿，不通风，昏暗，窗户纸黑不溜秋，破房子好像就要倒塌，鬼也看不上，如果我是鬼，我也不要这地方！

再往前，原集体宿舍的西北方向，孤零零地有一座小房，砖墙到顶，四周都有玻璃窗子，高高的，显得很漂亮。李景沅来到这座漂亮的房子跟前。在这里两年多，李景沅还不知道这里还有这么漂亮的房子。李景沅进去站了片刻，出去收拾了一抱柴，进房点了火——木工身上的火柴很现成。他坐在旁边烤了起来，直到浑身都热烘烘的了，他才起来，又往后站了站。

往南看，巍巍祁连，白雪皑皑，它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样子。即使到了三伏天，戈壁滩上的沙子已是摄氏六十多

度的时候，山顶上仍然是玉洁冰清的冰雪世界。千百年来，古老的祁连山见证了河西走廊上的一切，驼铃声里商队潮起潮落，历史的长河中大小王国旋生旋灭。这一切，亘古不变的巍巍祁连最明白，它看得一清二楚。李景沆遥问祁连：你曾见到过把全省两千多名知识分子集中到一起，驱使他们在毫无希望的土地上耕作，任他们一个一个地累死饿死的吗？祁连山回答李景沆的是无言的沉默，就像上帝在面对他的问题时也常常沉默不语一样。

往北看，一片坟墓。有旧坟、有新坟，新坟比旧坟多，全是前来参加劳教的右派分子的埋骨之处。劳教人员是抱着劳教两年就可以回家，就可能再工作，就可以全家团聚的愿望而来的。如今，他们已经永远长眠在祁连山下的这片荒凉戈壁，再也回不去了。有的坟头边放着一块砖，砖上刻着死者的姓名，大部分坟头却连这么一块砖都没有。是找不到砖头了，还是死的人太多了刻不及？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反正已经搞不清了，也没有人愿意去搞清这种事了。大家都在挨饿，都在想办法活命，现在又要迁场，谁有这个心思？李景沆还由坟头联想到了他的一位同时到夹边沟农场的同事，那个曾为在夹边沟死去的右派刻砖头的语文教师李绍桐。从1959年开始，李绍桐就从农业队调到了后勤组刻砖头，发挥他语文教师的一技之长，为死者在砖头上刻姓名。他的“砖雕”得到过场领导的肯定，但越到后来他的任务越重，身体越来越差，后来就刻不动了。李景沆这时也不知道李绍桐是死是活，他祈求上帝保佑李绍桐。李景沆想，这片坟墓中，每一座坟都连着一个家。他只见过“雕塑”的家属来找“雕塑”的坟墓，再没见过第二个家属来找过他们亲人的遗骨。是家属们还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已然亡故？鉴于这些人都是右派分子，是他们的家属跟他们划清了界限？不管怎么说，来到农场以前，他们都有一个完整的家。如今，饥饿和劳累

提前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父母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孩子失去了父亲！上帝啊，你为什么不能保佑他们呢？

往西看，白茫茫一片，千里冰封，望不到边际。李景沆想到了自己的人生之旅，前边不也是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吗。回顾过去的岁月，父亲如何挨饿，如何度过牢狱之灾，自己当初如何踌躇满志，又如何虔诚地信奉上帝，如何尽职尽责给学生们的教授数学，如何努力劳动以减轻对自己的处罚……却没有一段路走得顺利。前景叵测，人心叵测，现在已经无路可走，明天，高台不知又是什么样子，就像远方的白雪，茫茫一片。

李景沆孤独地站在那座漂亮的房子里，伤心地哭起来了。他哭的声音很大，能传到老远的地方。祁连山没有回应，北边的坟墓没有回应，冰雪覆盖的大地没有回应。哭完一阵，李景沆想，从几十年的经历看，自己的命运自己是没有办法把握的，一切还得遵从上帝的安排。主啊，请赐福给我吧，让我到高台也平安，然后平安回到天水。

祁连山下是兰新铁路线。没有喧嚣声时，在新添墩能隐约听到火车汽笛声。一声火车汽笛犹如一声长长的哀怨，把李景沆从祈祷中唤醒。时间不知过了多久，火已经只剩下余烬了，李景沆还是没有心思往回走，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把此时此刻的感受记下来。虽然他几十年来只钻研数学，并不把诗词歌赋放到心上，自己平时也没有多少这方面的兴趣。但数学符号无法记下他的感受，还得借助汉语词汇。不求精彩，但求真实。记下来，如果还能活着出去交给儿女，也好让他们了解一下，他们的父亲在夹边沟农场的这段难忘的但却不应忘记的岁月。

第二天，李景沆是带上他的袖珍本《圣经》爬上一辆装满东西的卡车离开新添墩的。这辆卡车上装满了劳教人员的行李、公文箱、劳动工具。车上的乘客只有两位，李景沆和一位管教干部。这辆车上的人和东西，是最后从新

添墩撤出的，留下的只有一片狼藉和死一般的沉寂。

在车轮带起的滚滚尘烟和剧烈的颠簸中，李景沆默默地祈祷：仁慈的主啊，保佑我和我的全家吧。阿门！

在酒泉火车站，管教干部交给李景沆两个馍，告诉他：这是你的晚饭。等火车一到，你和行李同时上车。李景沆听得十分真切，这两个馍是晚饭，可以算成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最后的晚餐”，比平时多了一倍，平时只是一个。那么多人不让押行李，只选择了我李景沆，现在又给我比平时多一倍的晚饭，这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和关照。这对忐忑不安、提心吊胆的李景沆来说，多少也是一点安慰。

李景沆坐在破烂不堪的酒泉火车站候车室里，等候着火车的到来。这时，耳边隐隐响起操练的口令声：“一二一，一二一……”这是什么声音？有部队吗？李景沆走出候车室一看，原来是一队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囚犯。管教人员虽然喊着口令，但囚犯们只是自顾自，愿怎么走就怎么走，谁也不按口令踏步子。李景沆再仔细一看，这些人似曾相识，就跟他自己在新添墩一起干活的那些劳教人员差不多。噢，是了，那不是我挖排碱沟时的队长吗？前边说过，在劳教农场，人员组织形式是“大队——队——小队”。大队长由管教干部担任，队长、小队长、组长都由劳教人员担任。这些劳教人员中产生的“干部”当然要选择听话、守规矩、能劳动、表现好的人担任。李景沆挖排碱沟时的队长就属于这一类。但后来他的身体垮了，领导不喜欢他，便把他撤了，听说他还干了些不守规矩的事。还有一个年轻人，在新添墩被批斗过多次，原因是偷了灶上的馍。第一次被抓，就开过一次全队大会。年轻人详细交待了自己的作案经过，他是从灶房门上端的一个小窗子中钻进去的，窗子又高又小，大家都暗自称赞年轻人的好功夫。说是批判，实则是一顿臭打：棍棒、皮带，抓住啥是啥，

直打得他翻来滚去，苦苦叫饶，管教人员方才住手。大家认为，这完全可以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谁知刚过两天，年轻人又故伎重演，这次是从另外一个窗子钻进灶房作的案，抓住后又批，又打。如此多次反复，不管你怎样防范，年轻人总能找到新的“切入点”；而且每次被抓之后，你打你的，我告饶我的；事过之后，照偷不误，只要能抓到手里、填到嘴里，便什么脸面都不顾。在夹边沟，这种人并不鲜见，“盛产”这种人也是夹边沟农场的一大特色。李景沆再端详一下喊口令的“公安”，他明白了，这个队伍就是新添墩作业站的“严管队”，大概是“严格管教小分队”的意思吧。就是说，这个队伍里的人员，不同于一般的劳教人员，他们是不守规矩、老惹麻烦的一帮。当然他们也不属于又犯了罪的那一部分，那部分以各种罪名“抗拒劳教”的人已移交检察机关了，等待他们的是判刑。“严管队”的人是劳教不老实，判刑却够不上。除了李景沆看到的挖排碱沟的原队长和钻灶房的窗子偷馍的年轻人之外，还有抢过东西的、逃跑后又被抓回来的、打了干部的、因不负责任造成各种事故的，等等，都进了“严管队”。“严管队”是1959年年初建立起来的，直到撤往高台时也没有取消，而且队伍还在逐步扩大。有些人是出去又进来的“二进宫”、“三进宫”。奇怪的是，就其中多数人而言，越“严”他们就表现越差，显示出恶性循环的态势，但场方为了扭转“场风”，一直坚持办“严管队”。前面说过，还在劳教人员中组织开展过一次“反偷盗、反逃跑、反违法乱纪”的“小三反”运动，但是“小三反”的结果也是越反犯规的人越多，反不胜反。

“李景沆——，李景沆——”李景沆正看着“严管队”的操练出神，不知谁在远处呼喊自己的名字，声音却很熟悉。李景沆回头一看，是王子善——那个被上帝挽救了灵魂的湖南“黑人”——李景沆木工组的老伙计。原来，王子

善正在另一列“严管队”的队列里站着接受严管。

王子善没有能够回到他的鱼米之乡？还是回去之后又被捉回？还是被湖南方面送回夹边沟？在当时都有可能。不管是什么可能，反正王子善还活着。看来上帝真真的在保佑着他。尽管“严管队”的日子不好过，活着总是好，感谢上帝！王子善很想凑过来与李景沆叙叙分别一年来的情况，但他无法离开队列，李景沆也无法走到王子善跟前。他们只好用眼神互相打招呼。然后，李景沆目送王子善渐渐走远，最后登上了一辆开往高台的汽车远去。李景沆看到，王子善是抹着眼泪登上汽车的，不知是对老伙计的留恋、对自己以往过失的内疚，还是对明天生活的担心与失望。不一会儿，所有“严管队”的劳教人员和大部分管教干部都乘汽车走光了。车站里一时间冷冷清清的，只剩下李景沆和另一名管教干部。

大约到晚上八点钟左右，计划装载行李的火车到站了。管教干部对李景沆和另外两个劳教人员交待说：你们现在上车押运行李。让你们到什么地方下就到什么地方下，行李和人一起下，上车吧。

车是铁皮闷罐子，有门无窗。塞上行李之后，李景沆爬上去找了一个平软的行李，能坐能靠能躺，宽敞自在，加上一天颠簸的疲劳，火车启动不久，他就入睡了。闷罐子的门一关，很严实，透不进来多少风。李景沆又裹着棉衣，躺在行李堆里，一点儿不冷。另外两人也各自找到舒适的地方躺下了，由于相互不认识，也就没有搭话。

李景沆这一觉睡得很香，火车是不是中间停过站，他一点儿都没有感觉。

不知道火车行驶了多少时间和路程，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火车停下了。“李景沆！下车！”随着一声喊叫，李景沆被惊醒，车门已经被打开。外边星光昏暗，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李景沆心想，什么鬼车站，照明灯也不开。然

后,他几乎就是本能地拉上行李往外拽。管教干部又喊:“你下车,你不要拿行李!”李景沆理解为“停车时间短,让我抓紧下车,可能有专人卸行李”。他急急忙忙来到车门口,站在门边找他上车时抓过的那根铁栏杆,才刚抓住,就又听见管教干部在喊:“快下!”李景沆赶紧把一只脚迈出车门,往下试探着找落脚的地方,不料身体重心已离开车体,一只手承受不了整个体重,掉了下去。车下没有站台,是一面斜坡。李景沆从坡顶滚到了坡底,他被摔得昏头昏脑,浑身酸疼。这时,他看到有几个人迅速摞下车上的行李。火车一声长鸣,又喘着粗气向东驶去。

李景沆抬头仰视了一下铁路路基,约有十来米高的一个斜坡,真可怕,哪里是什么车站?原来是半路上临时停车。早知道有这么高、这么陡的坡,借给我一个胆子我也不敢跳啊!李景沆活动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和双腿,都还能动。还好,没有太大的问题,感谢上帝。李景沆既伤心又庆幸:你们这些管教干部,怎么不说清楚呢,你们让我小心一点,我的安全有保证了,你们什么也不会损伤嘛。人啊人,良心哪里去了?李景沆坐在地上,长久地回想着这惊险的“飞车”一幕。他周围的地上横陈着从路基陡坡上滚下的行李、公文箱和各样农具。火车临时停车的这个地方是空旷的戈壁滩。初冬的夜晚,冷风飕飕,像刀子一样扎人的脸。本来,他有一件皮大衣,可是为了上路方便,他把皮大衣捆到行李里边儿了,身上只穿了棉衣。现在黑灯瞎火,自己的行李是哪一件都无法搞清。前一阵,在闷罐车上的行李堆里,因为车上很严实,没感到怎么冷。现在不行了,越坐越冷。他不知道管教干部对下车以后的行动是怎么安排的,自己不敢随便走动。想问一问吧,一米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李景沆开始冻得打颤了。他想搬几捆行李围个小圆圈挡挡风,但是手已经不听使唤,况且什么也看不清楚,他只好原地坐下等候。

时间过得特别慢，每一分钟都好像比一个小时还难挨。在这以前，李景沆体会最深的是饿着肚子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慢，那滋味真是度日如年！饿着肚子同时再被冻僵是什么滋味，在这个戈壁滩上的黎明前的这段时间里，他算是有了切身的体会，那便是生不如死！有好几次，他感到时间和自己的脉搏都已经凝固，他把自己冻僵的手塞到胸口的棉衣里边感觉了一下，觉得心脏还在跳动，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还没有终止。

终于挨到天亮。有两辆大轱辘的马车停在了摆行李的滩上，同来的还有两个管教干部。干部喊着让往车上搬行李，李景沆试探着几次想站起来都没有成功。他的腿又麻又软，他知道，站起来也得跌倒。他挣扎着，用双手一个劲地拍打着自己的膝盖和小腿，任凭管教干部怎么喊，他都无法遵命了。拍了十来分钟，大概是血液开始流通了，李景沆终于站了起来，他在原地小心翼翼地挪了几步，渐渐感觉能站得稳当一些了。这时候，另外几个人已经把行李装上了马车。管教干部把李景沆瞪了一眼，说：“走，李景沆跟上！”马车就沿着一条简易公路走向了他们在高台县的新场址。李景沆们不知道新场址离装行李的这个位置有多远。管教干部懒得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便问，只是跟上走就行了。

马车的速度，每小时大约就是五公里左右。直走到日上中天，平时吃早饭的时间早都已经过去了，还一点都没有停下来吃早饭的意思。李景沆是头天下午六点多钟在酒泉上火车之前吃了两个馍，天亮时就饿得撑不住了。因为太冷，全身都差不多冻僵，那时冷的感觉压过了饿的感觉。等到上路，稍稍活动了一阵儿，饿的感觉又压过了冷的感觉，而且一阵饿似一阵，腿脚发软，腰也直不起来，眼前直发黑。李景沆看见，与他同时押运行李的另外一个人正一拐一拐地跟在马车后边摇摇晃晃地走着，好像连身

体的平衡都掌握不了的样子，只是勉强挪着双脚。再难走也得走。再走一走，总是要给饭吃的吧，李景沆想。

走啊走啊，李景沆的双脚如同绑上了两块大石头，抬一抬脚就冒一身汗。临近中午时分，他终于走到了一处有人家的地方。走进院子，好像是一处道班，干部们和赶车的人随即进屋吃饭去了。两套车的牲口们也有一堆干草在啃。李景沆和另一名劳教人员在院子里等着。李景沆想，大概是干部和赶车的人先吃，我们两个随后再吃，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劳教分子、右派，放在后边吃理所当然。大约半个钟头以后，干部和赶车的人抹着嘴走出来了。李景沆想，他们吃完了，轮到我们的了。但奇怪的是管教干部并没有向李景沆们表示让他们进屋吃饭的意思，管教干部和赶车的人们只是边往外走边聊天儿，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

从白天晚上吃了两个馍到这个时候，已经连续十二个钟头水米没有沾牙了。坐了大半夜的火车，挨了几个时辰戈壁滩上刀子般的寒风，又走了四五个钟头的路，饥寒交加，李景沆已经头昏眼花了。李景沆顾不得管教干部发话不发话，就要走进去吃，管他什么态度。走进房间，李景沆问灶房师傅：“我们俩的饭呢？”师傅说：“什么饭，没有哇！”李景沆说：“我们早上就没有吃饭，一直饿到现在，为啥没有我们的饭呢？”师傅说：“我们不知道，没有给你们做饭的计划，向我们要什么，向干部要去！”在他们僵持的时候，管教干部和赶车的人已经坐在背风向阳处休息去了。他们一边聊天，一边看着牲口啃嚼干草，对李景沆二人与厨师的争论充耳不闻。李景沆伤心极了，眼睛里噙着泪水。他能怎么做呢？他时时提醒自己，要“温柔、谦卑”。十几个钟头没吃东西，没喝水，他还是这么想。话说回来，如果李景沆这阵儿怒发冲冠，非要与管教干部论个高低不行，那么肯定也是以李景沆的失败而告终，因为这个时

候李景沆剩下的力气恐怕连一只麻雀也捏不死了，他连说话的力气也不多了。值班师傅看他俩确实可怜，就说：“锅里还有汤，桌子上有辣子，调上喝去！”李景沆拿起饭勺在锅里搅过来搅过去，发现有面条时就赶快下勺子挖，费了好大功夫，在盛到的一碗汤中，一共捞到四根大约十厘米长短的“漏网”面条。另一位劳教人员也没有什么收获。李景沆一面喝着汤一面落泪。他听说被枪毙的人行刑前都要给饭吃，为什么给我就什么都没有呢？李景沆以前在家不喜欢吃辣子，到今天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选择了，只要是能往嘴里填的东西，他必须得填，否则他觉得当下就要被饿死。为了活命，李景沆与另一位劳教人员把一小罐用水和盐和成的辣椒糊“二一添作五”，分开倒入各自的面汤中喝下了肚。

一碗这样的糊汤下肚，虽然依然是饥饿难耐，李景沆居然又感到自己的手脚比刚才听使唤了一些。他用右手拇指掐一掐自己的左手，有点发疼。他由此断定，自己还活着，还有知觉，还能活动。他听到管教干部喊自己上路，只好吃力地站起来再跟上马车走。他想，凭自己虽然虚弱但并无疾病的身体，吃饱了饭，再走上几十里地应该是可以的。但今天不行，十厘米长的四根面条，半罐辣椒和一碗面汤，不但不能补充能量，而且还要消耗过去的积累。况且一年半的饥饿，能让他有什么积累呢？眼看着难友们一个个倒下，自己能活下来都已经不容易了，还奢望什么积累。李景沆用他的右手扯一扯自己左腕上松弛的皮肤，是粗糙的没有弹性的皮肤，能扯出五厘米长，典型的皮包骨了。他眼前一阵发黑，本能地停了停脚步，还好，没有晕倒。管教干部也没有发现李景沆有什么异常，大家继续缓慢前行。李景沆又迈开了他沉重的双脚，他边走边祈祷：万能的上帝，只要我还有一丝丝力气，我会跟上他们走的。我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走到什么地方，但我必须

得服从,跟上他们走到目的地。只是我几乎一天没有吃东西,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一旦倒下,可能永远也站不起来了,那不是我不愿意走,而是已经走到了我生命的尽头,请主饶恕我的罪过!我离开人世之后,我的远在天水的父母和妻子儿女将失去他们的亲人,失去他们的精神依靠,失去对生活的希望,这对他们来讲无疑是一场沉重的灾难。他们能承受得了这沉重的灾难吗?保佑他们平安吧,万能的上帝!他们都是你的孩子,虔诚的信徒,他们是无辜的。阿门!

从下午两点到五点钟,李景沆一直都处在眩晕的状态中,在祈祷中云里雾里走下来了,走到了目的地!由于过于饥饿,整整一个下午,可能是他内耳、小脑、延髓等器官轮番发生机能障碍,他看着静止的东西在运动,运动的东西在旋转。明明是走在平路上,却像跳坑一般走完了一个下午的路程。不管怎么说,他走下来了,没有倒下,感谢上帝。

到达目的地,先进灶房,李景沆领到了一个馍。这时候,距离头天晚饭时间已接近二十四个小时了。他乘火车押运行李有五六个小时,走路有八九个小时,其余时间是在空旷的戈壁滩上等候马车,几乎要冻死在那里,在这二十多个小时中,只吃了十厘米长的四根面条,一点辣椒糊和一碗面汤。他实在饿极了,这时候拿到手上的馍已经不是馍了,那是撂给落水者的一根救命的绳索,他必须尽快地紧紧地抓住抓牢,否则就失去了救命的机会。李景沆双手抱上这个馍馍,一大口就咬下了整个馍的三分之一,咬下的馍馍在口中翻了两个转儿,没有来得及咀嚼,李景沆把脖子一伸,“哧溜”一声就下到胃里了,丝毫没有受噎的感觉。如果说,这个馍平时需要十口才能吃完的话,今天只用了三口就下肚了。李景沆把馍吞下去后,却有些后悔,想仔细回味一下今天这个馍的味道,却已经回忆不起

来了。

就在李景沆想回味馍馍的味道而又回味不起来的时候,听见有人喊,说赵干事找李景沆有事安排。赵干事与李景沆在夹边沟时就打过交道。一次,农场给劳动表现好的人评奖,一等奖三元,二等奖二元,三等奖一元。李景沆被评为一等奖,可以领到三元钱的奖金。场里通知他,到新添墩作业站找赵干事领。李景沆在几天之后找到了这位甘谷人赵来苟,伸手要他的三元钱的奖金时,赵干事说:“什么?三元,你这样的右派分子能配上三元钱的奖金?给你两元就不错了!”李景沆从赵干事手里接过了两元钱的奖金,什么话也没有说。他认为自己是一等奖,千真万确,不可能把二等听成一等。但申诉也是白搭。赵干事愿给就给,不愿给就不给,天地良心,他自己把握去。我李景沆只能“温柔、谦卑”。要上那一元钱,未必就能救我的命。何况,我就是豁出去要,就能要回来吗?与其要而无果,还不如忍气吞声。李景沆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做什么,但他由当时发生的事情得出一个结论:赵干事是个厉害人物!现在赵干事又要找他了,是什么事情呢?李景沆找到了赵干事,赵干事交给他一件大衣,对他说:“你今晚去看守火车上卸下来的这些行李!”

放行李的地方离灶房还有不远的一段路。李景沆拿着大衣往放行李的地方走去。依然是饥肠辘辘,二十多小时的路途奔波,一个馍能顶多少事呢?行走间,李景沆突然发现路边上有农民的胡萝卜地。初冬时节,胡萝卜已经长成,快要收获但尚未收获的时节。李景沆看一看四下无人,他决定再一次放下自己的尊严,偷两个胡萝卜充饥,因为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李景沆先在心里作了祈祷:主啊,饶恕我的罪过,今天如果没有两个胡萝卜,我就要被饿死了。祈祷后,李景沆相信,上帝会饶恕自己。于是,他弯下腰刨开胡萝卜周围的湿土,用手握住胡萝卜的上端,

使劲往上一拔，成功了！再来一次，又获得一次成功！李景沆不敢贪得无厌，他知道若被人发现，挨批、挨斗、挨打，都是可能的。此类现象已发生在别人身上多次。若非万般无奈，堂堂李景沆，准备当数学教授的李景沆，怎么能干出这等偷鸡摸狗的勾当呢？君子渴死不饮盗泉之水啊！然而，此时此刻，什么气节操守都没有一个胡萝卜来得实实在在。胡萝卜是救命的东西，君子之风、勾股定律、线性代数，能救命吗？李景沆没有舍得拧下胡萝卜叶子，他捏着叶子在腰间蹭了蹭，便连泥带叶一起填到了嘴里。好香、好新鲜的胡萝卜！跟刚才吃馍不同，这次他品出了一点胡萝卜的香甜的味道。按他的胃口，十个八个也不够吃的。但李景沆还是心情复杂地离开了胡萝卜地，一步三回头地向看守行李的地方走去。

李景沆只身来到了吃晚饭以前从马车上往下卸行李的地方。行李摆了一大片，这一头到那一头足有三十多米远，路上的，地里的，滚到沟里的，好像是有意把行李撒了一大片。经过回忆，他想起来了：下午到了目的地以后，管教干部和赶车的人们都急着去吃饭，拉车的牲口也饿了，拽着马车往槽上走，喊也喊不住，两个赶车的人干脆不喊了，任由牲口们往前走，牲口边走，他们边往下摆行李，因此形成眼前这种现状。

眼看天色已晚，李景沆估摸了一下自己的力量，把这地上撒的一大片行李完全归拢到一起，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实在没有搬运这么多行李的力量。好在戈壁滩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周围没有什么人来往，谁能到这里偷行李呢，这又不是能吃的东西，谅也无人会来。话说回来，如果这个时候真有人来偷行李，如果李景沆起而护卫，如果这个盗贼与李景沆厮打起来的话，那么李景沆毫无疑问要被打翻在地，三个李景沆也不行，他根本没有力量和任何一个人较量。现在的李景沆，一阵强风就能把他吹

倒。通过目测,李景沆选择了四件距离较近、薄厚差不多的行李,往一起归拢,形成一个方块,是个露天的床铺。李景沆爬上这“露天床铺”后,好像浑身的骨节都已经松开,散了架了,活像一摊软泥。他躺下去,将赵干事给他的大衣盖在身上,还没有来得及回忆这一天的经过,也没有来得及作例行的每天临睡前的祷告,就入睡了。如果这个时候有盗贼来偷行李,只要动不着他身下的这四个,他是不会醒来的。如果这个时候来了一只狼,等不到他完全清醒,也就成为野狼的一顿不算“丰盛”的美餐了。那时的戈壁滩,生态的破坏还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野狼出没是常有的事。饿死的劳教人员中,由于埋葬过浅,被饿狼扯出吃掉尸体的事情时有发生。上帝保佑,直到天亮,什么都没有发生。李景沆是在前来取行李的人的一片吵嚷声中醒来的。他睁开眼时,太阳已经露出了地平线。

取行李的劳教人员吵吵嚷嚷地寻找自己的行李。吵嚷中,他们突然间就一齐哑了声扑向沟底。李景沆这才发现,原来有一件行李在滚下山坡时摔散了,行李里边有几个橘子散落在坡上。金黄金黄的橘子,在朝阳下格外绚丽,格外耀眼,瞅上一眼就会流出好多涎水。跑在前边的人,捡到橘子就往嘴里塞,顾不得也舍不得剥皮。走在后边的,便用夹杂着羡慕和嫉妒的眼光看着别人吃。李景沆站在他头天晚上睡觉的行李旁,没有加入抢橘子的队伍。他觉得今天的橘子和昨天晚上的胡萝卜不同,昨天的胡萝卜是集体的,摊到农户家微乎其微,偷上两个,对一户农民来说损失不是很大,不影响人家的生计。橘子是北方很难见到的东西,对于行李的主人来说,家里人千里迢迢寄来或者捎来的不仅仅是几个有形的橘子,而是一家人对亲人的救命之情。这番许多人奋不顾身抢橘子的场面,牢牢地定格在了李景沆的心中,令他终生难忘。一帮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讲师、机关干部、银行职员、中小学教师,

在饿鬼即将夺去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但是，这能怪他们不讲公德吗？在平时的日子里，他们是十分讲公德的呀。不但自己讲，还要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被赞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此时此刻，沟里边的“工程师”们恰恰正在以自己的双手和行为破坏自己亲手建造的精神上的“工程”！

劳教人员们终于各自找见了行李，包括那个摔散了行李、丢掉了金黄色橘子的南方右派，他倒是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大家聚拢到行李押送员李景沆周围问：“老李，你怎么才到呢？我们当‘团长’已经好几天了！”李景沆问怎么叫当“团长”呢？一个人解释说，来到高台新场，没有房子，搭简易地窝子住。可是人先来了，行李没有到，每到晚上，几个人找个背风处，背靠背“团”在一块儿，以这种方式取暖来减少热量的损耗，劳教人员戏称自己是“团长”。李景沆屈指一算，自己离开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已经整整两天两夜了。自己离开前三天，就有劳教人员开始往外转移，这样算来，最早离开新添墩的人已经有五天没有钻被窝了！五天，老天爷，初冬的天气，刀子般的寒风，有一顿没一顿的，就是有一顿也从来没有吃饱过。加上来高台之前的长期饥饿，好多人是拖着浮肿的双腿上路的。饥寒的五个昼夜，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李景沆自己虽然险些饿死在半路上，但他还是庆幸自己当了行李押运员，比他们少受了整整三天的冻饿之苦。李景沆后来才知道，出发时有些人就已经“病”入膏肓，根本经受不了长途迁移折腾，一路挨饿受冻，相当一部分人因这次大转迁耗尽了最后一点元气，虽没有把命送在半路上，但很快就送在了高台县的这个新场。

过去在夹边沟和新添墩，好歹还有个破屋子挡一挡风寒，高台的这个新场就不同了。地窝子没有建成时，只好在露天歇宿。现在，这些小风一吹都可能随时倒下的纸

人一般的劳教人员，只有自己动手搭地窝子，才能使自己好有个安身之所。所谓地窝子，应该是先在地上挖好坑，然后在上边搭上木头柴草，再盖上泥土，留下进出口，才能作为栖身之所。但眼下这些劳教人员们，谁还有挖坑的力气？为了节省一点力气，他们就在沟沟壑壑的崖壁上挖几下，然后胡乱遮遮掩掩，就算是他们的“地窝子”了。赵来苟们住的情况略微好些，是几间低矮的土房，那是农民的房子。这里农民不多，叫一个村子吧，太小。零零星星只几户人家，都是黄颜色泥巴土屋，一片荒凉破败。新添墩的大批劳教人员来到这里，就好像把一堆没用的烂石头往戈壁滩上一撒，没有人再去理睬他们。农场的总部在什么地方？夹边沟场部最集中的那些劳教人员迁到什么地方去了？李景沆们一无所知。他们只是以微弱力气给自己造一所称之为地窝子都十分勉强的栖身之处，躺在那里等待死亡。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力消耗，到达高台以后，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他们都是躺下不活动的。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等待吃饭。这一顿吃完就等下一次，下次吃完再等下下一次，从未吃饱过，也从未泯灭过对吃一顿饱饭的渴望。相当多的人直等到死的那一天也未能如愿。李景沆想，什么时候再吃到家乡的臊子面呢？没有臊子面，浆水面也行啊，就是多放些苦苣也无所谓，吃饱就行。

直到2002年春天，八十岁的李景沆接受作者采访时，他还是不知道当年他在高台住过两三个月的那一处戈壁滩叫什么地方。作者给他提供了几处以往听别人介绍的劳教人员改造时住过的地方：明水河、碱泉子，以期帮助他回忆起当年那个地方的名称。老人摇摇头说，实在记不得，只知道是高台县。因为当时的劳教人员被告知的就是转往高台，至于转往高台的什么地方，当时的管教干部没有说，李景沆们也没有问，直到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也没有问。“不过，”李景沆说“我很想知道高台县的那个地方

叫什么名字,我很想再去一次,最好是今年就去,趁我的身体还可以。孩子们可能不愿意让我去,但我一定要去!”

根据通知要求,身为木工的李景沆除了自己必用的生活用品外,还带着斧头、锯子、推刨、凿子等基本的木工家具。建造自己的地窝子,李景沆责无旁贷。管理他们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管教干部,态度和蔼,大家都称他为梁队长。李景沆始终认为梁队长是管教干部中的好人里边最好的一个。梁队长不仅为人和善,而且还跟大家一起修地窝子,一起参加其他劳动,挖土、抬木头,什么活都干。抬木头时还捡木头的大头抬。他见劳教人员体质虚弱,能照顾的就尽自己的力量照顾。李景沆还记得,这位梁队长在冬天常穿着一件非常合身的皮大衣,一根猎枪时时挂在身上,遇有野兔之类,往往能有收获。从他的举止和习惯看,梁队长可能是军人出身。凭他的枪法,应是立过军功的,但他丝毫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势。右派们本来已经精疲力尽,但在梁队长以身作则的影响和带领下,还是尽力去做,终于逐步建成了散落在沟壑崖壁上的那些地窝子。

在夹边沟时,劳教人员的床上还能铺些麦草之类,一来隔一隔潮气,二来增加一点柔软度和舒适度,这在寒冷的冬天是相当有效的。到了高台之后,麦草没有了,劳教人员只能睡在坚硬冰凉而又潮湿的土台子上。李景沆立即写信往家中紧急求援,他直截了当地说明就要家中那条用了三代人的俄罗斯地毯。家里人闻风而动,俄罗斯地毯立即寄到了高台。身下有了这张俄罗斯地毯,李景沆身上就不受潮气的侵袭,同时也多了几分温暖,多了几分来自家中亲人的关爱和温馨,使他增强了抵御来自严酷自然的伤害。

从到达高台新场到李景沆离开这个地方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他换住过好几个地窝子。开始几天,地窝子没有造好时是住露天。第一次分配,因为他是木工组成员,不

属于任何一个队或小队，就把他一个人安顿在一个夜里专门关羊的地窝子里边，他跟羊一起过夜。羊儿夜里是安静的，有一点儿反刍的声音，并不吵闹。只是那微微的咀嚼声很容易使人产生吃硬而脆的食品的联想，比如吃黄瓜、脆瓜、芹菜、胡萝卜的声响，这使李景沆的辘辘饥肠产生了条件反射，翻腾得难受，直想坐起来把羊儿们训斥一番。但转念一想，羊儿无罪，他们天生就是白天急急忙忙吃，晚间细细倒嚼的动物。上帝造物，就这么造下了，不让它们反刍，那无疑与上帝过不去。不让它们反刍，与不让人吃饭一样荒唐！这样一想，心里也就平顺了。睡在羊圈里，最让人无奈的是空气实在难闻。把门道堵住吧，地窝子里睡觉温暖了，但空气不好。把门道打开，空气新鲜了，但寒风飕飕，又把人冻得直打颤。堵也不是，打开又受不了，李景沆每天夜里都要堵堵开开，差不多要折腾到天亮。

后来几次，李景沆又奉命搬进了大些的地窝子，住十几个或二十几个人不等。住进一个地窝子以后，为什么还要不断地搬家呢？因为到了1960年底和1961年初，劳教农场的劳教人员里伙食定量已经减少到十八市斤，由于管理、加工等各个环节的漏洞很难堵塞，真正吃到劳教人员嘴里的就不能保证有十八市斤了。死人的事情几乎每天都要发生，而且大多发生在夜里。头天晚上睡觉时还有响动，第二天早上就不动弹了。一个地窝子里本来十几个人，死上几个，剩下的人少了，别的地窝子里也有死掉的，剩下的也少了，队上就安排往一起归拢归拢，便于管理和相互关照。

戈壁滩无遮无拦，一点小风就能吹起飞沙走石，尤其是冬季的风，更让人胆战心惊。每逢风起，尘土沙石就一个劲地通过柴草门往地窝子里边灌。中国人出门，都有个带针线的习惯，劳教人员更不例外，因为他们要劳动，缝

缝补补的事情更是经常需要的。为了对付每天都要大量灌进地窝子里边的沙尘，劳教人员们都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防护面罩，套到头上遮挡风沙，有的人晚上睡觉也不去掉。这些防护面罩很简单：做个刚能套进人头的布袋，在两个眼睛的位置剪两个窟窿就可以了。嘴的位置，有些人是剪开的，有些人没有剪开，说不剪开更好，还能挡住沙尘，保护呼吸器官。面罩都是根据各人的条件取材，有的是旧衬衣，有的是烂衬裤，有的是几块小手绢，还有枕套、床单上的一块布等等，五颜六色。针脚有大有小，做工有粗有细。人人头上套一个这种东西，看起来很滑稽，有时也很恐怖。

连一点干枯的野草也很难寻觅的戈壁滩，能到什么聊以充饥的东西呢？李景沆跑到很远的农民打场的地方，蹲到地上仔细瞅，他找到了十几粒麦粒。李景沆是用一根小木棍儿在场地边上的虚土中，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找到了这十几粒麦粒。他找一粒就往嘴里填一粒。一粒麦子儿填到口腔里，用舌尖把它调整到口腔一侧上下大牙之间，第一次嗑咬还能感觉到这个麦粒的存在，等到第二次嗑咬时似乎就找不见它了，往肚子里咽时已根本感觉不到麦粒的存在。小小的麦粒，太小了，小得叫饥肠辘辘的人刻意去感觉也感觉不到。这就是李景沆偶然出来走一走的收获，说不上是收获的麦粒补充的能量多还是为找这十几粒麦粒而消耗的能量多。多数人是不会去寻找的，他们认为躺下不动以减少能量的消耗更合算。另外少数出去寻觅的人，偶然之间也小有收获。有一次，李景沆寻找麦粒回来，看见一位难友手里攥着一条蛇的骨架，蛇肉显然已被他吃光。他不知道这条蛇是怎么被这位难友吃下肚的，几十年以后他也想不明白，但他肯定这位难友是把这好不容易到手的蛇生吃掉了。在当时，任何可以往嘴里填的东西都有救命的功效，谁也不会轻易放过

任何机会。李景沆曾听说,有人在地里捉住老鼠就直接吃掉。他没有见到这样的场面。他想,那一定是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因为老鼠不像蛇,太机灵,不容易抓住;而一旦抓到手,就是一疙瘩好肉,是令人垂涎三尺的好肉!

李景沆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迅速地垮下来。前几天,他还能走一段路,还能走到农民的打麦场上去寻找麦粒。现在,他感到连去打麦场的力气都已经没有了。在没有风的时候,他就钻出地窝子,在外边晒晒太阳。一天,他在一处高台上晒太阳的时候,看见食堂里正在卸用马车拉来的菠菜,那些东摇西晃的劳教人员们看到吃的东西以后,纷纷凑过去。管教干部发现“来者不善”后,立即将拉菠菜的马车护卫起来。但这仍无济于事,还是有人伸手去掀车上的菠菜,对管教干部的喝斥根本不在乎。眼看训斥不起作用,管教干部就拿棍子敲打,谁伸手就敲谁,这一招果然稍管用一点,但还是有人冒着挨打的危险去抢。直到菠菜卸完,围着马车的人才散去。李景沆目睹了卸车和抢菜的全过程,他不羡慕抢到菠菜的难友,他认为抢是不应该的,是违背主的意愿的,是一种罪过。再说他自己已经无力去抢了,只能看着别人去抢。这时,一位年轻人喊着“李老师”向这边走来。走近以后,李景沆才看清是他天水一中的学生蒲一叶。蒲一叶高中毕业时考上了大学,但体检中没有过关,据说是心脏有些毛病,大学不宜录取。蒲一叶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十分沮丧,知道再参加高考也没有什么意思。刚好,这个时候天水地方教育部门要选一批优秀高中毕业生充实到各小学任教,以加强基础教育工作。蒲一叶报了名,就这样成了一名小学教师。不幸的是,反右开始不久,蒲一叶就被打入“黄风集团”,成为右派分子,和一帮年轻同事一起,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参加劳教。师生相见,感慨万千。蒲一叶要对他的李老师说的话很多,但这个时候最要紧的还是与吃有关的话题:“李老师,

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老老实实坐在这里看着别人去抢菠菜。你不去拿，谁会可怜你？你拿一点儿是一点儿，不能光坐着等死嘛。”蒲一叶一边说，一边把一棵刚才挨了一棍子才抢到的菠菜塞到李景沆手里。李景沆看了看这棵菠菜，长长的叶柄，宽阔的叶子，一共是四瓣叶，一条完整的淡红色根须。蒲一叶催促李景沆快吃下去。李景沆不再犹豫，一口就将整棵菠菜吞了。李景沆噙着泪水，用自己干柴一般的手拉着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的同样干柴一般的手，相对无言。

还有一次，李景沆坐在一个地埂上晒太阳。一位中年人向他走来。“李老师，我给你一个‘霉包’吃”。“霉包”是有病的玉米植株在应该长穗子的地方长出的一个菌包，这种菌包是可以食用的，其学名应该叫瘤黑粉病病瘤，与食用菌类似。李景沆看着这位给他送“霉包”的中年人，却回忆不起来他是谁，叫什么名字。中年人见李景沆认不出自己，就给他解释说：“我是天水铁中的数学老师，叫赵铁民，我常到天水一中去观摩教学，多数是听你的课。我们铁中的中年老师都喜欢你的课。我们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霉包已然干透了，分量很轻，个头却很大，比一个拳头还大。太珍贵了！李景沆把霉包接到手里，暖在心里。“谢谢你，赵老师。”“不用谢，李老师，您多保重。”赵铁民走后，李景沆打开霉包，发现黑皮里是一兜比面粉还要细的黑色粉末。李景沆仔细品着霉粉，觉得有点像小时候母亲给他做的炒面的味道。霉粉太细，李景沆鼻孔里呼出的气息都能把它吹起。为了把霉粉一点都不浪费地吃进嘴里，尽管当时没有风，但李景沆还是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屏住呼吸，将舌头贴到霉包上粘着吃，直到连淡黑色的粉皮都填进肚子里。李景沆长久地坐在地埂上，细细地回想着霉包的那种炒面一般的香甜，也体味着这生死与共的师生情义。

天气临近深冬,越来越冷。人们将能穿的棉衣、皮衣都加到了身上,晚上睡觉也没有人脱衣服。一则脱衣服要费力气,为了节约一点儿力气,也就免脱了。再则,地窝子透风漏气,穿脱时的寒冷足以把人冻僵,为了少挨冻,还是不脱为好。至于不脱衣服给虱子的叮咬与繁衍造成多少方便,也没人顾得了那么多。他们的皮肤、神经,连同心灵都已经麻木。一天中午,李景沆钻出地窝子去打饭,路过一条沟时,他看到十几米深的沟崖下有一排坐着的罗汉。李景沆寻思,天天从这里走过,从未发现这一带有石窟,今天怎么突然就冒出了这么多罗汉?李景沆揉了揉眼睛再看,竟然真的就是一排罗汉。离开饭时间尚早,李景沆想看个究竟,就走到了跟前。仔细一瞧,原来是一溜灰头土脸的右派坐在那里边晒太阳边等着开饭,每人怀里都抱着一个饭盆。风带着沙子从崖头上吹下来,落在“罗汉”们身上,使他们全部成了土黄色的“雕塑”。不走近看,根本感觉不到生命的气息。但他们分明还活着,还等着去打饭呢。李景沆也觉得这里比崖头上边暖和一些,于是也在边上坐了下来,等待开饭,直到把自己也坐成了“罗汉”。这一天,他们等待开饭的时间出奇地长,从中午等到太阳偏西,从太阳偏西又等到日落西山,午饭成了晚饭,晚饭成了夜饭。怎么回事?原来,饲养组饲养的力畜也在死亡和减少。原先是两辆马车跑后勤,现在牲口少了,只够套一辆。这辆车拉煤不能拉粮,拉柴不能拉菜,今天没粮,明天没柴,东西凑不够,开饭也就没有个准确时间。有东西就做,东西不全就拖着。神经已经麻木的劳教人员们到这个时候算是彻底“改造”好了,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种情形,给了就吃,不给就挨,挨不过也挨着,没有什么人还会提个什么要求、请求。开饭的时间终于到了,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灶房里飘出一阵羊肉清香。李景沆暗自赞叹:“主啊,今晚有羊肉了!”他领到了一块发糕和一碗

羊肉汤。发糕体积很大,但很虚。拳头大小的发糕,一捏,只有一个核桃大了,一口就能吃光。汤里倒是有一大块东西,李景沆捞出来一啃,是羊的脚把骨,只有一点咬不动的筋,剩下都是大骨头。咬不动也得把它啃下来吞进肚里。几乎是一天,就等了这么一点东西。李景沆只能在心中发问:场领导,几百人吃饭,就不能想想办法按点做吗?人都快不行了,为什么还要穷折腾呢?这不是过于残酷了吗?

越来越虚弱的李景沆虽然估计天水家中的景况一定也很凄惨,但具体惨到什么程度他并不知道。他的妻子赵立珍宁愿自己一人承担起家破人亡的精神重压,也不愿给发配到远方戈壁滩上的丈夫增加任何一点点精神压力。她也在祈求上帝,保佑自己的丈夫平安回家。眼下,她凭借着自己一个人微薄的收入养活全家,艰难度日。而这个时候的李景沆,如果还想活下去的话,单靠农场的一点可怜的清汤糊糊饭是难以维持的。他必须向家中求援。赵立珍对李景沆的求援是有求必应。她知道自己丈夫的性格和为人,她太了解他了,不到山穷水尽、万不得已,丈夫是绝对不会开口求援的。她已经预感到,景沆的生命可能已岌岌可危,她必须从一家老小的牙缝中往外抠,哪怕是抠出个半斤八两,也要寄往丈夫那里去,这是救命的需要。公婆已然年迈,风烛残年,孩子一个夭折,一个送人,剩下的也还小。赡养老人,抚育孩子,家中不能没有她。

1961年年初,又一包炒面从天水寄出。几天之后,李景沆就收到了。他把炒面放到自己的小木箱中,每天晚上临睡之前,他才把箱子打开,用小调羹挖出两匙子填到嘴里。李景沆清楚,两斤炒面不是用来充饥的。充饥能够吗?天天处于极度饥饿之中,不要说两斤,二十斤也不够一个月用的!炒面是用来救命的。为了延续生命,他要让这两斤炒面发挥最大的效能,就每天晚上两匙子,他已经吃了

四天了，吃掉的还不到五分之一。如此算来，剩下的还能吃二十多天，就能接近春节了。他计划春节之后再写信向家里要。他不能频繁写信要，家里也困难，挤不出多少。李景沆装炒面的小木箱天天上着锁，木箱本身也挺结实。木工李景沆经常给别人做木箱，在那种人人都被饿成小偷的环境中，李景沆当然要给自己造一个最结实最放心的木箱。不晒太阳的时候，李景沆就躺在铺有俄罗斯地毯的泥台子上，守着他的小木箱等候下次开饭的时间的到来。有一天，地窝子门口伸进一个脑袋喊“李景沆！李景沆！”李景沆一看，是原来夹边沟农场木工组的组长史国良打发的人来喊自己的。这位史组长不同于新添墩木工组的那位寇国英组长，寇待人和善，从不欺人。史组长不然，能欺则欺。在新添墩时，李景沆曾被临时调往夹边沟参与完成过一次紧急任务，正是在这位史组长的带领下，让李景沆吃尽了苦头。史组长与早期的王子善一般，行为与撒旦无异。李景沆认为，他是魔鬼式的人物。不过，人都是在变，王子善不是已被上帝挽救了灵魂吗？他问史组长打发来的这个人找自己有什么事？来人说：场里杀了一匹马，大家都抢着喝马血，马血顶饿，又有营养，我已经喝了半碗多，还有呢，史组长叫你赶快去喝一些。“感谢上帝！”李景沆想，史组长这不也变成一个善良人了吗？遇到这样的好事，他自己喝过，还想着我老李，我们共事一场，也没有白共。

李景沆起身赶往场里屠宰马匹的现场。屠夫操着一把利刃，正在往下剥马皮，旁边围了不少人在看。马血在地上流成一片，已经凝固，用手指去捏又捏不起来。马血和地上的泥土牢牢粘到了一起，已经无法分开。要吃，也只能连泥土一起吃下去。大家只有望着白白浪费掉的马血而心里难受，李景沆只好回到他睡觉的地窝子。回去以后，李景沆吃惊地发现，他的小木箱已被人撬开。李景沆

最关心的是他的炒面，那是他的命！小木箱的箱盖被人撬开撂在一旁。箱中的东西被倒出来，弄得满铺都是。他一件东西一件东西查看，别的衣物没少一件，惟独炒面不见了！李景沆失去理智一般地大喊大叫：“谁撬了我的箱子？我的炒面谁偷了？”没有人理会他。这种事情几乎每天都发生多起，你反映到管教干部那里，他们也只是听听而已，有时甚至连听一次都不耐烦。他后悔自己不该去凑热闹想喝什么马血。马血没有喝成，木箱被撬，炒面被人偷去！要知道，在当时的农场，损失的不只是一斤多炒面，是全家老小的一片心，是妻子的一片关爱之情，是他要度过饥荒的最少二十天的补贴。二十天，没有了这些炒面，今后的二十天能熬过去吗？李景沆越想越恼火，越觉得他的损失太惨，必须追回。

既然告到管教干部那里去也解决不了问题，李景沆决定自己当一回“福尔摩斯”。他仔细查看了被撬木箱的箱体和箱盖，箱体、箱盖上均留有三角锉的印痕。有三角锉的人，必定是木工无疑！眼下的高台农场新场里，除了他李景沆自己以外，他见到的惟一的木工就是打发人前来喊他去喝马血的史组长，那个去年在夹边沟农场木工组曾带上自己完成过紧急任务的史组长，联想到他的狠毒和狡诈，又联想到史组长专门叫他喝马血，别人没有说，他史组长凭什么关心我李景沆，分明是调虎离山计。不是他，还能是谁呢？说什么也是这个姓史的干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李景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理直气壮过。他找到史组长，劈头就问：“是你撬开我的箱子！偷了我的东西！”姓史的其实是个很有心计的泼皮，他既然精心设计了以喝马血为由的调虎离山计骗走李景沆，又准备好三角锉迅速作案，在李景沆返回之前及时撤离等一环紧扣一环的实施方案，他肯定也想到了如果万一败露怎么办？李景沆找上门来怎么办？姓史的显然也在分析，

盗窃的事情天天发生,管教干部们管不胜管,上边没有人会认真对待这码子事。李景沆嘛,一贯是逆来顺受,在夹边沟时就把他看清楚了,叫他干啥他就得干,不叫他干啥他啥也不敢干。那时候他就领教过我史某人的厉害。今天,就是他心里清楚了这件事是我史某人所为,谅他也不敢来找。当然,他万一找上来,对这种懦弱者的办法就是硬,硬起来,他啥办法都没有。可怜的李景沆,他只按自己的逻辑推理来思考问题,根本不可能想到一场灾难正向他走来。他想再怎么讲,这个农场也是人在办,还是个教育人、改造人的单位,还有人管嘛,还有管教干部在工作嘛。盗窃者虽多,都是背地里做事,还是怕别人知道,偷东西总是个丢人的事嘛。但是,李景沆错了,错在他直到现在还没有认识到,此时此刻的高台农场已经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角斗场,什么黑白颠倒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道理没有人听,斯文不值一文,知识是最没用处的地方。按他自己信仰的教义说,他也错了,即在最需要的时候,他却没有“温柔”。就在他满有把握能在道义上占到上风的劈头问话还没有落音的时候,姓史的已经怒目圆睁,跳到李景沆面前,先在他脸上重重地打了一个耳光,然后劈头盖脸一阵拳脚。李景沆只觉得天旋地转,一下子就躺倒在地上。姓史的边打边说:捉贼见赃,你抓住我了,你有什么根据,真他妈欠打。需知,困难时期的劳教农场,个个都是瘦子,包括姓史的这类恶人在内,都是些皮包骨。但刚刚偷吃完炒面的史组长,还有些力气,加上暴怒之中的爆发力,他握起的拳头就如同—根棍棒,捣在李景沆的脸上头上,如同用干柴和棍棒在捣,李景沆既没有招架的思想准备,也没有招架的力量。他一下子就被打成了一滩泥,躺在那里连动弹一下的力气也没有了。但在一阵眩晕过后,李景沆又恢复了思维。他想,这一顿打挨得太冤了,明明是姓史的偷了自己的东西,却不让说,说了就打人,公理

何在？公平何在？管教干部为何不主持公道？他想起了关汉卿笔下那个蒙冤的弱女子窦娥临被冤死时的两句唱词：“地也，你不分善恶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天也胡做，地也胡做，我李景沆一介文弱书生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认倒霉，收兵吧。回到自己的地窝子，李景沆伤心地痛哭一阵后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昏睡中的李景沆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住在一座十分漂亮的房子里，房子门口放着三块大石头，大石头上缠着一扎铁丝。铁丝扎到石头上有什么用？不如把它取下来派上个用场。李景沆取来了自己的木工斧头，举起斧头使劲一砸，“啪”的一声铁丝断了。同时“轰隆”一声，他身后的房子也随即倒塌了。接着脚下变成了一片沼泽，那座漂亮的房子一点儿痕迹也没有留下。李景沆惊出一身冷汗，醒来后刚才梦中的一幅幅画面很清楚。

本来，梦就是梦，这跟他丢了东西、受了委屈也不无关系。把它不当一回事，那就什么事也不是。但走投无路的李景沆却认为这是主的启示，是主要让自己进入天国的启示。他想，不然的话，为什么那样清晰？他进一步认定：主现在是要我离开人世了。我几十年按主的训导行事，这一次就要进入天国了。这对我自己来讲，无疑应是一件好事，人世间的苦难就要结束了。主要我死，我是不能不死的。要我现在就死，我一分一秒也不能多活。想到这里，李景沆暗自祈祷：主啊，我是一个独生子，我的父亲爱我超过了爱他自己，父亲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好多倍。如果我今天死，我父亲是承受不了失去爱子的精神压力的，他几天之后一定也要死。如果我和父亲都死了，母亲是百分之百地活不下去。母亲对我的爱超过了父亲对我的爱。她老人家经受不住失去儿子和丈夫的打击，一定经受不住，定死无疑！李景沆还推测：儿子先死，必定是主对父母亲的惩罚。生时加以惩罚，死后必

进地狱。就是说,同样是个死,李景沆要进天堂,他的父母则就要下地狱了!想到这里,李景沆惊恐极了。他继续祈祷:主啊,我死可以,但天堂不能去,我要跟我的父母一起下地狱。父母亲把他们所能够给的爱完完全全给了我,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是这样,直到现在,我认为,就是因为我,他们才活在世上的。我不能孝敬他们,反而连累他们下了地狱,身为人子,我一百个不愿意!主是宇宙的主宰,你无所不能,你就让我也下地狱吧,让我和我的父母永远在一起。万能的主啊,你一直受到万民赞颂,就是到了地狱,我也要继续赞颂你,永远永远为你祈祷!或者,主啊,你让我活着回到天水,到天水家乡受苦受罪也行。只要让我和家人在一起,为我的父母颐养天年,为他们养老送终,使他们进入天国,不管自己是什么结局我都无怨无悔。哪怕把我饿死,哪怕把我饿死之前加上一枪,把我枪毙掉!饿死、枪毙之后再把我下到地狱也行,我毫无怨言。主啊,我惟一的要求就是让我给我的父母养老送终,答应我吧,仁慈的主,阿门!

李景沆没有马上就死。他相信,漂亮的住房顷刻之间变成沼泽的启示,是要他结束自己生命的。但经过自己的祈祷,主又答应了他活着回到天水的请求。为了表现自己的心愿,一连三天,李景沆反复祈祷的就是以上内容。

三天以后,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条很宽很宽的大河,浪涛滚滚。李景沆站在河边上,双手端着两碗米饭。米饭冒着热气,同时散发着扑鼻的清香。他回头一看,身后是一座三层高的楼房。楼房不是砖砌的,而是水泥浇铸的,完整性很好。正端详间,大河发了洪水,李景沆就势一缩身,退到了楼房里边,有人随手关上了楼门。上帝保佑,洪水没有进来。洪水越来越汹涌,突然,洪水巨大的冲击力掀翻了楼房,但楼房的整体结构并没有遭到破坏。楼房倒在洪水中,被洪水推搡着翻滚。李景沆感到自己也随着

楼房的翻滚而翻滚,却没有感觉到磕碰的疼痛,两碗米饭依然牢牢地抓在手上,也没有被抛洒掉。翻滚着的大楼之外,是洪水冲垮村庄和城市之后的号啕和呼喊,老人和孩子的喊声都有,还有鸡犬的号叫,凄惨而可怕。李景沆继续在楼里边翻滚着,外边的号啕声此起彼伏,可自己什么危险也没有,他还在心里默念“平安”。大楼好像突然撞到了一块巨石,猛烈碰撞引起的震动,一下子把他惊醒过来,原来是南柯一梦。这个梦与《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有些像。李景沆认为这分明又是主的启示,不然怎么会如此清晰呢?他把今天这个启示和三天前的那次启示连起来分析以后,认为那次梦中的三块石头是成家立业的基石,是基础,那次的启示是,家道要中落,要崩溃了;而今天的启示是个好兆头。把两个启示连起来看,他得出结论是:按我自己的本事和能力,要想建立起家室,建起一个生儿育女的完整家庭,那是不可能的,非失败不可。今天,有两只手上的两碗米饭,我将不再挨饿了,这是一种预示,是说的将来。大水到来,我躲进大楼,就是主的大恩典,再大的洪水也奈何我不得。虽然随着洪水的冲击,大楼也不得不滚动前移,但它的完整性不会破坏,它会庇护主的信徒永久平安。想到这里,李景沆觉得安然多了,心里也踏实多了。

李景沆的心境开始平静之际,也是高台明水农场最严酷的阶段来临之时。这时已开始频繁地死人。活着的,没有一个人不浮肿,李景沆也不例外。他的身体好像一下变成几百斤重,两条腿已承受不了身体的重量,每迈一步,都非常艰难。

事情就是这样离奇。完全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饥饿、浮肿加上焦虑、烦恼,死亡就会加速到来。而生活在幻想和幻觉中的人,虽然已经浮肿,但相信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一定会拯救自己,因而心平气和,没有烦恼,没有忧愁,

思想上没有什么压力,始终有一个好的心态。这些看起来已经距离死神不远的生命,却奇迹般地顽强坚持着,延续着。你可以把他称为苟延残喘,但他能喘得下去。李景沆即属这一类。

拖着浮肿的身体,眼看着每天都有死去的劳教人员被抬埋,保持着平静的心态的李景沆,在等待着上帝来拯救。

又过去了七八天,一天上午,场里通知李景沆去参加例行的身体检查。医生掰开李景沆的眼皮,用手电照了一下,然后问:“李景沆,你给家里留什么话不留?”这就是说,医生已断定他将不久于人世了。

劳教农场的医生们有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他们的判断准确无误。为了对李景沆的家人负责,问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也是出于医生人道主义的关心。只是,这种直截了当的办法可能对当事者带来的精神打击,医生似乎有些忽视。但医生们有医生们的道理,天天从地窝子里往外抬尸体,大家看得一清二楚。今天是张三,明天就是李四,明摆着的事情,都是精神健全的人,还需要弯弯儿绕?李景沆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也清楚。他刚刚上了一次厕所,就几乎耗尽了力气。他从地窝子里爬出去后,中间歇了两次才走到地方并且是咬着牙才蹲下去的。完事后却怎么也站不起来,身上好像压了几百斤的重负。他只好用两只手扳住蹲坑两侧的矮墙,憋足了力气,手、腿和全身一起使劲才站起来。跟李景沆一样,由于大家都已走不动路,什么蛇、老鼠、玉米秆子上的霉包、打麦场地边浮土里的麦粒等等,可以找到往嘴里填的东西,统统再没有人去想了,因为那是需要现成力气的,没有人有这样的力气了。但是李景沆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东西,就是“希望”。别的人已心灰意冷,等待死亡,李景沆却已得到“启示”,上帝将拯救他。因此,听到医生的问话以后,李景沆没有吃惊,也没

有难过,他反而安详、平静地说:“没有,给家里不留什么话。”医生反而吃惊了,久久盯着李景沆,那种表情是分明在问:马上就死的人,怎么这样安详、平静?这样坚强?其他人听了类似的问话,都是哭着出去的。这个李景沆是怎么了?医生们注意到,李景沆说“没有”时,显然是一种平静、安详的心境!太不可思议了。李景沆毕竟是个知识分子,妻子又是搞医务工作的,一些生理和医疗方面的常识性的东西他还是知道的。因此,这时候的李景沆与医生之间其实也有一个共识:根据李景沆的气色和生理反映,如果不采取医疗或饮食措施的话,最多三天之后,李景沆可能就不行了。三天,是最多三天,也可能是两天或一天,否则,医生是不可能让他留下遗言的。医生认为,三天之内是要死人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但是,李景沆认为,三天之内是危险期,三天之后定然平安!

在场方通知李景沆检查身体之前,李景沆的大便已停止好几天了,但小便很频繁,因为进嘴的东西全是稀汤。他一方面等待上帝的拯救,一方面打算向家人求救。他草拟了一封电报稿揣在身上,内容是“我已病危,立珍速来”。李景沆的想法是,万一上帝不来拯救我,我应该同妻子见上最后一面,场里死人越多,来场为亲人送葬的亲属也越多,越是络绎不绝。由于自己已无力行走,李景沆只要见到外边来人就请求:“请代我把电报发出去!”但奔丧者都悲痛万分,谁有心思替他办这种事。李景沆的愿望天天落空。一天,他去打饭的路上遇到一位管教干部。小土路很狭窄,李景沆站了下来,没有给对方让路的意思。管教干部刚要给李景沆让,李景沆却抓住了干部的手说:“干部,你看我的脸成了什么样子了?我病得已经很重了,走不动路了,我有一封电报请你给我发出去!”干部不耐烦,要走,李景沆说:“我没有钱,这里还有一块肥皂作为对你的酬谢。肥皂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请你拿

走,还可以洗洗衣服。”干部还想撂下李景沆走掉,李景沆仍然紧紧地拉住不放:“我已没有任何办法了,如果你不管,我只有等死,这块肥皂,我也就只有扔掉拉倒!”管教干部看李景沆实在可怜,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替他发出了这封电报。这是医生让他留下遗言的第二天。李景沆一面等待一面在心里盘算:立珍应该已经接到电报,她差不多已经在从天水到高台的路上了。

李景沆静静地躺在铺有俄罗斯地毯的土台子上。第一天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他平安度过了。第二天,李景沆还是静静地躺着,仍然是平安度过。到了晚上,李景沆爬出地窝子,又爬到地窝子前边一处空旷的高台子上,望着无垠的星空祈祷:“主啊,三天时间过了两天,我现在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饥饿搅得我心发痛,浑身发肿,没有一点点力气。主啊,旧约时代时,你显神迹,叫乌鸦给你的仆人叼饼吃,新约时代也有神迹,救人性命。今天,主啊,我求你也显神迹,可不可以赠我一只兔子,让兔子跑到我的怀里呢?我可以拿兔子充饥,否则,我就要死了。”李景沆又想,兔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三里五里之外,它要跑过来是需要时间的,我能等待得住吗?风很大,皮衣穿在身上如同单衣一般,怎能等得住呢?可是如果上帝要赠予,我也得等啊。数学教师李景沆这时又设定了一个推导程序:如果有鸟儿从我头上飞过,那么,马上就会有兔子到来,我就等着。如果连鸟也没有飞过,那就说明上帝不给我赠兔子,我就不等了,还得回到地窝子去。神情恍惚的李景沆等着等着,突然有三只鸟从身后飞到他的面前,落在了他面前的地上。三只鸟交替着往上跳,就像一个熟练的杂技演员双手向空中交替着撂几个小玩艺一般。鸟儿跳着,唧唧喳喳地叫着。李景沆正在高兴之际,鸟儿又不见了。他定定神,知道这是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产生的幻觉,但他同时又认为这种祈愿本身又是罪过:就是有兔

子来,没有刀,我怎么屠宰?就是有刀能屠宰,没有锅灶怎么来煮?就是有锅能煮,给快要饿死的人吃上一肚子的肉,肠胃是适应不了的,非吃死不可!罪过呀,要上帝显神迹给自己赠免子真是荒唐!李景沆拖着浮肿的双腿爬进了他的地窝子,又躺回到他铺有俄罗斯地毯的土台子上。

李景沆浮肿的双腿冰凉冰凉,这种冰凉似乎还有往上身发展的趋势。他知道全身冰凉意味着什么。李景沆开始有些恐惧。他侧卧着,蜷曲着身子,用自己的双手握住双脚,想通过这个办法把脚暖一暖。他希望早上起来的时候双脚能提高一点温度。整整一夜,他都是这样侧卧着。这一夜,他也睡了不知多少觉,但睡着的时候似乎也醒着,醒着的时候似乎也睡着。终于挨到天亮,李景沆的双手还握着自己的双脚。但是,单从感觉而言,他好像是握着两块石头。双腿以下麻木而又难受,有知觉,但不明显。不管怎么说,这一夜算是又过来了。过了这一夜就是第三天,是李景沆认定的危险期的最后一天,也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天已大亮,光亮透过地窝子的门洞射进地窝子。李景沆躺卧的土台子与射进来的光线是平行方向,他的头正对着地窝子的门洞。光线很好,是躺着看书的最佳位置。李景沆拿出了一直伴随着他的《圣经》。这是他两年多以来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坦然地翻阅《圣经》。以前他不敢,那是犯忌的事情,会惹出很多麻烦事。今天不然,所有的活着的人都躺着,大家都在等死,不会有人因为他诵读《圣经》而多事了。两年多的劳教生活中,他从来没断过读《圣经》的功课,但那必须背着人去做,多半是在如厕大便之时。往往是针对某件事情,请求主的启示,尔后随意翻开,看看主是如何教训的,李景沆就把这个日期记到这段启示的旁边,然后就照主的教训去做。别人拿去这本《圣经》,只能看到上面写了很多的年月日,根本不解其义。但

是李景沆清楚，每一个日期的背后，几乎都有一段苦难的经历，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终生难忘的经历。在新添墩的最后日子，快要迁场的时候，有几天非常难挨，实在熬不过，李景沆利用如厕之机带上了他的《圣经》，他问主：主啊，人世间的苦难为啥这般难熬？我能熬得过去吗？请万能的上帝启示。他蹲在便池上，看看旁边没有人，就迅速掏出《圣经》，随手打开，里边的一段话是：“你们蒙恩因为在于信服基督，并且在于为他受苦。”李景沆感到自己豁然开朗：受苦也是蒙恩！是上帝的安排，还能有什么怨言呢？按上帝的旨意去做，今天受苦，明天才能步入天国。主的启示，帮助李景沆度过了新添墩最难熬的日子。可是，那个时候，李景沆还没有像今天浮肿得这么厉害，两腿还没有麻木、冰凉，医生也还没有让他留什么遗言。今天的情况更严峻了。按李景沆的估摸，今天是三天危险期的最后一天，当然也是最危险的一天，趁着大家都在等死的时候，让我再请求一次上帝的启示。天赐良机，光线也格外地好。李景沆随意翻开《圣经》，里面是这样一段话：“谁能使我与上帝的爱隔绝呢？是痛苦吗？是饥饿吗？是刀剑吗？是逼迫吗？是赤身裸体吗？不是，谁也不能。”李景沆认为，这段话是送给自己的。自己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死亡的威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近。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人、什么事，统统都不能隔断他与主的爱！李景沆要信主、爱主到永远，直到他的大脑停止思维的那一天。李景沆挣扎着爬起来，趿上鞋，揣上他的《圣经》。他的脚肿胀得厉害，鞋已经穿不进去。他钻出地窝子，又爬上昨天晚上去过的那个高台子。李景沆要利用这最后一天的时间，到那个空旷无人的地方，再请求一次主的启示。李景沆刚刚爬上去，就听见下边地窝子跟前有人喊：“李景沆，老李，你妻子来了！”

赵立珍来了，带着一家老小对李景沆的关心。李景沆

则认为,妻子是带着一家老小的关爱,同时也带着上帝的爱来到了他的身边。因为他和赵立珍的结合本身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让赵立珍做他的妻子,关照他,他也有义务按上帝的旨意爱护妻子。看着自己浮肿的、步履维艰的丈夫,赵立珍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她急忙上前去,搀扶住东倒西歪的丈夫。如果不是她一针一线缝成的熟悉的衣裤,她根本就不敢断定眼前这个一阵风就能吹倒的病人就是他的丈夫。赵立珍心目中的丈夫,虽然略显瘦削,但格外精神。景沆是个闲不住的人,每次下班回家,不是加班批改学生的作业,就是操起斧锯刨凿砍砍推推,再就是教孩子识字读书,从来不见他闲下来无所事事。不管干什么事,动作麻利准确,风风火火。而今天她眼前的丈夫已经完全不见当年的风采,惨白肿胀的脸,说不上是土灰色还是污垢色,眼泡像安到脸上的两个鸡蛋,眼睛成了一条缝,要不是在凝固的这条缝隙中淌出了泪花,真难叫人相信这还是个活人。赵立珍是个护士,由于工作的原因,她接触过成百上千的病人,可她从没有见过像此刻她丈夫这个样子的病人。她只见到过病魔折磨下的病人,没有见过严酷生活条件下过度劳累和强大精神压力折磨下的病人。她拉着丈夫冰凉的手,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李景沆先开了口:“父母亲都好吗?孩子们都好吗?”赵立珍明白,此时此刻,她只能说一些使丈夫树立生活信心的话,任何可能对他造成精神压力的话都不宜说,她必须尽她的全力帮助自己的丈夫,使他不要倒下,一切的一切,都要等到度过眼前这个难关再说。赵立珍表情非常自然地说:“都好,他们都很健康,生活也好,你不要操他们的心,有我在,啥事没有。你自己多保重,比啥都要紧。”

妻子给李景沆带来的是:十八九斤炒面,四两左右的一小瓶清油,一块锅盔。李景沆和妻子都清楚,这些救命之物要一点一点用,不可一次用得过多,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赵立珍平日的工作就是护理病人，她有丰富的护理经验。这一次，她要亲手护理丈夫，他是她终生的伴侣，是全家的顶梁柱。他不能倒下，老的老，小的小，全家人都等他平安回到天水。她必须舍弃一切，尽她的全部能力把丈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不见丈夫身体好转，她是不能回去的。

从来的这天早上开始，赵立珍就扶着李景沆走路，扶着李景沆上厕所、打饭，直到扶他脱衣，躺下。赵立珍来了以后，再也不让李景沆和衣而卧，为他脱衣，又为他洗涮和消灭虱子、虻子。没有可供前来探视的家属单独住宿的地方，晚上，赵立珍就坐在李景沆躺卧的土台子旁边的地上。困了，头靠在土台子上打个盹，就算是睡觉了。来明水前，赵立珍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赶到高台，背着炒面走了十几里路；到明水后又为李景沆洗洗涮涮忙碌了一天。晚上，头一靠到土台子上就睡着了。这时候，赵立珍的头下垫了一个小包袱。同一个地窝子的一个大个子劳教人员一直注意着李景沆夫妇的动静，想在他们身上获取点什么，因为赵立珍千里迢迢来探望丈夫，绝对是不会空手来的。“大个子”看着李景沆夫妇都已入睡，就悄悄来到他们的土台子跟前，看了看，认为最好下手的就是赵立珍头下边垫着的那个小包袱，其余的东西李景沆要么放在他修理好的木箱中，要么压在他身下。小包袱里必然是吃的东西。“大个子”认定这一点，决定对小包袱下手。

“大个子”趁着黑灯瞎火，摸着了小包袱，使劲儿猛然一拽，把小包袱抽到手中，转身钻出地窝子就往远处跑。赵立珍被惊醒之后，发现有人偷了自己的包袱，一边喊一边往外追。追了几步，外边黑黝黝的，赵立珍又气又怕，不敢多追，只好悻悻而归。“大个子”也是饿急了，他跑出去就不打算再回这个地窝子来了。“大个子”跑出去一会儿，外边就飘起了雪花，戈壁滩上霎时白茫茫一片。李景

沆为“大个子”惋惜，也为他祈祷。其实包袱里只有赵立珍的几件换洗衣服，一点儿吃的东西都没有。这么冷的天，“大个子”也是一个浮肿的身子，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能跑到火车站吗？这一跑，只怕是凶多吉少。李景沆暗自祈求上帝保佑这个可怜人，赐福给这个可怜人。

李景沆的生活起居都得到了妻子的悉心照料，心情好多了，身体急剧垮下去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并已经开始有了好转的迹象。

李景沆这时也不由得有了一种放声歌唱的欲望。于是便隐去歌词，只哼曲调：

3 2 3 2 | 6 — | 3 2 3 2 | 6 —

哎 —— 哎 ——

同样是基督徒的妻子赵立珍知道丈夫的心思，他们心照不宣，丈夫哼着曲调，她在心里念着歌词：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

耶稣肯体恤，他是恩主，

他爱我到底，创始成终。

李景沆认为，万能的主满足了自己的祈愿，他终于在三日危险期的最后一天派妻子拯救我，于是我有救了。李景沆只觉得三天前居然让他留下遗言的那个医生可怜而又荒唐。至于帮助李景沆往家里发了电报的那位管教干部，在这次挽救李景沆生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李景沆并没有多想。他只感谢上帝。

这时的李景沆住的地窝子是他到高台之后住的第四处地方。这个地窝子很大，进门是一块平地，能住十来个人。往里走，上一个小坡，又一块平地，又能住十几个人。两个平面上总共住了二十八个人。这个地窝子，可能是当时明水农场最大的地窝子。李景沆就住在刚进门的地方，就是整个地窝子的最外边。李景沆一遍又一遍哼着《压伤

的芦苇》，而且有意把节奏压得很慢很慢。他是在细细体味主的教诲。

《压伤的芦苇》，打动了住在同一个地窝子的右派。这是个南京人，已经全身浮肿。他挪着蹒跚的脚步来到李景沆的土台子跟前，悄声对李景沆说：“老李，你唱的是教会歌曲《压伤的芦苇》，我也曾经是教徒，我们都是弟兄。”从交谈中李景沆了解到，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分配到甘肃教书，今年二十七岁。他二十五岁时被划为右派，来到劳教农场也已两年多了。“真想不到会走到今天这步田地。我已经是一棵受伤的芦苇了，上帝还能来拯救我吗？”他很忧伤地问。李景沆劝他不要灰心丧气，要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上帝与我们同在！他会拯救他的孩子们的！”李景沆鼓励这个苦命的小兄弟说。夜已经深了，巡夜的管教干部走到门口喊：“睡觉，不要说话！”他们只好停止谈话。“南京人”回到他自己的土台子前躺下了。这一夜，李景沆睡得比前几天都踏实。早上醒来，妻子告诉他那个“南京人”半夜里咽气了，已被抬出去。天亮之前，包括“南京人”在内已经抬出去了五个。面对这种情景，赵立珍越发不敢离开李景沆一步，她担心她一离开，丈夫就会像昨夜里的那五具尸体一样被人抬出去。

赵立珍来到明水农场的第三天晚上，李景沆照惯例做了睡前祷告：“主啊，今晚我就睡在你恩赐的宝坐前，请赐我一个安宁的睡眠。”在往常，祈祷之后他很快就入睡了。但这天晚上出现了意外，乱七八糟的幻觉不断地纠缠着他，一闭上眼睛，就有一个人用很微弱的声音在耳边说话，睁开眼睛却什么人也没有。妻子和前两天晚上一样，坐在他躺着的土台子边，头靠在土台子上，已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妻子这三天一直都很平静，主要是她看着丈夫还有活下去的希望，她坚信丈夫与别人不同，他是上帝的孩子，上帝一定能够保佑丈夫平安回到天水家中。看到妻子

安静地酣睡的样子，李景沆的心里也平静了许多，他再次祈祷以后，又闭上了眼睛。但是，只要眼睛一闭，那个声音就又在耳边响起，一直搅得他烦躁不已。凌晨三点钟时，李景沆试图起来走一走，但刚一起来，就觉得天旋地转，他只好又躺了下去。只要一闭上眼，那个声音就又在耳边响起……李景沆认为这是撒旦在折磨他。黎明前，李景沆开始阵发性地说起了胡话：“把我往出抬！把我往出抬！”不管赵立珍怎么安慰，李景沆还是大叫不止。管教干部认为李景沆已被头天连续抬出五具尸体的现象吓坏了，就对同一个地窝子的其他人说：“这个人不行了，马上会死，不要理他，让他喊去。”一个劳教人员见此情景，进门时就顺手牵羊把李景沆头边放的一个铁罐子拿去，准备据为已有。铁罐子是早先李景沆还能活动时煮野菜用的“锅”。在频繁地死人的这段时间里，乘人之危掠夺东西的现象经常在发生，人人都习以为常了。刚好这一阵李景沆是清醒的，他瞪了这个人一眼，怒斥道：“我还没有死呢，胡拿什么？放下！”这人一看李景沆又清醒过来了，加上赵立珍也在旁边怒目而视，便只好把铁罐放回原处。天亮之后，李景沆安静了一会儿后，就又大喊大叫起来。喊累了，李景沆就闭上眼睛安静片刻。刚一安静，就又产生了幻觉，那个讨厌的声音就又开始在耳边聒噪。李景沆感到撒旦还在纠缠他，让他把剩下的一点清油也摔掉，连瓶子一起摔，说那一点点油是救不了他的命的。魔鬼不害怕李景沆的训斥，李景沆只好求救上帝：“用上帝的衣带做衣带来束腰，用主的教诲当做遮胸的护身镜来护身，带上福音的头盔，穿上福音的鞋子，守着圣灵的宝剑，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魔鬼，你退去！魔鬼退去！”李景沆一挥手，差一点打在赵立珍的头上。李景沆认为他在以上帝的名义来驱逐撒旦。尽管这样，赵立珍还是想方设法地让李景沆吃了一点。快吃晚饭时，李景沆觉得又有一个声音在耳边

说：“你今晚上吃饭就要把你胀死，李景沅，今晚的饭不能吃！”李景沅坐在土台子边上，接过妻子递给他的一碗糊糊饭说：“撒旦！你不要管！我是主的人，胀死也是主的安排，与你无关，你少管，走开！”李景沅狼吞虎咽地吃下了这碗饭，然后就安静地躺下了。这已经是赵立珍到达高台的第四个晚上了。

这晚上，李景沅睡得格外香甜。直到2002年春天，李景沅回忆起那天晚上的睡眠时，还记得非常清晰。他说，躺下去，每一块骨头仿佛都被放进了专门为它设计的衬着绒垫的模子里，再舒服不过了。不用翻身，一躺下就很“到位”。他说，那是他一生中还不曾遇到过的美妙的平安夜。清晨醒来，李景沅感到轻松多了。坐在地上的赵立珍看着丈夫折腾整整一夜一天之后睡了个安稳觉，精神也好多了，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李景沅在为自己与撒旦搏斗一天终于取胜而自豪的同时，也多了一层忧虑，组织上会不会怪罪：你这个李景沅，组织上让你到劳教农场来改造，你又胡说了一天什么上帝、主耶稣、撒旦、魔鬼……还说要把你抬出去，把我们折腾了一夜一天，现在你又好了，你是装神弄鬼吧？你的思想离改造好还差得很远！别人能回去你不能回去，还要好好改造！李景沅越想越怕，他问妻子：“我昨天喊的啥话？他们都听清了没有？”妻子告诉他：整整一夜一天，除了“把我抬出去”能听清之外，其他时间都是“啊啊……嗒嗒嗒嗒……哦哦……，唉……”谁也没有听清说的究竟是什么。李景沅这才放心了，知道自己没有喊出太出格的话。

早上起来，李景沅感到一股寒风从脚脖子直往上蹿。他又感到裤腰比以前松了许多。他把拳头从后腰伸下去，摸了摸自己的臀部，他感到皮肤紧贴着骨头。身上的肉到哪里去了？冷风嗖嗖地通过空荡荡的裤脚、袖口，直往身上灌。李景沅找了些绳头，分别缠在裤脚、袖口和腰间，一

共缠了五根才总算止住了无孔不入的寒风。然后，他站了起来，慢慢挪动脚步，居然轻松了许多。

李景沆这才明白：原来是浑身的浮肿消退了！

俗话说，男怕肿，女怕散。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肿即意味着死亡，而李景沆的浮肿却在说了一天胡话后竟然消退了，这在当时极为罕见。2002年春天，年过八旬的李景沆回忆他一生经历的磨难时说，他一生中，差一点丧命的危险一共发生过十次，都相当危险，但每一次都又活过来了。比较而言，高台农场这一次最危险。

既然丈夫的身体已有明显好转，浮肿已经消退，儿女和老人的安危又成为赵立珍操心的主要问题了。老人身体不好，儿女们小的只有几岁，最大的才十来岁，生活不能自理，日子又很艰辛，她割舍不下天水那一头的事。李景沆何尝不明这个事理？夫妇俩商量后，李景沆对妻子说：“你回去，把老人孩子照看好。我这里你放心。有剩下的炒面贴补，我眼下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过一个月再来看我一次，我一定能平安回到天水！”从到达明水农场那一天算起，赵立珍在土台子旁边的地上坐了五夜之后，乘火车又回天水去了。

就在李景沆身体稳步好转之际，农场里绝大多数劳教人员的身体状况却在继续恶化。死亡继续威胁着每一个浮肿的躯体。没有言笑，人人有气无力，包括身体稳步好转的李景沆在内也是如此。有人对李景沆说：“老李，把你剩下的炒面放到被窝里去吧！”李景沆知道把它放到被窝里比放到外边要安全得多，但他缺乏把炒面提一下的力气，他也懒得再去拉一次被窝。李景沆瞅一眼自己的炒面，想把它挪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有动。他觉得增加任何一点点体力消耗都是不合算的。

这个时候的明水劳教农场，更加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李景沆隔壁地窝子里的一个年轻人一开始浮肿就写信向家里求救,老母亲接到信后就立即赶来了,结果年迈的老母亲赶到时儿子已不能言语,只扑闪了几下眼睛就咽气了。千里迢迢赶来的母亲和儿子连一句话都没说上,儿子就死了。老人哭得肝肠寸断,让李景沆们这个地窝子里的许多已经心如止水地等死的人们也流了眼泪。

还有一次,从外边抬进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就睡在李景沆旁边。从进来开始,这个人就从头到脚裹在被子里不停地呻吟。开饭时,每人一份,但给这个人却没有。为什么不给饭吃,李景沆不知道。地窝子里躺着的劳教人员已经自顾不暇,没有人能够顾得上他的死活。偶然进来的管教干部和炊事员是应该管一管的,起码应该走到跟前看一眼,或者问一问。但是,没有人这么做。呻吟三天三夜之后,这个人就咽气了。

这时,所谓的管理工作似乎已经简化到只剩下了两件事:第一,由炊事员送两次稀汤饭;第二,往地窝子外边抬尸体。

地窝子惟一的采光口是门道,冬天太冷,门道外边要挂一个草帘子。草帘子一放,地窝子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李景沆躺在靠门的土台子上,对草帘子揭开以后门口发生的事情能看得一清二楚,尤其是对打饭的情景更关注,因此看得更清。当时,地窝子里的人已经不能够或不愿意再起床,大多数情况下是大师傅把饭盆端到地窝子门口,然后分别给每个饭盆盛上糊汤饭,再送到铺位前。

有一天打饭时发生的事情,成为两幅永久性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了李景沆的大脑中。

第一个画面:大师傅为一个劳教人员打上了饭,往铺位上端的时候,看到稀汤中有两截胡萝卜,便十分麻利地用手捞出胡萝卜填到自己嘴里,然后才把剩下的清汤送给了那位可怜的劳教人员。这使李景沆意识到,灶房大师

傅都已经饥饿难耐了。

第二幅画面：大师傅钻进地窝子里边为一名劳教人员拿出了饭盆，舀了一勺饭汤正要往盆里倒的时候，顿了一下，盆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大师傅随即把这个饭盆翻扣在地上，磕了磕。一股刺鼻的臭气在空气中弥散开来，李景沆赶紧用被角掩住自己的鼻子。分明是磕出了一堆粪便！但他看了看打饭的大师傅，大师傅面部并无诧异的表情，倒出粪便后就把稀汤饭舀进去了。在劳教农场，脸盆与脚盆合用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大家都能接受。不过他们在到达明水农场以后已经很少洗脸。不洗脸，不洗脚，脚盆和脸盆没用了，能换点吃的就换点吃的。饭盆却不但不能没有，而且显得尤为重要。饭盆做便盆用，李景沆是第一次看见。倒出粪便，不经清洗就把饭舀进去，更让李景沆既惊讶又伤心。这是一个已经没有力气把自己的粪便倒出去的病人，如果他的亲人此时此刻守在身边，能发生这种事情吗？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古今中外，发生过这种事情吗？若干年以后，如果把这一幕说给子孙听，他们会相信吗？李景沆心里一阵恶心。他自己的饭已经打来放到铺上了，他明白，再恶心也得吃下去，想活下去就得吃，反正自己的盆里没有粪便。他一口气把一盆稀汤喝光，还把盆子舔得一干二净。只是一想到饭盆里边装大便，他就一阵恶心。李景沆很后悔，心想给别人打饭，我看的什么？

1961年元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九点多钟，明水农场来了一辆大轿子车。汽车停稳后，走下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这个人来到站在那里看汽车的李景沆跟前，十分和气地拍着李景沆的肩膀说：“同志，耐心等待，三天之后，国家的大米白面就送来了！”李景沆从1958年5月来到劳教农场，到这个时候已有两年半时间了，还没有碰到过一个对他如此客气的干部，光是那一张笑脸，就够温暖人心的

了,况且还称了“同志”,又说三天之后有大米白面送来,该不是做梦吧?李景沆怀疑自己的听觉出了毛病。干部见李景沆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自己,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李景沆这一次听得更真切了,他自言自语地重复着干部的话:“三天之后,国家的大米白面就运来了?”李景沆琢磨不透这句话的含义。他是惊涛骇浪中抓了一根救命木头的逃生者,他渴望能有个逃生的机会和处所,但他不敢有不切实际的奢望。思来想去,他当然特别希望这位干部说的话是真的,但他同时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到了下午两三点钟,李景沆发现,所有他碰到的管教干部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都很像上午九点多钟从大轿车上走下来的那位态度和善的干部,见到劳教人员时,一个个笑容可掬。管教干部从全场各个角落喊:“大家都到场部来啊!有事情要安排!”把劳教人员们召集到一起以后,安排了两件事。第一件,给每人注射一针葡萄糖,以增加营养。第二件,鉴于相当一部分劳教人员已经饿死,天气严寒,剩下活着的人数量已不多,决定把地窝子里的人员全部撤出,把场部不多的一些房子全部腾开用以住人,立即改善劳教人员的居住条件。李景沆被安排在一个像教室的大房子里,床板上铺上了软绵绵的草垫子。安排完这两件事,管教干部们并没有给大家做什么过多的解释。既没有什么“上级关怀”这样通常的套话,更没有说劳教农场的严峻现实引起了上级党和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改变现状之类彻底安定人心的话。因此,劳教人员们只看到管教干部的态度有好转,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对自己能不能活下来,特别是能不能活着出去,仍然是心中无数。大家仍然在忐忑不安中等待,在饥饿中等待。

几位农民模样的人来到李景沆的“新居”,说是用大米换他们的东西。农民一眼就看上了李景沆的俄罗斯地毯,问他换不换。这块地毯是李景沆家里几代人的传家

宝，他有些舍不得，同房的难友也有人劝他留下自己用。可李景沆想想那些陆续死去的难友们，便伤感起来，他想“能换几斤是几斤吧，不换，我死了还是人家的！”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这块毛毯换了七斤大米。李景沆回忆说，当时的行情，一块半新不旧的罗马表可以换两个馒头，连管教干部与农民换东西都是这个价位。

“新居”已生了炉子，炉火很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穿着白大褂的女子们出出进进地生炉子、添煤、打扫卫生。说是上级派来护理他们的护士。但由窑街煤矿打成右派的尚世洁回忆说，那些女子们是从另一个劳教农场——边湾农场转来的。她们也是劳教人员，大多是解放前上海滩的妓女。李景沆从他的七斤大米中取出二两倒进自己的搪瓷杯，放到火炉上煮成粥吃了下去。香甜极了，他不敢多吃。一则东西不多，需要节约点吃；二则饿极的人，吃多了对身体无益。吃完了粥，李景沆就准备把剩下的大米收藏起来，但回头一看，他的大米不见了！“我的大米呢？我的大米呢？”难友们告诉他：“老李，不要喊了，你的大米已经被刚才进来的那个护士拿走了。”李景沆气愤极了。七斤大米，那是他用自家的传家宝换来的救命的米，不到万分紧急关头，哪能把传家之宝换出去呢？而且，自己舍不得多吃，七斤米才吃下去二两！数学老师李景沆心算之后马上得出结论：自己才吃掉百分之二多一点，而百分之九十七叫这个可恶的护士顺手牵羊拿了去！再说了，护士工作是救死扶伤的工作，你的责任就是救难救急，是让你抢救人命来的，而你却把你的抢救对象的救命粮抢走，这和拿刀子杀人有什么两样？李景沆想问：派护士到农场护理病人的组织，你知道护士进场以后做了什么事吗？可是问谁呢？谁会为你作主呢？那几位眼看着护士顺手牵羊拿了李景沆大米的劳教人员，个个都是半死不活躺在那里动弹不得的浮肿病人，他们特别需要别

人护理,没有人护理,他们也只有躺着等死,他们敢去得罪那几位护士吗?李景沆只得自认倒霉。

俄罗斯地毯再也回不来了,回不来,不去想它就是了。虽然管教干部的态度有所好转,居住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伙食依然糟糕,饥饿感并未减缓,妻子上次带来的炒面已快贴补着吃完了。掐指算来,妻子离开高台回到天水的的时间已近一个月了。按照他和妻子的约定,立珍应该再到农场来一趟了。刚到一个月的时候,赵立珍没有来,但李景沆的姐夫从天水来了,当然是受赵立珍和李景沆父母的委托,代表他们全家到农场来的。姐夫带来了一摞饼子和其他一些吃的东西。姐夫旅途劳顿,到了李景沆的“新居”,又有了暖洋洋的炉火,即刻就来了睡意。他往李景沆的床上一靠,立即鼾声如雷。同室中饿急了的那些难友们,看着天水的大锅盔直流涎水。一个胆子大的上前掰了一块,李景沆根本没有护卫自己食品的能力,只是躺在那里呼唤:“姐夫,姐夫,他们拿我的馍,你起来给我要回来。姐夫起来,姐夫起来!”李景沆的姐夫由于长途奔波过于疲劳,睡得很死,李景沆的声音又过于微弱,他姐夫的鼾声没有停顿片刻,继续打着。同房的人们一看,掰一块是一块,不掰白不掰,纷纷前来,你一块我一块地抢。一阵工夫,一摞饼子被抢了个荡然无存。

俄罗斯地毯换来的大米吃到嘴里的是接近百分之三,损失掉的是百分之九十七。而这一摞大饼,李景沆一嘴也没有吃,就被人抢走了!万分痛苦之中,门开了,进来一位管教干部问:“李景沆在吗?”李景沆回答在。干部又问:“有家属吗?”李景沆回答有。干部说,“家属可以带上李景沆明天回家!”李景沆若干年后才知道,因为当时西北局刚召开的兰州会议要求紧急抢救人命,这是劳教当局采取的应急措施。把李景沆安排在首批回家的名单中,刚好他的姐夫这一天就在农场。这是巧合,但李景沆认为

这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要拯救他的生命。因为同一个大房子的人中间，只有李景沆接到了可以回家的通知，其余的人眼巴巴望了半天，管教干部并没有说他们的事，给李景沆交待之后就出去了。管教干部走后，有一个人先哭了一声，接着众人齐声哭叫起来。他们边号啕边说：“老李你活了，老李你活了，我们死定了，我们活不成了。”众人齐号，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可惜戈壁滩人烟稀少，没有几个人能听到他们这样多的人一齐大放悲声。能听到的人，也并不为这样的悲声所动，因为这里的人们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如果把当时的劳教农场看成是一个世界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哭喊是没有用处的。

出发之前，医生为虚弱已极的李景沆再次检查了身体。医生告诉他：你虽然虚弱，但心脏没有什么问题，你打起精神，不要有什么顾虑，一定能安全到家。场方给李景沆发了二十元钱的路费，还发给了一些路上吃的馒头。一切准备停当，李景沆和他姐夫就坐在门口等候汽车到来。就在他俩等车的工夫，一群劳教人员围到了李景沆身边。一个人说：“老李，救救命吧，我这双鞋还是新的，放到这里没有什么用处了，你回家还能穿一穿，给我换一个馒头吧！”没等李景沆说话，那人就已经放下鞋抢了一个馒头走了。另一个人说：“老李，这是几斤粮票，在农场里用不上，你是好心人，救救命吧，把粮票给你，给我一个馒头吧！”没等李景沆说话，这个人放下粮票，抓了一个馒头就走。李景沆没有守护之力，只好眼睁睁看着别人一个一个把馒头拿走。姐夫提醒李景沆把馒头抱紧，可抱紧了馒头，有人又把他刚“换”来的鞋拿走了。就这样，汽车未到，他上路的干粮已让人拿了个精光。李景沆想，拿就拿吧，反正我要回家了。只要回到家里，总比他们留下的人门路多。姐夫责备李景沆：“你一个馍不剩，路上几天怎么过？”

李景沆无言以对，只得任由姐夫数落。但这位基督徒此时心里倒觉得很平静，因为他在自己也十分困难的时候援救了别人。

汽车开过来了，首批获准回家的劳教人员在各自亲属的陪伴下登上了汽车。汽车就要启动的时候，上来了一位管教干部，用眼光搜寻着什么东西。这位干部的眼光最后落在李景沆的手提包上，然后一把从李景沆手中夺走，说：“这是我的提包！”说完就下了车。全车人刷地一下全把眼光盯到了李景沆身上：“原来这个瘦子是个贼！”“已经批准回家的人了，还偷人家一个提包干什么？”汽车司机高声叫道：“把这个贼拖下去！把这个贼拖下去！”李景沆受了这般突然打击，心想这下完了，今天只要被拖下去，那就彻底无望了，必死无疑！他闭上双眼，任凭别人怎么喊也一动不动，只是哭着在心里祷告：主啊，这个提包是我省吃省喝在小卖部买下的，千真万确是我自己的东西。两年多来，除了农民地里的两个胡萝卜之外，我没有偷过别人的任何东西，你保佑我，千万不要让他们把我拽下去，拽下去我就没命了。主啊，救救我！这时，抢走李景沆包的那个干部又爬上了汽车，把提包甩给了李景沆，并向大伙儿声言：“提包是他的，不是我的！”原来这位干部到车下打开一看，里边不是自己的东西。毕竟是国家干部，栽赃的事情不能干，才又重新登上汽车把提包甩给了李景沆。这样一来，司机停止了喊叫，汽车上的全部乘员也才安静下来。李景沆心里的一块石头也才落地：感谢上帝！好危险啊。主啊，我活了，我活了，我有救了。

汽车开到了火车站。自由市场刚刚有限度地开放，饭铺里的生意已开始红火起来。大家下了汽车，就各顾各了，有的去购票，有的去候车室问车次情况。李景沆和他的姐夫则提着行囊径直来到一家饭铺。伙计问他们吃什么，李景沆问有什么，伙计随口说了几样，李景沆说：“当

然吃红烧肉。”不一会儿，红烧肉端上来了，大块子的，李景沆两三年没见过这东西了。他做梦见过好几次。但梦醒之后想，今生今世怕是再见不到这东西了，不想今天竟能端到眼前。油光闪亮、香气四溢的肉块，看着真是过瘾。李景沆先让姐夫“吃”，姐夫就吃起来。李景沆用筷子也夹了一片，刚要往嘴里填，他又停下了筷子，把肉片仍放回碗中。姐夫问他为什么不吃？他说：肠胃好长时间没见过油水了，这几块肉吃下去，必然闹病，可能是要命的事情，你吃吧，我不能吃。李景沆要了一碗白开水，泡了一块馍，十分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就算是午饭了。一个几乎饿疯的人，红烧肉到了嘴边却不敢吃，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控制住自己的食欲，需要多大的力量！李景沆后来回忆说，人没有这个力量，我靠了神的力量，是上帝帮我这么做了，上帝保佑了我；否则，非吃死不可。

李景沆和姐夫是下午登上东去的火车的。火车上人挤得要命，一会儿，他们所带的行囊就全部被挤丢了。没有列车员或乘警什么的来问一问，走道里站的、坐的、躺的，到处都是人，没处下脚。两个人的座位挤三个人，三个人的座位挤四个人。工作人员没有办法巡查。丢掉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再找回来的。

因为是慢车，上下人员多。列车快到张掖时，李景沆和姐夫终于找到了一个座位。但由于李景沆的身体极度虚弱，又不敢吃东西，臀部的瘦骨头顶在硬板凳上，硌得他直冒虚汗，浑身不舒服。李景沆对他姐夫说：“我实在坐不住了，一点点力气也没有，你让我下去，缓一缓再上车。”姐夫十分为难。眼下，所带的东西已全部丢失，就连在高台上车前买的几个包子也被人拿走了，到兰州还要倒车，剩下的盘缠是紧绷紧，只够勉强到天水用。如果路上再一耽搁，怎么回到家去？姐夫劝他坚持，到了兰州再休息。从张掖到兰州，李景沆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

的。他几次想从窗子里跳出去，在急驶的列车中往外跳，一下子就能了却此生，同时也就结束了难熬的痛苦，但是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往外跳呢？没有办法，只好一分钟一分钟地挨。

好不容易到了兰州，换车休息时，李景沅迈着沉重的脚步去排队打开水，又受到工作人员的严厉训斥，让他站到远处，等别的客人全部打完再去打。李景沅自己清楚，此时的他已是蓬头垢面，衣衫肮脏。车站工作人员是把他当成乞丐来训斥的，非常合乎逻辑，他没有力气与车站工作人员去争执，也没有这个必要。但他在心里说，让李景沅吃饱肚子，再换上整洁的衣服，不比你们差！李景沅让姐夫给他买了一个小面包，他慢慢吃了下去，他依然不敢多吃一口，生怕肠胃闹毛病。人在路上不比家中，小心为好，就在他坐在候车室里候车的时候，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突然窜到一个小孩子跟前，伸手抢过小孩子手中的油条，一把填到自己嘴里，边吃边逃。孩子的父亲追上前去照准那人后背猛击一拳，那人踉跄了几步继续奔逃。孩子的父亲明白，追上去也没用，东西也被他吃进肚里去了，只好回转身照看吓得发抖的孩子。父亲把孩子搂到怀里以后，孩子才“哇”地一声扯破嗓子哭了起来。李景沅由此断定省城也都在饥饿之中。

在兰州上火车时，李景沅行走时吃力的样子引起了列车人员的注意，问明情况以后，列车员主动替他补了一张硬卧票，才使他得到了稍稍的休息。快到天水时，实在饥饿难耐，李景沅在餐车上买了一碗米饭，没敢要肉菜，就连米饭也只吃了几口，便交给姐夫吃掉了。没想，吃上以后只十几分钟就开始泻肚子。下泻之烈，比吃了泻药还厉害。到了天水车站，下车后第一件事是找厕所，但紧找慢找还没有来得及找见，就弄到了大衣上，肮脏难闻。天水火车站离天水市还有十几公里路，需乘汽车。李景沅一

看,乘客十分拥挤,秩序又不好。他的姐夫这时已离开他到别处去了。等下去,到天黑也乘不上车。李景沆找到一个随车服务员,告诉她,自己是个病人,急需要家人照顾,如不能及时回家,将有性命之忧,他还对服务员说:“服务员,你看我的脸,你看我的眼,我快不行了,请照顾我一下。”感谢上帝,这个服务员是个极富同情心的人。她走过去跟司机耳语了几句,司机立即跳下驾驶台,到车门口吆喝大家给这个危重病人让个路,叫他先上去。乘客们登车心切,谁都假装没有听见司机的叫喊。司机看着大家都没个什么反应,怒不可遏地解下了自己的皮带,来到车门口一顿猛抽,谁往前挤就抽谁的头,终于打开了一个通道。李景沆在服务员的搀扶下上了汽车。坐在开往天水市的汽车上,李景沆寻思: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是挤不上这趟车的。下一趟,下下一趟也没有指望。今天这位司机和服务员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司机是用皮带打了别人,别人被迫让开路之后我才得以上了车的,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恩典吗?感谢上帝!到了天水市汽车站,在服务员搀扶下,李景沆下了车。服务员还帮他雇了一辆人力架子车。李景沆使尽全身力气,爬到了架子车上。“上帝啊,我回家了!上帝啊,我回家了!”这个声音没有发出来,李景沆的力量已经耗尽。架子车拉到古风巷他的家门口时,他再也没有力量自己从车上爬起来。一家老小叫了几个邻居,把李景沆抬到了家里。两年多前,儿子是扛着行李,自己走出家门的,是个挺精神的中年人,如今已经奄奄一息,一步路也走不动了。父亲抱住儿子的脚,母亲抱着儿子的头,妻子和孩子们围在周围,好长时间大家不说一句话,只是哭。母亲和孩子们大声哭,父亲和妻子低声啜泣,一家人哭成了一团。李景沆一边哭一边说:“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哭了好长时间之后,父母亲 and 妻子一起把李景沆抬

到了炕上，给他铺了一套干净被褥，伺候他静养。父亲躺在儿子旁边说：“孩子，我听你媳妇的二爷说，你已经饿死在夹边沟了，我就把家里攒下的一点钱装在口袋里准备当盘缠。我想，一旦有了你真不在人世的准确消息，我就要到兰州去，我准备到省政府去给你讨公道，也可能讨不上公道，如果真讨不上公道，那我就跳到黄河里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反正活是活不成了。现在你回来了，我也不死了。看起来前面说的那些话也是误传，咱们还是要好好活着。”

此后，为李景沆换洗衣服、端水喂饭的事主要落在了赵立珍一个人身上，年迈的母亲为她做个帮手。不管怎么说，李景沆活着回家了，只从这一点说，就值得高兴，再忙也值得。为了儿子和丈夫早日康复，母亲和妻子什么苦都愿意吃。李景沆的腹泻还没有止住，母亲只准他每顿喝一小碗面糊糊，妻子为他配了止泻药，但并无疗效，每次吃过饭十几分钟以后就大泻不止。一连几天，李景沆的病情也不见好转，一家老小都着了急。

李景沆的病惊动了——一个养羊的邻居，也是一户信仰基督的人家——徐奶奶一家。徐奶奶前来看望李景沆，告诉他：“李兄弟，你走了两年多，我们天天都向主祷告，祈求赐你平安，保佑你回家。我一辈子养羊，不会干别的。再有十天，我家母羊就该下羊羔了，母羊下了羊羔就有奶。你坚持着，再有十天，我送你羊奶喝。羊奶是好东西，暖肠胃，喝点羊奶你就能缓过来了，一定的，愿上帝保佑你，阿门。”说完，徐奶奶就回家了。李景沆想，十天，老天爷，我这身体能坚持十天吗？腹泻不止，什么药吃了都不起作用，真是愁人。李景沆的父母和妻子比他还要着急，但着急有什么用呢？

李景沆静静地躺在床上。一次，他在调整卧姿时，一伸脚，把脚伸进了被子里一处开缝的地方，脚直接踏到了

棉絮上。李景沅感慨万千。妻子是个十分机敏、勤劳的人，什么家务活都力求井井有条，决不落后。现在，她虽然每天忙碌不停，却连被褥也收拾不齐整了。可见确已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实在也太难为她了。一个女儿夭折，一个儿子送人，这是李景沅回到家中几天以后才知道的。若非山穷水尽，怎么能走到这步田地。李景沅回到家的这几天，谁也不愿意提起这种叫人伤心的往事。妻子感到内疚，但他体谅妻子，他不认为这是妻子的过错；相反，他只怪自己，他自责没有尽到当父亲的责任，在孩子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远在天边，连一句关心体贴的话都说不上！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想弥补已经没有可能了。

第二天天刚亮，“嘭嘭嘭！”就有人猛敲大门。李景沅的父亲赶紧跑过去，把门打开一看，原来是徐奶奶。她端着一碗羊奶，边进门边说：我家母羊昨晚提前产羔，今早奶就下来了，我赶快挤了一碗先端给李兄弟，赶快叫他调理。母亲把这碗羊奶平均分成了四份，六个钟头吃一份，刚好是一天的量。一连四天，徐奶奶每天给李家送来一大碗羊奶。从喝羊奶那一天起，李景沅的腹泻就停止了，从第四天开始，李景沅感到自己瘦得皮包骨的有一点点肉了。从第四天开始，除羊奶之外，母亲在他的饭食中增加了一点面食，再后来又增加了一点蔬菜，食量逐步恢复正常。李景沅用手触摸身上各部位的肌肉，明显感到一天好似一天。精神也很快恢复。一个月之后，李景沅自己感觉已经恢复了健康。与两年前离开天水西行劳教时的李景沅相比，差别不是很大了。

如果没有徐奶奶家的羊奶，就没有李景沅迅速康复的身体，甚至能不能活下来都成问题。明明母羊的预产期还有十天，而就在李景沅危在旦夕之际，母羊却提前十天产下羊羔，产下丰富的羊乳，又遇到了徐奶奶这样热心肠的老人。这当然是巧合，是李景沅的好运。但李景沅认为，

这是神迹，是上帝的安排，是上帝要救他一命。不然，我李景沆能活下来吗？

按劳教农场安排，李景沆先到市委组织部报了到。经市委组织部介绍又到天水一中报了到。汪都校长接待了李景沆，欢迎他结束劳教回校任教。校长和老师们既为李景沆的生还庆幸，也为没有能够回来的那另外五位老师伤心。特别是那位老校长、老地下党员任纪文，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都挺过来了，夹边沟怎么就挺不过来了呢？是的，人们对此很难理解。

汪校长问李景沆有什么要求，李景沆说他不愿意再教书了，他会木工，学校也需要木工人员，他说他干木工就行了。汪校长没有同意李景沆的要求，希望他重返教师工作岗位。李景沆说他身体虽然有所恢复，但不能站立时间过长，不要说四十五分钟了，恐怕连半个钟头也站不住。汪校长说，半个钟头不行就站二十分钟，二十分钟不行就站十分钟，十分钟不行就站五分钟。你也可以坐下讲，你不能离开这个教师工作岗位，组织上需要你，教学岗位需要你。

李景沆只得回到他阔别将近三年的讲台。但他一旦站到讲台上，从头一天开始，就是四十五分钟不歇气。他太爱他的数学和学生了。这一站，就站到了退休。

在李景沆年近花甲的时候，又从天水一中被调往天水师专即今天的天水师范学院，一直工作到六十五岁。他不认为这圆了他青年时代的大学教授梦，他有太多的遗憾。

李景沆认为，神爱自己，自己也应该爱神，爱别人。在他周围的同事或相识的人当中，有几位最值得他去



李景沆从夹边沟生还后，这是他1965年自己做小桌的生活照。

爱的人而没有得到他的爱。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候,在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别人的爱。如今,这些人都已悲惨地死去,这是他终生的遗憾。用什么办法弥补呢?李景沆在已经完成的他的十万字的自传《我蒙恩的一生》中,对这些人做了简单的记载,他的惟一希望是后人不要忘记他们,特别是不要忘记他们优秀的品质、渊博的学识和对天水教育事业的贡献。这些人包括:

语文老师王锦,他在学生和教师中有崇高的威望。他死后四十年,曾有一篇署名“千里情”的文章歌颂他高尚的师德。除语文知识,他时时注意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教学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他为他倡导的这些优秀品质付出的代价是生命。他是在三天没有得到任何食物的情况下饿死在夹边沟的。

裴子峰老师,生前刚直不阿,死后他腿上的肉被人割走,据说是被人吃掉了,而且是千真万确。李景沆说起这事就伤心落泪。他分析,夹边沟农场的那个时期,割了亡人身上的肉肯定要吃的,不然就不会去割。他说,有一个吃人肉者,就在水市某县,现在还活着。因为我自己是基督徒,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不管是什么人,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我只求上帝饶恕他的罪过。

杨坎生,天水师范的老师,他的哥哥杨对生背叛了地主家庭,早年参加革命,后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抓获,惨遭杀害。这样,杨坎生的家庭出身既可说成是大地主,也能说成革命烈士。他自己当然要强调是革命烈士家庭,但他的上级是根据需要来说的。想贬你,你就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想褒你,你就是革命烈士家庭出身。杨坎生以他政治上的谨慎和工作上的努力平稳度过了反右派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但到“反右”时尽管他一句右派言论也没有,还是因为他的地主家庭出身而被划入右派分子行列,送到

了夹边沟农场，最后饿死在夹边沟，他的夫人投井自尽。

肖祖贻老师，一直在天水一中教授化学，是李景沅《我蒙恩的一生》中写到的惟一躲过了反右派斗争的一位老师。肖祖贻的化学课讲得非常精彩，人称“肖化学”。李景沅用数学方式观察、思考、处理各类问题，与李景沅相类似的是“肖化学”则用化学眼光观察和处理问题。他特别注重学生对化学基本概念的掌握和化学知识的应用。他教授的班级在化学各类考试中总能获得好成绩。“肖化学”高高的个头，消瘦的身材，穿上一件中式蓝大褂，一派仙风道骨。他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但是，“肖化学”躲过初一，没有躲过十五，在十年浩劫中，不愿每天遭受人格的凌辱和折磨，一头撞在一辆停驶的卡车上，血洒天水一中大门甬道，用鲜血和生命证明了他的清白和无辜。

还有一位令李景沅念念不忘的人，是当年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的管教干部宋干事。2002年8月2日，作者出差到北京时，用手机接到过李景沅的一个长途电话，他央告作者调动最大的活动能量替他寻觅这位中等个头、中等身材、面孔白皙的南方人宋干事。李景沅说这个人太好了。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宋干事能时时照顾自己，难能可贵。找到他，我要好好地感谢他，我要把他写进我的《我蒙恩的一生》中，我要祈求万能的主保佑他，让他流芳百世。

晚年的李景沅，生活是幸福的。如今，他儿孙满堂。妻子赵立珍身板依然硬朗，与李景沅相濡以沫，相敬如宾，相互关照，和谐美满。孩子们事业有成，有的是大学教师，有的是中学教师，有的是企业负责人，也有留学国外，定居美洲的。但是，最叫他满意的，是他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从事他信仰的基督教工作。如今，李景沅是天水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四名委员之一，又是委员会的长老，除了布道和教会

的管理事务外，还热心于天水的慈善事业。他积极引导信教群众遵守社会主义法律，配合政府，为天水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作为地方党组织和政府联系基督教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桥梁，李景沆受到了地方领导人的尊重，也受到信教群众的爱戴。

李景沆说，他还有一桩未了的心事，就是在他有生之年，再去一次夹边沟、新添墩和明水农场，看一看他劳动和生活过的老地方，看一看新添墩南边那个古老村庄里的那位女天使——那天晚上慷慨赠予他一个烧土豆的好心的农村妇女。几十年来，李景沆经常为她祈祷，祈愿天主赐福给这个好心人。



手捧《圣经》的李景沆已八十高龄，这是他的近照。

省委机关的第一个右派

1957年9月22日，中共甘肃省委机关报——《甘肃日报》以《看！党的叛徒关维智的丑恶嘴脸》为题，发表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全文如下：

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在近三个月来的反右派斗争中，揭露和批判了隐藏在共产党内的右派分子关维智的丑恶面目。

这个右派分子在党的组织部门是怎样向党进攻的呢？首先他反对党的领导和监督。支部为了了解党员思想变化情况制定了一个简单的登记表，关维智便谩骂是“国民党作风”，是搞“黑名单”，并引右派分子葛佩琦的话，骂支部竟然起了“监视党员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所以要引葛佩琦的话来骂党支部，是因为他觉得这句话“最能代表我的心意”。他主张党员在党内就有“绝对自由”和“绝对民主”，不愿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不愿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因此，他表示要向支部“坚决斗争”。关维智并叫嚣“共产党内出现了阶级”，他认为领导同志是“统治阶级”，被领导同志是“被统治阶级”，并说：“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待遇不同，就是阶级差别。”他进而狂妄地主张“我们在工作上不能跟中央转”，对“跟上中央转”的人，表示“憎恨”，说这些人“规规矩矩，没有棱角”。他认为能否给领导

提意见“是考验一个干部的标准”。

其次，他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反动言论。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在报纸上公布后，关维智首先表示赞同。林希翎诬蔑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剽窃胡风的主张，罗隆基叫嚣胡风问题完全处理错了，关维智就认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里的一部分意见“值得考虑”。右派分子说，我们的工作搞得“一团糟”，关维智也认为成绩“不值一谈”。右派分子诬蔑积极分子是“白鼻子”，关维智也把一些靠拢组织和领导的同志称作“奸细”，“和领导一个鼻孔出气”。

他反对“靠政治吃饭”。关维智“经常考虑前途问题，他主张不靠政治吃饭”。理由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表示为了达到有一技之长的目的，要“坚决奋斗”。关维智日夜盼望的“一技之长”是什么呢？下面的话可以找到答案。他钦佩和羡慕孔厥的“写作技能”，他说：“孔厥虽被开除了党籍和（被）作家协会（开除），但他的写作技能谁也开除不了，人家还是一个作家，换个名字照样写文章。”因此，他污蔑干部学习理论是“处处都用马列主义的框框”衡量是非，说“这会限制人的个性发展，就会使人不自由”。

这就是趁党整风之际，与党外右派相呼应，公开向党进攻的党的叛徒关维智的货色。

关维智由此被定性为“叛徒”即右派分子，他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省委机关本身产生的第一名右派分子，颇具典型意义。叛徒的嘴脸当然是丑恶的，原因是他与“党外右派分子相呼应”，“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这位未署名的文章作者提到了好几位赫赫有名的大右派的名字，计有：储安平、林希翎、罗隆基，还有此前就成为“反革命分子”的胡风。搞清这几个人物的大致情况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将有助于我们搞清《看！党的叛徒关

维智的丑恶嘴脸》文章的全部意义。

储安平，“反右”时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在1957年6月1日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有个发言，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其中说道：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亟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取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脸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他们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这就是著名的右派“三大理论”之一的“党天下”。另

外两大理论是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与“党天下”一样，“三大理论”均产生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那个时期，中共中央统战部总共召开了十三次座谈会，最后一次在6月3日结束。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向“朋友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关维智渴望有一个好的党风，但他与当时好多知识分子和干部一样，过于天真。他响应党的号召，也是从自己的党性和良心出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他也就理所当然地同全国几十万右派分子一样，中了“阳谋”。

说他“反对党的领导和监督”，是他“丑恶嘴脸”的主要原因，也是称他为“叛徒”的主要原因。劳苦家庭出身的关维智，本应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同心同德，为什么跟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呢？

关维智祖籍高台。他的爷爷是拔贡，人称“关贡爷”。当时，关家也拥有一些房产，家道还算殷实。据关维智回忆，他的父亲弟兄三个，父亲排行老大。后来，家道衰落，无以为生。关维智的父亲到酒泉谋生，关维智的二叔留在高台家里种地，三叔只身去新疆闯荡。

关维智的父亲来到酒泉后，在南大街现民族饭店以北处开了一间规模很小的杂货铺子为生。杂货铺子后面带有一院房子，1936年，关维智就出生在这里。

关维智五岁时，父亲的杂货铺子经营不下去了，只好又带着全家返回高台。关维智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弟一妹。哥哥关维礼十三岁时患肺结核死去。亲人相继去世的打击和经济的日益窘迫，使他的父亲愁肠百结。无奈之下，关维智的父亲带着子女又回到了酒泉，投奔关维智的舅舅阎林德。阎林德在酒泉开着一家米铺。由于关维智的父亲粗识些字，就在米铺里当管账先生。那时，关维智和妹妹寄宿在阎林德家里，他的姐姐和弟弟住在他的姑妈

家里。

1945年,关维智插班在北斗宫小学(现酒泉市二中)读三年级。1947年,关维智又考入酒师附小,两年后毕业。因家庭困难,他的父亲拿不出钱让他继续念书。关维智想报考不收学费、以勤工俭学为主的山丹培黎学校,但他的父亲坚决不让去,关维智只好又报考了酒泉师范学校。在阎林德的资助下,关维智终于圆了求学梦。

关维智在酒泉师范只念了一个多月,1949年9月25日,酒泉解放。学校放假,关维智躲在米铺里目睹了整个解放过程。解放军进酒泉后,学生纷纷报名参军。关维智也去报名了。但报名站的同志嫌他个子小,年龄也小(关维智当时才十三岁),不要。但倔强的关维智说什么也不肯离去,死缠硬磨,非要报名站的同志收下他。被关维智这种劲头感染了报名站的同志只好写了封介绍信,要他拿着去刚成立的地方干部学校报到。不料,地方干部学校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关维智。关维智这回学聪明了,赖在办公室就是不走。结果,他如愿以偿。在地方干部学校学习了两个多月,12月初,全校师生要背着行李步行去金塔下乡。关维智再一次因年龄太小而未被准予随行,只好留在学校。这个时候,酒泉地委成立了文工团,地点就在干部学校。关维智二话不说,进了文工团,整天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唱歌、扭秧歌,过得倒也快乐。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文工团奉命去东北。热血沸腾的关维智又因年龄原因无法随团去东北。正在关维智沮丧至极时突然峰回路转,他被团地委招收到团委工作了。经过学习和培训,关维智被分配到当时隶属酒泉地区的临泽县。当团地委用车把他送到临泽时,天已全黑了,满目荒凉,一片幽寂。年幼的关维智刚放下行李就大哭起来。第一次离家出远门,他整整哭闹了三天,死活不留在临泽。恰在这时候,酒泉专署的领导来临泽视察工作,听

说了他的情况后,又把他带回了酒泉。为此,关维智十分感激这位领导。

1951年春天,关维智当上了酒泉专署的通讯员。在此期间,他还参与了农村“减租反霸”工作。1952年秋天,“土改”开始,关维智被正式派去参加“土改”。1953年春天,参加完“土改”后,关维智回到专署成为正式干部,被分配到财政科工作。这年,尚不满十八岁的关维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财政科工作期间,全国第一次普选工作开始,关维智先后参加了嘉峪关乡和上坝乡的普选工作。1954年7月,甘肃省委举行全省机要档案培训班。酒泉专署派关维智去参加。在省委学习了一个月后,突然被省委组织部告知:“你就不要回去了,我们这里正缺人”。关维智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关维智被安排在省委组织部档案室工作,他写信给家里,托人把行李带到兰州。一个多月后,省委组织部又派他到西北局组织部(当时设在西安)接收当时在甘肃工作的延安时期的干部档案。趁这次出差的机会,关维智第一次游了华山。1955年1月,中央组织部通知各省选派一名干部到中央组织部整理各个时期的干部档案,关维智有幸去了北京,在中组部呆了一年后,中组部有意要留下他,但省委组织部干部处不放。这样,关维智在1956年春天回到省上,在省委组织部干部处当干事,后又被任命为干部处巡视员,享受科级待遇,工资定为行政二十一级,可参加研究干部问题的部务会。

1957年5月1日,党中央发布“全党整风”的命令。各种言论开始出现。6月8日,毛主席发出“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的指示。关维智并不知情,他相信组织,也相信自己的的



年轻时的关维智
(摄于1957年)

确实是在帮助党改进作风。6月10日,在部内讨论会上,他批评党支部所列的反映党员思想动态的名单为“黑名单”,并说这样做,“起了便衣警察的作用”,是“国民党作风”。从此,他成为省委机关第一个被公开批判的对象。从当年9月份开始,他便失去工作岗位,终日参加机关劳动。直到1958年4月,关维智正式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下放农场劳动,工资由行政二十一级降为二十五级。

我认识关维智,是在他担任酒泉地区(即现在的酒泉市)文化处处长的时候。我进一步地了解关维智,是在他已经退休后成为我了解夹边沟农场的向导的时候。他是甘肃省委机关的第一名右派,在劳教农场参加过劳教。在酒泉,他是“反右”这一段政治风云的“历史博物馆”,而且是一座毫不吝啬的“博物馆”。

1996年下半年,我调酒泉地委工作,分管文教和宣传,而他是地区文化处处长。以他为首的文化处的几位领导,工作都很卖力,有思路、有点子、有措施,工作干得很出色。加上他的前任们及全区文化战线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全区的文化工作成绩突出,已在全国挂上了号。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共同参与筹办了“全国第五次文化先进县经验交流会”。这个会在酒泉召开,全国三十个省、区、市的文化厅、局长都来参加,听了我们的工作汇报,也参观了酒泉市(今肃州区)银达乡银达村、玉门市南门村、安西县环城乡、安西县南岔乡、敦煌市五墩乡、敦煌市杨家桥乡等乡村的文化活动设施和群众的文艺演出。

在银达村礼堂,六七十名厅长、司长、处长们坐在简陋的木条椅上看演出。节目很零散。其中有一出叫《洞房花烛夜》的秦腔,主题是唱了千百年的老主题,劝导人们尊老向善,鞭笞不孝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演员很投入,功夫也好。这种源于生活,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节目很受欢

迎,不光庄户人家男女老少都看得入神,就连那些厅长、司长、处长们也有不少人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农户人家的小剧团,打动了上层文化人的心,是银达人的骄傲,是酒泉人的成就,是包括关维智在内的酒泉地区城乡专业及业余文化艺术工作者辛勤工作的结果。这个时期的关维智,看上去并不像一位花甲老人。他早起晚睡,工作安排得极为周到。后来,在我与他的交谈和阅读他的一些书写材料中了解到,他是要把失去的时间尽可能多地争取回来,为酒泉地区的文化事业,贡献出他的全部光和热。1979年,他在地区电影公司工作,这个时期,他曾在《干部鉴定表》上的“自我鉴定”栏中写到:“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说是极不平常的,带有历史性的。元月份,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对我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进行了纠正,恢复了我已停止了二十年的党组织生活。我看到了自己的光明,我迎来了祖国的春天。我是从死亡线上被挽救回来的,我的心情特别舒畅,我的情绪很高涨,我衷心感谢党,我决心为党,为‘四化’建设再奋斗二十年。”

但是,在他1949年年底参加工作之后,一直到退休的四十多年当中,大多数时间是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的。

从给关维智戴了右派帽子的时候开始,他整整申诉了二十年,但每次申诉都是石沉大海。1978年5月23日,“四人帮”已被粉碎,倍受迫害的人们纷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关维智顾不得“凡是”不“凡是”,他又一次上交了自己的申诉材料。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关维智对整个“反右”斗争的评价,对全国知名右派的评价,对全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和认识,都难免失之偏颇,有些可能是错误的,但对于自己的清白是清楚的,他希望得到公正对待的要求是正当的。他的申诉材料的全文是:

中共甘肃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

我原是甘肃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的干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降四级的处分。一九五八年六月送往安西农场，劳动改造两年半，一九六一年元月在抢救人命中被送回省委。同年夏秋经甘肃省委组织部批准摘去“右派”帽子。现在酒泉地区电影公司当会计。

领导及同志们，二十多年了，我心里有许多话要对组织上说，我对五七年的问题，到现在都不服。“文化大革命”中，我多次向省委组织部提出申诉，要求将五七年的问题帮我复查一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政策对照，我不是“右派”，但一直得不到答复。当时的组织对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处理时只嫌不严，要求复查就不屑一顾了。但这对我本人又是一生的大事。我一九四九年冬天参加工作，到今年二十九年，当了二十年的“右派”（虽然摘了帽子，但还是摘帽右派的待遇）。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年，后来我实在忍耐不住，一九六二年曾给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写过一封信，听说这封信转给了省委统战部，然而还是不见下文。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就不敢多提这件事，稍一出口，“翻案”帽子戴上，时时处处挨整，只好痛苦地忍受。

今天，阳光特别温暖，春风沁人心脾。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万恶的“四人帮”，党的优良传统恢复了，党的政策大放光明。我再次把一九五七年的问题，向你们提出申诉，请你们在百忙中帮我把这些事复查落实一下，这是党的政策，也是我终生的荣幸。

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早上，在组织部干部整风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支部最近搞了个干部名单，记载着每个人的一些言行……对这件事有些支委听了都有点突然，以前未听到，所以在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散会后中午吃饭时，大家对这种作法更是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

下我们干部处的党小组长马鸿恩同志(此人张家川人,不知现在何处工作)对我说:我亲眼见过这个名单,其中在你(指我)名字后面也写了几条。我听了更是火冒三丈,认为在组织生活会上支部的同志平时从来没有人给我同志式地指出我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在背后给我记黑账?所以在下午的整风会上,我第一个发言,情绪激动,言词激烈,措词尖锐,指名道姓,说这个名单是“黑名单”,这种作法是“国民党作风”,是对党员起了“便衣警察的作用”。就这三句话,第二天我成了组织部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

在批判这三句“反党”“骂党”的“右派”言论时,又把我平时在会上的发言和下面的议论搜集起来,加以上纲批判,主要是下列几条:

一、说“组织部内出现了阶级”,领导干部和一般同志是“阶级关系”。前一句话我说过,后一句话是他们分析推理的。事实是当时省委在宁卧庄给高干修了一座很高级的宿舍,设备周到,布置豪华,而一般干部没有宿舍,特别是双职工没有房子,有的不在同单位的夫妻星期六在部长办公室的地毯上过夜(这事是副部长李坤润亲口在部内会上说的)。福利物资的分配,事事分等级,例如省委园子里的苹果,摘下来部长十二个,处长六个,干事二个。福利费的评补尽量满足部长、处长,领导星期天可以带上老婆娃娃坐公家的小卧车去郊游,一般干部出差上车站去要个车就难上难。这方面的事情还比较多,现在也论不清了。当时我太天真,对这种现象在会上或下面都表示过反对意见,我也说过组织部出现了“阶级”这个话。

二、我骂和组织上接近的同志是“奸细”、“白鼻梁”、“走内线”等。当时部内有个别同志,不学无术,干不了什么工作,貌似老实,行为诡秘,会奉迎领导,这个人从来不当面给同志们提意见,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一笑了之,经常给领导送个小情报,打个小报告,在背后嘀嘀咕咕,才被

支部看中，所以我曾骂过上面的话。当时像“奸细”、“白鼻梁”之谈，也是干部处内几个同志互相开玩笑的语言。如马鸿恩、张世英、莫树琬都用这类话骂我，但因是开玩笑，我并不在意。然而，却成了我的“反党罪行”。另外，我还骂过XX处长，我当时认为他很阴险，当面用小恩小惠拉拢人，但在背后整人最厉害。

三、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说我在组织部内提倡大民主，不要领导集中，强调党员要有个性，青年人要有“棱角”，提倡“百家争鸣”，要办“文艺墙报”等。当时组织部内民主空气比较缺乏，有些领导同志听不得不同意见，许多同志，包括一些处长、副处长在私下对他们的作风是强烈议论的。我当时年轻气盛，认为需要打破这种沉闷局面，所以对一些不平之事采取大喊大叫的方法，就是不服他们的专横，和他们顶得厉害。我喜欢文艺，爱写点杂文，曾向支部提出利用一块黑板，办个“文艺墙报”，提倡“百家争鸣”。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官官相护”的小杂文，就是讥讽部分领导的一些不妥当做法，被其他同志登在黑板报上。这些都是我的“右派”“罪行”。刘效先（也是右派）在一九五五年和张韬副部长去庆阳，回来后写了一篇反映庆阳地区退休老干部的稿子，先投给《甘肃日报》，未用，后转投《人民日报》，作为党员来信，并加了“编者按”发表。这件事因同去的张韬副部长不同意，在部内对刘效先进行了批评，我认为这种作法不对，既然党中央的报纸都发表了，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甘肃省委是存在问题，就是事实有些出入，但不能采取压制不同意见的作法。我公开支持刘效先，也是我的“罪状”。

一九五六年，省委组织部搞干部规划，是我和张韬副部长及张世英等同志一起搞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出来以后，无法执行，其中，特别是对青年干部和妇女干部的增长比例无法执行，中央组织部也有了新的精神。当初

规划做好后,我曾说过这是死搬硬套,不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因此针对这件事说过“不要跟上中央盲目乱转”。

四、和当时社会上的右派一唱一和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些大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对这些言论在整风会上进行漫谈评论,其中我对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认识不清,漫谈中,说党外人士宋庆龄可以当国家副主席,还说副总理中也可以放个民主人士。这就是主要的一条,其它都是根据上面的“罪行”来和社会上的右派如葛佩琪、林希翎的反动言论对照出来的。对反革命分子胡风,过去闲扯时说过,胡风如果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对学术上的有些意见还是可以参考。在平时我说过报纸也要适当报导我们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批判时和右派攻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相对照等。

五、其它几个问题:1.一九五六年苏联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人民日报》在这方面的报道较多。我曾说过,毛主席可能知道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但还写了《最伟大的友谊》歌颂斯大林。说我有意图诬蔑毛主席,事实不是这样。2.马列主义是“框框”的问题。我曾经说过,马列主义在思想上可以用,但在生活上不能处处用这个“框框”去套。我没有说过或思想上认为“马列主义是教条”。除了前边有关“骂支部”的问题之外,其它这几条都是反右运动以前的事,从来没有哪个领导或同志提出这些错误,而且还把我从一般干部提拔为干部巡视员(科级),能参加部务会,而在运动中就成了罪行。

以上这些,就是一九五七年定我为“右派”的主要事实。

领导和同志们:从一九五七年至今,这二十多年来,我始终认为我是有错误的,我的主要错误在于:我从参加工作后,背上历史清白、家庭出身好,从小参加革命,年轻

有为的包袱，放松了甚至拒绝对世界观的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在思想意识中无产阶级的东西接受不多，资产阶级的污秽一触即合。这是我犯错误的主要根源。

我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一九四九年酒泉解放后，我小学毕业，家庭困难，无力供我继续上学，十三周岁就参加工作。在工作中深感文化程度太低，在工作中极不适应。我就埋头自学，力争提高文化水平。我对文学感兴趣，特别是对古典文学爱好，我死啃硬钻，既无法进正规学校，也无良师从正面辅导，只抱着“开卷有益”的想法，采取“自我奋斗”的道路，钻在故纸堆中，无形中接受了一些封建文人的思想意识。我想通过刻苦勤学争取自己有所作为。我抱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念，认为在文学上只要搞出一点成就，我就争得了自由，有了“个人的前途”。我还说要为自己的这种理想和信念奋斗一辈子。但我忘记了阶级观点，忘记了为谁服务这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当然我在旧社会只是上过小学，成人做事都在新社会，我没有想到学习本事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旧中国或反革命服务，但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想得很少，只是要疯狂地发展自己。我上面的错误都是在这种人生观的指导下出现的。

但以上述错误，划我为敌我矛盾的资产阶级右派，我是始终无法接受的。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在政治生活中分辨香花毒草、言论行动的六条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二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未能得到认真的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言论上有所放松，但是，这不能和一些民主党派的右派先生们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相提并论，不能无限上纲。我认为我的言论是思想认识范畴中的问题，不是政治上的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问题。以政治上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来划定思想意识中的错误,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然在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乌云压顶,恶浪冲天,社会上右派份子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时候,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当时经过批斗、帮助,我也认识了这些问题。对一个同志的政治处理是一件严肃慎重的事,不能用情感代替党的政策。

当了“右派”的这二十年中,不论在农场改造,或是分配做什么工作,我很清楚自己在政治上这种致命的重负,所以,对工作单位的组织和同志对我的使用和看法我都不怨,只能埋头扎实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加速思想改造。就这样小心谨慎,总还免不了当“运动员”。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我写了一些给报纸投稿的文章,其中有些也发表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主动把这些文章交给了电影管理站(现电影公司的前身)支部,要求审查。支部看过后退回给我。一九六八年我又交出,结果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加上参加了派性活动,他们以“你是右派,谁派你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为由,将我列为“阶级敌人”,被专政了五年。其原因是两条,一是因为我是“右派”;二是我写的那些文章。对这些文章我认为没有多少错误,因为给报纸投稿,惟恐写得有问题人家不用,有错误的东西我是不敢投出去的。我也没有什么私下的笔记、日记之类的东西(专政组在家里搜过)。最后结案的全部材料我没见到,只是有一页上级的批复。宣布为人民内部矛盾,给予“警告”,解除专政。

领导及同志们,听了中央(78)十一号文件和省委宋书记关于落实政策的讲话,感到党的光辉分外温暖,组织特别亲切。二十一年来第一次感到像我这样的人和组织的关系接近了、距离缩短了,心情特别舒畅,情绪也很激动。我像向亲人一样,倾吐了我的上述申诉,我并没有什

么奢望，也不文过饰非，妄图全部推翻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我过去和现在所恳切要求的是对我的问题的性质进行复查。我的问题的关键是定性不准，不应划右派，处分过重。请组织解脱我的精神重压，使我在今后的二十年中更积极地投入新的伟大长征行列，为“四个现代化”贡献一切力量。

我的问题虽然时隔二十多年，但现在复查还是有条件的，因为大部分当事人还能找到。为给组织上提供方便，除材料中涉及的同志外，再列出下列有关人员：

王乘祥，当时的组织部长，现在不知何处。

李坤润，当时的副部长，听说现在是民政局长。

张 韬，副部长，当时他已去宁县工作，但我和他一起工作时间较长，他知道平时情况。

雷秉让，当时的干部处长，听说现在榆中或靖远工作。

黄效震，办公室副主任，现任供电局书记。

王 平，干部处副处长，兰州不知哪个单位。

刘万财，处长，现任嘉峪关市文教局长。

张东明，干部处干事，现任组织部处长。

莫树琬，干部处干事，现在白银。

张世英，干部处干事，现不知在兰州哪个单位。

尚志礼，原党管处干事，现不知在哪个单位。

冯维厚，原党管处干事，现不知在哪个单位，听说在《体育报》当记者。

还有一些同志，一时记不起来，但在复查过程中别的同志会提供出来的。

以上申诉，恳切要求你们受理。

当年，那些全国最知名的大右派之中，除了章乃器开始还“拒绝批评”之外，经过一场场亘古未有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实际是无休止的谩骂和凌辱之后，老右们一

个一个不得不违心地屈辱地低下他们高傲的头。章伯钧“低头认罪”，储安平“投降”，罗隆基开始“交待”。章乃器被迫“检讨”。虽然只说自己是“犯错误”，而且是“思想和作风的错误”。费孝通则于1957年7月14日在《人民日报》上向人民“伏罪”：“我向人民伏罪，继续揭露自己的罪行，也就是为揭露章罗联盟的阴谋作见证。”

在新华通讯社，1958年3月18日上午，已经被折腾了半年多的新华社著名右派分子戴煌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在当天下午两点钟准时到机关二楼会议室开会。他预感到“宣判”自己的时刻到了，于是准备了两个小纸条，上写“我有严重的错误。但我不是‘仇视党’、‘仇视革命’的‘右派分子’，也不同意根据本结论所推演出的论断”。他这是为自己即将面对的“政治结论”准备作出的最后抗争。只要还有一丁点儿希望，就应该这么做。但是，会议主持者在大会一开始就打招呼：“如果不服从决定，将被开除公职，自谋生路！”听到这个“忠告”，戴煌没有再拿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那个小纸条。五十多年后，他在回忆到这段往事时写道：“在宣读我的《政治结论》时，我极为冷静地估量了它的全部意义，我想：如果我不暂且忍受一下‘俯首斩腰’的痛苦，我与革命之间的最后一根线也被切断了。而我还是要革命的，短暂犹豫之后，我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签上‘同意’二字和自己的名字。”运动残酷而又奇妙。它可以打乱人的正常的思维，随意改变一个人的政治面目和一件事的政治色彩。它能把不具备正常思维的人变成“英雄”、“模范”。也能把今天“红”的东西明天就说成是“黑”的。如章乃器，他“走红”时，他的履历是投身于抗日救国和民主革命，一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人士。到了墙倒众人推之际，便有下列种种说法：“爱国是假的”，“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创造向蒋介石卖身投靠的资本”，“勾结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阴谋活动”，“破坏土改”，

“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到了最后，这位被中国当时的知识界称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开始“检讨”。不为人知的大西北甘肃省委组织部的那个小人物关维智还能例外吗？

1957年7月20日前后，省委组织部、财贸部、监委对关维智进行了好几天联合批斗。火力的激烈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在全国大小右派纷纷“缴械投降”的大环境中，关维智开始认识到“我对我的有些问题的看法不承认是不理智的”，为了给自己减轻负担，1957年7月22日，他利用这个星期天，一气呵成，写出了《我的检讨》：

我是一个在党内持有错误立场的人，因此我入党以来，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来我的许多言论、行动及一系列的思想活动都是反党的，我犯的罪行，不但在党内是严重的，而且在社会上也是不能宽容的。在组织上，我虽然和右派头子“章罗联盟”没有联系，但思想上已经加入了这个反党集团。在同志们的一再挽救下，我愿意彻底交待我过去的一切，向党请罪。

一、引用右派分子葛佩琦的毒恶言语辱骂支部。

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党在我身上花了不少心血，可以说党是我的再生父母，但是我丧失了一颗普通人的良心，我对党不是倍加感谢、爱护，不是贡献自己的一切来报答党，而是以怨报德，来攻击、辱骂我们的党，进行反党活动。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我站在和党对立的立场看问题。支部根据党的决定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对党员进行监督，但是我心里有鬼，有着反党思想，很害怕支部对我监督。平时因我的错误受到党监督而积累了不满情绪，这次就起来反对支部的这项工作。对支部成员，我要求撤下来，换上符合我反党思想的同志，允许我的反党活动在党内合法。其实这是梦想，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反党分子在党内是极少数的，在组织部就我一个。如果按

照我的意图建立支部，那就不是我们党的支部。这个问题暴露了几年来我错误思想发展的结果，如果这次不暴露，将会越陷越深，走向绝路。

二、反对党的领导和监督。

我入党时举手承认了党纲党章，新党章我也同意了。但是从我入党后的一系列活动上看，我用了两面派手法，因为我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组织，但暗地里干着反党勾当。到组织部这几年来，我对历届支部、小组长都不满意，甚至对中央的一些决定。我往往用我的言行去衡量党的干部，我不愿意晚上多开会，或非开不可，就去应付，不是看报，便是交头接耳开小会。会开得多了，不是善意地提出批评，帮助改进，而是敌对的要向党支部作斗争，我一贯很少检查自己，也不愿意接受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监督和批评，批评轻了，我顶回去了，重了，我蛮横无理地和他们吵架，甚至恶意讽刺。我骂执行领导意见的同志为“傀儡”，骂和领导接近的同志为“奸细”、“走内线”等，我离间他们和组织的关系，叫他们跟上我转。骂王顺处长，也骂其他一些新提拔的处长，说他们臭架子太大，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中央的决定，我借口根据本地具体情况执行而实际是拒绝。去年的干部规划，我自作聪明，说这叫死搬硬套，盲目执行的结果，因而提出不要跟上中央转。当时我虽然没有明确想出应该跟上谁转，现在看来我是跟上“章罗联盟”转了。

张凌虚(当时兰州铁路局职工，因给领导提意见而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后，我的错误思想更加猖狂了。我把革命的分工，以劳付酬的合理原则，歪曲为“阶级关系”，所以我和领导之间的感情也是对立的，认为领导统治着一般干部，要求别的同志给领导提恶意的意见，谁不这样，我就污蔑为“磨圆了”，用来挑拨下面同志对领导的不满，破坏党的团结。我在平时奉行着“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这句话，我自己走的路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路，向往着大名大利。因为我走这路，就和党的大路是格格不入的，但还是坚持自己的路，丢开党的路，这就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和党和同志搞不到一块儿，我自己提出一套反党的东西，谁妨碍我走路，我就对谁打击、讽刺、谩骂，这条路走过的人不少，都碰回来了，行不通，而我还盲目地追求。

三、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

为了便于我的路走得顺，而且在党内争取合法，因而我片面地要求极端民主、自由，要求无原则、无领导的民主自由，而不受组织和纪律的约束。每遇一件问题，首先考虑的是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许多问题还认为小民主不行，要来大民主，大吵大闹。这是由于我的立场问题而决定了我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对付党的问题，用这个眼光来看组织部，骂部内空气闷人。实际上组织部的社会主义民主空气是浓厚的，这是下乡回来后对比之下产生的感觉。我要求的民主，在组织部是不应该有的。我要用我的观点来改变组织部的空气，这就是我在党内提倡“百家争鸣”、办“文艺墙报”，屡说不像共产党员的话等一系列的活动，这无非就是要叫部内出现更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工作上我主张同志们说咋办就咋办，这就是民主，领导上决定了就是不民主。刘效先的稿子（指反映庆阳地区老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后被人民日报发表的稿子）受到批评后，我首先考虑的不是刘对这个问题的完全错误的态度，和事实有很大出入，而强调党员有这个自由，组织部把刘一棍子打死了，我挺身而出为刘抱不平，还骂甘肃日报是胆小鬼。实际上部内没有对刘提出什么批评。我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剧了刘和其他同志对领导的不满，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利己者总强调自己的自由，而看不见这种所谓自由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害处，也不愿听

别的同志对不正确意见的反批评。一系列问题说明我对自由、民主的要求从自己的利益考虑,有利自己者就去要求、去拥护,不利自己者就去反对、去破坏。把党的组织原则完全抛在了一边。

四、历史性地一贯性地不安心工作。

我不安心工作,不能和别的同志相提并论。别的同志在某一时期,对一项工作不满,这虽然也是个思想问题,但究竟不是很严重的,而我是一贯的不安心。参加革命八年内工作从性质上说是换了五次,从每件具体工作上变动七次。每次工作都是先应付后不满,我到底愿意干什么呢?从思想发展上看,总是这山望见那山高,单凭自己的喜恶爱好去挑挑拣拣。这样看来,革命工作这样多是没有一件可以填满我的步步高的个人私欲的。这哪能算得上是来参加革命呢?

五、思想上抵制马列主义。

前面讲的都是反马列主义的。马列主义和个人主义是针锋相对的。我要个人主义就是不要马列主义,我平时感到马列主义枯燥无味,所以不重视政治理论学习,我把马列主义视为框子。实际污蔑为教条,说这个框子在工作上、在思想上可以用,在生活上可以不用。把思想和生活截然分开,去否定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的意义。我说在思想上用马列主义,实际也没用,要用了,我也不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因此指导我的思想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以我看事物,想问题就是从反面,从歧路上想。我对现实看不见,来说瞎话,马克思以后的这些年,马列主义是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而我反而提出现在人类退化了,看不见共产主义(实际是不愿看),这除了说明我否定革命成果和对党的奋斗目标发生怀疑外,别的是解释不了的。

六、为反革命分子喊冤。

每一个普通的，抱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处理都是拍手称快的。但是我一个共产党员反而迎合右派分子而提出“这个反革命案件要考虑”。百家争鸣提出后，我错误地把这个反革命分子当成一家，要替他来争鸣，替他喊冤。无非是要他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继续毒害全国人民，相反地对革命同志的感情，却完全是另一个样。老干部喜新厌旧，不分青红皂白，要求出来一个包公，杀上一批。这干脆是阶级敌人的要求。对其他同志的着眼点也是以我的思想活动去衡量，一样的就接近，去团结，否则就挖苦、讽刺。

上面这一系列的言行和思想活动，把党章搬出来，不论是对党员个人的要求还是党的组织原则，是没有一点相符的，它强烈地说明，我虽然在党内有个名字，从现象上看是个共产党员，但思想已经完全脱离了党，和党对立起来。这是一个思想立场，思想体系，作为指导而表现在各方面，这就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立场的思想体系，用这种观点来对待现实、考虑问题的。因而我的思想活动是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符合且一呼一应的。如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我不但要求在副总理中放民主人士，还发展要宋庆龄当副主席；右派分子要抹杀工作中的成绩来否定党的领导，而我也要求党报多报道工作中的阴暗面，说合作社里问题很多，这实际是改变党报的性质，这也是反动派报纸的方针；右派分子说胡风是历史上的人物，我提出要考虑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右派诬蔑我们党的领袖，我说毛主席可能知道斯大林的错误，却写《最伟大的友谊》歌颂斯大林，这也是诬蔑我们的领袖；右派骂我们的积极分子是“白鼻子”、“婊阿鼠”，我骂靠近组织的同志为“傀儡”、“奸细”；右派说马列主义是一百年前的教条，现在过时了，我说马列主义是框子，人类退化了；右派分子林希翎说他要做一个有个性、有棱角的青年，我也说不

要规规矩矩，要有棱有角，要求无限制地发展个性，等等。这样看来我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是有意抵赖，强辩。我是个完完全全的右派分子，因为在党内，其危害性就比社会上的右派更大、更阴险。

我认为有两个根本原因使我当了右派分子：

第一，是我的社会根源，我是在资产阶级的圈子里长大的，资产阶级的主要特点都沾染到了我身上，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灌满了脑袋。但是社会出身并不决定一个人一生就坏，而是看用什么态度对待自己，而我的态度是入党时虽然承认了革命的人生观，但旧的思想本质没有清除，实际上没有建立革命的人生观。入党后我一直拒绝改造，坚持错误。几年来党对我的一切教育我都没有听进去，不是用党的思想来改造我，而是我想在党内发展我的思想。每次思想改造活动，都从来没有考虑把自己的思想问题放到运动中改造，在肃反运动中，中央组织部批判姚效先的思想，因为我的思想本质也是一样的，应该在一块儿清算一下，但我看到对姚批判得很严肃，就把自己的思想埋伏下了，也不从中吸取教训，仍按自己的错误路线任其发展，所以错误由小到大，忽隐忽现，一直发展到现在。

第二，就是我提出的“不靠政治吃饭”。我的人生观决定了我对问题的看法，我经常考虑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发展方向，要求一技之长，要有文化程度，要有本事，这些都是求名利的资本，把行政干部看为“万金油”，没前途，马列主义没味道，就脱离政治，不注意从周围发现问题来联系自己，想在别的方面去寻找出路，抱着文艺书籍，钻在这个小天地中生活，想在这方面提高，来向党讨价还价，在考察我的政治面目时，我搬出共产党员的牌子，过后就丢过，设法追求一技之长，认为有了一技之长就身价百倍，有名有利，这也就是我片面地羡慕一些有名的文人如孔厥等的原因。把这两个原因加起来，资产阶级思想的发

展和政治立场上的蜕化，就使我成为一个反党的右派分子。

我的错误，党组织是对我进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教育，如镇反运动中把我从反革命的泥坑里拉出来，到组织部对我不安心工作的多次批评，肃反运动中对我的教育，以及无数次的生活检讨和思想检查等，但我屡教不改，因此我的错误是我自己造成的，组织上尽到了一切责任。这次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是下了工夫的，如果我再执迷不悟，就是自绝于党。因此我愿意下最大的决心，扭转我的思想立场，勇敢地站到党的立场上来，希望党和同志们不要抛弃我，我相信我是可以改造过来的。这个检讨是初步的认识，我将做进一步的检查。

关维智的这份写于近半个世纪前的“检讨”，是极为普通的一份，在当时的高压政治气氛中是惟一能自保的选择。就在关维智写出他的“检讨”的十天之前，即1957年7月12日，就有三名全国知名右派在不同场合合作检查，并陆续被《人民日报》发表。这三名右派是叶笃义、韩兆鹗和毕鸣歧。《人民日报》发表他们的检讨发言时所使用的标题分别是《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愧恨交集》、《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这些检查发言的陆续发表，表明彻底打败了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特别是全国那几个头面人物的“认罪”或“认错”，迅速形成绝对的“一边倒”的局势。作家叶永烈对当时全国局势的描绘是“汇成一支‘右派’们‘是我错’的‘大合唱’”。到7月22日，即关维智利用这个星期天伏案疾书，一口气写出了他的三千多字的《我的检讨》这一天为止，《人民日报》上天天都刊有右派们的检讨发言，计有黄琪翔的《请求人民的宽恕》，龙云的《思想检查》，黄绍竑的《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陈铭枢的《自我检讨》，谭惕吾的《我为什么犯了严重错误》，张云川的《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潘大逵

的《我承认错误》，李伯球的《我痛恨自己给章伯钧利用作点火的工具》，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民主党执行章伯钧的道路》，马哲民的《我要重新做人》，黄药眠的《我的检讨》，宋云彬的《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钱孙卿的《我做了人民的罪人》。

对关维智的这次检讨，属于同一个“整风”单位的省委组织部、财贸部、监委的同志们异口同声说：好。

四年之后，也就是把关维智投入劳教，险些被饿死，又被“抢救”到兰州之后的1961年5月20日，重读自己的检查，关维智在最后一页的下方，又写了几句话，最后一句是：“我知道好在什么地方。因为我照数次斗争（要求）我的思路‘深刻’写下去，再不好，还能怎样。”二十岁刚出头的关维智，原本是一株幼苗。经过一番揉搓以后，彻底蔫了，等待他的是河西走廊的一个个劳教农场、劳改农场、就业农场。

河西走廊，从乌鞘岭到猩猩峡，绵延一千多公里。他的南面是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北面是沙漠戈壁，最著名的是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在高山与沙漠戈壁之间，发源于祁连山向北流入沙漠戈壁的无数条内陆河的两侧，就是一个个所谓绿洲。它们互不相连，单独成“洲”；但又相隔并不遥远，因此有“路”。绿洲养育了河西走廊的各族人民，也为汉唐时期的中外交往铺就了一条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这种路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路。从这个绿洲到那个绿洲，只要骆驼能在几天不吃不喝的情况下坚持走到，不要中途渴死、饿死，也就算是“路”了。

设想一下，在某一个偏远的小绿洲建一个劳教农场，只要把进出农场的汽车管好，谁还能“飞”出去不成？什么叫得天独厚？在河西走廊改造罪犯就是得天独厚。夹边沟、十工、四工、碱泉子、明水河、黄羊河都具有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

1958年春,关维智的问题最后定性,要他到农场“改造”。当时给他的选择是:武威黄羊河农场、张掖老寺庙农场。关维智的亲人都在酒泉,就主动要求到安西十工农场,领导上答应了他的要求。

他先到安西十工,1961年元月“抢救”人命时又被转到高台碱泉子农场。劳动中,他努力“改造”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得到党组织的理解。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他还为自己设计了另一条路: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下去时,他带了一大木箱的书,还有一把胡琴。书是反右以前在兰州陆续购置的,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光《红楼梦》就有三个版本,其中有一个是香港版的。他想的是,劳动之余书琴相伴,过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田园生活,岂不也好?但严酷的现实并不是他所能想像到的。

在以后的将近三年的非人生活中,他目睹了行将饿死的难友们“人相食”的凄惨场面。在以后的二十二年没有人格、没有尊严的生活中,日夜被屈辱所煎熬。

漫漫人生路,苦涩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中。

2001年4月,与关维智一起到十工农场改造的难友和风鸣的纪实文学作品《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出版了。关维智读完了这本书,他是含着眼泪读完的,因为这本书多处记述了他自己经受过的苦难。

关维智对这本书的感受是:“这本书基本上是我一九五七年打成右派后到1961年元月从高台回到兰州的经历和‘改造’实录。”随后,他在和风鸣的书后写了如下文字:

我个人的事需要补充几点:

1.我到十工后,因年轻力壮,在农田里干的机会不多。下去一个月后,调去建水磨,挖土方。夏收后搞基建,修大饭堂,连夜加班,十一前完工,书中有描写。十月份调去安西蘑菇台修水库,这是安西县大跃进的工程,农场抽了六十多人参加。我劳动很积极,被任命为排长,带三十人劳

动。当时劳动很苦，还要和各公社的社员争红旗，抢进度，一天干十四个小时，但肚子能吃饱。休息时我们跑十多里路去榆林窟参观，拜访了郭老道，老人家做了素菜招待我们。就在修水库时我心爱的罗马表丢了。这块手表是我一九五五年被抽出来，以中组部工作人员的名义去青海省委组织部检查工作时，由他们陪我在青海百货公司从两打表中挑选的。这一丢，我一天都没吃饭，一个农场老工人说：“关排长，饭还是要吃的，也许会破财消灾，想通一些。”不想后来的事实真跟这话巧合了。

2.一九五九年春天，水库又不修了。我回到农场后又去开荒，夏收后即书中所写的换场，我必然到四工农场。我和刑满释放的“职工”一起劳动，我没有去玉门农场的条件。因为右派都要到四工。到四工后也没有参加田间劳动，在滩上开荒修渠。冬天就调去兰新铁路肇东车站为大炼钢铁采石灰石。从四工农场到肇东车站，我的双腿几乎冻得被截肢。当时天气很冷，从下午五点一直到凌晨三时，坐在拖拉机的拖斗里，下车时我的两条腿已冻得没有感觉了，是别人把我拖下去的。找到一个工棚，睡着几个民工，有一堆未完全熄灭的火堆。进去后难友们把火弄旺，一个民工知道我的腿冻木了，就拉我钻进他的被窝，不让我烤火。第二天十点钟，我的腿有了感觉。在采矿时每天都是打眼放炮，把炸出的矿石背在铁路旁码成方以便上火车。在背一块大巨石时，从头上滑下，我双手扶地，就砸断了左手中指和无名指。当时受伤后工地医生只给我随便包扎了一下，三天后我发现指头没有任何感觉，皮发白，我给领头的队长说，他让我去安西县医院治疗，县医院打开一看，无名指必须截指，中指可以保留，听医生安排，我就留下了断指“纪念”。

3.在肇东车站(在现在的柳园站和星星峡站的中间)，挖矿石将近一年，一九六〇年因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就开

始死人了。我因手伤，队上照顾，只干不太重的活。其他人就受不了，活重，任务大，吃不饱，我的难友们就想办法，每天有一辆火车通过这个小站停车，就用长铁丝弯成小钩，站在旁边，从车窗中钩旅客们放在小桌上的饼子。我因有点工资（我在一九五七年为行政二十一級，打成右派降四级，为二十五級，每月四十多元），就趁停车时上去，在餐车买饼子。有一次买了三个饼子，下车就吃了两个，留一个用手巾包好放在我铺头的一个小木箱内，还加了锁，第二天我劳动回来，打开木箱，发现饼子不见了。我怒不可遏，大声喊道：“谁偷吃了我的饼子，兔子不吃窝边草，别处去偷！”我的邻铺是书中写的郝治忠（我记得他叫郝志伟），他两眼直呆呆地望我，我已知道了是他偷的。他已虚弱得厉害，我就把这事压下了，再没说什么。过了几天，他说他不行了，除了自己随身的衣服外，再没什么，他要送一条棉裤给我。三天后他就没气了，是我和其他几个人抬出埋在车站附近滩上的。这条棉裤我带回去穿了十多年，一九七二年才因破旧被拆掉。

4. 一九六〇年夏收时我们从采石矿回到四工参加夏收，因肚子饿，吃生麦子是惟一的补充办法。割几镰刀麦子，就偷着搓揉一把麦子，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是不能喝生水，实际上生麦子吃下去并不渴。有的人干脆上田带个暖壶，把生麦子搓揉再吹尽麦糠后放在暖壶里，开水泡后把水倒干，麦子泡胀也就半熟了，才吃。书中第二百八十二页到二百八十三写了胀死人的事情，和我一个小组的上海人殷阿祥就是这样死的，他原是一名军官，我和他一起收割，下工后他路过小渠就喝水，我们还阻止他，他说没关系，下午又吃了一盆糊糊，晚上即肚子胀得大声喊叫，在地铺上乱滚，我还帮他揉肚子，促使下泄。管教干部不知听到没有，反正没进来，我们也没办法。半夜他就不叫唤了，也没气了。又是我和其他几个人把他抬出去埋在了

四工滩上。四工农场有个“严管班”，是专门对偷吃或有其他不轨行为的人设的。白天带出去劳动，晚上从外面把门反锁上，吃、拉都在房子里，限制行动自由，实际是队上的监狱。每天晚上都听到凄惨的叫声，天亮时平静下来，人可能死了，同室的人抬出去一埋就完事，因为大家都麻木了，也不去打听。

5.夏收后我就被调去高台碱泉子滩上开荒。这里和明水农场——接收夹边沟转场右派的那个农场同属一个总场的开荒作业点。在后来因“抢救人命”回兰州时，碱泉子与明水的右派分子是一起集中到高台车站，由总场的管教人员一起押送回兰州的。我记得去高台碱泉子滩是九月，天还不冷，一到目的地，什么都没有，一望无际的戈壁，放下行李先挖地窝子，天亮时才挖好，上盖树枝杂草，就是我们的宿舍。书中第二百九十九页写的我就是那样，带队的张干事看重我，让我当记工员，可以在外出时买到碱草籽馒头。在四工夏收时我已将我的毛哔叽裤子、毛巾被、一件高级风衣在农民家换了吃的，到碱泉子只剩下行李。一个一九五五年被抽到中央组织部时买的帆布箱，装零碎东西及钱。这年冬天特冷，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开始大量死人，吃人肉也司空见惯。书中第四百零三页的描写很真实，省法院的李定国，大个子，圆脸，戴眼镜，俨然一幅法官相貌，就是那样死在我的身边，我们都已做好死的准备，一条裤子，一个被子，一根很长的麻绳。但我好像没有死的恐惧，也没想自己会不会死，只想每天能过去。死人都在夜里，白天不杀人，早上起床看谁没起来，一摸嘴上没气，我们还有一口气的难友就将他用他的被褥一包，用绳子先把头部捆好，浑身用麻绳缠几圈，然后把双脚捆死，四个人一人一角抬出去。挖坑也没力气，只铲个小沟，把尸体放进去用土盖住就完事。这期间我有两件事，一是我的帆布箱被人撬了，偷去180元钱。队上张干事是劳改

系统的，破案有方，三天后就查出是同工棚的谭实干的。谭实原是师大还是其他哪个学校的老师，平时文质彬彬，很敦厚和善，谁知在这种情况下干这种事。他自己也承认了，队上决定把他送高台监狱，又是我和张干事去送。我进了一次高台城，但也送了谭实的命，后来听说他死在高台监狱。到十二月份，荒滩上是呆不下去了，死人太多，粮食无以为继，决定搬到场部。大家都搬走时，张干事让我留下看余下的杂物，并留下可以吃三天的饼子。他们走后，荒地上就我一人，因为饿，我把三天的饼子都吃了，又喝了一两缸子水。麻烦了，半夜里肚子胀得我在地上打滚乱叫。也许我命不该绝。平时不见有老乡，这天晚上从火车站下来个赶毛驴的老乡，听见惨叫声进去一看，问我情况，他用毛驴把我送到场部，当时医生给我泻药，我一拉才活下来。后来打听老乡是去梧桐泉车站送人后下来的，但不知姓名，他救了我。

6.西北局兰州会议后，我们一块儿的杨再春请假回兰州后给我们来信说上级要抢救人命，我们可以回家或回原单位。我们是一九六一年元月下旬在高台车站乘火车回的。下午上的车，到兰州走了两夜一天又一个半天。可恨的是，车上开饭不要粮票，带我们的管教干部集体买，每人每顿一个大饼子。按车上的规定我们可以领到四个饼子，但实际他们只给我们一个饼子。两天两夜一个饼子，还是饿得没办法，连大声抗议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兴奋地小声嘀咕。管教干部说下车按数发给我们。到兰州车站下车后我走得较迟，等省委组织部的同志来接我，因为我也不知道回兰州后先去哪里。就看见管教人员把三麻袋饼子放在他们的车上拉走了。我流着眼泪被接到了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在兰州一只船。

这就是我一九五八年四月到一九六一年元月在“炼狱”中的经历，所以我是流着眼泪读完和凤鸣的这本《经

历——我的一九五七年》的。我感谢此人此书，她把我们的苦难昭示于天下和后人。我很庆幸，我活下来了，我是幸存者之一。但我的心灵上的刀口和阴影，至今无法愈合和消失，可能这一辈子都无法消散。又何止这将近三年的非人生活，而是二十二年，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元月给我改正，恢复公职、党籍，工资为行政二十级。二十二年我从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变成四十多岁的壮年，我的青春年华能补上吗？时间损失能收回吗？二十五年的低人下贱的人格能补上吗？我很愤慨！中国的这段历史，夹边沟、十工、四工等农场的惨状，也应该完全大白于天下，警醒于世人！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我要好好地活着！

二〇〇一年四月底

关维智所写的这个“补充”当中，最叫人撕心裂肺的，莫过于“人相食”这一段了。我照他的提示，翻开和凤鸣的《经历——我的一九五七》第四百零三页，里边对“食人”的描述也极为有限：



1961年，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暂住期间，部分右派分子合影（左起第一排：安xx、范旭东、xxx、关维智、傅维铎；左起第二排：洛宾、杨作林、冯玉林、xxx；左起第三排：高登九、魏振铎、刘仲文）

“当时饿极了的几位难友也曾把死人的屁股割下来煮熟分食——在大饥荒的年代里，饿殍遍野，死人肉是最容易得到的。……原省法院的难友李定国，感到活下来毫

无希望,看到身边的人连死人肉都吃,在绝望之中,把被子撕破,把眼镜也砸碎。在砸碎手表的第二天撒手人寰”。

《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是一部四十一万字的著作,详细地记载了和凤鸣夫妇被打成右派之后的苦难经历。但是讲到最最苦难的经历时,讲到令人毛骨悚然处,却是如此惜墨如金!

亲身经历这场苦难的人,谁也不愿意重提这些过去只有在史书中才能看到的事情。

恶梦醒来,谁也不愿意再回到恶梦中去。

但毕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忘记的。

在苦苦等待了二十二年之后,关维智终于等到了为他平反的这一天。

1979年元月3日,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经过复查以后,作出了《关于关维智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全文如下:

关维智同志,男,汉族,现年四十四岁,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参加革命,一九五二年十月入党。原为省委组织部巡视员。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查看,下放农场劳动,工资由二十一级降为二十五级。现在酒泉地区电影公司工作。

关维智同志对其定性处理不服,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复查。现复查结论如下:

一、关于原认定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整风鸣放会上谩骂机关党支部对党员排队和建立党员思想变化情况登记卡片是“国民党作风”,搞“黑名单”,起了“监视党员的便衣警察作用”,并要求把支部专干xxx撤下来的问题。关维智同志在申诉中承认他在当时整风鸣放会上说过这些话。说他由于听到党支部专职干部xxx同志搞了一个名

单,记载着每一个人的一些言行后,在会上情绪激动,言词激烈地批评了xxx同志,是有错误的,但xxx不能代表党,骂了xxx不等于骂了党。经查原整理的发言记录,关维智上述发言内容属实。从发言的整个内容看,是批评党支部专取干部xxx同志的。批评的措词是很错误的,但还不能视为是对党和党的领导人员的恶意诬蔑攻击。

二、关于原认定反对党的领导。曾在小组会上说:“共产党内出现了阶级”,领导就是“统治阶级”,被领导就是“被统治阶级”,“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待遇不同就是阶级差别”;主张我们在工作上“不能跟上中央转”,对“跟上中央转”的人,表示“憎恨”;他还主张在日常生活中不要马列主义,说“马列主义这个框子只有在一定的场合下可以套,如果处处都用马列主义的框子,就会限制人的个性发展,就会使人不自由”;他提出:“不靠政治吃饭”,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要为学得一技之长“坚决奋斗”;赞同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认为国务院副总理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值得考虑,应当摆几个民主人士,主席中应有民主人士,说宋庆龄就很合适;他认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里的一部分意见和对胡风的处理“值得考虑”,等等。

关维智同志申诉说,原来认定的这些问题,对他的原话的意思有歪曲。关于“党内出现了阶级”的问题。关承认说过“组织部内出现了阶级”一句话,否认说过领导是统治阶级,被领导是被统治阶级的话。关于在工作上“不能跟上中央转”的问题,关说一九五六年冬,根据中组部的要求,组织部搞了个干部规划,青年、妇女干部增长比例太大,后来中组部有了新的精神,原来部里搞的规划作废。所以,他认为对中央的东西不能死搬硬套,应根据本地情况执行,因此,说过不要盲目跟上中央转的话。但没有说过对跟上中央转的人表示憎恨的话。在一九五五年

的日记中他曾写过对跟上别人转的人表示憎恨的话。材料中把两者混在一起了。关于在日常生活中不要马列主义的问题,关在申诉中承认说过马列主义的问题,关在申诉中也承认说过不能光靠政治来吃饭的话。但意思是还要学一技之长,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真本事,光靠共产党员招牌是不行的,要又红又专。关于赞同右派分子“党天下”的谬论问题,关在申诉中承认由于对储安平“党天下”谬论认识不清,看了报纸后说过党外人士宋庆龄可以当国家副主席,副总理中也可以放个民主人士的话。对胡风问题,关承认在闲谈中说过如果胡风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对学术上有些意见还可以考虑的话。

经查,在处理关维智问题时,对材料中认定的问题,当时没有取旁证材料,现在事隔二十多年,有的人已记不清关维智说这些话的具体情况了。根据对原定错误事实和本人申诉进行全面分析,上述问题都是关维智同志在反右派运动之前,日常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思想认识上的缺点错误,有些错误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出现一些认识上的错误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现象,不能把它都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根据中央《划分右派分子标准》中关于“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只是对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规定,对关维智同志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现予以改正。经一九七九年元月二日部务会议讨论决定,恢复关维智同志的党籍,鉴于去年调整工资时给关维智同志提了一级,工资级别恢复到二十级(原为二十一級),过去少发的工资不予补发。

关维智现在过着安逸的退休生活。他的老伴王莲花,

早年找些临时工做一做，近年在家属楼群烧茶炉，不算忙，也闲不住。她是中国传统型的贤妻良母，对关维智的衣食照顾非常周到。关维智不管家务，写写字，看看书，参加一些退休干部和居民社区组织的社会活动，还挺充实。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取妻成家。小儿子关琿夫妇在长沙工作，大儿子关瑞在《酒泉日报》社当记者。

就在本书成书之际，作者问关瑞：“你怎么看你的父亲？”儿子太了解父亲了，他以《我眼中的父亲》为题，发挥他的记者特长，写文章作答：

我眼中的父亲

一个无法理解的年代，但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经历过的年代。

——题记

父亲退休后，在本来就不算宽敞的居室里，辟设了一间书房，并请人题了四个字装裱在门楣上，曰“可追书屋”。偶有来客仰头望字，父亲便说：“逝者已远去，来者犹可追。”然后释怀朗笑。

我似乎明白：父亲过去的岁月里，失去的是青春、时光、尊严，还有他一生的梦；现在，他要努力寻回这一切，穷其余生。

父亲年轻时是个想有作为的人，但一九五七年在省委组织部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去安西农场改造，一九六一年才返回兰州。三年炼狱般的经历，成为父亲心灵上的刀口和阴影，一辈子都无法愈合消散。父亲的左手无名指断了一截，据说是一九五九年劳动时被石头砸断的，成为大炼钢铁的“纪念”。父亲原本喜欢拉二胡，指头一断，年轻时代的浪漫情怀便随着一把斑驳的二胡湮没在尘埃飞舞的岁月里。

父亲戴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帽子。我无法理解也不想理解那个年代，但我深深同情父亲的遭遇，也深深钦佩父亲所具有的那种坚韧不拔、顽强不息的生命活力。与父亲一起劳动改造，一起吃饭睡觉的难友，最后又被父亲亲手埋尸于荒滩野岭，



当年省委机关的第一个右派关维智

而父亲却活下来了。这无疑是对那个荒唐年代最有力的嘲讽和控诉。因为失掉了尊严，所以活着才痛苦；因为失掉了自由，所以活着才艰难；因为失掉了梦想，所以活着才悲哀。但是，痛苦也罢，艰难也罢，悲哀也罢，父亲终究是活了下来。活着走出那个年代的父亲背有些驼了，但头依然高扬，笑声仍然爽朗。还有什么能比乐观地活着更具人生魅力呢？

因为是“右派”，父亲三十多岁才结婚，母亲来自农村。政治上的打击尚未结束，生活上的困顿接踵而至。一家四口人只有一份城市定粮，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糊口。风雨飘摇，父亲如一棵树，顽强地挺直身子为他的妻儿遮风挡雨。父亲四十出头，便有了白发。那是在茅庵河滩电影公司的农场里，我惊奇地发现父亲头顶上生出了几根白发，我指着它们像发现新大陆。父亲哈哈大笑，让我给他拔下来。在后来的岁月里，那几根白发日益清晰地镌刻在了我的脑海深处。我一直尝试着阅读它们，在父亲为我提供的良好的读书环境里。但我始终没有读懂。

生活再困难，父亲也堂堂正正做人。他可以接受别人的帮助，但绝不理会别人的施舍。父亲教给了我们许多做人的道理。在以后我成长的岁月里，那些朴素的道理使我

受益匪浅。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父亲教导我“人穷志不短”；在高考落榜、颓然不起的时候，父亲伸手拉我起来，说：“男子汉大丈夫，没有什么可以打倒你的。”父亲教给了我们做人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传递给了我们力量。这种力量，是父亲用二十多年的生命劫难换来的；这种力量，是父亲对儿子倾注的心血、寄托的希望。

经过了一些世事之后，我才粗略地读懂了父亲的性格。不论是耿直、乐观，还是执着、开朗，浸透到父亲骨子里边的，是坚强，是一种对生命本质和生存意义的坚守，一种对生活强烈的挚爱和追求。没有这样的坚强性格，父亲活不到今天，更不可能在“可追书屋”里读书写字；没有这样的坚强性格，父亲不会就着咸菜，喝着劣酒，笑谈古今。有时候我在想，父亲是凭借与生俱来的坚强走过了那个年代，还是沧桑经历炼就了他的坚强。

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父亲一生所走过的路崎岖坎坷。欣慰的是，他毕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尽管付出的代价同样巨大。父亲不是守财奴。父亲把自己的财富一点一滴都给予他的正在成长着的儿子。对于这种慷慨的赠与，除了感激地接受，我别无选择。那个狂热而又冷酷的年代过去了，我庆幸自己没有亲历那场劫难。但父亲留给我的财富，则永远无价、永远保值。坚强，只有坚强，才能笑对一切不幸，才能笑傲世间炎凉。这笔精神财富，我不敢终日炫耀，也不敢深埋心底，只愿它能随着我的新鲜血液一起流淌，生生不息。

关 瑞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一个多才多艺的右派

1957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团支部书记提钟政被党支部安排为电台《鸣放简报》委员会委员，他自己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点也不意外。作为省广播电台节目部记者，他接受了一系列的采访任务，都与“大鸣大放”有关，而且任务完成得都很好。如采访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李化方及诸多省内外知名的学者、教授，还有省级各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采访制作了很有影响的现场录音报道、专访、广播通讯，对甘肃省各首脑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大鸣大放”都有公认的促进作用。在广播电台内部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提钟政也是率先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发言，按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要求，把自己对党的意见和内心感受倾心吐出，可谓忠诚、热情。

提钟政没有理由不忠诚。

1949年，在新中国诞生之前，提钟政从华北大学分配到甘肃新闻界工作。他先后担任过甘肃日报记者、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岗位上，当过时政新闻记者、文艺编辑、扫盲教师，搞过科普专题节目。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宣传任务十分繁重，中心工作很多，

调整也快。电台的节目要随党的中心工作不断调整。作为一个团的基层干部,党指到哪,提钟政就干到哪儿。他受到了党组织和台领导的高度信任,因此就参加了台里的鸣放委员会,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之一。

提钟政在《鸣放简报》委员会中的工作就像在其它岗位一样,十分积极、肯干。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把各组的鸣放记录收集到一起,归纳整理以后用大字报的形式抄写张贴出去。每天下午,别人下班以后,技术科、行政科,编辑部的专题组、文艺组、录音组等,就把他们鸣放的小组讨论记录交到《鸣放简报》委员会宣传委员提钟政这里。提钟政每天都要加班,他必须把各小组的记录整理好,并且还要誊抄、张贴。对此项工作,提钟政开始还觉得新鲜,时间一长,每天都是老一套,无非是些张三说某领导好邀功,李四说某党员爱做表面文章,这个说某领导搞了特殊化有脱离群众的危险,那个说某领导高高在上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再有就是一些领导好耍小聪明,对人不能一视同仁,重用了拍马屁的小人,打击了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云云。天天重复这几句话就感到枯燥无味了。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活跃分子,提钟政对这种现象十分不满意。他认为,既然要提意见,要帮助党整风,就应该有点儿震动,有点儿帮助的样子,不疼不痒算什么?提钟政决定别出心裁来一个,与众不同,以他文艺编辑的特长为广播电台的鸣放工作出一分力,添一分彩。提钟政的想法很简单:还是大家提的那些个意见,但是不采取简单叙述的方式,而采取诗词歌赋的方式加以表述,是否可以增强一些刺激力、感染力?他首先想到的方式是自由诗。这种形式没有固定的格律限制,押韵比较自由,诗的段数、行数、字数都没有硬性要求,只要流畅、通俗就行了。这样的诗,好写,但很难写得很好,往往流于一般化,吃力不讨好,不能用它。提钟政又想到了律诗,只是律诗要求句中一定要平

仄相间，上下句中一定要平仄相对，又有仄起与平起等不同格式，自己一时还不能完全掌握，写出来不合平仄要求，广播电台文学修养高的人多的是，岂不让人耻笑。提钟政又想到了词。词虽然也是古诗的一种，平仄要求也十分讲究，但他刚刚学过《西江月》的句式要求，受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的影响，他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句子长短不一的文学样式，感到新鲜别致，很能表达自己克服鸣放一般化现象的愿望。好！就是《西江月》了！《西江月》应前后两阙，两阙的平仄声要求是一样的。第一步，他先把平仄声写出来：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

提钟政晚上加了个班，字斟句酌地把电台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的种种表现，按照他列出的平仄形式填了进去。

但是，作为词的《西江月》，应该是上下两阙，而提钟政要的讥讽对象是五个人，一人独自一阙，就填了五阙。也就是说写每个人的都只有上阙而没下阙。这已经不是《西江月》，应该说是提钟政模仿《西江月》上阙的字数和韵脚写成的一首顺口的老式自由诗，提钟政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读起来上口、听起来过瘾就行。全文如下：

光荣榜·调寄西江月

表××功

事事揽权窜跳，
邀功心切性忙。
有错赖部下推光，
谁要逆我必亡。

表XXX功

时时窥势观风，
附势趋炎家常。
为官德性不用讲，
只想日后再上。

表XXX功

赫赫英才俊秀，
翩翩学者风光。
玲珑八面变幻忙，
有筋无骨饭囊。

表XXX功

头头下令前冲，
干将全凭气壮。
白的也当黑来唱，
方显武艺高强。

表XXX功

见风使舵逢迎，
拍马溜须抹光。
为表忠心不嫌忙，
立命理当这样。

写完后，提钟政自我欣赏一番，然后抄写整齐，连夜张贴了出去。

第二天果然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一些播音员当场就抑扬顿挫地朗诵起来，听起来很觉得是对官僚主义的鞭挞，比大白话的大字报效果好多了。看到这一切，提钟政喜不自胜。作为一个积极分子、电台《鸣放简报》委员会委员，他认为自己已经充分尽到了责任，切切实实帮助

党整了风。

就是因为这一“光荣榜”，提钟政一下子就被列入“丑类”之列，深深地落入“诱敌深入”的陷阱之中。昨天还是电台《鸣放简报》委员会的领导成员，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今天就成了罪不容赦的牛鬼蛇神，魑魅魍魉。

提钟政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他的罪名比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另一些右派的罪名要多。首先是用所谓词的形式丑化电台领导和积极分子的形象，反革命才华在“光荣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与北京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遥相呼应，给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抬轿子，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大合唱推波助澜。

除此之外，提钟政的右派言行另外还有四条：

一、反对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因为提钟政在鸣放中说过“台领导轻人才、重奴才。真正有才学的人不被重用，‘溜须拍马’者青云直上。”

二、反对党的政治理论学习。因为提钟政说过：“不少编播人员文化素质低，又不努力学习。记者和编辑的稿件中错别字连篇，播音员老是把字读错，走腔拐调，播出以后贻笑大方。学习深奥的《政治经济学》，还不如多学点文化知识。”

三、反对党的肃反政策。提钟政说：“一九五五年由反胡风运动而开展的机关内部‘肃反’不注重调查了解，不实事求是，硬要在电台内部也挖出几个‘胡风分子’，由此而扩大审查范围。对被审查者随意进行人身污辱，作风粗暴恶劣。”

四、利用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以自己采访报道的记者身份进行反党活动。如组织社会各界的牛鬼蛇神，像陈时伟、李化方这样的大右派，借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这样的阵地，向党发起猖狂进攻。提钟政曾积极邀请过这些人撰写稿件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给他们录过音并在甘

肃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除提钟政以外，甘肃人民广播电台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还有邢鹤、王达、张亦铭、王化通，另外，打成坏分子的是孙敬，一共六个人。电台当时的总人数是五六十个人。几个月功夫，十分之一的人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坏分子。

邢鹤是个“老革命”，1940年前后在他的家乡河北省就参加了革命。那时他还是个“红小鬼”，也曾提着脑袋同敌人斗争过，是党组织把他培养成一个广播工作者的。他会写曲子，又能导演，他培养的文艺骨干有的已经当上厅长了，但他还是个音乐编辑，科级干部。因为资格老，讲起话来顾虑少，不怕被人抓把柄，胆子就比别人大。按规定，他住的房子是公家的，就应该交房费、电费、水费。总务人员几次上门催收，他也不交，催得急了，他放了一句：“你们比国民党催苛捐杂税还厉害！”这就成为他主要的右派言论了。

张亦铭与提钟政犯了一个类似的“错误”。提钟政是填词写“光荣榜”，目的是想改变一下鸣放的形式，不要千篇一律，天天热剩饭，提高一下鸣放水平。张亦铭也认为，好赖也是个省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不能说满腹经纶，肚子里的墨水多少还是有一点儿，天天热剩饭有什么意思？民间有话：话说三遍比屎臭。我们就不能在大鸣大放中创个新？于是他发挥自己的特长，谱写出了一首歌曲，再把广播电台领导同志的各种官僚主义的表现编成歌词与曲子配起来，一方面把他的“作品”抄成大字报贴到一处显眼的地方——大家吃饭时常聚在一起的一个饭场子的旁边，一方面又在大家就餐时亲自向大家演唱。当时，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院子中间有一个小花园，小花园中有一个葡萄架，葡萄架下就是个传统的饭场子。中午大家都在食堂就餐，这个时候全台员工到得最齐。张亦铭抓的这个

时机很好,加上他宏亮的嗓音,精湛的表演,效果确实比较火,于是他也落了个“反革命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的结局。

王达是一位革命烈士的遗孤,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已为革命抛了头颅,洒了热血,他本人就是在革命圣地延安成长起来的“天然”革命接班人。但是有个倔强性格的王达显得与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他对自己直接领导的决定总是有不同看法,而且次次都要“当面提出”,还要陈述自己的“高见”。王达认为,自己是烈士家庭出身,在延安长大,自己的革命动机是无可怀疑、无可挑剔的,你们能奈我何?提钟政就曾经认为,即使把全台的职工都打成右派,王达也仍然是个革命者,他是个敢做敢当的人,是全台知识分子中最“革命”的人。但是,很不幸,那些对领导非常顺从的人很少有被打成右派的,王达却成了全台五个右派之一。

王化通当时是电台工务科的负责人,属技术人员。人很老实,话也不多。据当时在电台从事人事工作的乔明远回忆,就是因为他话少,来电台的时间短,为了凑够“任务”指标,在以上四名右派的基础上,临时增加了一名王化通。

孙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富裕之家,是电台的男播音员。孙敬人长得标致,衣着也十分讲究,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天生的好嗓门。他是当时广播电台的“白马王子”。孙敬播音,大家都佩服。一个标致的才子,追求的姑娘自然排成了队。因此,孙敬难免就显得有些狂傲。在那个年代,光是一个衣着讲究,随便就可以你戴给一顶“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帽子。再傲气些,那就更危险了。果然,反右派运动中,孙敬成为广播电台最年轻的戴帽阶级敌人——坏分子。

1958年下半年,对右派分子要作出处理了。甘肃人民

广播电台根据上级文件精神最后决定：王达回原籍河南农村去当农民；张亦铭与电台脱离关系自谋生路；王化通回原籍会宁当农民；提钟政、邢鹤、孙敬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1958年9月30日，电台人事部门负责人找提钟政谈话，告诉他现在组织上决定让你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去劳动教养。这时的提钟政已经知道党组织对右派分子是分成几类来处理的，如第一类就是开除公职。他问人事科的这位负责同志，我去夹边沟算第几类？下一步怎么处理？这位负责同志说，是劳动教养，主要在于改造思想，改造好了就回来再当记者，啥时间改造好就啥时回来，不脱离革命队伍。好好劳动，还有指望。提钟政想，现在还年轻，吃点苦不算啥，去了好好表现，相信能够取得领导的好评，再回到人民的怀抱搞我喜爱的广播工作。拿定主意以后，提钟政问什么时候出发。人事科同志说当晚就走。提钟政说那怎么来得及，一个下午的时间，家里五个孩子，还有些事情要安排，说什么也得拆洗拆洗被褥吧。人事科的这位同志是个比较通情达理，也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他考虑片刻后对提钟政说，这样吧，我作主宽限你一天，无论如何你不能超过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国庆节的晚上。上级规定，国庆节前你们这号儿人必须离开兰州，到明天晚上就非走不可了，没商量，你实在不走就得派公安把你押走。提钟政掂了掂人事科干部这番话的分量，觉得人家这也算给了面子，也不能叫人家为难。再说了，僵持着不走，最终还不是给自己过不去吗？到那时可能就上升成敌我矛盾了。想到这里，提钟政回答得很干脆：那好吧，明天晚上一定走！

国庆节晚上，电台安排一名叫魏光楣的干部与提钟政同行。说是魏光楣要到酒泉出差采访，刚好与提钟政一道上火车，还可以替提钟政办理各样手续。

既然决定去参加劳教，那就要去好好劳动，好好改造，争取尽早劳教合格，以便早日返回电台。这就需要扎扎实实地准备，提钟政装了两个皮箱，单的棉的，穿的戴的，劳动穿的，休息日穿的，一应俱全。

到了酒泉，先到劳改分局报了到，就在附近一家旅店住下了。提钟政催魏光楣：快把我送到夹边沟！

其实，魏光楣并非到酒泉出差采访，他是奉命押送提钟政的。可能是电台的领导当时考虑，到夹边沟劳教的大批右派均已集体押送到农场，提钟政这种零散人员，再派公安人员还不好协调，不按期送到又违反规定，采取这种“顺道”方式不伤提钟政的尊严，可能会使提钟政更好地配合，既节约人力，又比较安全。果然如电台领导所料，魏光楣与提钟政安全到了酒泉。因为是零星人员，属于个别补送之类，事情显得不是那么紧急，加上酒泉劳改局的领导和有关人员有事外出，不在机关，魏光楣的交接手续拿不到手，提钟政催促也没用。

10月初的酒泉，到处瓜果飘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没有沙尘暴，甚至一点儿浮尘都没有。天气晴朗的时候，真的是万里无云。这一年的酒泉跟前几年比，庄稼长得更好，地里一片金黄，到处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但这一年的酒泉也跟全国一样，人们都忙着大炼钢铁去了，包括把各家各户的做饭锅都收集起来，砸碎了往土高炉里掇，白天黑夜地烧，到处都在创炼钢高产的新纪录，放卫星，没有多少人去操心地里的庄稼。1958年的“大跃进”之前，中共中央有过两次重要会议，即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都是为“大跃进”制造舆论的。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他的《〈大跃进〉亲历记》中说：“在杭州和南宁会议上，因干劲大受到表扬的甘肃，这时决心在五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要比现在增长十六至十九倍，以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可见甘肃的牛已经吹向全国了，比一般的省要吹得

凶一些。丰产的庄稼不能收回家中，来年的日子怎么过？老百姓忧心忡忡。但老百姓说不起话，说了没人听；干部们不敢说，谁说谁受批判。如果把当时的经济建设比喻成一艘航船，1958年秋季，这艘航船正在驶向浅滩。老百姓看清了这一步，而越往上的领导却越不清楚。彭德怀元帅这时到他的家乡湖南走了一趟，看到这些与全国各地一样的情况以后写道：

谷叶败，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我为人民鼓与呼！

元帅为民请命的呐喊没有能够制止经济航船向危险滩涂的自杀性冲刺，却反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当时，全国一片热昏了头的口号声：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当英雄！”

“白天一片人，夜间遍地灯！”

“白天一片红，晚上一片明！”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十五年赶英超英！”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这时的酒泉城里，从早到晚被笼罩在一片“跃进”的气氛之中！提钟政在酒泉城里整整等了三天。他的心比酒泉城还要乱。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了更好地帮助党整风，挖空心思加班加点利用休息时间写了“光荣榜”，怎么转眼之间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了呢？从1928年在天津出生，到这个时候，正好是提钟政的而立之年，立什么呢？新社会不存在“立德、立言、立功”之

说了,无非是成家立业。家虽成了,业却一败涂地。因为业的一败涂地,家也落得个夫妻分离,父子分离,天各一方。打从十五岁后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当勤杂工那个时候起,提钟政就认定一条:为人需勤奋,惟勤奋才能生存。十几年他都是这么过来的,不管怎么天下大乱,他个人却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哪怕是短暂的成功,可这一次为何败得如此凄惨?利用这几天的空闲,他极力从自己记忆的长河中理一个头绪出来,好在今后的岁月里好好汲取教训。

毕竟自己才是个三十岁的人,今后的日子还长得很。况且,天津还有父母,他们也希望儿子有个像样的前程。兰州家中还有望眼欲穿的贤妻和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大女儿提秀琪,1948年生,时年整十岁;二女儿提秀瑜,1951年生,时年七岁;三女儿提秀莹,1953年生,时年五岁;大儿子提秀瑕,小名大华,1955年生,刚刚三周岁;小儿子提秀琨,1957年生,与全国四十多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产生的时间在同一年头,刚刚一岁。不为别的,只是为了父母、妻子和五个孩子,自己也得活着,在现有条件下争取最好的结局。

提钟政的思绪回到了他的幼年和童年时期——

提钟政的原籍是河北沧县陈圩乡后白马村。他的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弟兄四人。父亲十六岁那年,离家远行,到天津去谋生。因为家里很穷,一亩地也没有,未成年的老二老三只好给人当长工。

提钟政的父亲到了天津之后,开始做些装卸、搬运之类的苦力。后来,他结识了一位擅长做西餐的师傅。天津是个外国人很多的地方,西餐较其他城市有更大的市场。西餐师傅看这个姓提的小伙子既勤快又机灵,遂收他做了徒弟,手把手教他怎么做烤牛排、色拉、比萨饼、烤面包等手艺。一年多以后,提钟政的父亲就成了一个能够独当

一面的西餐师傅了。

1928年元月，母亲十七岁那年，就在这个提姓的西餐师傅家中，提钟政来到了人世间。那是个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年月，兵患连兵患，天灾连天灾，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人人都要为糊口、为生存而日夜奔波，西餐师傅的家庭自然不能例外。而且，在一个不稳定社会里近乎殖民地的城市中，西餐行业的风险更大些，今天很抢手，明天可能就没事可干了。就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担忧与惊恐之中，提钟政度过了他的童年。他在这个家庭中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受到的影响就是：为糊口需勤奋，惟勤奋才能生存。

九岁那年，即1936年，父亲送他到学校读书。提钟政就读的这个学校叫“今是小学”，取“今是昨非”之意，颇有些反封建的意味。学校的一切对提钟政都很新鲜，他不但功课学得好，也是各种文艺体育活动的积极参加者。有个叫张礼厚的老师，教体育，是天津篮球界的明星，学生们都很崇拜他。这个张老师还有个绝活：天生一副好嗓门儿，唱京剧不亚于专业演员，而且是自拉自唱。一天，提钟政大着胆子对张老师说：“张老师，你给我拉个倒板！”张老师用疑惑的眼光瞅一瞅这个小机灵鬼问：“你会唱？”提钟政很大方地说：“会。”随着一个悠扬的倒板过门儿的结束，一个稚嫩的声音有板有眼地在校园里飘荡开来：

一马离了西凉界，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

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

那魏虎在朝中身为太宰，

他把我受苦人哪放在心怀？

恨魏虎是内亲将我来害，

苦苦地要害我所为何来？

柳林下拴战马武家坡外，

见了那众大嫂笑开怀。

.....

提钟政唱得虽然还有些不合拍之处，但一个小小孩童，能够基本上跟着胡琴走，而且唱词记得如此准确，实属难能可贵。张礼厚老师停下他的京胡，站起身来，拍着提钟政的小肩膀，高兴得合不拢嘴，说了句：“小子，行呀你！”接着就详细地询问了他的家事。以后，除了体育课之外，张礼厚又成了提钟政的业余京剧教员。提钟政之对京剧，本来只是从他的同学肖金福的父亲肖伯伯等长辈那里受了些熏陶，朦胧地有所喜爱，哼一哼而已，及至得到张礼厚老师的点化之后，就提高很快了。他学会了很多角色的很多唱段，生旦净末丑，什么角色都能来几下。他不但唱而且深入品味每个唱段甚至每句唱词的含义。他的体会是：京剧太好了，品味唱词就是品味人生、认识社会。他从此与京剧结下不解之缘，高兴的时候唱，沮丧的时候也唱；失败的时候唱，成功的时候更唱；铐子带到手上时默默地唱，到戈壁滩上没人的地方放开嗓门儿唱。

今是小学还有一位高个头、秃脑门儿的音乐老师杨希增，他看到提钟政的京剧唱得不错，经询问和启发引导，杨老师发现提钟政对歌曲以至歌剧也有很大兴趣。这时候，天津已经沦陷，提钟政上学、放学都要经过日本人设的岗哨，还要给他们鞠九十度的躬，否则就会招惹麻烦。为了减少麻烦，父亲就给提钟政一点零花钱，中午在学校附近随便吃一口，就不回家了。少招惹麻烦事，家长也就放心些。这样一来，提钟政在学校的时间多了些，利用这个时间，杨希增老师就给他教歌曲，还吸收他参与歌剧《天鹅》的排演，让他扮演其中的男主角海国少主伊尼斯。伊尼斯受继母虐待，独自一个人在森林中流浪，可怜而又凄惨。颠沛流离中的伊尼斯，仿佛就是提钟政。提钟政一家是从那个年年涝灾的盐碱滩——河北沧县农村流

落到大都市来的流浪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十分可怜。小小的提钟政，竟然把剧中人的咏叹调唱得凄凉委婉、催人泪下：

渺茫茫不辨路何处，
急匆匆又向森林来。
沿途的柞杈树枝，
满地的阴湿霉苔。

……

在今是小学的五年半时间，是提钟政一生所受正规教育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除了识字启蒙外，他还比较多地接触了古今中外的戏剧。除了听和看，他直接参与了排练和演出，这对他以后几十年的生活和工作都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1942年，不满十五岁的提钟政辍学了。虽然还有半年时间就毕业了，但这半年的学业他已无法完成，因为他的父亲大病一场，无力挣钱养家。作为家中的老大，提钟政必须挑起养活一家老小的担子。他选择了到一家商店当学徒的工作，这样他就可以到老板那里去吃打工饭，不但为家中减少了一张吃饭的嘴，而且每月还能给家中交回一块大洋。再变卖一点家具，日子也就能往前推了。

半年以后，提钟政的父亲身体基本康复，还找到一个推销“戏匣子”的活。父亲重新承担起一家老小的伙食负担之后，提钟政又回到了今是小学继续他未完成的学业。1943年，修完小学课程，拿到了毕业证。这是提钟政一生中拿到的惟一的一张毕业证，尽管他以后上过日本人的日语学校、美国人的英语学校，共产党在解放初期为了培养知识分子干部而开办的华北大学，但他都是匆匆入学又匆匆离校。

在重新回到今是小学的这一年的这一年，提钟政有幸在李秀琴老师担任班主任的班上就读。李老师有很高的古文造

诣,不但课讲得好,还常在周末带上学生们去郊游。名为郊游,实则进行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提钟政记得,有一次周末,李秀琴老师带领学生们来到八里台聂氏祠堂,这里供奉着为抗击八国联军入侵而英勇战死的聂世成的牌位。祠堂两边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做狂风怒涛飞海上;下联是:看此地山河破碎满腔怒火率我铁甲雄兵战城南。横批为:大义凛然。

由于家庭生活十分拮据,小学毕业后,提钟政决定告别学生生活,找个挣钱糊口的营生。李秀琴老师知道后,劝他继续自己的学业,到天津最好的中学去深造,将来定能成就一番事业。李秀琴老师曾经把提钟政的一篇作文《梦游纽约记》作为范文,向全班同学推荐。提钟政没有去过美国,他甚至没有到沧州和天津以外的任何地方去过,但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写得有声有色。李秀琴老师很高兴,她对提钟政说,告诉你的父亲,中学的一切费用均由我承担,不要你们家出一分钱,学业是不能耽误的。提钟政回到家里,把李老师的这番好意告诉了父亲,父亲既万分感激,感叹世上竟有如此的好人,又担心孩子因此而欠下的人情债、良心债怕是全家人永世也还不完的。他无法下这样的决心,终于婉言谢绝了李老师的一番好意。

在家中赋闲时间不长,提钟政父亲的一位朋友到家中报信儿说,一家日本大公司东亚海运株式会社现在要招收勤杂工,不妨让钟政去试试,混口饭吃,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这时家中只能吃到有沙子的山芋面窝头,牙碜得要命,就这东西也吃不饱。全家人经过反复商量,觉得挨着等不如挣着看,好坏去试一试才能知道。结果,一报名就被录用了。

提钟政的任务是为了一栋两层家属宿舍楼当勤杂工,这栋楼就在海河边上。进楼有个很大的大厅,往下有一溜

地下室,也是仓库和锅炉房,一楼和二楼各有八套房子。

他刚去时,日本人的家属们尚未到达。到了晚间,整栋大楼只有他一个人,大风从海河河面吹过来,呜呜作响,他有些恐惧,但为了混饭吃,也得硬着头皮挺下去。日本人家属陆续到达入住,提钟政的活儿也慢慢多起来了。烧锅炉,打扫楼上楼下的过道和大楼周围的场地,打扫厕所。时间长了,也有日本人打发他出去买点东西。每当这个时候,提钟政也能熟练地说一句十分干脆的“哈依!”看着这个中国小伙子勤快又可靠,一会儿中村家要买米,一会儿伊藤家要买盐,一会儿山口家小女孩儿没有人看了,一会儿铃木家的炉子没煤了,都要喊他。只要走道中有人喊“波衣桑(小伙子先生)!”提钟政就会马上“哈依”。

一进楼门的过道里支了一张床,晚上提钟政就在这张床上过夜。旁边还放着一台电话。电话一响他就马上抓听筒说一个“哈依,瓦希马依(您找谁)?”不管对方要找这栋楼上住的谁,提钟政都说一个:“哈依,乔达吾马其古打散(请稍等)!”然后就彬彬有礼地喊接话人。

这期间,日本人时常给提钟政安排的好多事情,他多数都听不懂,要靠用手势去比划。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即改善谋生的手段,提钟政决定学一点日语以改变每天遇到的窘境。刚好,离东亚海运株式会社职员宿舍楼不远处,有一处黄家花园小学,那里经常举办日语补习班,每天一个半小时,从五十一个片假名学起,既学说,又学写。由于工作环境本身就是个日语学习的实习环境,一年下来,颇见长进,日常的日语会话已经毫无问题。这个期间,提钟政每天讲的日语要比汉语多。日本人对这个能讲日语的“波依桑”自然非常满意,渐渐地对这位张口“哈依”、闭口“哈依”,而且毕恭毕敬的勤杂工不再提防,很放心地让他干一切杂务。有了这个条件,“波依桑”就可以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穷苦的家庭谋点小利了。提钟政的想法是,

小日本日常所用,都是剥削中国人得来的,自己利用便利条件摸一点“便宜”心安理得。日本人让他劈木柴烧锅炉,他就专门劈一些小块的装到小袋子里,趁天黑别人看不见时,骑上车子送回家再赶快回来。到了冬天,这些日本家庭每家都要烧炉子取暖,每家门口都有一个存放煤块的大木箱,是上锁的,这些锁上的钥匙都由提钟政掌握。送煤的是另外的中国劳工,提钟政管收货和保管。有一次,送煤人看看周围没有别人,悄悄对提钟政说:“怎么样,爷儿们,‘走’点儿吧?”提钟政问:“嘛叫‘走’点儿?”送煤人说:“每家六袋儿煤,我给卸,你给数,大声点儿数,故意叫日本人听见。前五袋实实在在,最后我给一个空袋子,你照样数六袋儿,实际上只给鬼子五袋儿,剩下的咱俩分,这就叫‘走’点儿,明白了?”“好!”提钟政当然举双手赞成,因为他家里冰锅冷灶,正缺烧的煤!这样,一家“走”一袋,一共八家,一次送煤他俩就可以落下八袋儿煤!这一个阶段,全家的吃喝用,就全指望着提钟政的工资和这些零零星星的“洋财”了。

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他们的东亚海运株式会社职员全部撤回。在这里干了整整两年提钟政,也就结束了他的“哈依”生活。

时间不长,他父亲的一位老朋友刘保真来家报信儿说:日本人跑了,美国人来了。美国人是帮助国民党占地盘儿的,来了不少美国大兵。提钟政也看到了,美国兵嘴上叼着“骆驼牌”香烟大摇大摆在街上溜达,倒不像日本人那么可恶。刘保真说:我现在就在美国人的营盘里管理中国杂役,我可以介绍钟政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医院去当勤杂工。这时候的提家,又到了揭不开锅的时候了。父亲身体不好,什么生计也干不成。全家五张嘴等吃饭,就是挣不了什么钱,少一张吃饭的嘴,父母的难肠事也会减少些。因此,提钟政力主前去试试看。无计可施、走

投无路的父亲也只好同意儿子到西洋人那里看看再说，也许还是个活路。提钟政在日本人那里两年，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为讨对方的信任和喜欢，再穷困潦倒，也得吹个头，收拾一身尽量整洁的衣服；心里再窝火，也得“哈依、哈依”，而且要表现出乐此不疲的神态。1945年8月，经过一番收拾打扮，提钟政到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医院去应试，一眼就被看上了。录用之后，分配他照看两间医院员工住房，二〇五号和二〇九号。二〇五号住的是炊事班的十几个人，二〇九号是运输班的十几个人。提钟政的主要工作是打扫卫生。员工们上班走后，他要收拾床铺，换洗干净的床单被褥，擦玻璃和桌椅板凳，要求是一尘不染。如果他们回来用手指头一摸有灰尘，那提钟政就要被开除。这些话，是提钟政一上班就给他交待清楚的。上班以后，提钟政立即把自己说了两年的“哈依、哈依”调整为“OK”。凭自己的勤快、小聪明和眼色，提钟政很快得到了美国人的信任。在这里，美国兵对提钟政的称谓是“Shorty”，音译成汉语叫“硕奥提”，是“矮个子”、“小东西”之意。提钟政照看的这两个屋合起来住有二十五个人，由于他服务得好，每人每月给“硕奥提”付一美元的酬金。这样，一个月下来，提钟政就能挣到二十五美元。二十五美元，在兵荒马乱、物价飞涨的旧中国，在天津，都是一个不得了数字！

除此之外，提钟政还能得到其他一些优厚的待遇。二〇五号住的美军炊事班的负责人叫奥波瑞昂。奥波瑞昂是与提钟政年龄相仿的小伙子。他见提钟政机灵勤快，很是喜欢，并很快与提建立了友谊。每天早上上班之后，奥波瑞昂就把“硕奥提”叫到灶房，肉饼、鸡蛋、牛奶、咖啡、水果、各样罐头放到他跟前让他尽管吃，愿意吃啥就吃啥。这个待遇是美国大兵也享受不上的。因为大兵们是根据食品的品种按比例分配的，不能随便挑捡，而提钟政则

尽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去选择。吃饱喝足之后,只需给奥波瑞昂一个简单的手势,说声“伯依伯依”,再去他的二〇五号和二〇九号干活就行了。

有了充足的伙食保证,小伙子干活又不惜力气,两个房间的各样活路很快就干完了,剩下的时间不能回家,也不能乱走动。百无聊赖之中,趁美国大兵不在宿舍,提钟政就在炊事班驻的二〇五号一遍遍听他们的留声机。其中有一首男中音歌曲听着顺耳,他就一遍遍反复放,而且记下了其中的唱词。后来经过请教,居然也搞懂了歌曲大意,而且学会了,也唱得上来。奥波瑞昂们既吃惊又高兴,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开始多起来。提钟政经常拿上他们房间里的画报和刊物请教一些单词的读音,大兵们都抢着给这个“硕奥提”当老师。很快,汽车、手表、玻璃镜子、裤子、皮鞋、袜子、外套等等都学会了。但是提钟政并不满足。不能自如地和这些美国人对话,提钟政还是害怕影响自己将来的饭碗。这时候,有一所英语补习学校招收学员,可以在业余时间授课,每天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中,一个小时学读、说,另一个小时学打字。提钟政就在这里报了名,风雨无阻地听课、练打字。与其他学员相比,提钟政的条件得天独厚,他学习时没有生存的后顾之忧,上班时又是个极好的实习课堂,加上他的天赋和勤奋,他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这个时期,他每天下午四点钟下班,参加两个小时的英语学习训练,才六点多钟,回家尚早,精神又旺盛,回家路过渤海大楼时,看见那里贴着举办“簿记”训练班的启事,就是学习一些银行业务。提钟政心里痒痒,没有同家人商量,就顺便参加了一个学习“簿记”的训练班。他想,反正是艺不压身,多学一手就多一手谋生的路子,就是家人知道了,也不会怪罪自己。

直到1947年,提钟政一直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医院里干他的勤杂工,同时刻苦地学习他的英语。他的英

语水平已有长足的进步，日常会话已经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能写能打字。这期间，也同奥波瑞昂建立了深厚的个人感情。这个时期的中国，东北全境已快解放。天津也即将听到解放战争的枪声。美国人看看没有办法帮助国民党收拾这个残局，就要准备卷铺盖走人了。

这一年的阴历三月初七日，是父母亲为十九岁的儿子提钟政选择的良辰吉日。中国人的习惯，这一人生大事，不能不告诉自己的好朋友。提钟政找到了忙得不可开交的奥波瑞昂，告诉他，自己就要成为新郎官儿了。奥波瑞昂所在的医院和部队一起，正在往停泊在渤海的美国舰船上撤退，但奥波瑞昂还是表示，不管怎么忙，朋友的婚礼是一定要参加的。就在提钟政的父母为他择定的良辰吉日前夕，奥波瑞昂亲自驾驶一辆吉普车来到了提家，卸下了几箱罐装啤酒、大桶子的冰激凌，还有很多的白糖、咖啡、香肠，都是整箱装的，整整一车！提家老小哪见过这么多的好东西？房子里、走道儿上放满了啤酒罐和各种洋食品。这些地方放不下，又在院子里、厕所里堆了不少。奥波瑞昂大概也是利用美军撤退之机，慷“国家”之慨，给朋友祝贺婚礼。提钟政估计，这些东西也不可能是奥波瑞昂自己掏腰包给他买的。但提钟政认为，奥波瑞昂对中国朋友的情义是真挚的，是真心祝福自己。一个中国勤杂工和帝国主义派出的士兵之间该不该建立这样的友谊？提钟政没有去想过。作为一个普通人，提钟政在以后很多年都非常感激奥波瑞昂对自己的信任、尊重和友善。当然，到了全国人都发烧的那个狂热时代，这种交往就有另一种解释了，可以叫“卖国投降”，也可以叫“里通外国”，还可以称做“给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当走狗”，反正是随便怎么说也不为过，提钟政不敢不接受这种解释和批判。但在改革开放以后，提钟政在报纸和电视里看到过这样一则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某某，当年抗美

援朝作战中的英雄飞行员，击落过多架美国战斗机，他在北京接见了一位美国客人，这位客人就是司令员当年在朝鲜击落的一架美国战斗机的飞行员。这则消息又引发过他对奥波瑞昂的思念之情。提钟政清楚地记得，他们分别几个月之后，他曾收到过一个寄自关岛的包裹，里边有一条皮带、一条华达呢裤子、一条半截袖的夏威夷衬衫，另外还有一封信。信和包裹都是奥波瑞昂寄来的。信上说：我们已经奉命回到了关岛，没有来得及与你道别，非常想念你，我亲爱的朋友。我近期也要准备回家一次，看望我的父母双亲。请代问你的爸爸好，问你的妈妈好，问你的漂亮的太太好。我的家在遥远的佛朗西斯科……后来，他们又通过两次信，快到解放的时候，他们的联系就中断了。

1948年，美国兵从天津撤走以后，提钟政第三次在家中赋闲。无聊之中，只有到街上去走走。耀华中学阅报栏前是提钟政每天都要久久停留的地方，每天都要从这头儿看到那头儿。报纸上的散文、杂文、随笔引起了提钟政的很大兴趣。看得多了，他自己也试着写一点儿，使用的是“小老夫子”和“介萍”的笔名。他把自己的小文章投到了两家报馆，一家是《民生导报》，另一家是《新时报》。提钟政光读报不订报。稿件寄出之后，能不能采用，他也不是特别在意。有一天，在耀华中学的报栏中，他惊喜地发现了“小老夫子”和“介萍”的文章居然均被刊登。喜不自禁的提钟政，马上跑到街上，买了好几份刊有自己作品的报纸分发给亲友。提钟政按报馆通知的地址到《新时报》去领稿酬，一位戴着老花镜的长者瞅了瞅他，问：“给你爸领稿酬？”提钟政急忙解释：“不是不是，不是给我爸领，是给我自己领，我自己写的稿子！”长者很觉意外，盯着提钟政笑：“嘛？你写的，行啊爷们儿，好好写，有出息！”于是，阅读和写作成了提钟政在这一段时间里打发日子的最好

方式,他对新闻写作的兴趣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不久,还是在耀华中学的阅报栏里,提钟政看到天津《工人日报》上刊登的一则启事:“本报招收实习记者,报酬面议。”他毫不犹豫地前去报了名。考试的那天,他发现报名者有七八十个人,多数都比他年长。应试者被安排在一家小学教室里。等到考生们都到齐之后,监考人员给每个应试者发了一份试卷,上边语文、历史、时事、文艺、体育、哲学等各类问题很杂,涉及的面儿很宽。因为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没有什么思想压力,也不感到紧张,知道多少写多少,提钟政感到自己答的这些考卷还凑合。写到最后,是英语试题,都是些很简单的提问,诸如:“你喜欢什么?”“你叫什么名字?”“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几个月的英语补习班和平时与奥波瑞昂们的厮混没有白费,如今居然派上了用场!可能是大多数考生连字母都认不全,想蒙一下也不敢,相比之下,提钟政的英语水平已是鹤立鸡群了。加上其他问题回答得也算可以,几天之后,《工人日报》就刊出了进入面试圈者的名单。提钟政很荣幸地榜上有名。

负责面试的两位老编辑是缪隼和钮琳,这都是他们的笔名。两位考官简单问了几个问题之后,拿出了一张报纸。缪隼指着报纸上的一则消息说:“你把这篇消息朗读一遍”。提钟政在小学就经常参加文艺活动,朗读也是他的拿手好戏。朗读了一遍之后,提钟政把报纸交回到缪隼手中。接过报纸后,缪隼说:“提钟政,你刚才读的消息是什么内容,再说一遍,能做到一字不差最好。”提钟政一边回忆一边复述,外交部副部长某某某几月几日到什么地方访问,随行人员有某某某等几人,几乎是一字不差。缪隼、钮琳于是面带微笑。钮琳又说:“提钟政,假如你现在就是我们的记者,你正在马路上行走,迎面风驰电掣开过来一辆消防车,拉着警笛,从你身旁呼啸而过,你怎

么办？你应该怎么办？”提钟政想，我当然应该尽快赶到现场。但是消防车到底开到了什么地方并不知道。于是提钟政说：“就近先找一个电话，打到消防队，先问清着火的地点，然后挡一辆三轮车，抄近路火速赶往火灾现场，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火灾损失情况，有无人员伤亡。如果条件允许，还要尽可能地搞清失火原因，尽快往编辑部发稿子。”面试结束，提钟政回到家中，天天到耀华中学的报栏前去看有没有结果。过了两天，《工人日报》刊登的录用名单中果然有他的名字。从七八十名应聘者中只选中了四名，就有他提钟政，这使他喜出望外。他马上到报馆报了到，报馆已经给他印好了名片“工人日报记者提钟政”。从这一天开始，不断地派他外出采访，有市政府首脑杜建时的招待会，有驻军首领陈昌杰的防务安排等，甚是红火。这个时期，提钟政把他放在箱底的两套西装也拿了出来，熨得平平展展，并且频繁地倒换着穿，同时把头发也收拾得油光发亮。衣冠楚楚的提记者经常穿梭于各大工会、厂工会，国民党市党部、县党部、警备司令部之间，出席上层社会在各大饭店举行的宴会和各种应酬活动，“小老夫子”和“介萍”的各类报道也频繁地出现在天津这家《工人日报》上。

仅仅几个月，天津《工人日报》就停刊了。原来，创办《工人日报》的两位老总，是旧政府社会局的两个主任秘书，其中一个名叫张才忠。张才忠办报的目的并非以媒体方式服务大众，或以媒体方式正当经营，而是为了“套汇”。因为当时的新闻纸国内不能生产，要办就得进口，要进口就得有外汇，有了外汇就能倒腾，就能发大财。至于报纸，能发行几千份我可以说几万份，能发行几万份我可以说十几万份，谁也查不清到底能发行多少，只凭嘴“说”，外汇就源源不断地进账。外汇进了账，说是买新闻纸，实际上买的是市场上紧缺的盘尼西林等药品和其他

紧俏商品。快到1948年秋了,天津的国民党政权已经岌岌可危,摊子已经守不住了,哪里还有外汇去让你买新闻纸?经费一停,报馆立即关门,提钟政又一次失业。

1948年夏秋之交,提钟政第四次赋闲在家一个多月后,青岛的一位朋友给他来信说,美国驻扎在青岛的军人还没有完全撤退,在青岛的美国商人也不少。他们那里需要懂英语的勤杂工,用人的单位有海员工会、海员工人俱乐部、军人俱乐部。如果愿意撞一撞运气,可到青岛来,说不定也还能有碗饭吃。提钟政想,在家呆着也是挨饿,不如去青岛闯闯。他同新婚的妻子商量:既然青岛有这样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去青岛试一试呢?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妻子没有理由反对他去青岛。当天下午,妻子便将丈夫结婚时送她的那枚戒指拿出变卖掉,交给丈夫做去青岛的盘缠。

筹够了盘缠,告别了家人,提钟政搭乘一艘四百吨级的客轮,开始了南下青岛的旅程。由于轮船吨位小,渤海、东海的风浪又大,他又是第一次乘海轮远行,行船不远,他胃里吃的东西就全部吐光了,胃液吐完就吐苦水。他是迷迷糊糊到达青岛的。上岸之后,稍稍歇息个把小时,提钟政就有了精神。但朋友告诉他,外国人从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撤走之后,青岛的洋人尚未撤离,很多曾给洋人服务过的职员和劳工大批涌向青岛谋生,人满为患,有的人一等几个月还谋不上一个职位。

提钟政哪是能等几个月的人?他打听了一下外国人在青岛的一些公会和俱乐部的情况以后,决心自己去闯一闯,就像到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员工住宅楼当勤杂工、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医院当清洁工、到天津《工人日报》当记者一样,说撞上就撞上了,没有一般人想像的那么难。有时也是事在人为。

到达青岛的第四天,提钟政穿上了奥波瑞昂从关岛

给他寄的夏威夷衬衣、华达呢裤子，把头发梳光，皮鞋擦亮，领带打好，抖擞抖擞精神，直奔位于山东大学的美国军人俱乐部。这时候，提钟政只知道这个俱乐部的头领叫克拉默，大致知道一点儿克拉默的长相特点：大个头，黝黑的面孔，戴六道杠肩章的上等兵。此外，他一无所知。进门见到一位士兵，提钟政很熟练地用英语先说一声：“先生，你好！”而且是一副一见如故的样子，士兵很自然地问了一句找谁，提钟政说，我要找我的朋友克拉默先生。士兵把提钟政带到了克拉默的房间，提钟政进门就发现里面背靠门坐着一个美国兵，是个大个头。这个大个子美国人回头的一瞬间，提钟政发现他是个六道杠的上等兵。提钟政猜测，这个人肯定就是克拉默。于是他大着胆子跑过去，采用了美国人久别重逢的那种紧紧拥抱的方式，用流利的英语不停地说：“老朋友，太想念你了，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终于找到你了，老朋友……”克拉默看中国人，大概也像我们中国人看外国人一样，都是一样的鼻梁、蓝眼珠、黄头发、白皮肤，不细看，很难分清什么约翰、保罗的。克拉默愣了愣神儿，显然是怀疑自己忘记了这个有过交道的中国小伙子，转而对这位能熟练讲英语的提钟政客气起来了，问提钟政到这里找他有什么事情。提钟政说，我想在这里找个工作。克拉默问你写吗？提钟政回答没问题，能写。克拉默顺手摸出一张纸，让他在纸上写几个蔬菜和食品的名称。提钟政心想，天助我也，最会写的就是食谱、菜谱，那是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医院就练过的。他从容不迫，拿起笔，在上边端端正正用英文写下了“春鸡”、“嫩鸡”、“煎蛋”、“牛奶”、“黄油”、“番茄酱”等等。克拉默看了十分满意，立即吩咐一个姓梁的中国管事：“给这个小伙子拿套工作衣来！”梁管事是个胖子，他喘着粗气跑到克拉默这里接受任务，听了这话有点目瞪口呆。梁胖子拿出工作服，交给

提钟政，拍拍他的肩膀说：“行，爷们儿，有两下子！”

这里的工作是打扫卫生、当招待。除伙食外，每月有二十美元的工资。会来事儿，还能拿到三十美元左右的小费。工作之余，就买点书读读。

从1948年8月干到1949年元月，美国人统统从海上撤走，提钟政第五次失业，而且是孤身一人远在他乡。青岛当时还是国统区，天津已是解放区，他和家人在不同的天下，无法联系，也无法来往。在痛苦的等待中，偶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国共和谈期。听到这个消息，提钟政喜出望外，决定趁这个机会“打道回府”。他一改自己平时西装革履的服饰和油头粉面的打扮，到集上买了破棉衣，再涂上油污，胡子也不刮，完全一个逃难农民的样子。从青岛出发往天津走，他路过了八九道关口和封锁线，看到过子弹打到地上冒出一溜子黄烟，也听到过炸弹爆炸发出的轰响，一路连滚带爬地回到了天津。

途中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不远，从村子里跑出几个带枪的人，对提钟政们进行一番盘查以后，命令他们把钱都拿出来。提钟政心想，坏了，把剩下的一点钱拿出来，余下的路怎么走？但愁也没办法，叫往外拿是不敢不拿的，不能为这几个钱把命送掉！他们各自把身上的金元券拿出一堆放到自己面前。一个军官模样的中年男子又对自己的手下人发出命令：给他们换成“北海票”！原来是要把国统区流通的钱给他们换成解放区当时使用的货币！他们遇到了不坑人的军队！这是提钟政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遇到的第一件事。他想，这真是天下奇事，还有这么好的部队。

提钟政是在一天夜里十一点多回到家的。听到提钟政在叫门，家里人才从梦中醒来。爸爸出来了，妈妈出来了，妻子抱着几个月的大女儿秀琪出来了，他们不相信隆隆枪炮声中，亲人能千里迢迢从青岛回到天津。大家把提

钟政拥到屋里，高兴得抱头痛哭了一场，并且发誓不让他再离家远行，骨肉分离的滋味儿实在太难受，骨肉分离的日子实在太难熬！

父亲告诉提钟政：我现在在天津国棉四厂工作，在工厂食堂当炊事班班长。工厂现在由解放军代表领导，军代表叫刘仁术。工厂已经恢复生产，工资也有了保证。刘仁术对工人们很客气，赶明儿我跟刘代表说说，看能不能给你在国棉四厂找个活儿。第二天，提钟政的父亲就跟刘仁术说了儿子的事。刘仁术问：你儿子多大了？父亲说二十一岁。刘仁术问：有文化吗？父亲说有，还当过记者呢。刘仁术说，既然是工人子弟，又有文化，国家需要干部，就培养他当干部吧。先让他去读大学，现在有三个大学，跟您儿子说，有军政大学、华北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叫他考虑好，愿意上哪个，回头给我说。大学是要上的，上哪一个呢？提钟政提出：哪个高上哪个。哪个高呢？全家人都不知道，但从这些学校的校长看，华北大学校长的名气最大，校长是吴玉章，副校长是成仿吾和范文澜。最后就确定报考华北大学，并很快被录取。

报考时，学校介绍学制是三年，毕业以后分配工作。但当时的形势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拿下了半壁江山，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干部，哪能等得上三年时间？结果，入学四个月以后，到1949年7月底，提钟政就被分配到西北干部大队，与后来成为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刘毓汉同在一个中队，刘是这个中队的中队长，提钟政是这个中队的团支部书记。

开国大典以后不久，提钟政所在的二中队全体队员就来到了甘肃省的省会兰州。路过西安时，习仲勋给大家作了报告，要求干部大队的同志们做人民的大骆驼。提钟政热血沸腾，决心响应党的号召，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他听到二中队全体队员分配到甘肃的决定以后，激动

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决定当一头甘肃的好骆驼。一到甘肃，提钟政就被分配到了甘肃日报社。工作一段之后，他感到自己擅长并喜欢朗诵和文艺表演的特长无法发挥，又主动要求到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省委宣传部的同志经过了解，认为提钟政的要求有道理，广播电台正缺少会讲普通话的播音记者，很快就满足了他的要求。

到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之后，又能采访，又能写稿，又能播音的提钟政如鱼得水。他集采、编、播于一身，每天完成一个四千多字的专题节目。由于他工作比较出色，在全台第一个被提拔为“政策法规组组长”。为了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提高宣传水平，提钟政向当时的台长阮迪民建议，广泛建立通讯员队伍，属于工业方面的政策法规，请工业厅的杨易木帮助组织撰稿；属于公共安全方面的，请公安厅厅长刘兰亭协助；属于商业方面的，请商业厅的同志协助；公安司法方面的，请人民法院帮忙。当时省政府还有个政令宣传委员会，领导人是沈求我。经协商，提钟政被任命为省政府兼职的政令宣传委员会秘书，这就为政令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大大提高了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政策法规宣传工作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权威性。一时间，全省城乡，包括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从广播中听政策蔚然成风，广播成了传达政令、宣传政策最有力的工具。这一段卓有成效的宣传从根子上说当然是党的政策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威力所决定的，也是电台全体采编播录人员包括领导在内集体劳动的成果，但提钟政在其中起的是骨干作用，他的最初建议和积极实践功不可没。

1951年冬天，作为宣传业务骨干，提钟政跟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宗望参加了一次土改。地点是酒泉县河东区六乡第二行政村，村子多数人家姓杨，还有少数雷姓人家和其他姓氏。提钟政担任这个村工作组的组长，就住在

一家姓雷的贫苦农民家中。徐宗望对当时的酒泉地委书记刘长亮说：“这个小伙子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很棒，让他好好锻炼锻炼，派到个艰苦的地方去。”在第二行政村的这个冬天里，提钟政在这里结交了一些农民朋友。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几年之后他却被“发配”到这个村子的旁边挖沙子。翻过年，到了春耕的时候，土改工作就差不多完成了。家里宣传任务很紧，人手不够，电台编辑部派了一名科长吴天任来领人，经过一番交接，提钟政跟上吴天任回到了兰州。临走，土改工作队给了提钟政相当高的评价。

回到电台时，正是全国开展扫盲运动的时候，广播电台在这个运动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任务。那时候，还没有今天普遍使用的汉语拼音，有一种注音符号，可以帮助人们快速识字，但必须会拼音，而且能说普通话才行，用地方方言是拼不成的。既能认识拼音符号，又会拼音，又能讲标准的普通话的记者当时极少。那时，干什么事都讲究搞运动。当时凡能收到电台信号的地方，大都发了识字课本，组织群众定时收听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拼音识字教学广播。整个兰州市区和部分农村成了一个硕大的广播学校，提钟政在广播里念一个“摸啊——妈！”下面成千上万人马上跟一句“摸啊——妈！”由于学员与老师不见面，学员对老师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学员对老师仰慕却又见不到，有点像今天的年轻人中仰慕明星大腕儿的追星族吧，学员们对提钟政就产生了很多猜测，有的说是五十多岁，有的说是戴眼镜的大知识分子，有的说是个光头，挺胖。提钟政在扫盲对象当中，特别是在各广播扫盲收听点上的基层辅导老师当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这个时期，他每天都能收到好多学员来信，有汇报自己学习成绩的，有请教学习方法的，还有打听他是否已经成家，对他还有点那个意思，但又不便直说的。

1953年,广播扫盲教学工作告一段落,提钟政又被安排到电台文艺组工作。除当编辑之外,提钟政亲自说过快板,与电台的另一位播音员常景春说过相声,也编写并且参与演出过广播剧,上台朗诵诗歌更是经常的事情。由于经常录音和约稿、改稿,他和文艺界特别是戏剧、曲艺界的人士打得火热。甘肃戏剧界的沈和中、靖正恭、陈永玲、王晓玲等都是他的好朋友。

直到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提钟政又先后做过文体专题部的记者和科普专题部的编辑。他以体育记者的身份在比赛现场制作的录音报道也有过很高的收听率。作为广播电台的团支部书记,提钟政做到了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到哪个岗位都能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他喜欢引人注目、轰轰烈烈,看不上平平淡淡。自从他离开华北大学,进入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一天开始,他都非常顺利,而且成绩斐然。比如那不怎么起眼的扫盲工作,别人都不怎么愿意干,他却干得有声有色。学员结业时,争着要为他披红戴花。

提钟政的成功,在于他做事认真,总是要做得比别人好一些,高人一筹,自己心里才熨贴。他的这种性格,也是源于他自小形成的观念:为糊口必须勤奋,只有靠勤奋才能生存。自从提钟政第一次工作,就是他十六岁那一年给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员工宿舍楼当勤杂工开始,每次找到一份工作,他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你干得好,人家就信任你,就多给报酬。解放后到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这是为人民服务,那就更不用说了,更应该加劲儿努力。这几年也是这么干过来的,领导和同志们都很满意,党和政府也没亏着自己,给的待遇也很不错,提钟政很知足。他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要以加倍的努力报答党的关怀。那首“光荣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来的,谁知事与愿违,愿望与结局竟有如此大的反差!真是不可思议。

.....

魏光楣的接转手续办了三天，提钟政在酒泉地区招待所躺了三天，对自己以往所走过的崎岖道路回忆了三天。除了以前的“为糊口必须勤奋，只有靠勤奋才能生存”之外，这次回忆使他又有了新的收获：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没有信心。信心是克服困难、扭转败局的第一要素。只要树立起志在必得的信心，付出“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努力，又有随机应变的策略和手段，眼前的困难就能够克服，困境迟早能摆脱，哪怕是枪口对住自己的头。不然，怎么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说呢？人生之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魏光楣喊了两声提钟政，提钟政回过神儿的时候，正是他下决心立志摆脱困境的时候，因此，提钟政并不显得沮丧。实际上，经过这三天事实上的休整，提钟政已经恢复了他十几年来一直保持着的精神抖擞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直伴随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九死一生。第一死，当然是他从青岛冒着被枪炮打到身上的危险逃到天津家中，但那只有几天的功夫，很容易熬过去，以后的几次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魏光楣告诉提钟政，明天早饭以后出发，到夹边沟农场报到。

魏光楣为提钟政雇了一头驮行李的毛驴，提前吃完早饭以后，他们就出发了。出了酒泉城，往东偏北一点儿三十多公里就是夹边沟农场所在地。10月初的酒泉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路两边的包谷已经成熟，齐刷刷有一人多高，每个植株上多数都结了两穗包米。这比提钟政的家乡沧州的那些盐碱地上的庄稼好多了。沟渠纵横，流水潺潺，杨树叶已经微微发黄，沟渠边上的青草还是绿油油的。这是酒泉绿洲的心脏地区，丝毫感觉不到周围戈壁的苍茫和荒凉。一轮红日从正前方冉冉升起。阳光有些晃眼，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提钟政千里迢迢来酒泉劳教，马

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他既感到孤独却又莫名地觉得充满希望。跟在毛驴身后，观赏着眼前的这一切，不由哼起了他上小学时就很熟悉的那段京剧：

一马离了西凉界，
不由人一阵阵泪洒胸怀。
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
薛平贵好一似孤雁归来。
那魏虎在朝中身为太宰，
他把我受苦人哪放在心怀？
恨魏虎是内亲将我来害，
苦苦地要害我所为何来？

……

哼着走着，走着哼着。中午时分在路上吃了干粮。大约日头偏西时，就下了公路往正北方向上了一条小路，说是不远处就是夹边沟农场了。他们来到了一条河边。河床很宽，河水却不大，这是河西走廊众多内陆河的共同特点，因为夏天经常有洪水冲刷，河床都很宽，平时河水都不大，缩起裤腿就能蹚过去。提钟政蹚过去以后又转身回到河边，蹲下去认认真真洗了个脸。他的想法是，走了一天的路了，马上就要见到农场的领导和劳教的同行们了，不能就这样蓬头垢面去见人，要干干净净，精精干干。

下午五点多钟，到了夹边沟场部，正是开晚饭的时间。报到以后，提钟政就跟着魏光楣到了干部食堂，坐在魏光楣的身边等着吃饭。自打五六天以前同魏光楣一起离开电台以来，每天吃饭都是一样，由魏光楣点饭、结账，提钟政只管吃，别的事情不管。夹边沟农场的第一顿饭，提钟政认为还是老一套程序，也就很自然地在魏光楣旁边坐下了。不料，提钟政刚坐下，就进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像是一个管教人员。提钟政礼貌性向他一笑，又微微点了点头。这位干部不但没有还以微笑，反而怒目圆睁，

两眼瞪着提钟政，并且用手指着他的脸怒斥道：“出去！”由于这个训斥来得突然，声音又大，提钟政吓得心里“咯噔”一下，赶快退到了门外。

蹲在干部食堂门外边想了半天，提钟政才清醒了许多。他原来认为，魏光楣嘛，他跟我不一样，他才是个录音员，干了个熟练工性质的工作，有个小学文化程度就拿得下来。我是编辑，是记者，是播音员，还能演文艺节目，广播电台的活儿那么多，没有哪一样能难倒我的。而且，我的级别也比他的高，他是干部，我更应该是干部。但是，眼前的一切又告诉提钟政，自己已经不属于干部的范畴了，已经是干部训斥的对象。他不敢往后想，今天是训斥的对象，明天呢？明天会不会是管制的对象？专政的对象？不是说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吗？难道政策又变了？又按敌我矛盾处理了？

过了一阵儿，大概是干部们吃过饭了，来了一位干部把提钟政领到了劳教人员就餐的地方。提钟政一眼看到了省人民银行的一位外号“景大头”的秘书，提钟政喊了一声“景大头！”“景大头”回头一看是提钟政，两双手随即紧紧地握到了一起。提钟政问，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景大头”也问，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提钟政还想问一些其他问题，“景大头”却没有兴趣同他交谈了。“景大头”的眼睛一个劲儿贪婪地往装馍的笼屉上瞅，提钟政只好放开“景大头”的双手。提钟政的心头掠过一丝惊恐：莫非到夹边沟农场要挨饿不成？

轮到提钟政打饭了，大师傅发给他一个馍，一碗糊糊。馍是玉米糝子做的，看着这个馍，叫他想起今天跟在毛驴后边赶路时，毛驴排出的大便的颜色和形状，色如驴粪，硬如石头。提钟政虽然饥肠辘辘，却丝毫引不起他的食欲。提钟政丝毫没有去啃一啃糝子馍的意思，只是站在那里发呆。这个现象被“景大头”注意到了，他两眼直勾勾

地盯着提钟政手中的馍，走到提钟政身边，用肩膀碰一碰站在那里发呆的提钟政，关切地对提钟政说，这是你的晚饭，你怎么不吃呢？“景大头”见提钟政还没有什么反应，就突然把提钟政手里的馍抢了去，一口就咬掉了一半儿，剩下的一半儿还紧紧攥在手中，生怕又被提钟政或者别人抢走。吞进嘴里的半块糝子馍噎得“景大头”把脖子伸得像打鸣的公鸡，连白眼珠儿都翻了几翻，才把馍咽下去。旁边打饭的、吃饭的、排队等候的，几十双眼睛都齐刷刷地盯着这里发生的一切。提钟政却发现几十双眼睛里喷射出的全是羡慕的目光，没有一个人流露出谴责的意思。

提钟政还在端着 he 的一碗糊糊发呆。“景大头”没有继续要提钟政的这一碗糊糊，可能是多少还有些难为情，总不能都要光吧？总得给人家留一点吃的吧？看着提钟政并没有把这碗糊糊马上喝下去的意思，一个姓赵的劳教人员蹭到提钟政身边，又是递筷子，又是擦筷子，又不断地点头微笑，一个劲儿地向他献殷勤。末了，指一指提钟政的糊糊饭吞吞吐吐地说：“啊，怎么样，啊？呃，呃？……”这个人的意思已十分明白，提钟政双手一推，那个人就迫不及待地把那碗糊糊双手捧起，一仰脖子，几口就下肚了。

提钟政被分配在基建队的第五小队。第五队有五十几个人，队长叫王承芝，原先是兰州机车厂的技术员。住的是大房间大通铺，每个人只有四十多厘米宽的地方，都是用筷子量出来的。就是说，如果你两边的人都能侧身而卧，你还有可能仰面平躺一下。如果他们平躺着，那你就只能侧卧了。

不管生活条件多么不如意，不管自己怎么想不通，提钟政认定：我是来劳动教养的，是来改造思想的，要好好表现，脱胎换骨，尤其要好好劳动，成为新人，才有可能争

取几个月或一年半载回单位，回家。他不愿意再往后想，他认为自己只要劳动得好，也就不可能待得时间很长。人事干部的话是代表组织给自己说的，组织是不会欺骗人的。

在以后一段时间，提钟政是什么活儿累自己就主动请缨干什么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整地，把不平整的地整平。提钟政还倡议在小队成立一个青年突击队，捡最重最累的活去干。提钟政的倡议被批准，成立了由十几个年轻小伙子组成的青年突击队，并任命他为突击队的队长。11月，酒泉的气温早晚温差很大。晴天的午后，气温能达到十几度，但早晨和晚上却又下降到零下三四度，甚至零下七八度，一般人干活时已经穿上了绒衣绒裤，而提钟政不，他穿着背心短裤，还干得头上直冒汗。在他的带动下，青年突击队的劳教人员个个都很卖力气。平地拉土时，好几只土喇叭对着突击队喊：“突击队，加油干！突击队，加油干！”提钟政活像一架加足油的发动机，在工地上奔走如飞，队员们谁敢懈怠？他们这个小队的任务老是完成在别的小队的前面。这一段时间，青年突击队使基建队第五小队队长王承芝在整个基建队里都感到脸上很有光彩。

青年突击队的表现，得到基建队领导的称赞。王承芝决定“重奖”青年突击队员。具体办法是：每天晚饭，除糝子馍之外，本来是每人一大勺糊糊饭，一大勺刚好就是一碗。现在，馍还是一样，大家都是一个，给青年突击队员每人再加一小勺糊糊，大约有一碗的四分之一。这样一来，又进一步大大激励了青年突击队的斗志，队员们的劲头儿更大了。提钟政认为，这是他来夹边沟农场参加劳动教养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常言说，万事开头难。放下笔杆子，拿起锨把子，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也有一个开头难的问题。到底自己是个吃过苦的人，给日本人当勤杂工，扛过大袋子的煤、大口袋的面和米。在美国人的军人俱乐部当

招待，还不都是些力气活，一天忙到晚，也是马不停蹄地干。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通过自己拼命地干活，重新成为一个新人的日子不远了，胜利在望，再努力吧！

劳累了一天的劳教人员们，躺倒以后立即进入梦乡。但提钟政却久久不能入睡。这些日子，他每天都处在亢奋之中。入夜，他点着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带灯罩的煤油灯，刻写各种宣传材料。这种“美孚”灯比普通的煤油灯要亮得多，是张亦铭的父亲送给他作纪念的。提钟政特意把这个灯带到夹边沟，本来是准备晚上看书用的，他知道农场是不会有电灯的。那个年代，在甘肃省，除了兰州外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有电灯，多数城市都是点煤油灯，更不用说农村和偏远的农场了。如今他为自己的这个小灯找到了新的用场。由于他的青年突击队在基建队、在全农场已经小有名气，受到了领导的赞扬和支持。根据提钟政的要求，场部特意为他配备了誊写钢板和蜡纸、油印机，供他编写刻印《今日战况》、《生产简报》、《喜报》等宣传材料。这位“提队长”白天与他的青年突击队一样战天斗地，入夜就点上小灯忙活这些宣传材料，比他在广播电台连夜赶写《光荣榜》还要上心。须知，当年在广播电台是吃饱了肚子加班干，如今是饥肠辘辘加班干；过去有办公桌，有电灯照明，如今只能坐在铺上，把钢板横在自己膝盖上刻写，但是提钟政心甘情愿。每写一份《战况》，都要反复推敲，反复修改。那是个大跃进的年代，生产大跃进，语言也大跃进，新提法、新词汇层出不穷，提钟政也尽力让自己的《战况》在语言上、提法上不落后于时代，还特别注意学习、采用最新最时髦的语言表述方式。他们的队长在一次会上说，你们这些草包，吃完晚饭就躺着，跟猪一样打呼噜去了，看人家提钟政，每天晚上加班编写《战况》，自己刻自己印，哪里去找这么优秀的人，你们这些草包们应该

向人家学习嘛！提钟政的《每日战况》开始是印给自己小队的人看，后来印发给全基建队，再后来是印发全夹边沟农场，每个小队都发一张。

提钟政所在的青年突击队，成了全农场基本建设的排头兵。

两个月之后，酒泉地方上要架设一条从玉门到嘉峪关的高压输电线，到农场来求援，农场就把五小队派去支援。虽然是无偿援助，但饭是要管的，这一点对提钟政他们个人来讲太重要了。从他们到达工地的那一天开始，黑石头一般的糝子馍就不见了，改成了白面馍馍，早中晚各五个，中餐和晚餐还有炒菜，大多数是炒洋芋、炒辣椒，偶尔还有红烧肉。活儿同夹边沟农场整地相比，稍重一些，无非是些挖坑、栽杆、架线之类。开始工地在住地不远处，随着架设线路的延伸，施工工地就越来越远了，每天走多远才能走到工地。越往后，天气也越冷了，施工的难度一天比一天增大。

输电线路电杆从嘉峪关开始，穿过戈壁滩，往玉门老君庙方向延伸。这一天，线路要跨过一条干河沟，刚好在干河沟底应该有一根杆子。从表面上看，是一层粗砂，但一镐下去，却震得虎口发麻，只挖出一个白印子，原来是厚厚一层冰。坑要挖到一米五见方、一米七深的程度才算合格。他们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难啃的骨头，什么时候才能挖成？愁也没用，任务在这里摆着，还得一点一点挖。提钟政虽然年轻，但他有痔疮，不能使猛劲。其实他的痔疮原来并不怎么严重，青年突击队这两个月繁重劳动，使他的痔疮加重了。

夹边沟农场医务室的刘鹏举医生是来自兰州医学院的右派，在兰州时就认识提钟政，劝他要认真治一治。但夹边沟农场哪里是个治病的地方？提钟政没有太在意。他想想，注意一些就行了，只要不使猛劲，问题就不是很大。今

天的情况就不同了,不使猛劲儿,冰层怎么挖得开?不可能不劳动啊,挖吧。提钟政双手把洋镐高高地举过头,在空中停留片刻,把气憋足了,猛地把腰往下一弯,紧咬牙关,使出浑身的力气向下砸……累了,歇一歇再来。这一天,在提钟政的记忆中是他出力最多的一天。到了下午,他感到自己的臀部除了原有的发痒、灼热和疼痛之外,又多了一种黏糊糊的感觉。他估计是痔疮开始流血了,但没有办法,任务完不成不能收工。这还不算,如果撂下不挖,两个多月青年突击队的良好表现不是前功尽弃了吗?自己争取尽早回到广播电台那个记者工作崗位的愿望不是要泡汤了吗?提钟政下了死决心,只能咬着牙硬撑着苦干,不能半途而废。他继续一次又一次地把洋镐高高地举起,继续使尽全身的力气一次又一次地往下挖。他已经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前面一镐下去后面就是一股血……直到夜里十点半钟,终于挖够了一米五见方、一米七深的坑。提钟政又检查了一遍,觉得完全合格后才收工。

回去的路上,提钟政感到臀部一阵阵钻心的痛。每抬一次腿,就好像用刀子戳了一下似的难受。实在痛得厉害,他就停一停脚步,他想过,能不能躺下往前滚,因为滚起来就不用抬腿迈步了。但再一想,这么远的路,滚到明天早上也滚不到住地呀,平时曾见过走路的、跑步的、乘车的、坐轿的,也有走不成爬着的,哪里见过滚的?想到这里,提钟政苦笑了笑,咬咬牙,继续艰难地往前爬。

不知走了多少时间,提钟政回到帐篷时,其他人都早已入睡了。

帐篷中的火炉上放着一铁壶热水。提钟政进帐篷后第一件事,就是用铁壶中的热水和帐篷外的冰雪兑了一盆温水。提钟政先是脱掉了棉裤,然后试图脱内裤。但内裤已经牢牢地粘到肉皮上,一扯就钻心地疼。提钟政左扯右扯,扯出了满头大汗,内裤还是扯不下来。此时,他真想

大哭一场。但是他明白，哭是无法把裤子和粘在一起的肛门分开的。他想到自己在酒泉招待所三天闭门思过的收获，不是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办法克服吗？哪怕是枪口对准自己的头，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眼前，一个大活人为脱裤子哭鼻子，那是懦夫，不是提钟政！提钟政必定有办法把它脱掉！呃，有了，我连裤子一起坐到温水里泡，不信把它泡不开！于是，提钟政又往盆里对了一点开水，用手试了试，大约有四十度，刚合适。提钟政一只手扶着床沿，一只手按着地，慢慢地坐到了温水里，一股暖流从臀部缓缓上升，惬意极了，但这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可能是温水浸过内裤很快接触到了痔疮创口，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从臀部直往上蹿，提钟政急忙站了起来。血痂把内裤和皮肉还牢牢地粘在一起，还是扯不开，提钟政已疼得大汗淋漓，也只能咬咬牙，再一次坐到温水盆里。大约过了五六分钟，提钟政用手试着扯了一下，裤子和皮肉终于分开了，他才站起来，慢慢脱下内裤，清理了满屁股的血污。从这一天开始，提钟政的痔疮比以前严重了，活一重就流血，流了血，他就用高锰酸钾洗一洗。给他看病的医生如刘鹏举等，也都是戴帽子的右派分子，也是劳教人员，不敢给他开病假条。不就是个痔疮吗？尻子里淌点血，就躺倒不干了？医生们怕承担影响生产的责任，也怕扣一个继续同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帽子。只要能坚持，提钟政也不愿意马上就躺着歇着，他还年轻，受得起这点病痛。他宁可多受痛，也要好好表现，早点回家与家人团聚，回单位继续搞他的编采和播音工作。坑挖好了，杆子栽上了，接着就是架线。爬杆儿上线是技术工人的活儿，提钟政他们主要是往电杆跟前背电线。有一天下午，提钟政背了一捆电线往工地送，那是一段汽车无法行驶的沟沟壑壑的戈壁滩。提钟政深一脚浅一脚，走啊走，时间已近黄昏，他还没有走到目的地，饥饿，寒冷，痔疮发

作引起的灼痛，还有流血引起的黏糊糊的难受，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提钟政被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惊醒了。车灯在他脸上一晃一晃的。

提钟政极力睁开眼睛，他觉得脸上糊了些什么东西，用手一摸，借着一闪一闪的车灯一看，是已经干了的血痂。这是怎么回事？他极力回忆自己是怎么躺倒在这个地方的，脸上怎么有血？提钟政用手在身边摸了摸，手触到了冰凉的电线。他一下子明白了，自己是在往工地送电线时晕倒在这里的，晕倒时碰破了头，流了血，结了血痂。提钟政吃力地站起身来，他从汽车行驶的方向判断，汽车司机并没有发现自己，再过一会儿，汽车可能会越走越远。听人说，夜晚的戈壁滩有野狼出没……想到这里，提钟政突然来了一股力量，他脱下一件衣服在手中挥动着，呼喊着急难地奔跑着，他要极力引起汽车司机的注意。司机终于发现有人在呼喊，在距离提钟政几十米远的地方刹住了车，因为沟沟壑壑，汽车开不到提钟政跟前。提钟政气喘吁吁地走到汽车跟前，司机问他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背着电线往工地送，结果晕倒摔伤失去知觉等情况一一说给了司机。司机把头一摆说，那就上车把你带回去。提钟政说：不能就上车，我背的电线还在那边摆着呢，送不到工地，我也得把它背回去才是，不然怎么交差？司机有些火了，不知是看着提钟政太狼狈，到这个份儿上了还惦记着他的电线，还是要急着赶路，便粗声粗气地骂道：管球你的电线不电线，你还要命不要命了？命要紧么你的电线要紧？你上不上车？说着，司机已经把车发动起来，就准备挂档了，提钟政这才不得不上车。不上车，他今晚就没有回队部的机会了，就要在戈壁滩上过夜，冷，还可能遇到狼，这一夜怎么过？可提钟政又想，他自己上车把背的电线撤下，明天怎么向队部交待？扣一个劳动表现不好

的帽子影响了回单位、回家的时间,多划不来!提钟政一面往车上爬一面哀求司机:师傅,把我的电线也带上吧,要不明天我不好向队上交待,行行好吧师傅……司机看也不看他一眼。等他上了车,还没坐稳,一踩油门“呜”一声,车后扬起一溜烟尘。司机像是对提钟政、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什么他妈的电线,球!

1959年元月,嘉峪关至玉门老君庙的高压输电线架设工程结束,提钟政又回到了夹边沟农场。

临近春节,农场里要搞一点突出节日气氛的文艺活动。经过一番摸底筹划,决定用京剧的形式排练《十五贯》中的一折戏。演戏需要物色合适的演员,反正都要从参加劳教的右派分子当中出。饰演娄阿鼠的是个北京人,饰演况钟的是什么地方人,提钟政已经记不清了。兰州市西关十字一家机械厂的一个女技术人员饰演熊友兰的媳妇。熊友兰是个小生,由谁饰演呢?选来选去选中了提钟政。这帮人排练得非常认真,特别是提钟政。他认为,排戏演出是活跃农场文娱生活的有效形式,是农场整体工作的一部分。认真演戏,也是认真工作,是领导看自己工作表现的机会,马虎不得。再说,戏是啥?戏是“离合悲欢演往事,愚贤忠佞认当场”,“三五人千军万马,四七步万水千山”。戏是历史,是社会,是人生。它能让哭的人笑起来,也能让笑的人哭起来。可以说它什么都是吧,其实它什么都不是,它就是人编出些曲儿和故事哄人高兴、叫人伤悲的东西。既然生活中没有可高兴的事儿,到戏剧中能找到也是好事。提钟政从小就喜欢唱戏,特别是京剧,有不少段子都会唱。唱戏就可以不干活,何乐而不为?提钟政表演得不但认真,而且是全身心投入。

正式演出的那一天,看戏的人很多。管教干部们也都来了。也难怪,当年那个时代,没有电视,收音机都是奢侈品,惟一的文化生活就是集中起来全场看电影。能看上

戏,这是破天荒的一次。右派分子们多是些文化人,对中国的传统戏剧多少都有些基本的了解,知道这《十五贯》是歌颂清官况钟为蒙冤百姓平反昭雪的戏。他们都有一个相互之间不能吐露,却又希望自己的冤情能够平反的迫切愿望。愿望无法实现,到戏中去寻求一点精神安慰吧!这是劳教人员愿意看戏的不约而同的心愿。提钟政们没有辜负场领导和广大劳教人员的愿望,表演赢得了观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戏演到案情真相大白、熊友兰的冤情终于得到昭雪的时候,提钟政对况钟的感激之情已经很难用语言表达了。根据剧情,这里设计了一套熊友兰连续三个抢步加叩拜的表演动作。随着激越的音乐和锣鼓点儿,提钟政感到自己的冤情已被眼前这个况钟给平反了!《光荣榜》不再是他忘恩负义地射向党组织的毒箭,而是他的一片赤诚!他一步跌倒,左腿前蹲,右腿后跪,把头往后一扬,头上的长发随着头的叩拜在空中也甩了一个大圈。接着又非常紧凑而自然地接连重复了两遍,把此时此刻熊友兰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

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这大约是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少有的一回发自内心的掌声,是称赞提钟政们的演技,还是表达了劳教人员们心中的某种愿望?这是当时不能探讨的话题。不管怎么说,演出获得了成功。

在整个排练和演出期间,提钟政们的伙食是受到照顾的。吃的东西与其他劳教人员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给“演员”们不定量,可以吃饱。直到1959年春节前后这一段时间,提钟政基本上没有忍饥挨饿,他比其他劳教人员们要幸运多了。

不管是在夹边沟平田整地,在嘉峪关到玉门老君庙之间架设高压电线,还是再回到夹边沟农场劳动,年轻的提钟政一直保持着昂扬的朝气。他穿的那件西装虽然破

旧,但十分合体,有垫肩,腰收得很合适,显得特别精神。与别人清一色的中山装相比,也显得特别扎眼。每次出门,他总在腰间拴一根草绳,虽然不伦不类,但俨然一副拼命干活的架式。在上下工的路上,只要不是累得实在受不了,他总是哼着,唱着。在一般劳教人员的眼里,提钟政好像不是戴了帽子来劳教的右派分子,而是在城里呆腻了,到乡下来消遣的无事之人一般。你有什么可乐的呢?可事情就是这么怪,有人以紧皱的眉头向人展示自己内心的烦忧,而提钟政却偏偏喜欢在那脍炙人口的精彩唱段中寻找自己排遣的方式,他喜欢这种方式。

1959年春节以后,基建队给提钟政所在的五小队分配了一项打土坯的任务,地点在离场部不远的一片荒滩上。选择在这个地方的原因是这里有很厚的黄土层,还有一眼咸水井,取水很方便。打土坯是最典型的力气活儿,要先挖好土和好泥。他们缩起裤腿跳到泥里用脚反复踩着和泥,这比用铁锨和省劲,也能把泥和匀。泥和好后才能开始往模具里填泥制作土坯。提钟政们所用的土坯模具很大,在模具里填好泥后,要把填好泥的模具抱到平坦、开阔的地方,然后打开模具将土坯摊到平地上晾晒。每抱一回,几乎都要右派们使上全身的力气。提钟政因为痔疮的关系,又怕使猛劲儿,偏偏这又是一个不使猛劲儿就干不成的活儿。打土坯是有任务指标的,每人每天要完成八百块。任务很重,他们必须起早摸黑地干。为了完成任务,晚上他们就睡在水井旁边的小草屋里。

这时每个人的口粮已进一步减少,每天只有两顿饭:早上九点多钟一次,下午四点多钟一次,都是送到工地上吃。送饭时同时捎带送点开水。因为劳动强度大,出汗多,不但肚子吃不饱,而且水也不够喝。渴急了,就喝井里的咸水。这一喝,有一多半人开始拉肚子,有的人拉得很厉害,跟拉痢疾差不多,又没有药,拉肚子的人消瘦得很快。

有的人刚来时还好好的,拉了几天就变了形了。有一个姓芦的浙江人首先病倒。这个浙江人是什么身世,当右派之前在什么单位工作,提钟政他们一概不知,只晓得他当过会计,说话唧唧喳喳的,没有人能听得懂,他没有办法与旁人交流。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又吃不饱肚子,其他人也是自身难保,谁还有心思去顾及一个讲“鸟语”的浙江人?一天早上,这个姓芦的浙江人没有起床,因为他本来肚子拉得厉害,别人也没太在意,心想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到了上午九点多钟,场部把饭送来了,喊他吃饭,半天不见动静。提钟政们才发现不对劲,走去一看,发现他的脸色焦黄焦黄,手也是黄的,眼睛也不睁,用手搭到鼻子上一试,不出气儿了!大家这才知道他已经死了。

不管语言怎么不通,但毕竟大家都是一样戴了右派帽子来劳教的人员,一起打土坯也有些日子了,看到浙江人的这个结局,人人心里都很难受。提钟政也在拉肚子,比这个浙江人的情况好不到哪里去,看到场部派来的车拉走了浙江人的尸体,提钟政脑子里闪出《红楼梦》里《葬花吟》中的几句:“依今葬花人笑痴,它年葬依知是谁?”但是今天这个场合只能自己在心里想,不能唱。物伤其类,大家都在默哀,都肃立着,目送浙江人的离去。提钟政真想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放声唱一曲《葬花吟》,然而无奈拉肚子拉得他已经有气无力,连走几步路都已经很吃力。

浙江人的尸体拉走以后,提钟政们向管教干部反映说,给我们送的水不够喝,我们只好喝井里边的咸水,可喝了这里的水就拉肚子。现在打土坯的这些人都在拉稀,没有药,也就没有任何办法能止住。老芦已经先死了,再不采取措施,我们这些人就都要完了。请给我们看看病吧,最好把我们转到场部,这里实在坚持不下去。管教干部向场部反映了他们的要求,场部很快就派医务所的刘

鹏举等人来给提钟政们检查身体。刘鹏举看到问题严重，立即向场方提出建议：情况十分危急，多数人已出现口渴、皮肤干燥、眼球凹陷、尿量减少等症状，这是脱水的症状，如不及时抢救，很快就有生命危险！当天下午，场部就派出管教干部来到水井边的小草屋，告诉提钟政们收拾行李，转回场部。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和休息，提钟政们基本上恢复了健康。这时，他所在的基建队第五小队又接受了一项新的外出任务：到酒泉县的一处戈壁滩上去采供国防工程建设用的沙，事先告诉他们到了那里不许乱走动，不该打听的不要乱打听。

到了目的地一看，提钟政发现居然是自己熟悉的地方，正是他1951年冬天，跟随当时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宗望参加土改的地方。如今，这些地方都换上了一些新名称，什么“红旗”、“跃进”、“东风”、“反帝”之类，其实就是酒泉县河东区六乡第二行政村，或叫清水堡，他曾担任过这个行政村土改工作组的组长，还能忘得了？当年在他的主持下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贫农们兴高采烈的景象他至今记忆犹新。如果如今能见到那几位农民，他们可能还会记着这个情景呢。提钟政知道，右派不右派那是机关单位的事情，农民不管这些个。

采沙工地就在清水堡村旁边。把地表上不太厚的土层剥开，底下就是沙子，白白的，颗粒大小也非常一致。大自然鬼斧神工，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这种地理结构。厚厚的一层白沙，就好像人工存放的一般。

已是开春的天气，不很冷了。提钟政们就住在采沙工地临时搭起的几顶帐篷之中。每天的工作就是挖沙、装车。一则劳累，二则也有规定，不让随便走动，所以，在到达工地的一个多月当中，提钟政老老实实没有离开过他们劳动生活的工地和帐篷。干河沟对面的清水堡像磁铁

一般牢牢地吸着他的心，那里有他熟悉的村街、土坯房、热炕头，他曾经在那里吃过的拉条面、糝子饭，特别是放到火里烧出来的叫做“烧壳子”的馍馍，想起来就叫人馋涎欲滴。还有他结交的一大批农民朋友。提钟政是个爱结交朋友的人，日本人桥本、美国人奥波瑞昂、当年天津《工人日报》的老编辑缪隼、军人俱乐部的大个子领班克拉默、跟提钟政一起划为右派分子的张亦铭，等等，至于他小时候在天津今是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李秀琴，更是他终生难忘的忘年之交。但是，那些朋友有的现在应该算是“敌人”了，因为他们的国家现在是中国的敌人，他们个人自然也应该是提钟政的敌人，这是从道理上推，而不是从感情上讲。话说回来，就是能当朋友交，天涯海角，天各一方，也没有办法见到面，没有办法联系得上啊。提钟政的农民朋友则不然，就近在咫尺。每天劳动的时候，只要他的目光往东边清水堡那个方向一瞥，他就不由自主地想迈步到村子里去走一走。

一天下午，四点多钟就收工了，可能是带队干部有点什么私人事情要办，大伙也就跟着占了个小便宜。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提钟政溜出帐篷，不一会儿就进了清水堡。提钟政一看，这边是药铺，那一处是小杂货铺，再往前朝右一拐第二个门应该是他土改时的老房东雷华云的家。那时，雷华云年迈的父母都还健在，雷华云还有个弟弟。在提钟政的主持下，土改时除了给雷华云家分了土地之外，还分了一头大青骡子，雷华云一家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街上没有行人，显得冷冷清清。进了雷华云家，也不见人。提钟政喊了几声，正房里走出一位妇女，把提钟政瞅了一眼，调头就往屋里跑，边跑边喊：“你快出来，工组长来了，工组长来了！”工组长指“钟”组长，雷华云媳妇讲的是高台县的方言，“工”“钟”不分。提钟政参加工作后，除档案中“姓名”一栏填“提钟政”以外，其他一切工作和

社交场合,包括他当播音员所报的名字都是“钟政”,因此清水堡农民喊他“钟组长”。

雷华云跑出房门,双手拉着提钟政的手使劲儿摇,边摇边打量着他的衣着,“你怎么来了,我的天爷,你怎么来了?”雷华云双手抱着提钟政的右手仍在一个劲儿地傻摇,竟忘记把客人往房里让了。雷华云太意外了,他知道“工组长”是大忙人。当年土改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单位上就来人把他请回去了,他怎么能有空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来呢?并且怎么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提钟政笑着对雷华云说,进屋慢慢说吧。

雷华云始终拉着提钟政的手不放开,一直把提钟政拉到炕上坐了下来。隔着炕桌又把提钟政的手握起来,还是问的那句话:“老天爷,你怎么来了?你干什么来了?”提钟政反问雷华云,看见村子西边那几顶帐篷了吗?雷华云说见到了呀,那不是劳改犯住的地方,是劳改犯在那里挖沙子的嘛。提钟政说我就住在那里,我就是在那里挖沙子的人。雷华云一听大惊失色,连珠炮似的追问道:“你犯错误了?你怎么会犯错误?你犯的是啥错误呀?”提钟政犯难了。实话说给他吧,怎么说呢!即便说了,他能理解吗?编个瞎话吧,为什么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朋友编瞎话呢!提钟政想了想,还是照实说了吧。于是,提钟政把自己如何成为右派的经过,从头到尾按时间顺序说了一遍。雷华云听得一清二楚但又十二分地想不通:“钟组长,你是个好人啊,怎么就……”雷华云转过身向他媳妇交待了几句什么话,又继续与提钟政攀谈起来。雷华云拿出自己种的旱烟叶子招待提钟政抽。

不一会儿,雷华云的媳妇端了一盆热腾腾的洋芋进来了。洋芋的淀粉含量大概很高,一个个都裂开了嘴,好像是笑迎当年土改工作组的钟组长。雷华云媳妇把洋芋往炕桌上一放,一股清香飘散开来,是蒸土豆特有的那种

清香，沁人心脾。提钟政好长时间没有闻到过这种香味了，他有一种陶醉的感觉。他想，这种气味可能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味了。他已经咽了两次口水了，只等主人发话。雷华云发话了：钟组长，你看，你来了，我们也没有什么招待你，家里一点儿粮食也没有，没有面，拉条子也没法做，你就凑合着吃点洋芋吧。提钟政顾不上客气，他本来丝毫也没有客气的意思，拿起来就吃上了。吃了几个以后，才发现雷华云夫妇眼睁睁地瞅着自己，他们夫妇一个也没有吃。提钟政忙说：你们也吃呀，你们也吃！但他俩谁也不动手，只是一个劲儿地劝钟组长吃。就这样，直到提钟政一个人最后把这一盆洋芋吃完。临走，雷华云交给提钟政一个小布袋儿，里边装着炒熟的麸子，还有一包大约两斤多晒干的带叶子的胡萝卜。把这些东西塞到提钟政手里，还一个劲儿地表示歉意。那意思是，你看，钟组长当年对我们那么好，十几亩地，大青骡子，都是你钟组长分给我们的，今天你落难了，来到我家，没有什么招待你，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真是对不起你。提钟政知道，这已经是老实巴交的雷华云家能够拿出的最好的东西了。回到帐篷，提钟政一直过意不去，心想，他们把麸皮和干萝卜送给我，他们吃什么去？那是他们的口粮啊。第二天，提钟政拿了一双家中带来的皮鞋和那件半旧的夏威夷衬衫送给了雷华云。夏威夷衬衫是美国朋友奥波瑞昂当年从关岛寄给他的，是他最心爱的一件衣裳，可雷华云对他一个右派分子如此诚心，实在无以相报，无以相送，也只好把这件衣裳送过去，聊表心意吧！雷华云执意不要，推辞再三。提钟政说，收下吧，我现在挖沙、装沙，哪里穿得成。这些东西，放着也是放着，你不穿，叫你兄弟穿去。提钟政知道雷华云的兄弟在县城当工人，他是穿得着的。从这时起，提钟政就写信告诉天津的父母亲，以后来信可寄：甘肃省酒泉县清水堡二队雷华云收，这个雷华云定会转交给我

的。这个办法很好，可以避开检查和克扣。这以后，提钟政的父亲经常给他寄一点钱和粮票到雷华云处，雷华云一次不误，都及时转交给了提钟政，提钟政就用这些钱和粮票在清水堡车站的铁路食堂，或者另外一个专卖一锅子面的小饭铺去，买点吃的。有了家中的接济和雷华云的帮助，提钟政在清水堡采沙的这一段时间没有挨太多的饿，他的体能消耗没有出现“透支”，这对他最后终于度过了最严酷的难关创造了一些条件。提钟政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农民朋友雷华云等一帮人在自己最艰难的时期对自己的帮助。提钟政记得，1959年夏天，一天中午，采沙的一帮右派要结伙到农民地里去买西瓜吃。他们随意来到一块瓜地，一个大个子农民在这里看瓜，每人称了一个，付钱时大个子农民示意提钟政等一下。提钟政不知这位农民有什么事，就站下了，等别人都走了以后，农民问提钟政：“钟组长，你还认得我吗？”提钟政把他端详了一阵，猜测说：“你是东头老杨吧？”老杨说：正是，钟组长，你是好人，土改时，你给我家分了十五亩地，还有两头牲口，你是我们家的恩人。人不能没有良心，我不能忘了你！今天我在这里看瓜，算你运气好。你在这里挖沙我也听雷华云说了，想帮你，没机会，你现在就到地里去挑，看上哪个摘哪个，尽饱吃，不收你的钱。提钟政说：那哪儿成。老杨二话没说，走进地里挑了一个大瓜，托在左手中，一边向提钟政走，一边举起右拳，“扑哧”一声砸下去，熟透的西瓜破成了好几块，硬塞给提钟政说：快吃快吃，这都是你的，吃。临走，又给提钟政硬塞了两个，怎么说都不要钱。

1999年，即雷华云帮助了提钟政的四十年后，提钟政有事乘小汽车路过清水堡，他让司机把车停下来，又专门去探望了雷华云。可惜这时雷华云已经辞世，提钟政在他家中的院子里肃立了几分钟，算是对雷华云的凭吊了。这次来，提钟政只见到了雷华云的兄弟、女儿和开出租车的

女婿。这些人都不知道什么“钟组长”，什么土改、大青骡、劳改队采沙子之类的事情，对提钟政这样的不速之客也就不热不冷的。但提钟政认为，自己亲自来了，见到了雷华云的亲人们，了却了一桩心事，在心灵上还是感到极大的安慰。

在清水堡的这半年多时间里，虽然粮食已经很紧张，采沙队的伙食很差，但有了雷华云、老杨等农民的帮助，天津家中又不断有钱和粮票寄来，提钟政的日子还算能过得去。他不但坚持下来了，而且劳动表现还属于比较出色的一类。前边说到，他们采沙的地点就在清水堡西头不远，这里有一条铁路支线与兰新铁路线接轨，向北延伸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他们采的沙子就直接装到停在支线上的火车皮上，有车皮就装车，没有车皮就备沙。装车往往是突击性的工作，有时半夜三更也要起来干活，挖沙备沙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别人劳动都是一把铁锨，捡小的挑，大的使用起来太费力，吃不消。提钟政给自己备了两把锨，一大一小。任务不紧，用小的挖；任务紧了，用草绳把腰一扎，抡起大锨干。装车皮，他装得最快。挖沙子，他挖得最多。管教干部们后来也有经验了，到工地一看，像小山一般的那堆沙子，肯定是提钟政挖的。他不愿意前功尽弃。自从1958年来到夹边沟农场，分配到基建队以后，不管是平田整地，架设高压电线，挖土、提水、打土坯，还是采沙装车，他都要以“先进”的标准要求自己。目的只有一个：争取一个好的评价，早日回到家中，回到工作单位。

这期间曾经发生过一件并没有引起提钟政警惕，但最后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差一点儿给他带来一场沉重灾难的事。一天，提钟政正在工地上挖沙子，基建队袁队长径直走到提钟政干活的地方站下不动了，好像有什么事情要交待。提钟政把自己手里的活停了下来，问袁队长有什么事。袁队长看了看提钟政说：“我看你最近情绪不

对呀！有什么心事儿吗？说说看，有什么心事。”提钟政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说：“没什么事，我这一天活儿干得还可以呀，谁像我又干又唱？”袁队长说：“不对，你有心事，你好好想想，有心事呢。”说完，袁队长就走了，没有进一步解释，提钟政也没有往心里去。管教干部嘛，总要有个干部的样子、干部的架子、干部的口气。不管见到谁，总要敲打几句。提钟政一贯表现好，没有什么可敲打的，以这样居高临下的口气问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也许说完也就完了。

1959年初冬，提钟政们在清水堡挖沙的任务完成以后，就把他们调回到夹边沟农场了。临走前，全体挖沙的劳教人员集合在一起，聆听解放军讲话。因为几个月来，他们挖出来的沙子供应的就是部队单位，用途都在国防建设上。解放军态度和蔼，开会前跟大家有说有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他们对右派分子这么客气，提钟政既感到意外，也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受到了“人民”的待遇！解放军嘛，对人民才能和蔼，对向党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怎能客气？

开会了，这位解放军军官说，大家辛苦了，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你们都没有停止过工作，你们有力地支援了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建设，感谢你们的劳动！听了以后，提钟政们心里热乎乎的，感到那位首长的讲话非常亲切，但是又非常遗憾，因为那位首长在讲话开头没有说：“同志们”，讲到最后也没有说这三个字。回到农场好几天，提钟政心里还在想着这件事，又是慰问又是感谢的，就是不叫“同志们”，什么时候自己才能被别人称为“同志们”呢？

回到农场休整了几天，提钟政们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到黑河边上捡石头。提钟政记得，这里也有铁路，他估计也是从清水堡接轨的兰新铁路线上往北走的那条

支线。石头很多,搬石头比挖沙子要累得多,而且远离村庄,失去了雷华云们的帮助,口粮进一步减少,提钟政开始有了艰难度日的感觉。即使这样,他还是坚持着每天晚上加班加点,在别人都入睡以后,他还要撰写《战报》,放了个什么卫星,树了个什么红旗,超额完成了多少多少任务,用大红纸抄好,第二天出工以前张贴出去,以鼓舞士气。

有一天,任务完成得不错。收工之后,提钟政就抓紧时间写起了《喜报》。《喜报》写到一半的时候,帐篷前开来一辆吉普车。采石场附近只有火车路过,偶然也能见到卡车,吉普车却是很少开到这种地方来的。吉普车一到,一些人跑出去看热闹了。提钟政想,可能是有什么领导到采石场来检查工作了,他想与自己无关,便继续低头写他的《喜报》。这时候,队长走进提钟政的帐篷,喊他到队部去一下。出门看见吉普车,挂的是公安牌照,提钟政心里一动:什么人出事了吗?提钟政没想到他走进队部帐篷后才看见有两个公安正在那里等着他——吉普车是冲着他提钟政而来的。

公安开门见山地问:“你叫什么名字?”提钟政说:“叫提钟政。”公安又问:“原先在什么地方工作?”提钟政答:“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公安问:“平常写东西吗?”提钟政答:“写,我喜欢写,也喜欢朗诵,朗诵能把诗文的感情充分地表达出来。”提钟政这时还没有想到公安今天找他与什么治安、刑事案件有关。只要说到诗文词曲,他就来了精神。别人问到的他乐意讲,别人没有问到的,他也主动联系起来给你说。公安问:“你现在还能朗诵吗?”提钟政说:“可以呀,没什么问题。”公安说:“那我给你找本书,你朗诵朗诵。”提钟政说:“咳!找什么书呢,我脑子里装的什么都有,我给你朗诵就行了。我给你朗诵一首马雅可夫斯基的《好!》。”公安说:“啥鸡?”提钟政说:

“不是公鸡母鸡的那个鸡，是马雅可夫斯基。他是杰出的苏联诗人，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林务官的家庭，父亲去世以后迁居莫斯科。上中学时与布尔什维克大学生结识，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十五岁入党，曾三次被捕，在狱中开始写诗。他的诗文充满战斗激情，最有影响的长诗是《好！》作者在诗中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赞美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公安们有些不耐烦了，打断了提钟政的演讲：“好了，你朗诵吧！”提钟政清一清嗓门，立整，把头微微抬起，目光作仰视状，马上就进入了演出状态：

我大声地礼赞，
以骄傲，以歌颂。
我们迈开了大步
走向工作和斗争，
……

公安们今天到采石工地，并不是来欣赏提钟政的文艺演出的。马雅可夫斯基的《好！》是一首长诗，他们没有耐心把诗听完，只听了几句就打断了提钟政的朗诵。公安接着问提钟政：“你自己写不写诗？”提钟政说：“写还是能写，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公安又问：“你在场部写过诗吗？”提钟政说：“在场部没写过。”公安说：“你再想想看，写过没有？你自己说，坦白从宽，自己交待能得到宽大处理，等别人揭发或者拿出证据来，那处理就不一样了！”

到这个时候，提钟政才觉得自己的脑袋“嗡”地一下，然后一阵眩晕，差一点栽倒在地。他这才明白，公安是冲着他来的。他们肯定是怀疑自己写了什么反动诗歌一类的东西，而且似乎已经有了证人和证据。提钟政还回忆起，几个月前在清水堡挖沙子时，袁队长曾说自己情绪不对，似有什么心事。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场领导就把自己瞄上了。天哪，到现在自己还蒙在鼓里，还加班加点写

《喜报》，这是哪个缺德的干的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到底是啥事，我什么事也没干呀，我就是要好好表现，只怕别人说我什么地方表现不好呢。

见提钟政半天不说话，公安拿出手提包，刷地一下拉开拉链，从中取出一张纸拍在桌子上，对着提钟政声色俱厉地说：“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提钟政看了一下，是几句顺口溜：

管教干部说大话，
五两口粮够个啥？
糠皮野菜当饭吃，
鬼神遇上也害怕。

顺口溜看样子不是原件，是用公文纸很工整地抄下来的。提钟政感到似曾相识，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内容。虽然谈不上什么文采，但它反映的情况还是挺真实的。只是这个时候只能说它坏，不能说它好，说它是反革命恶毒攻击，是污蔑大好革命形势，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别有用心，是矛头对准革命管教干部……提钟政也认为这个时候写这种东西真是不识时务，胆子也真太大了些，不知哪个右派到了这个时候还如此胆大妄为，也太不自量力！

他想起来，大约在一年前，也就是1959年年初时，有一次他上厕所，情急之中没有带纸，本来应该在进厕所之前到地里找一块土坷垃揩屁股，这是当年劳教人员通行的办法，但这一次土坷垃也没来得及拿。这怎么办？眼前有一片烟盒，心想也是别人用过的了，用过的干了以后还可以再用，当时条件就这样，没什么可讲究的。但他拿起烟盒一看，上边写着四句顺口溜，也就是上边说过的这四句话。提钟政讲不清自己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个纸烟盒他没有用，但他从厕所回去后对袁队长说了这件事，他建议袁队长尽可能把伙食改善一下，大家对伙食意见很大。袁队长对提钟政很看重，因为提钟政一直是劳教积极分

政的队长耳语了好大一阵儿，就离开了。队长回到帐篷后，问提钟政，你刚才干什么来着？提钟政说正在写《喜报》呢。队长说，那就回去继续写吧，没事了。

1960年春节到了，提钟政们是在采石工地“欢度”春节的。

这一天的采石工地大雪纷飞，戈壁滩上少见的大雪天气。没有办法外出，出去也没啥地方好去。劳教分子们都龟缩在帐篷中，躺在被窝里。有蒙头大睡的，有默默流泪的。常言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此刻，茫茫戈壁，一群无端被社会抛弃的人与石头和大雪为伴，谁不在思念亲人，思念他们的妻儿，思念他们的父母，思念他们的家乡？提钟政也不例外，他在想念远在天津的父母兄弟，远在省会兰州的妻子儿女。他知道，哪怕他们的生活很宽裕，没有亲人在身旁，这个春节也是凄凉的。何况，全国大饥荒，天津和兰州的亲人也是逃不脱的，骨肉分离加饥饿难耐，亲人们这个春节怎么挨过去呢？想到这里，提钟政心里憋得难受。他穿上棉大衣独自走出帐篷。

帐篷外白雪茫茫，戈壁滩一改往日的灰黑，跟京剧《林冲夜奔》的情景像极了。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受高俅父子陷害，发配到提钟政的老家沧州充军，那时沧州是个边远、贫困的地方。林教头有国不能投，有家无法回。如今，我提钟政何尝不是如此？一首《光荣榜》，本意是响应党的号召、批评官僚主义，到头来却落得一个反党的结果，戴一顶右派帽子被“发配”到这荒凉戈壁滩上捡石头。这到底是怎么了？我到底干了什么？来到夹边沟农场，我拼命地干活，业余时间还帮助场里和队上搞宣传，发挥我的一技之长，就是想得到一个好的评价，能够早日回到家里跟正常人一样去上班，过一个安稳日子。可是呢，又无端被人怀疑，差一点被公安逮走，我提钟政还有希望吗？我还有出头之日吗？我还能回到亲人身边吗？唉！想也无

用，提钟政只有一个排遣忧愁的方法，唱起来吧。今天，最能表达他此时此刻心情的，还是《四郎探母》中《坐宫》那一段：

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
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
想当年那一场血战，
只杀得血成河尸骨堆山，
只杀得杨家将东逃西散，
只杀得众男儿滚下马鞍。

……

这时，提钟政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他已经完全进入角色，已经成为杨延辉了。思念亲人的杨延辉与提钟政已经没有区别。提钟政忘记了大雪，忘记了寒冷，久久伫立，向着东方，向着亲人，继续唱道：

我改换名和姓方脱此难，
将杨字拆木易匹配良缘。
肖天佑摆天门两国交战，
我的娘押粮草到了北番。
我有心过营去将母来探，
怎奈我身在番营远隔天边。
想老母想得我肝肠寸断，
想老娘想得我泪洒在胸前。
眼睁睁高堂母难得相见，
儿的老娘啊，
要相见除非是梦里团圆。

唱完了，提钟政回味着每一句唱词的含义，咀嚼着，

就像牛羊反刍。他觉得这是打发时光和转移注意力的好办法。

不知道在雪地里站了多久，提钟政感到自己的肩膀被人从背后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他的小队长。

小队长一句话没说，只是给提钟政披上了一件老羊皮大衣，陪提钟政站了片刻，回头又进了帐篷。

提钟政刚才思念亲人，思念家乡，虽肝肠欲断，却并没有流泪，但此时此刻，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几十年以后，他回忆起这一幕时仍感动不已，写了一篇题目为《人间自有真情》的文章。他认为，从形式上看，他们这些劳教分子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但实际上，还是有人了解、关心并同情他们。只是这种感情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不能表露，不能往外说。亲人的思念，社会上善良人们的暗中关照，帮助提钟政们树立了活下去、坚持下去、力争有一天能够平反的信心。提钟政认为，队长可能是看自己在雪地里站的时间长了，怕冻坏了身体，悄悄给自己披上了老羊皮大衣。队长没有把自己当坏人。

1960年春，采石工作结束，提钟政们又回到了夹边沟农场。基建方面没有什么活可干了，场里临时安排基建队送粪。就是把粪装进茭茭草编的筐子里，两人一组，从场部到地头，分若干地段，按接力赛的办法，一筐一筐往地里抬。提钟政的搭档是个大个子，姓刘，也是天津人。刘大个子原是天津码头上的装卸工人，四百斤的大麻袋，只要有人帮他抬到肩上，他就能从码头走上跳板，再从跳板上走上轮船。在夹边沟，虽然饿着肚子，当年的老本儿还没有“赔光”。提钟政跟他一副担子，又是老乡关系，这就碰上了好运气。筐子一到，提钟政站起来就要抬，刘大个子大手一挥说：别忙，坐下歇，抽烟。第二筐又来了，刘大个子又挥手说：别急，坐下抽烟。一连五筐转到他俩面前了，刘

大个子这才站起来说：来，擦起来一下抬上。刘大个子让提钟政在前面抬，他自己走在后边，粪筐挂在杠子上的支点几乎就挨到刘大个子的肩膀上了。这样一来，五筐粪的重量，刘大个子至少承担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刘大个子不是右派分子，而是“坏分子”，坏分子是五类分子中的一种。五类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都属无产阶级的敌人，当时的政策是，对右派分子可以“优待”，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送到农场强制劳教虽不像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可哪个右派分子都不敢说啥，好好改造就是了。刘大个子为什么被划成“坏分子”，提钟政当时没搞清，过后就更搞不清了。从刘大个子的为人看，提钟政认为，刘大个子不坏，他是个同情弱者的好心人。

送完春肥以后，一直到1960年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劳动”基本上成了一句口号。粮食定量越来越少，有时一顿饭连一点粮食星子都见不上，只有半碗放了点盐的苦苣。右派分子们成天躺在床上，就等着开饭。已经有人开始浮肿。上年，死人还是个别现象，1960年春季以后，开始多起来了。越到年底，饿死人的事就越频繁。

1960年9月，提钟政们接到场里通知，让大家收拾东西，准备转场。通知说，行李捆好以后，由场里组织统一运送，基建队全体劳教人员先于全场其他人员步行到新场区——高台明水农场。

转场决定很突然，要求很急，说行动就行动。提钟政把他日常所用的一些零碎东西包到一起，打了一个大行李，交到了队里。提钟政给自己留下了一条纯毛毛毯，虽然陈旧，但又轻又保暖。马上就要进入秋末了，从夹边沟农场到高台明水农场差不多有二百多里路，无论如何一天时间是到不了的，肯定要在路上过夜，没有毛毯怎么可行。

这天早上，提钟政们交运了行李，集合起来就上路了。基建队人员是打头阵的，必须在大部队之前先期到达，做好各项迎接大部队的准备。其他队的人员随后将乘车前往，提钟政们没有这个运气，他们必须“长征”。

队伍行进在戈壁滩上，开始还路过了一些村庄，只是越走村庄越稀少。一直走到天黑，路都看不清了，才就地休息。戈壁滩上，昼夜温差大，虽然是秋季，白天在阳光下光着膀子也不觉冷；太阳一偏西，气温很快就下降，到了晚上就确实寒意逼人了。提钟政毕竟有一条纯毛毛毯，他把自己用毛毯卷了好几层，虽然依然很冷，但还能熬得住，居然也睡了两觉，适当地恢复了一点体力。很多人被冻得一夜未眠。

第二天继续东行。路过一个村子时，带队干部说：“休息！”大家就地有蹲的有坐的，凑在有阳光的背风处晒太阳。因为许多人头天晚上被冻得一夜未眠，这一晒，有些人就迷糊起来了。带队干部并没有说休息多长时间，提钟政看大家都在迷糊，连带队干部也在打盹儿。他有纯毛毯护身，比别人休息得好，正好口袋里还有几块钱和粮票。能不能到老乡家找点吃的东西，提钟政这么一想，两腿不由自主地就开溜了。

这一天，提钟政一连找了十几家，也没有见到一个人。他不甘心，总想既然出来了，就不应该空手而归，结果越走越远。糟糕的是提钟政是个方位感不强的人，转了老半天，不得不无功而返时却又找不见刚才休息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回去时，队伍已经开拔！村子冷冷清清，找不到其他人，提钟政只好猜测着走。

提钟政走着走着，不觉天色已晚。老远看见一处有暗淡的灯光一闪一闪的，寻思这有可能就是大队人马的落脚之处吧，就大步赶了过去。走到跟前一看，是一个村子的集体食堂，社员们正在以家庭为单位到食堂打饭。有的

一边走,旁边的孩子一边在抢着吃。刚才找不见队伍,提钟政只是着急找,还没怎么觉得疲劳和饥饿,现在眼睁睁看着人家盆盆罐罐里边装着稀汤饭从面前走过,顿时觉得饥饿难耐,找队伍的事早放到脑后了。提钟政不由自主地向着食堂灶房走去。

灶房两个大师傅看着这位不速之客,迟疑地问:“你是……?”提钟政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人家肯定要问我是干啥的,为何这么晚了来到本村等,我现在已经饿得走不动了,我回答他们一切问题的目的都是先在这里搞上点吃的,吃了东西再说下一步咋办的话。不然,饿倒了,走不动路了,还找什么队伍去?于是,提钟政沉着地应道:“我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一起出来采访,路上丢了件东西,那个同志回头去取了,我在这里等等他。”听说是省城广播电台的大记者到乡里采访,两位大师傅很客气,又是让坐,又是让饭。尽管提钟政一个劲儿地往肚里咽口水,但还是要尽量地要表现得矜持一些,便言不由衷地说不急不急,等我们那个同志来了一块儿吃也行呢。虽然这么说着,但手却不由自主地接过了大师傅递过来的大海碗。锅里是野菜糊糊饭,提钟政连喝三碗,也就是说他一口气喝掉了三个社员的定量饭。喝完以后,提钟政对两位师傅说:钱和粮票另外那位同志拿着,他很快会来的,来了就交给你们。

吃完饭,等了半天,也不见提钟政的“另外一个同志”来,两位大师傅便说:“怎么办呢?记者,我们要睡觉呢。”提钟政这时无法脱身,也不想脱身。黑灯瞎火,他到哪里找他的队伍呢?灶房里虽不是栖身之所,但在找不到栖身之处的时候,这里总比外边暖和些。提钟政对两位大师傅说:那你们就睡吧,我也在这儿睡,我不占你们的床,把这几个板凳并到一起就成了,我这里有毛毯,灶房也不冷,可以的,没问题。

第二天一早,提钟政就被叫到了大队部。一个大队长模样的人问提钟政,你是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吧?提钟政答是。队长说,我们食堂的师傅说你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提钟政说就是,从1949年底开始,我就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一直到1958年。我到甘肃的好多地方采访过,后来我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来了。原来,提钟政从劳教人员队伍中走失以后,管教干部便怀疑提钟政逃跑了,就通过地方政府向附近村庄发出通知,要求协助搜寻离队人员。一大早,大队部得到线索,说有个可疑的人昨晚在大队食堂吃的饭,过的夜,现在还没有离开。于是,提钟政就被叫到了大队部。现在提钟政说他原先是广播电台的记者,“后来到夹边沟来劳动了”,是有意把问题说轻松一点,大队长也就什么都明白了,他又好气又好笑,同时又可怜眼前这个瘦得像麻秆一样的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知识分子,心想要什么钱和粮票,向他要,他也拿不出来。这个善良的队长告诉提钟政走错方向了,并且详细地告诉他应该怎么走。

提钟政顺着大队长指引的方向走了一个多小时,果然看见了大队人马。提钟政直奔队部,管教干部们看到逃跑的人又回来了,都很意外:“嗨!记者回来了!你这个提钟政本事真大,人家农民一人一瓢饭,你却一人三瓢,还什么采访记者,你可真会编呀你……我们寻思你要逃跑呢,今天看你是千方百计找队伍要回来,还真不是逃跑的样子,可你也不该冒充广播电台的记者呀!”

提钟政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也是实出无奈,不吃点东西,怎么坚持下来,怎么找回队部来?管教干部说,看样子你还是有改造决心的,是可以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这一点儿应该表扬。你早饭吃了没有?提钟政说:我一早起来就被盘问半天,他们给我指了个路,我就奔队伍来了,到哪里去吃饭?队长立即安排炊事班给提钟政补一份早

餐。因为是队长特意安排的，值班的炊事员又恰好是提钟政的一位天津老乡，对他特殊照顾了满满一碗野菜糊糊。提钟政无意中走失，反而意外获得了两次“吃饱”的机会。

从夹边沟农场出来的第二天下午，步行转场的队伍就到了高台明水农场。

提钟政一看，满目荒凉，没有树，看不到成片的耕地。裸露的、干涸的黄土地跟他们这几天转场步行走过的戈壁滩没多大的区别。从地貌看，没有一般戈壁滩那样的平坦。沟壑不少，崖头也不低，崖面凹凸不平。凹进去的部分正好是一个“窝子”，上边盖上些柴草，下边稍稍加以平整，用草帘子再吊上一个进出的门，就是一个能住人的地窝子了，用不着大兴土木去盖房子。右派劳教，有个地窝子栖身也就可以凑合了。

提钟政们来到明水农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造地窝子。场部的工作很简单，把场地划成若干块，一个队给一块，自己去建地窝子就是了。这就是提钟政们到达高台明水农场后开头几天的工作。灶具和生活必需品已经从夹边沟农场带来，原先的建制不变，生活秩序基本保持着离开夹边沟前的状况。

听管教干部们说，明水农场的土层很厚，肥力很高，只要能浇上水，种啥成啥。种上谷子，谷穗能长狼尾巴那么长，还不用施肥。这些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经过几年努力就都可以实现。但眼下的问题是，这些右派分子在夹边沟时，由于长期吃不饱饭，一部分人已经饿死，有的人已经浮肿，所有的人身体都十分虚弱。原先还能活动活动，健康状况相对好些的人，经过转场的两天“行军”，几天挖地窝子劳动，现在已经动弹不得，还谈什么平田整地、挖沟、修渠、打井、取水？

转场的两千多名右派分子，只是在刚刚到达明水时挖了几天的地窝子，勉强搞了一点平田整地的工作之后，

每过二三十分钟就钻出小屋巡视一番,如果被他们生擒,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提钟政很快就发现,他们出外巡视有一定的规律性,如能判断准确,在他们两次巡视间隙中可以得手。

提钟政缓缓接近场地。到了有可能暴露身影的地方,他就趴在地上不动了。在看场的农民巡视完,刚钻进小屋子后,提钟政就像一名侦察兵,急速地向着“目标”匍匐前进!这种匍匐前进的动作他以前从来没练习过,练习这个干什么?但他在电影上看到过。用这种方式前进,可以有效地隐蔽自己,在对方不知不觉中到达“目标”!提钟政很快爬到了场边,看看没有任何动静,又轻轻地爬到糜子堆边。收到场上的糜子还没有打碾,一捆一捆地撮在一起,提钟政拽下一捆,从谷秆的一头劈成两叉,往脖子上一套,转身准备往回爬时,小屋子传出两声低沉的咳嗽声,接着是几个人说话的声音。提钟政吓出一身冷汗,两腿有些发软。提钟政伏在地上等了片刻,他确信自己并没有被农民发现。这时,南边几公里处的兰新铁路线上一列火车隆隆驶过。因为是夜深人静,火车的声响显得特别大,就好像是在眼前一般。隆隆的火车行进声中,提钟政的两腿不软了,火车声给他壮了胆,提了神,他迅速爬出一段距离,确信已经远离了看场农民的视线以后,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就地坐下来缓了一缓,心跳慢慢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提钟政选定了一处有窝子的崖头,先把糜子放下来,然后潜回他住的地窝子里拿了脸盆,并装了水,再回到前面放糜子的那个窝子里边,用三个土块把脸盆支起来,找来柴草点了火,把水烧开,然后就一把一把地搓糜子,搓好就往盆子里撂。只要听到“啪”的一声,那就是已经有糜子煮爆了,差不多也就熟了。就这样,提钟政搓一阵子,吃一阵子,吃完了再搓。直到整捆的糜子吃光,已到了后半

夜。提钟政潜回地窝子，踏踏实实地睡下，同“室”人并没有对他产生怀疑。又过了一个晚上，提钟政喝了两天稀汤以后，肚子又饿得受不了。他心里还想着农民场上的一捆一捆的糜子，那真是太有诱惑力了！这天晚上，他准备再次采取行动。这之前，农民发现自己的劳动成果不翼而飞，知道有人在场上了手脚。这种案子肯定是附近的人干的，外地人不可能老远跑到如此偏僻的地方偷一把粮食，劳教人员是惟一怀疑对象。农民们把这种分析告诉了农场的管教干部，管教干部也认为这种分析合乎逻辑，但空口无凭，你说的是谁偷了农民的粮食呢？只能抓住证据才能下结论。管教人员给农民答应一定协助制止这种盗窃行为，保护农民的劳动成果。就在提钟政第二次把场上的糜子套到脖子上往回爬的时候，被早有准备的管教干部赵来苟逮了个正着。

“好啊，你这个狗日的右派，农民种粮食容易吗？你就这么祸害！你等着吧！”赵来苟训了一阵，就让提钟政把糜子送还到场里，当晚也就罢了。提钟政暗自感到侥幸：都说赵来苟了不得，大概也有发慈悲的时候吧。

第二天上午也没什么事，到了中午开饭时，提钟政排队走到跟前，掌勺的大师傅就停勺了，对提钟政说，赵队长说，不能给你打饭。提钟政只好离开队伍，让后边的人去打。提钟政眼睁睁看着别的人吃饭，饥饿难耐，就又央求大师傅发发慈悲打给他一份。大师傅说：我们不敢。赵队长说了不让打，你这不是难为我们吗？我们还问赵队长，为什么不给提钟政打饭，赵队长说你已经吃饱了。我们也不知道出了啥事，你还是找赵队长吧，等他同意了，我们再给你打。提钟政只好来敲赵来苟的门。当时，劳教人员统统住地窝子，有几间平房是专供管教干部住的，赵来苟就住在这里的平房中。因为是自己犯了错误被罚才不给饭吃，这时是不能理直气壮地去要的，只能毕恭毕敬

地求情，求情的声音都不能太高。轻轻敲一敲，没有动静，再敲一敲，喊几声，还是没有动静。提钟政是亲眼看见赵队长进了房间的，现在不开门，那是对提钟政的要求不屑一顾。一顿饭虽然只是一碗稀汤糊糊，但在那时却是救命汤！即便是吃了上顿，到下顿饭时也已饿得头晕目眩，缺了这一顿，那还了得！不能停止请求，说什么也得把这碗饭吃上。“赵队长！赵队长！我错了，今后再不去拿了，你得让我吃饭呀，赵队长！”赵来苟房子里依然没有动静，稍停片刻，提钟政再敲。他不能就这样回到自己的地窝子，吃不上这顿饭回去，那等于找死。你赵来苟不开门，我就一直敲下去。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提钟政终于把赵队长叫烦了。赵来苟高声大嗓子说了句“进来！”就把门打开了。提钟政陪着笑脸说：“赵队长，我错了，我认错，今后不敢再去拿了，你让我吃饭呀，不吃饭，我……”赵来苟说：“你不是已经吃饱了吗？你还吃啥？回去吧！”还是不给饭，提钟政怎肯罢休？他继续陪着笑脸求情。赵来苟忍不下去了，说：那你现在去灶房，把谁谁谁给我叫来。提钟政一听，有门儿，可能是同意叫这两个人来，安排给自己打饭吧，到底还是要好事多磨。提钟政按照赵来苟说的，把这两个人找见，对他们说赵队长叫你们二位去一趟。两人就随提钟政一起到赵来苟的房间。

一进门，赵来苟就把一根绳子撂给两个人说：“给我把这个狗日的捆了！捆结实！”两人不敢怠慢，拿起这根小细绳，中间挽一个“鼻子”，把“鼻子”搭在提钟政的脖子正中，绳子沿肩膀走向两臂一圈一圈从臂膀绕下去直到手腕上，然后把双腕顺着后背往上一提，两个绳头往脖颈上留下的那个“鼻子”里一穿，再使劲往下一拉，提钟政立即把腰弯成了九十度，脑门儿都要碰到膝盖上了，疼得提钟政直叫唤。

从提钟政记事起到此时的这几十年时间里，他有很多很多的不顺利，有过很多的屈辱甚至尊严扫地，让别人指着鼻子批判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向党猖狂进攻，但那只触及灵魂，并不触及皮肉。这一次是连灵魂带皮肉一起触及还外加一个饿肚子。他真后悔自己不该来纠缠赵来苟，这不是自讨苦吃么。但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呀，总不能等着饿死吧？不求他，可能饿死；求了他，又遭此下场！现在该怎么办呢？提钟政找了个土台子坐下来，一阵阵钻心的疼痛掠过全身，疼得他牙齿直打颤。他想，哪怕是不给饭吃，此刻只要把捆在身上的绳子解开也行。现在这个捆法，脖子疼，手腕疼，胳膊疼，臂膀疼，腰更是酸疼酸疼。坐下不动，一阵阵地疼；稍微一动弹，更疼得大汗淋漓。提钟政真真地体会了一遭戏文里所唱的那种难受：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
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我好比……

提钟政的思维又跳到《窦娥冤》的剧情中去了。再“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是窦娥。窦娥无辜受冤，街市被斩。我提钟政好意写了个《光荣榜》，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公道何在？天理何在？老天爷啊，你为什么不开眼？

除了坐以待毙外，提钟政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他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

大约一个午觉的功夫，赵来苟揉着惺松的睡眼出了门。看着被绑着的提钟政还老实实在房檐下坐着，就对旁边的两个人说：“给他解开，放了！”

提钟政已经全身麻木了，请求两位松绑者为他快些解开。这两人很有经验的样子对提钟政说：不行，不能太快了，忍着点，慢慢来。两个人为他松一环就揉一揉，再松一环又揉一揉，慢慢地松到了脖子根儿。提钟政只觉得自

己的双臂好像没有长在自己的身上，想抬一抬手，双臂根本不听指挥。过了好一阵儿，才逐步有了疼痛的感觉。两位松绑者看着提钟政逐步恢复了知觉，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便悄悄对提钟政说：快回去吧，还愣着干什么？提钟政才如梦方醒，赶快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地窝子，好像耗子躲猫，很长时间再不敢与赵来苟照面。

1960年11月，死人的事越来越频繁。有一天，提钟政的地窝子里爬进来一个山西人，奇瘦，两个眼睛几乎成了两个窟窿，胡茬子足有一寸多长，胡乱翘着，轻飘飘像是用纸糊成的一个假人。提钟政问他：你怎么到我的窝子里来了？瘦子说：我们地窝子里那个人已经饿死了，现在还在那里躺着，我没有办法睡觉。我看你这里宽敞，底下铺着麦草，就让我在这儿睡吧。提钟政没有多少力气说话，他往边上让一让身子，表示同意接纳这个可怜的伙伴。从进场的时候起，右派们之间就不相互打听各自的家庭、为什么打成右派等情况，避免说多了话给别人留下把柄。右派们只从相互打招呼 and 日常劳动、生活的简单对话中，从对方的方言口语中判断是哪里人，那也只是猜测，并不细问。瘦子与提钟政一个地窝子共同住了快一个星期了，提钟政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有一天早上，提钟政起床后，半天不见瘦子动弹，就蹬了一脚，叫他起来去吃饭，却没有反应，提钟政凑到跟前一看，瘦子早没气了，用手一摸，冰凉。这之前，提钟政连一声呻唤也没有听见。可见这个瘦子临死前连呻唤的力气也没有了。提钟政拖着浮肿的双腿挪到队部，把瘦子的死讯报告给了管教干部。管教干部让提钟政搬出来，再不要回到原先那个地窝子去。

大概是人越来越少了，提钟政被安排在一个很大的地窝子里边，两排大通铺，每排能睡十几个人。

眼看伙伴们一个一个死去，活着的人开始担心一个问题，假如明天我死了，日后我的家人来找，应该让他们

知道是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不能让亲人不知死活吧！因此，应该把自己的姓名、工作单位、籍贯、身世等情况告诉自己的左右，大家互相记一记，以便活下来的人向死者亲属介绍他们的亲人生前的情况。于是，从这个时候起，地窝子里的右派们才开始相互交流，介绍各自的身世，让对方记一记自己的名字、通信地址、收信人是谁等等。但是这个时候，大约有一半左右的人已不在人世了，相互记熟姓名与通讯地址的事情就显得更加紧迫。提钟政已让他的左右邻背熟了：天津市河西区营口道连星里三十一号提世林。然后，他再背别人家的地址和姓名。过不了几天，旁边背了通讯地址的这个人死了，又来了新的“邻居”，双方又得从头来。

提钟政已经背了好几个难友的通讯地址了，都是刚刚背过几天，人就不在了。这时候，他自己的浮肿已经从双腿发展到了全身。但他身下铺的和身上盖的反而有所改善。原因是，他身旁的人死了，埋葬队的人来了只抬尸体不抬被褥，提钟政就捡好些的被子、狗皮褥子换给自己用。提钟政止不住地经常自问：我还能活下去吗？他渴望着自己的生命不要就此结束，他放心不下天津的父母和兰州的妻儿。他的大女儿提秀琪才十二岁，二女儿提秀瑜才九岁，三女儿提秀莹才七岁，大儿子提秀瑕（大华）才五岁，小儿子提秀琨才三岁……没有了父亲，妻子怎么把他们拉扯大？为了父母，为了妻子，首先是为了孩子，必须得顽强地坚持，坚持，再坚持，坚持活下去。

1960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一个管教干部在地窝子里找到提钟政，告诉他：你父亲和你妻子过几天来探望你，他们已经来了电报，到高台的时间是17号。这时候的提钟政，行动已经十分困难。他白天晚上都躺着，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原先他在夹边沟时订阅的五份报纸和杂志这时也转送高台明水农场了，邮局的投递工作秩序不乱，各

种报纸杂志都能按时送达。但是他已经不能正常阅读了，一篇文章看上几眼就头晕眼花，似乎想睡觉，可放下报纸又睡不着。他掰着指头计算父亲和妻子到达的时间，想最后能够见上一面。阅读不成，只能在痛苦中等待着。没事就用手指头按自己的脚、腿、胳膊，一按一个坑。浮肿的身体各部分已经失去了弹性，按下的坑半天不能复原。提钟政是每天要看按下去的小坑是不是比头一天小了点，恢复原状的时间是不是快了点。他幻想着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能够好转。但他痛苦地发现，按下去的小坑越来越深，复原的时间越来越长。起身去解手，脚步越来越沉，气力越来越不足了。

两天之后，提钟政的父亲和妻子到了，他们是中午时分到的。提钟政和父亲已经十一年没有见面了。上次见面还是提钟政从华北大学结业，踏上支援大西北之路时，那时的提钟政满怀建设新中国的豪情壮志，舍弃大城市天津那个温馨的家，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赴大西北之路。那时的父亲四十来岁，敦实的身体，乌黑的头发，对儿子说：去吧，孩子，去了就好好干，不要牵挂我们。有我在，家里没事，放心去！父亲留给提钟政的最深的印象是一个擎天柱，天塌下来，父亲都能把它顶上去！可他今天看到的父亲已是白发苍苍，老态不光表现在脸上，腰也有些佝偻，是生活和精神的双重重负把他老人家的背都压弯了！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提钟政的双眼，他还没有来得及坐起来，父亲已经赶到床铺上，双手抱着提钟政的头痛哭起来。妻子呆呆地、默默地站在旁边抹眼泪。父亲是后悔自己没早一些来探望儿子。他已经听到很多有关夹边沟和明水农场饿死人的噩耗，今天终于见到了奄奄一息的儿子，老人家是既庆幸又心疼又担心，他担心能否挽救儿子的生命。

父亲和妻子这次来明水，一共背了八十多斤重的食品：炒面，饼干，点心，馒头，锅盔，罐头，红糖……这些都

风进不来了，地窝子里顿时显得暖和多了。以前，孤零零地躺在一个漏风的地窝子里，提钟政感到自己是一个被人类抛弃的累赘，尤其是眼看他的一个个右派伙伴饿死之后被抬出去的那一幕幕，着实让他心灰意冷，只能默唱几句“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而现在，他可以像孩子似的一个劲儿向自己的亲人伸手要吃的东西，亲人不给他，却是善意的拒绝，妻子依偎在身边，为他拉一拉被角，擦一擦眼泪。他又一次找到了“家”的感觉。

家，久违了的家，多么温馨！

一股暖流从他的心田流向浮肿的全身，使他肿胀的、一直冰凉的四肢渐渐地有了一些温热的感觉。如果说清晨的提钟政还在绝望中等待死亡的来临的话，那么，现在的提钟政，虽然他的皮下组织中过量的液体积蓄丝毫没有消退，但他心头等待死亡的念头已经一扫而光：有父亲和妻子的关照，我提钟政定能站起来，走出眼前的恶梦！

提钟政问父亲：儿子在这里受罪，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平时写信都不敢告诉您，怕您牵挂，您怎么就背了这么多吃的东西千里迢迢找到高台了呢？父亲告诉提钟政：前几天滨江路上住家的高老头儿来家里，把什么话都说了。提钟政一下子想起了前几天天津老乡高大爷到明水看儿子，高大爷的儿子高寿慈刚好与提钟政在一个基建队，后来也转到了明水农场。高寿慈饿得走不动了，眼看着不向家中求援就难以活着出去，于是就给父亲写信告诉了明水农场的实际情况。高老头来农场看望儿子时见到了提钟政。已经全身浮肿的提钟政对高老头儿说：高大爷，您的家在滨江路吧，我的家就在教堂跟前，连星里三十一号，我爸爸叫提世林，您无论如何要告诉我爸爸，早来几天能相见，晚来几天不相逢。过去从不愿给他老人家说，怕他牵挂，现在看来，不说不行了。

话是这么说了，提钟政又寻思，高大爷未必能把信儿捎到，即便捎到，父亲也未必有条件千里迢迢到高台来。但是高大爷是个十分认真负责的老人，他救人如救火，一回到天津，就马不停蹄地找到提世林，向他介绍了明水农场的详细情况和提钟政的请求。提世林家里没有钱，也没有什么积蓄，只好向亲友求援，然后背上“急救物资”，到兰州叫上儿媳妇就直奔高台。这一来，正来到了节骨眼上。按提钟政的说法，如果再有三天接济不上，那无疑就“迟来几日不相逢”了。

父亲和妻子在明水住了三天，提钟政的情绪逐渐稳定了，身体开始恢复，吃东西自己已经能够控制。父亲说：我们现在得回去了。你想，我们来干吗了？不是来救命吗？我们就带这点吃的，再住下去，叫我们把东西吃掉了，今后你咋办？我们早一天回去，就早一天减少两张嘴，就能多节约出一口给你。这七十多斤的吃食，你节约点，一天按半斤算，够你补贴两三个月的。再过两个月，如果农场还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再想办法。如果你坚持不了两个月，这么远的路，家里也实在没有什么法子，那你可就遭大罪了，我们也就没办法了。孩子，记着，节约点补贴。交待完毕，父亲和妻子给提钟政又留下三十斤粮票和三十元钱，就踏上了东去的归途。

在提钟政的父亲和妻子离开明水农场的这一段时间里，形势更加严峻了。家里边能送一点儿的，还能挨日子，家里边送不了的，就只能眼睁睁等死了。这个时期的饭，是由食堂大师傅直接送到地窝子里的。大师傅挨着床铺摸，有呼吸的就叫起来，舀给一瓢糊糊汤；再揭开被子检查，发现已经停止呼吸，叫半天没有反应的，就由大师傅用死者自己的被子一卷，两头用绳子一扎，出去报给队部，然后就由埋葬队的人进来把尸体抬出去埋葬。

提钟政住的地窝子中，有两个人是家中没有什么接

济的。一个是兰州山字石教堂张神甫的儿子，小个子。提钟政已经记不清他的名字了。还有一个是地质队的技术员，大个子，不知什么原因也划了右派。这一大一小得不到家中的接济，只有自己想办法。有天晚上，提钟政听到两个人蹲在地上唧唧咕咕，不知在干什么，还呼哧呼哧直喘气。提钟政听见大个子对小个子说：下来了，下来了。原来，他们俩在剥羊皮。然后他们就用洗脸盆子在炉子上煮羊肉。他们知道前几天提钟政的父亲来的时候带的有酱油膏。他们向提钟政要了些，放到盆里和羊肉一起煮。酱油香和羊肉香混杂在一起，弥漫在整个地窝子里边。两个人一边煮一边尝。说是尝，实际上是还有血水的时候就吃上了。等到全部煮熟，一盆肉也就吃完了。开始尝的时候，他们还给提钟政也拿一块。提钟政后来回忆说，以前说羊肉有膻气，在家很少吃，没想到竟然是那么香！哎呦，那个香呀，平生三十多年好像从来没有感到羊肉那么香。当然，大个子和小个子给提钟政肉吃也是有原因的，一则是用了他的酱油膏，二则是考虑到提钟政是个有“实力”的人物，他的家人刚来探过亲，给他提了几十斤的吃食，提钟政能好意思白吃羊肉吗？事实上，吃了羊肉之后，大个子和小个子每人都得到了两块天津饼干。但他们都没有舍得吃掉，而是存放到了各自的小木箱中。他们大概是想，饼干是可以存放的，今晚应该先吃羊肉。

还有一次，张神甫的儿子和大个子技术员在外边跑了半天，搞了一些比小米粒儿小的黄颜色的野草籽回来，用洗脸盆放到炉子上一会儿就煮成了糊糊。他们分给提钟政半小碗，剩下的大半盆子，两个人很快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因为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也不知道能不能吃，提钟政先是尝了一口，有点甜，也有点苦，还不是苦得吃不下去。心想，他们能吃大半盆，我何尝不能吃小半碗？提钟政估摸着吃下去也不会有啥事，看那两人吃得那么

香,也就吃了个精光。吃下去不久,提钟政就有了一种浑身发热、精神亢奋的感觉。再过一会儿,又感觉有些精神恍惚。再看大个子和小个子,两人已经口吐白沫,躺在地上不动了。提钟政挣扎着到医务所,说明情况后,医生给了药,叫他快服下去。服过药后,提钟政感觉正常了,身上也不烧了。他带着医生到地窝子的时候,那两个人还躺在地上呻吟着。医生把他们的嘴掰开,灌了些药液后,两个人把吃下去的草籽糊糊全吐了出来,才慢慢地脱离了危险。

一天下午,地窝子外边吵吵嚷嚷的,提钟政爬出地窝子,看见有几个人被关进了木笼子,就像关了几只猴子,引来好多看热闹的人。提钟政凑到跟前才打听明白,原来他们几个去埋刚死的邓大夫时,发现邓大夫屁股上的肉比别的死者多,几个人一商量,就把死者屁股上、大腿上的肉割下来,在地里生了火,烤着吃了。结果被场里发现,就把他们装进了木笼子。木笼子很小,人在里边,只能站着,整个身体上惟一能活动的就是两个眼珠子,还能来回转动。这些人的眼珠子也确实在不停地转动,说不上是恐惧还是悔恨。场里把装木笼子的办法叫做“关禁闭”。这种“禁闭”四周都可以看见,场方的初衷可能是要让更多的劳教人员吸取教训。但是,场方后来发现,这样做,对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劳教分子不但没有起到震慑的作用,在强烈的求生欲望的驱使下,反而起到了示范和诱导的作用。而且,围观者中,不乏从全国各地到明水农场来探亲的劳教人员的亲属,这些亲属探完亲是要马上返回全国各地的。随着他们的返回,农场的黑暗面就会被传播到全国各地。农场意识到这种警示办法得不偿失,又很快去掉了木笼子,并且向所有来农场探访的亲属人员宣布:吃人肉的事是坏人在造谣,你们不要相信,也不要传播,不要上了阶级敌人的当。

死神已经夺去了成百上千个劳教人员的生命。余下的苟延残喘者多数已全身浮肿，这是一种低蛋白血液病，随时有要命的可能。少数没有浮肿或者浮肿暂时消失的劳教人员，都是家里救济的结果。但是，任何一个人得到的接济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情况都不好。

人们在绝望中平静地等待死亡。

整个明水农场的劳教分子们，都在无奈地等待着末日的到来。1960年即将过去，1961年就要到来。提钟政的救命粮还没有吃完。他不敢，也舍不得很快吃完。他是按照父亲给他交待的原则，每天贴补半斤左右，尽量延长贴补的时间，因为家中已经竭尽全力了，已经没有能力马上再送东西来。为了保命，他只能这样做。这个时期的明水农场，已经没有人再顾及什么脸面、尊严、道德，这里已经不像一个聚居在一起的人类群体，他们更像一个神情茫然的动物组成的群体。提钟政的全部生活的关注点就是他来自天津的这几十斤多样食品。这时几乎所有人都成了窃贼和强盗。为了以防万一，提钟政干脆晚上抱着这些食品睡觉，白天背着这些食品出门。到食堂打饭、到医务室看病、到背风向阳处晒太阳，甚至上厕所，他都要把这些食品带到身上。

知道西北局兰州会议决定“抢救人命”的消息的那天，提钟政心里一下子踏实了，他觉得有了活着回到兰州、回到单位、回家中的希望，于是决定这天好好享受一下食物——煮一些面糊糊吃。提钟政把砸掉门窗的零星木头归拢了一大抱生了一堆火，把面糊糊煮得香气扑鼻。就在提钟政陶醉在面食的香气中不能自拔时，屁股上突然挨了一脚。提钟政回头一看，是怒发冲冠的场长刘振宇。

刘振宇说：“你这个坏屌，搞破坏！门窗都叫你们破坏

逐渐移到刘振宇的身后，清清楚楚地看到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但刘振宇却跳了过去，并没有念出他的名字。刘振宇居然把提钟政的名字从“释放”名单中擅自一下子就去掉了！提钟政心中“咯噔”一下，立即想到了三天前与刘场长的那场嘴仗，顿时追悔莫及！两年多都熬过来了，为什么到最后却图一时之快，跟刘场长顶嘴呢？这不是自己找死么！还是古人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权力”真是一个不得了的东西。一个小小劳教农场的场长，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劳教农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决定给每人一条活路，还是一条死路。所有念到名字的人都心里踏踏实实地回到地窝子收拾行李去了，只有提钟政还站在那里后悔得恨不能放一个炸药包把自己惹祸的嘴炸掉，如果不是那天逞一时之能，今天何以在别人“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时候，自己却如此沮丧和绝望。

提钟政像个木偶似的一摇三晃地回到了地窝子，活像挨了假洋鬼子的哭丧棒的阿Q回到土谷祠。同一个地窝子的人都忙着收拾各自的行李，他们边收拾边说笑，这种说笑声和收拾行李的各种碰撞声对提钟政来讲都是刺耳的怪声，强烈地刺激着他快要崩溃的神经。别人要活着回去了，我却要在这里等死！不行，我绝不能接受这个安排，我要活！提钟政非常清楚：只要刘振宇在这个场长岗位上呆一天，就绝不可能为自己放行。要走，也只能选择逃跑！是的，只有逃跑一条路，别无选择。

这么一想，提钟政便翻身爬了起来，跟另外两个人一样收拾起了自己的行李。这时的提钟政体力已经恢复得相当好，干活麻利，收拾起来也比另外两个人快得多。不一会儿，一个大行李就捆好了。狗皮褥子和毛毯在逃跑的路上要用，就没有捆到行李里边。这一切收拾停当，提钟政便拜托同地窝子的地质队大个子技术员说：你们有一

条活路了，但我也不能在这里等死，我也得走，今天就走。请你帮我把行李带回你家，你家不是在兰州市定西路吗？那里离广播电台不远，我回去后就到你家去取。让你操心了！大个子技术员是个爽快人，欣然应允。不一会，一辆运送行李的拖拉机开了过来，有人吆喝把打好的行李往拖拉机上装。提钟政没有出面，大个子帮他把行李摞上了拖拉机。

晚饭是在一起吃的。提钟政不露声色，他必须强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样才不会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天黑了，批准回家的劳教人员被集中到一起听管教人员最后的训话，然后就统一去高台火车站。

大队人马出发之后，明水农场里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提钟政确信他们已经走远，就开始收拾自己随身携带的东西：一个饭盒，一个小铝锅，一个玻璃瓶子，一个背包，一点路上吃的东西，还有烟渣子和报纸卷成的十来支自制卷烟。为了便于携带，提钟政想，应把他卷烟放进玻璃瓶子，玻璃瓶子装到饭盒里，再把饭盒装到小铝锅里，小铝锅再放入背包，这样就能有效地缩小行囊了。他慌慌张张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感到已经精疲力竭了。于是，把背包一提，老羊皮袄往身上一披，俨然一位再普通不过的旅行者。大队劳教人员是顺大路往高台火车站走的，提钟政不能跟上去，他必须绕道而行。

说是绕道而行，实际上没有路可绕，在没有路的戈壁滩里向着正南偏西方向迂回——那里就是高台火车站的所在方向。这个方向很好掌握，不易迷失，因为此刻显得黑黝黝的祁连山就在明水农场的正南方向，即使是在漆黑的夜间，也能感到它的存在。而相反的方向——明水农场的北侧，是平坦无垠的戈壁滩，即使是漆黑的夜晚，也能感觉到那边的空旷。

提钟政走到一处土崖边，前边是一道沟，那是洪水在

平坦的戈壁滩上“拉”开的干河沟。他趴在地上，凭借星光判断沟的深度，估摸着自己能不能跳下去，再爬到对岸，越过这条沟壑。经判断，沟深大约就是一米多深，不超过一米五。

提钟政纵身一跃跳入沟里时踩上了一具尸体！提钟政惊出了一身冷汗。但他顾不得想许多，他必须赶时间往火车站走。他刚爬起来一抬脚，却又踩上了一具尸体！原来，劳教农场这几天死的人，已没有人再去抬着埋了，都被扔到这条沟里了。农场里已经再没有能挖坑的人了，为了掩人耳目，就找了这么一条沟壑，把尸体搬到这里拉倒。提钟政刚跳下沟，碰到第一具尸体时也着实吃了一惊，吓出一身冷汗，接二连三地碰到一具又一具的时候，反而不害怕了。

他知道，死人是不会给他找任何麻烦的，可怕的还是活人，尤其是管教人员，万一碰上他们，肯定要被押解回场，要不了几天也会被搬进这条沟里。

三个多小时后，提钟政终于摸到了铁路的路基下。

浑身是汗的提钟政在路基下坐了一会儿，他要稍事休息，想抽支烟，也需要判断一下自己所在的位置是高台火车站的东边还是西边，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休息了片刻之后，提钟政站了起来，发现西边有灯光和人群活动发出的声响，他由此断定，自己现在已经来到高台火车站的东边。向西去，就是高台火车站。于是，他开始悄悄地向西移动。

大约半个多钟头，提钟政就逐步靠近高台火车站了。离车站越近，他就越发小心，因为越近碰到熟人的可能性越大。提钟政尽可能走在暗处，他一边走一边在昏暗的灯光中左顾右盼。这样，他就便于看见别人，而别人却不容易看见他。还好，他已经走到离候车室很近的地方了，一直没有被人发现。

已经能够听到候车室里喧闹的人声了！有一个人的声音特别高。再靠近，听清了，原来是场长刘振宇在训话。我的妈呀，好险！提钟政赶紧往回缩。

提钟政缩手缩脚来到火车站东头路基下，这里是背阴处，积雪尚未融化，但这里隐蔽，也能看到站台上发生的一切，于是提钟政选择就在这里“候车”，等待时机。他把大衣裹在身上，把背包当枕头，躺下静等。这时的室外温度大约是零下十五度左右，不一会儿，两只脚就冻得生疼生疼。提钟政知道，再冻一阵儿，脚就有可能冻伤以至坏死。他咬紧牙关，用几乎也是冻僵的手抓住脚脖子使劲地摇，待麻木的程度减缓以后就使劲跺脚，直到双脚恢复了知觉为止。提钟政就这样跺累了，便躺一阵儿。刚躺一阵，双脚又没有知觉了。如此躺一阵儿活动一阵儿，也不知折腾了多长时间，一束耀眼的光柱由西向东直射过来，而且越来越近。列车缓缓行驶到高台车站站台以后，就喘着粗气停下了。提钟政注意到，整个火车站只能听到火车的喘气声，并没有人群活动，也不见有人走动。这是怎么回事？火车来了，人们为什么不出候车室上车？提钟政借着月台上微弱的灯光发现，原来是一列货车。真是天助我也！提钟政高兴极了。他知道，候车室里的劳教人员们都拿的是硬座票，他们的行程与这个货车毫无关系，包括刘振宇在内的管教干部们，这时候也是不会出来的。自己只要能够避开车站工作人员的视线，爬上火车就是踏上了生路！看着站台上依然无人，提钟政“噌”地跳上路基，猫着腰来到月台下的货车边，先是把背包摆进车厢，然后就翻身进了车厢。这是一辆空车，车槽近两米深，能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车下的人很难发现车中有人。提钟政非常庆幸自己的好运气。

火车待发时提钟政心中有些着急，但他同时也很有安全感和成就感。他不愿意把自己的这次行动看成是“逃

跑”，根据国家的政策，他理所当然应该是列入准许回家或回到原单位的名单之中的，只是此前与场长顶了嘴，即被武断地扣了下来，这是不公平的。提钟政认为，抠一回字眼儿，这次行动应该称为“私自回家”，这样才合适。

大约半个钟头以后，火车头发出一声悠长的汽笛声，这是火车要启动的信号，这个悠长的汽笛声在提钟政听来美妙极了，是欢快的凯歌，是优美的抒情曲。大约四五分钟以后，火车就进入了全速行驶状态。因为是敞篷车，车速一快，车厢里的风就显得特别大。提钟政蹲到一个车厢角落里，用羊皮大衣紧紧地把自己尽可能地包裹起来。但是不管怎么用劲包，却总感到是捉襟见肘，凉风还是像犀利的刀子一般，从羊皮大衣包不住的部位向体内猛刺，说不上是冷还是疼。他不停地调整姿势，不停地用力把皮大衣往身上裹，总算是没有冻僵。一个多钟头以后，这列货车停到了一处灯火通明的地方，周围还有喧闹的人声，提钟政想可能是张掖车站到了。他必须下车调整一下快要冻僵的身体，吃一点东西，再伺机作下一步的打算，好在这里已经离开高台七八十公里，明水农场的管教人员是不会找到这个地方来的，可以从容计议。

提钟政下了车，他不能从出站口出，因为没有车票，被人挡住就又要节外生枝了。他是顺着铁路往车站外边走的，走到站外以后再下路基，迂回一里多才转回到候车室。候车室是一个很大的房子，里边人很多，有横七竖八躺着的，有坐着的，有站着的，有走动的，还有在酣睡中打鼾的。房子中间是一个大水缸一般的大火炉，虽然空气污浊，但暖烘烘的，比起冰冷刺骨的货车厢，这里已是人间天堂了。提钟政先凑到火炉边暖了暖身子。渐渐暖过来以后，却有些饥肠辘辘的感觉了。

一个中年男子抱着一摞烧饼在候车室中转悠。提钟政花十一块钱，全部买下了这个人的十一个烧饼。提钟政

站在原地没有动弹就把这些烧饼全吃下去了。

提钟政想现在该买票了,但不能买第一趟车的票,因为从高台乘货车到张掖时,高台那些劳教人员在车站候着,他们一定是坐第一趟列车回兰州的,我必须避开他们,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想好之后,提钟政对售票员说,买向东去的第二趟到兰州的硬座车票。现在,提钟政已经是一名普通旅行者了,他有车票,身上有盘缠,而且远离明水农场的管教干部,他什么也不怕了。

天亮以后,车站广播室通知说,提钟政买好票的那趟车马上就要进站了,提钟政随着排队的人流缓缓前进,剪票进站,大大方方地登上了列车。待他上车以后,突然发现这节车厢的另一头,就坐着为他带行李的大个子。再一看还有几个他虽然叫不出名字但非常熟悉的面孔,分明都是明水农场的劳教人员!提钟政顿时慌了手脚,但他很快就有了主意:退回后边的车厢,找个角落地方坐下来,把羊皮大衣蒙到头上,决不轻易把头露在外边,决不轻易走动。

原来,从明水农场步行出发到了高台车站的大批劳教人员也没有坐头趟车,因为头趟车是快车,在高台站根本就不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致使提钟政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千方百计要避开这些人,偏偏与这些人又遇到了一起,真是冤家路窄!人算不如天算。没有办法,一切都要围绕“安全回到兰州”这个目标努力,肚子饿了要忍着,口渴了也要忍耐,尿来了要憋着。他要把自己的活动降低到最低限度,最好让周围的人忘了他的存在。大家越不在意他,他就越安全。

提钟政几乎成了一只冬眠的动物,而一路“冬眠”也的确帮了他的忙,他没有被管教干部发现。伴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声,列车喘息着停靠到兰州站的站台边。提钟政仍然不敢轻举妄动。管教干部们吆喝着,劳教人员们有组

织地走下火车。有些无力走动的人,是用担架抬到月台上的。提钟政看到,躺在担架上的就有他的同事邢鹤。从明水起身“私自回家”时,提钟政曾在一闪念间想过,邢鹤不知还活着没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顾不上去打听。现在眼看邢鹤被用担架抬下了火车,一方面为他活着回到兰州而庆幸,另一方面又为他的身体担心,担心他能否抢救过来,恢复健康。

集中在月台上的劳教人员开始点名、训话了,列车上的乘客也下得差不多了。提钟政顺着车厢中的走道直往东去,他要走到车的尽头,远离集中训话的劳教人员们,也就远离了管教干部的视线。

提钟政很熟悉兰州火车站的地形和周围的环境。他从最东头一节车厢下车以后向着红山根方向走去,然后又往东绕了二三里路,绕到了长津电机厂(即后来的华联超市)一带。当时,省商业厅的饲养场也在这个地方,提钟政的妻子正在这个饲养场里当饲养员。她是因为当了右派家属以后从机关办公室打字员岗位上被调整到饲养员岗位的。当时认为,打字员是机关工作,与领导接触机会多,与保密文件接触多。右派家属属于不可靠人员,为了提高革命警惕,防止阶级敌人趁机捣乱,就把她调整了。

“宜勤!”提钟政看到妻子正在那里打扫猪圈,轻轻喊了一声。妻子回头一看,是自己的丈夫回来了!她又惊又喜,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灰尘,一边快步走到丈夫身边问长问短。宜勤知道自己的丈夫在明水农场是饿坏了的人,给他弄了两碗煮洋芋、一碗红烧猪下水,一面看着提钟政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一面给丈夫哭诉着他走后家中的情况:孩子们有的送托儿所,有的送回老家,她自己就住饲养场的集体宿舍。“老天爷,回来就好,总算逃出来了,拣了一条命。前几天,我已经找了电台的领导,他们也答应由电台派人去接你回来。虽然这次是‘私自回家’,到了这

个份儿上，怕是他们不会再说啥了，总不能在高台等死吧。”

宜勤说得对，在以后几天，提钟政先后见到了电台的领导陆寰安和甘肃日报的领导叶滨。陆寰安说：“你回来就好，别的事都不要管了，明天先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一要治病，二要休息。农场那边你就不要担心了，通过组织联系说明，妥善解决。”叶滨说：“你自己跑回来，你就活下来了，如果继续呆在那儿，我们就永远失去了见面的机会。你们在下面受了这么大的磨难，我向你们表示歉意。你可以写一份关于夹边沟和明水农场的情况，由我拿上向省委汇报！”看那样子，如果提钟政写出来，叶滨毫无疑问会交到省委去。但是，提钟政已经吃够了讲真话的亏，他想的是首先要保命，所谓明哲保身。那么多的难友都是因为讲了真话和心里话以后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撇下了妻儿老小，这样的教训，这一辈子要吸取，儿子、孙子都要吸取，哪还敢轻举妄动？提钟政没有反对领导的意见，也没有答应写情况反映，他只是感激领导的关心爱护，只是一个劲儿地打哈哈应酬。提钟政想，对于夹边沟的真实情况，发誓说啥也不去写！

在几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提钟政回想到这档事的时候还有些庆幸：多亏没有写，如果当时写了，我这个死里逃生的人又得死在被极端狂热情绪煽动起来的造反派的棍棒下了！提钟政“坚持不写”的决心持续了四十年。但四十年后，面对一个开放、开明的时代，提钟政确信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了，终于按捺不住地奋笔疾书，写成了十多万字的回忆《血泪惊魂夹边沟》。他在这部书的《作者前言》中说：1958年10月，迄今已整整四十年了，岁月悠悠，往事历历。我一生经历了很多坎坷和磨难，这一段最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之久，每当回忆起那段悲惨往事时，总叫我胆战心惊！

他还写道：生活在甘肃的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都知道酒泉夹边沟这个名字。1958年，在这块不毛之地上建立起一座农场，作为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劳动教养的场所。农场前后共收容了大约三千名接受劳动教养的各类分子，以右派分子为主。右派分子中绝大部分又是当时各机关单位的知识分子、业务骨干。这些人大部分没有生还。我现已年逾古稀，我不敢妄言此书是以血成句，以泪成章，然而不管是血是泪，是屈辱，是磨难，都已成为历史、成为过去了。把这段真真切切的事件写出来，让后来人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一个普通人所度过的不寻常的经历，才是作者的初衷。这并不是要让他们去诅咒那段不公正的腥风血雨的历史，也不是要让他们对于一个人所遭遇的不幸与伤害去洒一把同情和愤慨的眼泪。我的衷心期望是：让那一段荒谬的历史不再在中华大地上重现，莫让我们的子孙再经历那无端的伤害和残酷的凌辱。

回到兰州，领导上对提钟政又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态度，提钟政的苦难该结束了吧？可是不，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一旦把你列入阶级异己分子的行列，那就必须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立场和观点来对待你的一切。

对从明水农场回到兰州的右派分子，都是先回到各单位，按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先抢救人命，至于将来怎么安排，上级没有明确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提钟政就暂时住在他妻子在商业厅饲养场的一间单身宿舍里，每天到电台去参加学习，每月可以领到二十五元的生活费。两个月之后，在电台参加体力劳动。那个时候电台的人还很少，房子也少，占地显得很多，有一个好几亩地的菜园子，提钟政就跟着达延禄等人种菜，还干一些一般的体力活。这种日子过了一年多，直到1962年5月初，接上级通知，要疏散城市人口，是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对提钟政的安排是：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遣送回原籍河北沧州市

农。

妻子知道了对提钟政的处理决定以后,对提钟政说:你走了,孩子们又都寄养在天津,这里只剩下一个小儿子,我怎么办?要难,咱们难在一起,要死死到一处。你去沧州我也不放心,我这碗饭也吃够了。兰州我是伤透了心,我也不愿意呆下去了。你要回沧州,我就跟你一起回农村去,怎么也能把这半世人活下去。城里的运动这么多,天天叫人提心吊胆,不是人过的日子!

1962年5月17日,提钟政和妻子带上他们的小儿子,告别了生活、工作和劳教、劳动了十三年的甘肃,登上了返回家乡的列车。

尽管提钟政少小离家,和村里的人不是太熟悉,但他们一家是落难而归,父老乡亲还是接受了他们。然而,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精神打击和苦难生活的煎熬,提钟政的妻子在回乡第二年的农历正月十八,也就是1963年的2月11日,抛下丈夫和五个幼小儿女,撒手人寰。提钟政最清楚,是郁结在心头的痛苦和委屈夺走了妻子年仅三十岁的生命。

妻子去世以后,提钟政曾到国家广播事业管理局去申诉过自己的问题,广播局的同志告诉他,我们与省广播部门只是一种业务指导,并没有隶属关系,即便是你的确蒙冤,也只能由甘肃省来甄别,我们管不了这些事。

1963年6月,提钟政只身从沧州又到兰州。他到统战部找到了他的熟人雷雨天、吕梁、田广润,在这些人的帮助下,提钟政得以暂住兰州,并且每月领到二十五元的生活费。9月27日,省城人口调整办公室给提钟政在市五金化工公司武都路商店安排了一份工作。他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机会。领导上安排他搞啥,他总是尽心尽责,惟恐干得不好又生变故。有些不属于他的工作他也干,比如说,严冬到了,提钟政会提前来到单位,一个一个地接

着生办公室火炉,好让大家取暖,也好给大家留一个好的印象,使自己免遭折腾。11月,提钟政与他的第二个妻子陈碧珠结婚,孩子们都很尊重他们的继母,提钟政从内心感激她。陈碧珠在解放初期是曲艺团的演员,与提钟政早就相识,她也有过不幸的经历。

树欲静而风不止。像所有戴了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一样,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提钟政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折腾。

1968年下半年,“文革”还在继续。那年月,运动中还套着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文革”大运动在1968年下半年套进来的一个小运动。当时规定,有十种人不能留在省会城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就在提钟政等待遣送通知的日子,他又遇到了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他的妻子陈碧珠在与几位女工扯闲话时,说到了男人的胡子。陈碧珠说,“现在的男人没几个留胡子的,你看,毛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不是都没有留胡子吗?”平时一个对陈碧珠有意见的人想利用这个机会收拾一下陈碧珠,就向领导告发说:“陈碧珠说,‘毛主席嘴上没毛,说话不牢’。”领导上认为这是反革命言论,应当追究查办,就找陈碧珠谈话,让她交待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言论。陈碧珠勃然大怒,大骂诬告她的人是“放屁”,并且掀翻了领导的办公桌。于是,陈碧珠立即被定了两条罪状:一、攻击和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二、抵赖自己的罪行。当天就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实行群众专政,不准回家。这些日子,提钟政除了忧心忡忡地等待自己的遣送通知外,还要在家里照顾孩子。老三莹莹,老四大华,老五二华,最大的九岁,最小的五岁。提钟政还要到陈碧珠的单位为她送饭。在实行群众专政期间,陈碧珠是不能回家的。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条“最高指示”传达下来了,内容就是要动员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不要在城里吃闲饭。在此之前,甘肃的会宁县城里有一位妇女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新华社宣传了她的事迹。毛泽东肯定了这个妇女的作法是正确的,并号召全国的城里人都向她学习。提钟政想,既然兰州城里没有了我们的立身之地,还不如干脆主动要求回家,这样可以避免“押送”。于是,他主动向党支部写了申请,要求回原籍去参加农业生产。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党支部的批准,而且正如他所料,单位可以不派人“押送”,还为他 and 孩子们买了回家的火车票。不派人“押送”,在提钟政看来,就已经是最大的优待了,他打内心里十分感激化工站党支部的几位领导。

陈碧珠依然在“专政”,她还没有获得自由,又不能与家属见面,提钟政走前把她的生活作了安排,并委托朋友关照。二华是专门留下来为妈妈送饭的,其他孩子小,都要带回沧州。提钟政仍不放心,他知道陈碧珠是个性情刚烈的女子,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又托了各种关系给“专政”中的陈碧珠送了“条子”。他在“条子”上交待:我带孩子们回沧州了,你待在这里一定要忍耐,无论如何你要活着,你的烈性子今天无论如何不可放任。为了我,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家庭,你一定要活下去。等我到那边安排停当,等你的问题有了着落,我再来接你娘儿俩回老家沧州,到一个没有运动的农村去,过我们今后的日子。

1969年3月,提钟政带着他的孩子们,第二次回到他的老家沧县陈圩公社后白马大队,当了农民。

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振邦看上提钟政是个人才,他和提钟政商量,想办一个社队企业,听听提钟政有什么主意没有。提钟政立即想到了他患难与共的老朋友、他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张亦铭,便向王振

邦建议把张亦铭请来。王振邦是个很有主见,也很有胆识的共产党员,并不问什么“分子”不“分子”,有本事办厂就行。他们很快把张亦铭请到了后白马大队,连设计带施工,在短短的两三个月时间里,一个简易化工厂就建成了。

他们生产的第一批产品是“护桶胶”,这在当时是一项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的化工产品。各种油品的容器如果漏了,只要把“护桶胶”往上一抹,就立竿见影,马上不漏了。王振邦让提钟政发挥他见多识广、善于结交的优势,专门跑推销业务。于是,提钟政开始大江南北地跑,越跑越红火,后白马大队的这个化工厂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品种不断增多。

这时,陈碧珠的“现反”问题也得到平反,恢复了人身自由。她离开了文化部门,调到另外的单位。提钟政以兰州为基地,东西南北到处跑业务,推销他们的产品。王振邦和众乡亲由衷地感谢提钟政、张亦铭给他们这个穷乡僻壤带来了财源。

1969年冬,提钟政在青海省地质队联系了一批防水帐篷的业务,生意做得非常顺利。订货量增加以后,生产厂只有张亦铭一个人,技术力量不够。张亦铭的父亲也是一个懂化工的人,提钟政和张亦铭两人同时出面,把张老先生也动员到沧州。张老先生赋闲在家,正无事可干,也乐于为社队企业出力。

地质队的生意做成以后,提钟政在西宁不断扩大“战果”。有一天,他来到省轻工厅生产资料服务公司推销产品,一位姓许的处长接待了他。许处长从提钟政的言谈举止中判断,这大概不是河北省那些贫穷农村的农民,因为许处长的老家也在河北,他了解那里的情况。他问提钟政:你不是农民吧?提钟政看这位许处长和颜悦色,对自己佛眼相看,也没有高高在上的那种领导的架子,就把自

己的遭遇简单述说了一遍。许处长说：巧了，我也是华太学生，也是1949国庆节到的西安，不过我被分到青海了，我们既是同学又是老乡。两个人说了一些当年华大的事情，又说了一些他们共同认识的老师、领导和同学们，有升为省级领导的，有沦为阶下囚的，更多的是过着默默无闻的百姓生活的。两个人感叹一番世事纷扰之后，又回到了现实当中。许处长说：这样吧，你把那个陈圩乡后白马大队的介绍信收起来吧，不要用了，我让我们轻工生产资料公司给你换一个介绍信，这样可以增加些用户的信任感。介绍信的落款换成“青海省轻工厅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在青海省的轻工系统更具权威，更容易打开局面。果然不出许处长所料，后白马大队综合厂的产品在青海的很多地方一路绿灯，非常畅销。有些工艺简单、来不及到河北沧州去组织生产的产品，提钟政就干脆在西宁租用些临时厂房，就近加工，就近供货。

提钟政做梦也想不到的，又一场比夹边沟和明水农场还要大的灾难正悄悄地向他袭来。

1970年的春节前夕，青海省商业局市场管理组的工作人员找上门了。工作人员说：“把你的介绍信拿来我们看一看。”提钟政就把许处长帮他开具的那份证明交给他们看。工作人员看了看说：“不是这个，要看你们单位的原始介绍信。”提钟政只好把陈圩公社后白马大队开的那一份拿给他们。工作人员指着陈圩公社的这份介绍信说：“这介绍信上说得清楚，你们是生产销售玻璃仪器的，而你的这些化学试剂、防水材料、护桶胶、高低压配电盘，等等，一概没有啊！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提钟政当时有些慌，工作人员命令提钟政乖乖地打开自己的箱子。箱子被打开后，里边尽是高级烟酒。提钟政当即就被工作人员带回了机关，然后被转送到“西宁市清理城市闲散人员指挥部”，并在这个“指挥部”的关押室

度过了1970年的春节。

春节后的一天，两名公安人员来到了“指挥部”，一副手铐一铐，就把提钟政带到了监狱。提钟政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但真正被关到监狱里边，这还是第一次。至于被定什么罪，将来如何发落，提钟政只有听天由命。

没过几天，西宁市召开了一次公判大会，这是配合“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安排的一次重要政治活动。提钟政这时才被告知，他的罪名是“投机倒把集团首犯”。提钟政先是在号子里边被五花大绑起来。这是他第二次被绑了。提钟政还得听天由命。他没有任何办法去顾及他的父母、他的爱妻、他的年幼的子女，他只能默默吟唱：

……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
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我好比南来雁失群飞散。

……

就在提钟政默唱的时候，号子大门“哐啷”一声打开了，几位身强力壮的公安人员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把已经绑好的提钟政押上了“解放牌”卡车。前边已经有好几辆了，每辆车上都有几个犯人，都被五花大绑着。提钟政被操到车厢前面的档板跟前，面向正前方，一边一个战士抓着他的臂膀。

刑车队出发了，警车在前方开道，发出急促的警笛声，而车都走得很慢，缓缓驶向西宁体育场。街道两旁黑压压站满了看热闹的群众，每个人的眼睛都睁得很圆，脖子伸得老长，好像是光看一眼囚犯还不够，还要极力看清他们面部的表情，看一下他们的内心世界。两个战士分站

在提钟政身后,各自用一只手抓住他的手臂,用另一只手抓住他的头发,还极力向后拽。这样,他的脸就会不由自主地稍稍仰起,两边群众就会看得更清楚些。提钟政感到每一双瞪着他看的眼睛,仿佛都是一双利箭,他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犹如万箭穿胸。他问苍天,问大地:我提钟政1949年参加革命,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大西北,党叫我干啥我就极力干好啥。在广播电台是积极分子、业务骨干、团支部书记。在夹边沟农场,别人劳动完休息了,我还要写稿件、刻钢板、印战报、搞宣传。在化工商店,是我的工作我干好,不是我的工作我也抢着干好。在后白马大队,别人锄地我锄地,别人收割我收割,出河工是强劳力和小伙子们的活儿,我照样抢着干。大队党支部让办化工厂,我想办法干好。出差在外推销产品,队里给我记九分工我就很满意,我每天只啃干馒头,喝白开水。前一段没进号子时,每天晚上凌晨两三点钟才睡觉,筹划着第二天的任务,生怕没人订货,误了综合厂的生意……不算我是革命者,算成个农民总可以吧?为什么就……

刑车队来到了西宁体育场。提钟政们先被带到运动员更衣室,公安人员让他们排好队,站整齐,然后在每一个人的背后插了一块牌子。牌子就插在绑绳和身体之间。因为绳子捆得很结实,牌子也就可以牢牢地插在背上。提钟政背后的牌子上写的是——“投机倒把集团首犯提钟政”。

插好牌子之后,二十多名囚犯一个一个被搽到了体育场的中心看台。

体育场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体育场成了人的海洋,口号声的海洋。囚犯们在中心看台站整齐之后,一个指挥模样的人喊了一声“低头!”一队战士迅速跑到囚犯们身后,两个人一组,就如同在刑车上一样,一手抓胳膊,一手抓头发。区别是,抓头发的手不是往后拽,而

是往下压,是让囚犯向人民低头认罪。低头一般要到九十度,还可能再低一些,要看“执行”者掌握的程度和下边“广大群众”的情绪。下面喊得凶,就往下压一压,下边喊得不凶,就可以让罪犯适当直直腰,喘口气。

公判大会开始,几个领导模样的人先后讲话。无非是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形势;形势一派大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等等国内形势;还有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在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斗争更加复杂,善良的人们不要受骗上当,他们人还在、心不死等等。然后就是宣读判决。张三某人、李四某人、王五某人,一个一个往下念。有“反革命煽动罪”、“反革命破坏罪”、“恶毒攻击罪”、“破坏生产罪”、“反革命报复罪”、“强奸罪”,等等,罪名五花八门。从头一个人开始,最后一句话都是“判处死刑,押赴刑场,立即执行!”一个、两个、三个,都是“立即执行”,提钟政这时才真正害怕了。得,他在心里说,这辈子没有交待到从青岛回天津的路上,没有交待到从嘉峪关到玉门栽电杆的工地上,没有交待到夹边沟,没有交待到明水农场,怕是要交待到西宁城了。爹妈,你们多珍重!碧珠,孩子们尚未成人,拜托你了!大华二华,都是爹爹不好……宣判人员已经念到第十二个名字了,最后一句话还是“立即执行”。

提钟政是今天公判大会上念到的第十三个名字。随着一声威严的断喝,提钟政的脑袋便“嗡”地一声,马上一片空白。宣判人员念了些什么内容,他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的大脑已经停止了活动,浑身已经失去了知觉。实际上,他只听到了“提钟政!”三个字的断喝,全身就已经瘫软了。从这一刻开始,提钟政只剩下一个躯壳了。但是,对提钟政的判决并不是“立即执行”,而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提钟政之后念到的几个人,都是“死缓”,后边还有几个人是有期徒刑。

前边念到的十二个人,都被推到刑场枪决了。后边念到的十几个人,又被重新操到刑车上拉回监狱。已经魂飞魄散的提钟政是被拽上刑车的,直到回监狱的路上他才恢复知觉。从其他罪犯的口中,提钟政才知道给自己判的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给他判刑的主要罪状是:右派分子,一贯流窜社会,长期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特别是到青海以后,投机倒把活动更加猖狂,私盖公章,拉拢腐蚀革命领导干部,严重地破坏了青海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从这个时候起,提钟政在青藏高原上的这个省会城市里又度过了两年的牢狱生活,比他在夹边沟农场的时间短了几个月。那时候,最大的问题是饥饿,饥饿险些夺去了他的生命。那时他曾幻想,能吃饱肚子多好,如果监牢里能吃饱肚子,我宁可进牢狱。如今他真的进了牢狱,吃的虽然很差,但不至于饿得浮肿,不至于要命。今天的问题是没有自由,他又留恋起夹边沟的自由了。有了自由,虽然饿着肚子,他劳动之余还可撰写稿件,刻钢板,印喜报,那该有多好!今天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碧珠知道我被判了死缓吗?爹妈知道我判了死缓了吗?孩子们知道父亲是个即将走向刑场的罪犯吗?他们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吗?能经得起这样的精神打击吗?我提钟政活不成了,死也就死了,不过就是躺下睡了长觉,永远永远醒不来。可孩子还要长大,还要上学,将来还要工作。孩子和他的同学们在一起,如果有同学问我的孩子:“你爸爸呢?干的什么工作?”孩子怎么回答?孩子懂得“投机倒把集团首犯”是怎么回事吗?小小孩童,竟要让他们承受如此巨大的不幸,苍天实在太不公!

两年后,也说不定随时那一天,自己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提钟政想,我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代替亲人的痛苦吗?如能代替,死猪不怕开水烫,就让我一个人都承受了吧。一个将死之人,还怕什么?

西宁市“一打三反”公判大会的判决公告贴满了大街小巷,引起了一位名叫曲子莲的妇女的注意,她最吃惊的是关于提钟政的判决。曲子莲曾是提钟政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同事,专门负责听众来信工作。在曲子莲的心目中,风流倜傥的提钟政多才多艺,是广播工作战线难得的人才,能采、能编、能写、能说、能演、能播,新闻、专题、科普、教育、文学、戏剧、说唱,没有一样不会,哪个岗位缺人他能到哪个岗位顶岗,而且都是好样的,是当年电台响当当的业务骨干,也是积极分子,担任过电台的团支部书记。后来,因为写了“光荣榜”,被划成右派,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教了,怎么又成了投机倒把集团的首犯了呢?

曲子莲的丈夫叫张江林,原先在兰州军区机关工作,后来调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文革”期间,很多省的地方工作都是由军方领导负责的,张江林便兼上了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曲子莲回家对丈夫说了她今天在街上看到的公判布告,并讲述了对提钟政一案的怀疑。张江林随即指示省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对提钟政一案不可轻率,要认真查清后再说。第二天,保卫部便派出一个近十人的工作组到监狱里重新提审提钟政。已经被判了死缓的人犯突然又被审问,这使提钟政似乎又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就像落水者突然看到了一根漂来的木头,他当然要死死地牢牢地抓住这根木头,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开。一旦打开话匣子,提钟政就准备一直往下说。他必须说服这几个办案人员,然后才能有希望对自己改判。他要用自己的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倾诉去打动他们的心,这是提钟政惟一的机会,也是惟一的希望。“过了这一村,就没有这个店”,错过了这个机会,就只好等到第二年年底,一颗子弹把自己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提钟政一口气说了两个小时,看看办案人员有些听累了,他才很不情愿地结束了自己的陈述。

一位公安人员问他：噢，你白天跑了一天，晚上还要熬夜到两三点钟，而且天天如此，我们很多干部都做不到，你啃两个干馍还能坚持这么做，你为了啥？你的动力是啥？

提钟政说：政府，我呢，有一个想法，今天原原本本说出来，信不信由各位，是抓是放，是重判是轻判，你们看着办就是了。自从1957年当了右派之后，来个运动就有我的事儿。大运动是事儿，小运动是事儿。城市运动多，我的事儿也多；农村运动少，我的事儿也少些。我的老家农民日子不好过，但是他们接纳了我这个右派分子，我很感激。我很想给他们办点事，增加一些收入，改善一下他们的生活。我给他们把事儿办得好些，使他们的收入提高些，我自己吃苦再多也心甘情愿。他们如果能记下提钟政对他们还有些好处呢，大运动来了，把我的右派当小问题整改；小运动来了，大家伙儿睁只眼闭只眼，能放我一马就放我一马。不为别的，我上有高堂父母，下有妻子儿女，我的责任都没有尽完，我不能撒手不管。城里边容不得我，我呆不下去；乡里容得下我，我就得在乡里这么待着，表现着，尽力着……

说到这里，一个女审判员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再进来的时候，提钟政发现她眼圈发红，她是掏出手绢一边擦眼睛一边进来的。但是另外一位看起来厉害些的公安人员却把手枪掏出来“啪”地往桌子上一摆，说多少个反革命分子在我面前花言巧语都没有混过去，你想蒙混过关，做不到！

提钟政说：政府，我今天坦白交代的这些话，从第一句到现在为止，主要情节上有一点不符合事实，枪毙我！经济上我本人有一点儿问题，枪毙我！我讲到的所有情况有自己编造的、无中生有的，枪毙我！我推销的产品有不能用、糊弄人的，枪毙我！你们说我偷盖公章，我哪儿偷

去？你们说我拉拢腐蚀革命领导干部，许处长是我华大的同学，只是他请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还喝了酒，他连我的一支烟也没有抽过。我怎么拉拢腐蚀革命领导干部了？

可能是曲子莲、张江林夫妇的关心过问，也可能是政治气候的微弱变化，提钟政投机倒把案在1971年进行了重新审理。青海省保卫部经过内查外调，确信提钟政所述属实。1971年11月20日，沧县陈圩乡后白马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振邦接到通知，要大队负责人到西宁去领人。提钟政和王振邦一起被告知：“投机倒把犯提钟政在收审期间坦白交待好，有立功表现，免于刑事处分，可以回家。”王振邦书记盼的也就是这个结果，他不敢有别的什么奢望，能把一个完整无损的提钟政领回家，对提钟政的父母和家人，对后白马大队的父老乡亲就是最好的交待了！提钟政是为全村的利益跑业务而坐牢的，是他王振邦派出来的，提钟政在外边蹲大牢一天，后白马大队的乡亲们就心疼一天。既然今天已被允许回家，那就赶快回，一天也不要多呆，家里人都快急死了，尤其是提钟政的父母亲，再晚了，怕见不上人呢。

虽然无端地受了两年牢狱之灾，并且差不多一只脚已经迈向黄泉路了，但终因偶遇贵人相救，大难不死，提钟政已经非常谢天谢地了。提钟政的父亲由于长时间对儿子的安危牵肠挂肚，整天以泪洗面，已经哭瞎了双眼，什么也看不到了，整天念叨说他已经等不到儿子回家了。王振邦不忍心看到几乎送了命的提钟政刚刚遇到了一个高兴的事儿，就又让他立即沮丧起来。王振邦几天前从沧州起身，来西宁领人时告诉老人：“你一定等着我回来，我一定能把提钟政领回来。回来让他好好孝敬你老人家，再不叫他出去。”王振邦不能告诉提钟政，他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做的只有一条，赶快把提钟政领回家，越快越好，十万火急！

不管王振邦怎样宽慰提钟政的父亲，而且对他严格封锁儿子被判了“死缓”的消息，但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打从解放到现在，共产党对投机倒把分子是从不轻饶的。解放初，老人在天津当工人时，就亲眼见到过很多不法资本家被镇压。革命这么多年了，现在再搞投机倒把，只能比当时处理得更加严厉，根本没有从轻发落的可能。王振邦这次到西宁，也就是去收个尸吧，与其把儿子的尸体弄回来后再死，不如早点死了好受。老人吃了一次安眠药，但被提钟政的三弟发现，又抢救了过来。打那一天开始，老人身边就白天晚上有人陪伴，生怕他再出意外。

王振邦以十万火急的心情领着提钟政昼夜兼程。路过兰州时，提钟政本应下车去看一下妻子陈碧珠和小儿子的，但是王振邦没有这么安排，他怕耽误时间。他让提钟政事先通知陈碧珠，也上这趟车，一起往沧州赶。

按平时走法，他们应该先到北京或天津转车，这样方便些。但是这样走绕的路多，费的时间多。于是，他们提前在石家庄转车，这样可以节约出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提钟政的父亲执意不想见到儿子的尸体，他要趁子女们不注意的时候提前上路。在石家庄顺利地转车后，王振邦掐着指头算时间：还有六个钟头就到家了！恰恰就在这段时间，提钟政的父亲趁陪伴的人一时不在，摸了一根绳子把自己挂在了自家的枣树上，等家人发现时，老人已经“出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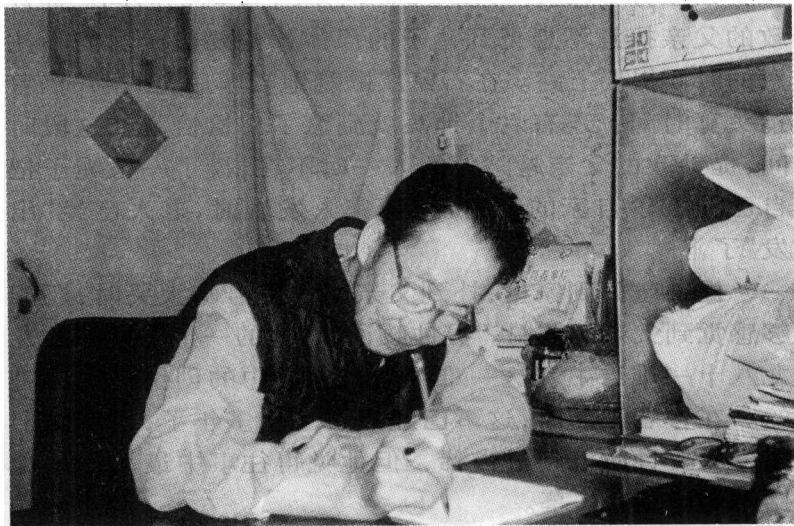
提钟政回到家里，扑到父亲的身上号啕大哭时，还能够感觉到父亲的体温。提钟政说，在他的一生中遇到的九九八十一难当中，这一难给他留在心中的创伤是最厉害的。在作者采访时，这事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当年四十多岁的提钟政已年过古稀，但他觉得往事中最让他刻骨铭心的还是这一幕。

提钟政在他的《血泪惊魂夹边沟》的《作者前言》中写

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把此书献给因受我牵连而自缢的老父，愿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舒眉展颜，在那不可知的世界里，不要再为我忧心忡忡、担惊受怕，劫难余生的我已经坚强地活过来了。今天，您的儿子生活得很好，不愁吃，不愁穿。我还要做一些事情，把虚度的时光一分一秒地追补回来，以此告慰他老人家，愿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含笑安息。”

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为提钟政落实了政策，又让他投身到刚刚起步的电视事业中去。提钟政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安排，并且不改多年来形成的习惯，还像年轻的时候那样，认真做好每件事。

这样，在提钟政一生的工作经历中，恰巧出现了两个有趣的“十年”：一个是1949年以后的十年，再一个是1979年以后的十年。前一个十年从事广播工作，后一个十年从事电视工作。这是两个废寝忘食的十年，是两个成绩卓著的十年。



在党的十六大期间用蝇头小楷写入党申请书的提钟政

晚年的提钟政，看着祖国一天一天走向富强，在内心深处萌动了半个世纪的一桩心愿，再一次强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在2002年11月上旬，即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期间，七十五岁的提钟政戴着老花镜，手握小楷笔，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向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向甘肃电视台党委庄严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撞见了不该撞见的场面 获罪的右派

高尚斌是夹边沟劳教人员中的幸存者之一。2002年，作者采访高尚斌时，在兰州市东岗路东郊巷七号省人民银行家属楼一单元二楼西侧一个两室一厅的中套房里，七十六岁的老人因偏瘫已经差不多在床上生活了近十年。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早在这个当年响应党的号召、从大上海支援西北的知识分子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右派后，就妻离子散。现在，老人是在小保姆的照料下度着自己的晚年。他多数时间只能躺在床上，只是偶尔在气候温暖，天气晴好的时候，在保姆小聂的搀扶下出一次楼门。

他已经习惯了靠回忆往事打发日子的生活。2000年冬季的一天，小聂拿着一封厚厚的信进门说：高爷爷您的信。原来，这封信是当时任上海市人民银行副行长、后来任上海市老龄委副主任的方国民写给高尚斌的。信封中装了一沓照片，那是高尚斌重游上海时的一些留影。信是这样写的：

老高，您好！

因工作忙乱，照片未能及时寄去，非常抱歉！

冬令季节，大西北气候严寒，望多保重！

欢迎您再回娘家看看。

再见，祝

身体健康、长寿！

方国民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这是老病中的高尚斌多年来收到的惟一信件。他把这封信连同他在上海的留影一起放在他的床头柜上，经常拿出来看一看。每看一次，就引发一次对往事的回忆。

最令他难忘的，就是发生在1952年8月27日那一天的一幕。这天上午，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在上海天蟾舞台召开金融业职工动员大会，动员职工响应祖国建设号召，支援大西北。那一天，上海的几千名金融职工有秩序地排队进场，会场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当祖国需要的时候……”的歌声此起彼伏，显示出金融职工对祖国无比的热爱和忠诚。当时二十多岁的高尚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热血沸腾，只怨报名时间来得太慢。动员会还没有开始，他自己已经开始了大西北金融工作的憧憬。高尚斌如愿以偿，成了响应党的号召的热血青年中最早的报名者之一。

现在，随便一件什么事情，都能引发高尚斌对往事的回忆。2002年4月的一天，小聂又拿了一封信进门说：高爷爷您的信。又是一封寄自上海的信。寄信者不是一个什么人，而是一个单位，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会工作委员会”。信的全文是：

一九五二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原上海市金融系统职工同志们：

今年，适逢原上海市金融职工支援大西北建设五十周年。值此之际，我们谨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和诚挚的问候。向几十年来一直关心帮助你们的当地党政和金融机构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五十年前，你们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满怀建设

祖国的豪情，踏上了支援新疆、青海、甘肃、陕西等地金融建设的征程，开启了支援西北建设的先河。几十年来，你们栉风沐雨，矢志不移，把青春和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大西北的金融事业，为西北地区金融业的建设、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实现了报效祖国的人生价值。你们不愧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优秀一员，不愧是身体力行开发大西北的先驱，是我们上海分行辖区人民银行干部职工学习的楷模。

如今，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投资和经济快速增长，重点建设投资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迈出实质性步伐，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新的进展，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显著加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势头良好。这将为实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打开新的局面。

……
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会工作委员会

二〇〇二年四月

高尚斌十分感激他故乡的原单位在半个世纪之后还在关心自己。但当他读到“祝你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时，忍不住老泪纵横。说身体健康，他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了。余下的时间，他只能偶然出去一下，多数时间是要在病榻上度过的。说阖家幸福，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早已离他而去。那是在1962年，他作为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和高台明水农场劳教两年多回到单位以后发生的事情。妻子不愿意当右派分子的家属，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填履历表时在“家庭出身”栏写“右派分子”。高尚斌不愿意连累自己的妻儿，但他更不愿意

自己的妻儿离开自己而去,可他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结果,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从此天各一方,高尚斌形单影只。漫漫人生路上,岁月的利刃在这个壮年汉子的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稀疏的白发替代了浓浓的满头黑发。三次中风之后,健壮的体格早已不复存在。一个鳏居四十年的耄耋之人,又是疾病缠身,何谈“阖家幸福”呢?



1979年,落实政策后高尚斌与其亲属合影(前排左起:高尚斌、高母李勿秋、高父高延龄、弟弟高尚德、后排左起:儿媳戎蕾蕾、儿子高峻、侄儿高翔、弟媳陈若迎、侄女高岩)

2002年,对于高尚斌来说真是热闹和幸福的一年。一个多月来,上海银行的来信引发的半个世纪的回忆还在继续,又一封来信也不期而至。6月上旬的一天,小聂又拿了一封信进了门说:高爷爷你的信。牛皮纸的信封很大,像公函,不像普通书信,原来是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寄给他的。信上说:

支援西北建设的原上海金融业全体员工同志们:

时值你们支援西北金融建设五十周年来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党委和全体同志们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你们的亲属,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一九五二年,我国正处于建国初期和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包括大西北在内的新中国金融业刚刚起步的关键时刻。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占全国总面积近三分之一的西北地区金融业务骨干和金融人才极端匮乏和不足,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大量和尽快地输入金融人才,西北金融业的发展将受到严重

制约和影响,并最终影响全国金融事业的发展,甚至拖国家金融业发展的后腿。正是在此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原西北区行向华东区行,提出了从当时的中国金融中心——繁华的上海市抽调金融专业干部充实西北金融队伍的请求。得到了华东区行的赞同和支持,也得到了你们和上海金融业大批干部员工的热烈支持和响应。一时间,一个响应祖国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祖国大西北去,支援西北经济和金融建设的热潮很快在全上海掀起。先后有数千名上海金融业干部员工踊跃报名参加。最终,经组织精心挑选和批准,你们二千多名上海金融员工连同家属怀着不怕艰苦,将青春和生命奉献于大西北金融建设的豪情壮志,义无反顾地告别繁华的大上海,到无论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比较艰苦的遥远的大西北,参加陕、甘、青、新四省区的金融建设。你们的这一壮举,开启了共和国成立后从沿海向西北地区有组织地输送专业人才的先河。

你们怀着建设西北金融事业的强烈愿望,在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历尽风风雨雨,无怨无悔地与来自祖国各方的同志们一起努力奋斗,辛勤耕耘,为大西北金融事业的建设、金融业务的规范和发展,作出了卓越和巨大的贡献。在此期间,你们之中有少部分同志再一次服从组织分配,走上其它系统的工作岗位,也都为西北地区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你们运用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知识,更加意气风发地为西北地区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努力工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你们宝贵的献身精神和长期的艰苦奋斗,就不会有迅速发展的西北地区金融事业的今天。毫不夸大地讲,你们和许多老同志一起,实实在在为西北地区金融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我们号召广大金融员工,向你们学习,奋发努力,为

建设西北地区的新金融、新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并敬祝同志们在离退休生活中身心健康、健康长寿！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二〇〇二年五月三十日

读到“并通过你们向你们的家属，致以最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时，高尚斌忍不住又一次老泪纵横。“家属”远在上海。大儿子和儿媳一两个月能有一次电话问候，小儿子偶有联系，其余成员就没有什么联系了。但是，不能不让高尚斌想到他们，那是他的骨肉。越到晚年，越到行动不便的晚年，高尚斌的感情便愈加脆弱。现在，他离休的单位——工商银行甘肃省分行每个月给他发的工资加各项补助，包括离休干部享受的保姆费在内，总共近两千元。按兰州的生活费用开支，高尚斌是够用的。他从来不为生活费用犯愁，这一点他是满意的。

读到“你们义无反顾地告别繁华的大上海，来到无论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比较艰苦的遥远的大西北”时，高尚斌的思绪又回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在上海天蟾舞台召开大会，动员金融职工支援大西北建设那一天的情景——

那天的大会由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副行长谢寿天主持。潘汉年副市长作动员报告，可怜潘副市长不长时间之后就碰到了比自己还要惨的厄运。潘副市长动员之后，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钟民、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又先后在会上作进一步动员。经领导们一讲，金融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报效祖国的激情之火烧得更加旺盛。像高尚斌这一批在解放前夕就参加了革命的青年就更不用说了。解放前夕，他们就在党的外围组织中发挥着骨干作用，跟行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派作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会场上，当下报名者就达八百九十六人。在大会以后的几天中，报名人数达到上海金融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七十，除

年老病残者外，基本上都报了名。最后，由工作委员会根据报名者的年龄、家庭及健康情况逐一审查，确定了一个两千人的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名单。高尚斌不但被选中，而且还被任命为一个大队的负责人，肩负重任，积极筹划出发事宜。

地处祖国大西北的各省区，人才奇缺，亟需各方支援。而上海金融业在1952年率先进行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二百四十多家私营的银行、钱庄改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并对机构、人员全面调整，已经锻炼了一批具有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的业务骨干，最有条件抽调一批业务骨干，支援西北各省区的金融建设。

上海金融职工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解放前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活动，并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业务技能。就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按照上海市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中国人民银行西北区行的部署，决定抽调一批金融干部，支援西北各省区的金融建设，从而揭开了支援大西北各项建设的序幕。从上海来到大西北的金融工作者，是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元老，它的意义远不止于金融行业，它树起了一面旗帜，掀起了一个各行各业支援大西北的时代大潮。

小聂每天为高爷爷打扫卫生、整理东西，不用的东西要及时收拾掉，以保持房间的卫生和整洁。但小聂知道，上海分行和西安分行寄来的这两封慰问信是不能收拾掉的，每天都要摆到高爷爷的床头柜上，他要随时阅读。

这一天，高尚斌的目光又长久地停留在这句话上：“你们……克服重重困难，历尽风风雨雨……”一下子又把他的思绪拉回到半个世纪之前了——

高尚斌清楚地记得，1952年8月27日天蟾舞台动员大会的以后半个月，他们参加了一次欢送大会。这一年的9

月12日，欢送大会在上海虹口体育场举行，上万人的规模。人民银行西北区行发来贺电，并告知已经作好迎接支援干部到来的一切准备。大会以后，两千名被批准支援大西北的干部分别按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四个省份组成了九个大队，每个大队二百多人。大队下面设中队和小队。各大队都配备一定数量的党团员骨干。高尚斌以他的资历、水平和热情被任命为第三大队的大队副政委。他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要尽可能考虑周到。他走东家串西家，说大西北天寒地冻，叮嘱出征者带足御寒的衣物，还帮助他们安抚年迈的老人，可他自己家里的什么事情也没有顾得上安顿。父母理解自己的儿子，没有责怪他，还鼓励他做好大队的各项工作。9月17日傍晚，他们这个大队在上海火车站登车北上。上海市的有关领导和华东区行的职工代表到车站列队欢送，军乐队高奏乐曲，锣鼓喧天。队员们在嘹亮的歌声中，与长期生活、工作过的上海，与前往送行的亲人依依惜别，踏上新的人生征程。

当年的大西北，交通十分不便。大队人马来到西安之后，要改乘卡车到兰州。卡车是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中接收过来的“道奇”，破旧不堪，公路又都是简易的土路、沙石路，行走非常缓慢，但是天地无情人有情。大队人马从西安启程以后，沿途各县党政领导都是亲自迎送金融支援大队，有的县领导还亲自送水送饭，想方设法安排好食宿。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今天想起沿途干部群众的那股热情劲，还叫人心里暖洋洋的。一个人的献身精神和行为能够受到别人的理解、尊重和赞扬，要比吃香喝辣重要得多、满意得多，激发出来的热情也要大得多。

“高爷爷，吃饭了。”小聂的呼唤打断了高尚斌的思绪。饭是从一墙之隔的新华社甘肃分社机关食堂打来的，大米饭、烧茄子。小聂很熟悉高爷爷的口味，在大西北生

活了半个世纪,也没有减弱他对大米饭的热爱。一天两餐吃什么饭,高尚斌从来不做具体的安排,小聂给他买来什么就吃什么。但小聂从来不随便买,她有好几种选择。考虑到卫生条件,主要是一墙之隔的新华社甘肃分社,还有一处同样是一墙之隔的省人民银行机关食堂。兰州的机关食堂,不是每天都有大米饭,但这里没有那里有,哪里有就到哪里买。这样,高尚斌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吃到大米饭。

吃完饭,照例是要午休一两个小时的,但今天他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一幕幕的“风风雨雨”,像电影镜头,又是一个接一个地在脑海中呈现出来。高尚斌任副政委的第三大队的人员到达兰州之后,“高副政委”主动请缨,要求到艰苦的农村去,不留在城市。小伙子的这个坚定的态度,引起人民银行武都中心支行行长单德修的关注,主动要求分行让这个朝气蓬勃的上海小伙子到武都中心支行辖区去工作。省分行行长石宪志同意了武都支行的意见。当时,来自上海的部分支援者编了一个“武都—临夏队”,一共五六十个人,高尚斌又被任命为这个队的队长。在这种情况下,高尚斌完全有条件留在武都或临夏工作,虽不如大城市,但比一般的小县城还是要好得多。但是,高尚斌没有这么做,他又向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留地区机关所在城市,到更加艰苦、边远的地方去!武都中心支行再一次满足他的要求,分配他到岷县支行当了一名人事股长,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年,即到了1954年。这一年,高尚斌与他的意中人庄龙珠经过三年的恋爱之后结为伉俪。庄龙珠也是上海支援大西北建设的金融职工,当年与高尚斌一同分到了第三大队,同时到达了兰州。庄龙珠被留兰州工作。他们成家之后,如果把高尚斌调兰州,工作安排有困难;如果把庄龙珠调岷县,组织上又不忍心,权衡之后,省人民银行出面协调,把他们夫妇

同时调到临洮，虽比兰州的条件差，但比岷县条件好些。这以后，高尚斌和庄龙珠都是一门心思干好工作，他们认为，支援嘛，就要像个支援的样子，有多少力气出多少力气，不要给家乡父老脸上抹黑，也不要违背自己当年的志愿。第二年，妻子庄龙珠生下了长子高峻，他们的小日子倒也美满幸福。

1957年初，一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之前，高尚斌无意中犯了一个“错误”。他在事后细细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无意之中的“错误”竟导致他后来的三年监狱生活、二十六年的右派生涯以及因此而来的妻离子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县支行的一位领导生活不怎么检点，传说他与一位女职员有染。高尚斌对此类传闻并无兴趣，也不留意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一次，快下班时，高尚斌要到该领导那里去签发一份文件。他应该先敲门，得到允许以后再进去，但他一时疏忽，没有敲门就推开了门。结果，高尚斌却真的遭遇了不该遭遇的尴尬场面。领导的好事被高尚斌搅了，当时就恼羞成怒不说，事后还老担心和怀疑高尚斌“传播新闻”，便暗下决心要除掉高尚斌这块心病。

那一场政治风暴很快就从北京刮到兰州，又从兰州刮到了小小的临洮。高尚斌被列出了好几条罪状。比如，说高尚斌曾说过，共产党不民主；说高尚斌还曾说过临洮银行的领导做事鬼鬼祟祟，以此诬蔑党的领导；说高尚斌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与北京的章伯钧、罗隆基们遥相呼应，妄图推翻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临洮支行接二连三地召开批判大会，要高尚斌交待自己的罪行。行里还动员他的妻子庄龙珠与高尚斌划清界限，揭发丈夫的右派言论。这时的庄龙珠已怀上了他们的次子小增，是个行动不便的孕妇。高尚斌清楚地记得，当时，是用了一把椅子把庄龙珠抬到会场上参加斗争会的。但

是,斗争了半年多,高尚斌也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他的理由是:我十几岁就参加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进行过斗争,组织过罢工并取得过胜利,多次受到地下党组织的表扬。1952年秋,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离开条件优越的大上海,离开父母兄弟支援大西北。可以留兰州而不留,可以留地区所在城市而不留,是一门心思支援祖国建设,一点私心也没有,怎么会跟右派分子站到一起呢?完全是无稽之谈!高尚斌就是不承认。临洮支行的领导说他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高尚斌一直在苦撑着。

直到1958年,反右斗争在其他地方已经结束的时候,小县城临洮的反右运动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为了迫使高尚斌认罪,让他参加了一个兄弟单位批斗右派分子的群众大会。那次大会上,那个右派分子把自己说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是一堆臭狗屎,而且自我解剖得十分“深刻”。高尚斌从这次群众批判会上忽然获得了“灵感”,他实在厌倦了无休无止的各种旨在逼他承认右派言行的会,他天真地想,如果像这个人一样痛痛快快地承认了那些他要他承认的“罪行”,他们不就罢休了么。批斗会结束后,高尚斌一回到单位就立即全盘承认了临洮支行的某些人强加到他头上的“罪行”。临洮支行的斗争像高尚斌所希望的那样,没有再进行,但痛快的“坦白”却使他搭上了给右派戴帽的最后一班车。1958年5月,高尚斌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押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进行劳教。尽管临洮支行的那个领导后来也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但高尚斌自己的“右派”帽子却因他自己的供述而被戴“铁”了,直到二十年以后才被彻底改正。

临洮县到夹边沟农场去劳教的右派分子总共有二十来人,是由临洮县公安局的两个公安人员直接把这些人送到酒泉的。两名公安人员很随和,他俩告诉这些右派分

子，劳教农场吃东西紧张，如果身上有钱的话，你们尽量在酒泉城里多买点吃的东西带上，到农场后随时补充一下营养。高尚斌事先已有准备，按两位公安的指点，他买了不少吃的东西。

在夹边沟农场，高尚斌们被安排在一间十几个人的大房子里临时住下了。由于旅途劳累，高尚斌很快就睡着了。临睡之前，他把自己在酒泉城里买下的饼干、点心、大饼之类都码放在枕头边上。但当他一觉醒来之后，所有吃的东西都不翼而飞。第二天早上，他抱着能“破案”的一线希望将此事报告给了管教干部，但立即遭到了管教干部的一顿训斥：你为什么不管好自己的东西？你说丢了那么多东西，谁作证？是不是“谎报军情”？你们这些右派分子，一贯胡说八道。这次教训之后，加上在临洮被划成右派前的那次“灵感”教训，使高尚斌彻底学“聪明”了。他变得逆来顺受，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冤屈与不公，他都不再辩解。仅仅两三个月时间，高尚斌就从一个“茅坑里的石头”变成了一只驯服的小羔羊。

丢掉了一大包食品，高尚斌正好轻装上阵。早饭之后，高尚斌得知自己被分配到了农场的新添墩作业站，离场部八公里左右，便自己步行到那里去报到。高尚斌离开上海，到甘肃支援大西北建设已整整六年了。六年来，先在岷县，后到临洮，看惯了也习惯了甘肃河东的山山峁峁、沟沟壑壑，不管怎么荒凉，那里的山上总是稀稀拉拉地还长着几棵草。可这里呢？他望着左面连绵不断的小山包，居然连一棵青草都不长，全是光秃秃的和尚头。太阳光从背后照到脖子上，裸露的那一小块脖颈就觉得火辣辣的。戈壁滩的阳光真是可怕！难道是太阳把山岭上的草晒死了吗？不对，因为他们行走的这条临时简易小道的右侧，有一条南北宽约两公里、东西望不到头的绿色地带。同样的太阳下，为什么独独这一片绿树成荫呢？原来，这

条绿带是相对较低的盐碱滩,地下水位高,适合耐盐碱的植物如红柳、沙枣树、芦苇、碱草子、臭蒿子等生长。这一带的土层也比较厚,正是农场的远景规划中要开发的大片农田。当然前提是要排碱。早在1954年,农业和水利专家就为这里的盐碱滩勾画出了一幅美妙的农业开发图。高尚斌们就成了把这幅美好开发图变为现实的实践者。至于实现这张蓝图要付出多少代价,高尚斌们是不知道的。越往西走,越是离新添墩作业站近的地方,地上的盐碱越重。地面上泛着白色,从鼓起来的一个个土包看,应是干燥而又松软的,但用脚一踩,才能感觉到那是硬邦邦的板结的地面,如果拿一个棒子敲击,估计会发出当当的声响。这么硬的土里,竟然长出那么多叫不出名字的植物,高尚斌对它们的生命力佩服极了。

在新添墩作业站,高尚斌经历了与李景沆、傅作恭、马述麒、王景超们一样的苦难和折磨,但他侥幸活了下来,并在1960年底被转移到了高台县明水农场。

“高爷爷,你的的信!”2002年7月底的一天上午,小聂像一阵轻风似的来到病榻前,唤醒了迷迷糊糊的高尚斌。打开大信封,是两份2002年7月23日的《上海金融报》。这份报纸的第一版,套红刊登了一整版的题为《建设大西北的先行者——纪念上海金融职工支援大西北建设五十周年》的长篇通讯,通讯配发了四张彩照和一张黑白照片。高尚斌激动万分,他要细细地阅读,他有充足的可供阅读的时间。阅读,可以勾起他许多美好的回忆。通讯近万字,开头是叙述上个世纪50年代初全中国和上海的历史背景,祖国建设特别是落后的大西北经济建设亟需多种人才的状况。上海金融系统经过广泛动员,员工们积极报名,然后分六个小标题详细地报道了上海人民的优秀儿女这一次报效祖国的壮行。这六个小标题分别是:“艰辛的万里行程”,“经受了磨炼和考验”,“在边疆扎根、开花、

结果”，“难忘的会面”，“半个世纪后的公正评说”，“拍摄以此为题材的电视剧”。

高尚斌几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读的。读到“去西北的同志经受了‘左’的路线下不公正的待遇……”时，泪水又一次模糊了他的双眼，他又想起了他的妈妈，那个已经弱不禁风的上海老太太出现在戈壁滩上的高台县明水农场的那一幕——

从夹边沟新添墩作业站转到高台明水劳教农场之前，高尚斌把他身上所带的最后一点积蓄——一小块约十多克重的黄金——都拿出来了。他用这块黄金换了二两炒面，他又用这些炒面和一缸子开水冲了一碗炒面汤，几口就喝光了。用现在的价格换算，就是一千块钱买了二两炒面。从此后，他连一文钱也没有了。到了高台明水农场半个多月之后，高尚斌先是发现自己的双脚穿鞋时不如以前利索了，开始还不太在意。又过了两天，鞋好像突然变小了。他这才意识到出现在许多难友们身上的浮肿，在自己身上开始了。他所能采取的惟一措施就是静卧不动，以减少能量的消耗。实际上，每天两顿稀汤，就是想活动，也没有多少力气走动。大家就都躺下不动，连上一趟厕所都很困难。就在这以后的几天中，高尚斌身上浮肿的部位迅速扩大，程度也在加重。眼看每天都要往外抬死人，高尚斌心中一阵恐惧，他真害怕厄运有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让他葬身这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他太想念他远在上海的爹娘了，当初，他如果不去积极报名支援大西北经济建设，好好守在父母亲身边，就好了。多么优越的生活条件！多么温馨的小家庭！为什么昏了头非要来大西北不可呢？现在，自己到这个份儿上，活着回去的希望已是越来越渺茫了，可怜自己的妻子和两岁的小儿子还留在临洮县城，谁来关照？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孩子两岁就失去父亲，谁把他抚养成人？高尚斌简直不敢往下想。

可能是死人的势头过于迅速，农场方面已无力进行抢救，为了依靠外部力量遏制这种势头，农场方面宣布：允许劳教人员写信或发电报向家中求援。

高尚斌知道，他在几天之内如果得不到家中的援助的话，他就要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但他不能离开，他要千方百计地活下去。他把上海的父母亲一方和临洮的妻儿一方作了个比较，最后决定向上海求援。他很快向上海家中发出一封“儿有病速来”的电报。

接到高尚斌发自高台明水劳教农场的电报，远在上海的高尚斌的父母亲万分焦急，第二天就登上了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经过整整三天的颠簸，来到了高台。下了火车，眼瞅着两只大木箱，高尚斌的母亲犯愁了。这么大的两个木箱，还有十几里路，怎么拿到农场去呢？她央求两位农民模样的人帮她把箱子扛到农场，每人给四元钱的酬劳。两个农民答应了，一人背一个箱子，将两箱上海买的食品连同高尚斌的母亲一起送到了明水劳教农场。

电报发出以后，高尚斌还拖着浮肿的双腿参加了一次批判会。有天晚上，孙xx悄悄溜出地窝子，找到埋死人的墓坑，由于他早有准备，加上坑挖得太浅，他很容易就从坑里的尸体上割下了一块肉。孙xx在炉子上煮这块肉的时候被人识破。于是，管教干部召集了批斗大会。会议主持者历数了孙xx的罪行之后说：今天你吃人家，明天人家要吃你，这是野兽干的事情，作为一个人，怎能这样做？主持者说完之后，就号召大家“打！往死里打！”于是，干部带头，打得孙xx扯破嗓子求饶。但是，求饶归求饶，人肉还是照样偷着吃，不管明天别人吃不吃他，因为孙xx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了。就这样，孙xx后来居然活着出去了。

这时候的高尚斌已经非常虚弱了，腿肿得老粗，脚已经肿得穿不到鞋里去了，所剩力气只够翻个身用，想坐起

来已十分困难。母亲千里迢迢来到高尚斌床前的时候，高尚斌已经起不来了，惟一能向母亲表示的动作就是双眼中涌出了一股热泪……母亲扑到高尚斌床上，用双手抱着儿子的脸，像看着一个怪物一样久久地盯着眼前这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儿子。

对于夹边沟、明水以至于全甘肃省的大饥荒，母亲在上海就已经有所了解。这一次，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上路之前，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两个大木箱中，装的全是吃的东西，有白面、大米、鱼和大肉罐头、饼干等。并且咨询了一些救治因长时间饥饿导致浮肿的病人的方法。不能让儿子马上就吃干的，那是很危险的。母亲用饭盆给高尚斌做了一些白面糊糊，一勺一勺地喂到儿子嘴里。严重浮肿的高尚斌只能微微张开嘴，咽下母亲喂到嘴里的面糊糊。眼看每天都要抬出去一些尸体，高尚斌的母亲极为恐惧，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不管下什么工夫，她都要救活儿子的命。经过母亲五六天的悉心照料，高尚斌的浮肿逐渐消退。

看到了儿子有了生还的希望，母亲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她庆幸自己及时赶到了明水农场，也认为自己当时在上海东挪西凑，搞了那么两箱食品所做的各种努力非常值得。就因为她这么做了，儿子才没有像他的许多难友那样永远葬身在戈壁荒滩。想起来真是有些后怕，当时在上海如果稍一犹豫，相信媒体报道的“形势大好”，相信儿子还不至于饿到全身浮肿的程度，不带上充足的食物来探望，恐怕儿子就没命了！

入夜，母亲和儿子挤在一个土台子上，听着儿子均匀的呼吸，放心之外又生出些埋怨来：“尚斌，你们一起从上海来了两千多名金融职工，人家不当右派，为啥偏偏你当了右派？人家当右派都在原先的单位改造，为啥偏偏让你到夹边沟和明水？你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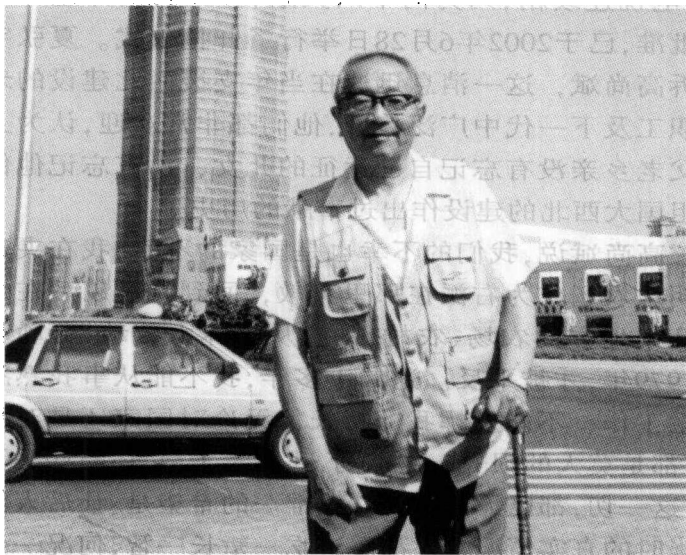
的事？”高尚斌说什么好呢？说因为他看见了他们的领导与女职员干那事？他能说清楚吗？怎么开口呢？高尚斌只好说：“我没有干什么事情。”母亲是断然不能相信的，因为她明白，都是反右派，全国应该是一个政策。上海的那些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吴茵等，都是些有名的右派分子，都是专门搞捣乱的。这是1957年7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的。毛泽东主席的话还能错吗？他们这些人，有的原来就是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中的右翼，他们历来代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跟共产党本来就不是一条心。还有一些在解放以前本来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当权人物，解放后跟上共产党，也是假心假意，平时不敢抛头露面，这次以为天下要大变了，就猖狂地向党进攻。还有一种是政治上一向不满的人，这次以为是逮住了机会，也向党进攻。你高尚斌是啥？你解放前就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还是大队副政委，你凭什么跟那些右派分子一个鼻孔出气？母亲又气又恼又惋惜，她一定要问出个究竟。但她的询问注定是一场徒劳，因为高尚斌本人除了偶然看到了单位领导搞女职员外，对其他所谓罪证，他自己也是懵懵懂懂，怎么能给母亲说得清楚呢？

有了母亲带来的各种食品，高尚斌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一周后，他不但能够很轻松地坐起来，还能下地活动了。这时候已经到了1960年12月上旬。母亲告诉高尚斌：我必须回到上海去，再给你筹办些吃的东西，不然还是要饿死。我走了，少一张嘴，这些食品你还可以多贴补一段时间。你节约着吃，省着吃，一定要坚持用够一个月时间，不是说要吃饱，不要饿死就行了。上海那边也很困难，但是再困难也得给你想办法。我一个月以后才能再来，坚持不到一个月，我也就没有办法了，你记好了。

这位母亲把自己三十多岁的儿子当成了幼儿，她不

厌其烦，一遍一遍地交待。母亲对儿子的安危太不放心，儿子在这里的处境太让她牵肠挂肚了。

好在甘肃方面开始了“紧急抢救人命”行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高尚斌被送回临洮抢救。他活着走出了夹边沟和明水劳教农场，成为众多不幸者中的幸存者。三十多年前，母亲给了他一次生命，三十多年后，母亲又给了他一次生命，给一次生命，就恩重如山了，给两次生命呢？高尚斌自己说，他对“母亲”二字的体会超过任何人。但是，这位伟大的母亲却到临死的那一刻都没有享受一次这个儿子的侍奉。作为阶级敌人、阶级异己分子，高尚斌没有条件到上海去尽孝道。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母亲才被高尚斌的弟弟接到武汉养老。母亲直到病危时都坚决不让弟弟告诉高尚斌有关自己的病情，以免给多灾多难的儿子增加精神和经济上的负担。弟弟尊重了母亲的嘱托，直到把母亲的遗体火化之后，才把噩耗告诉了高尚斌。想到



2000年，七十三岁的高尚斌在上海

这些,高尚斌就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荒凉的戈壁滩上,低矮的地窝子里,千里迢迢带着两个大木箱的母亲从上海到高台。本应是自己孝敬老人的年龄,却连累老人去挽救自己的生命。今生今世,他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母亲,而母亲却到死都不愿给儿子增加一点点负担!

电话铃响了,小聂接上了电话。只要小聂在家,每次有电话都是她先接,能回答或办理的事情,她就代劳了,因为高尚斌太不方便。“高爷爷,您的电话,找您呢!”这显然是小聂无法代劳的。上海的电话,是夏弘宇打来的。夏弘宇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原副行长,退休以后,经常为新闻单位写点新闻稿,那篇《建设大西北的先行者——纪念上海金融职工支援大西北建设五十周年》的通讯,就出自夏弘宇之手。他告诉高尚斌,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十六大的召开,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决定,将以上海金融职工支援大西北建设为题材的《青春马兰草》电视连续剧,列为向十六大献礼的剧目,并经广电总局批准,已于2002年6月28日举行了开拍仪式。夏弘宇还告诉高尚斌,这一消息迅速在当年支援西北建设的老金融职工及下一代中广泛传开,他们都非常欢迎,认为上海的父老乡亲没有忘记自己远征的儿女,没有忘记他们曾为祖国大西北的建设作出过奉献的历史。

高尚斌说,我们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我在夹边沟和明水农场作为右派在那里劳教,回到临洮以后在北山等几个地方的农场、农村,一直从事体力劳动、劳动教育到1979年,才被平反。这二十多年,我不能从事我熟悉的金融工作,不能发挥我的特长,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我个人,都是莫大的损失。这期间,我妻离子散,还险些丢了性命,这一切,都已无法弥补。我惟一的希望是:让后人能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人都要讲吃一堑长一智,何况一个国家和社会?但愿悲剧不再重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作者=邢同义著

页数=374

SS号=12244790

DX号=

出版日期=2004.10

出版社=兰州大学出版社